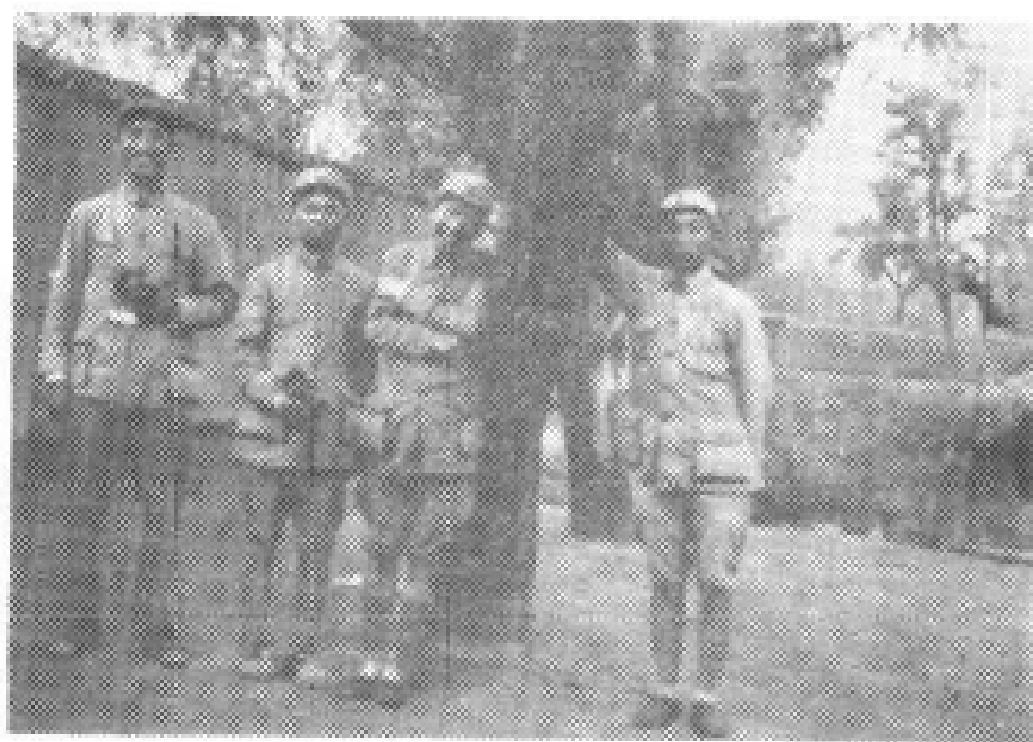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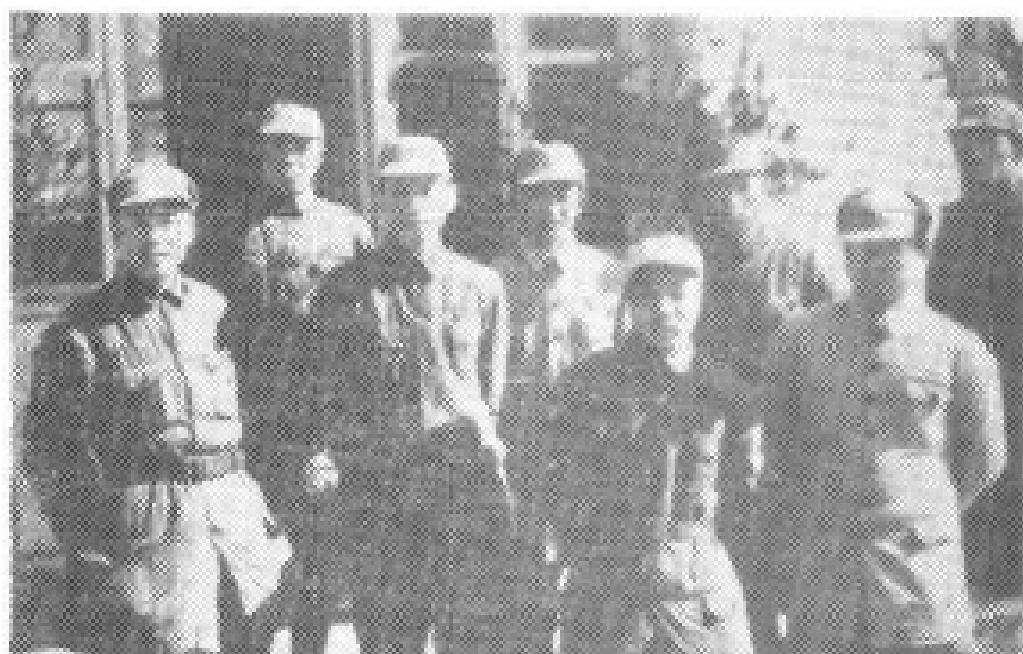


艰苦奋战的冀鲁边
徐向前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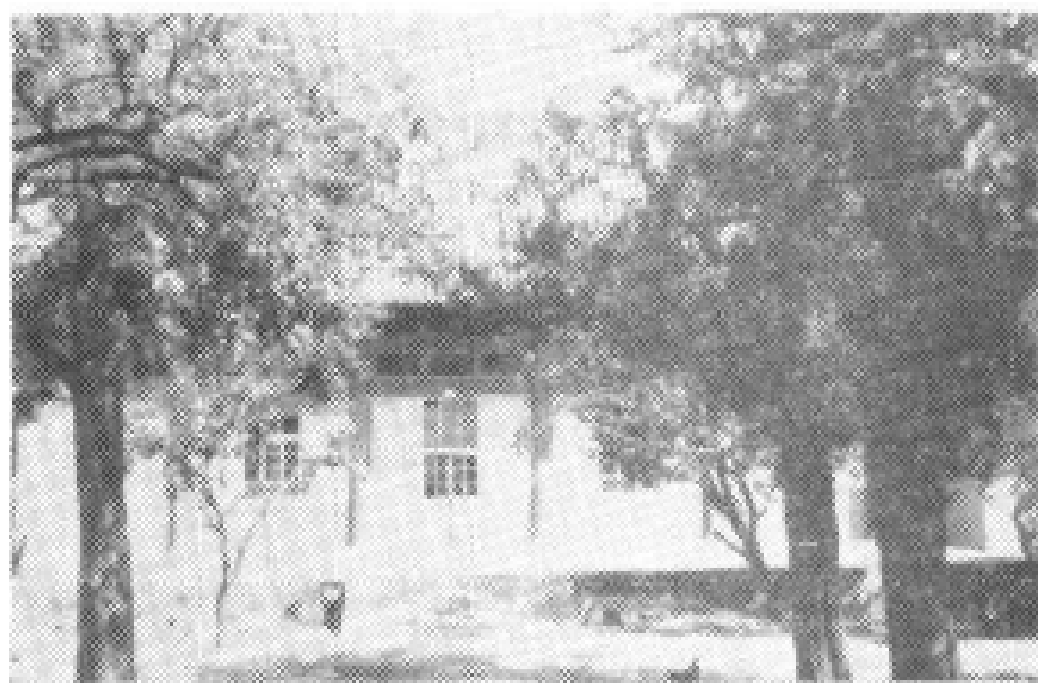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夏，肖华（右一）、符竹庭（左二）等同志率挺进纵队东进时，在冀南南宫与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左一）、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右二）合影。



一九四二年刘少奇同志（左三）在山东检查工作时，对冀鲁边根据地作了重要指示。这是他当时与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同志罗荣桓（右二）、陈光（左二）、黎玉（左一）、肖华（右四）等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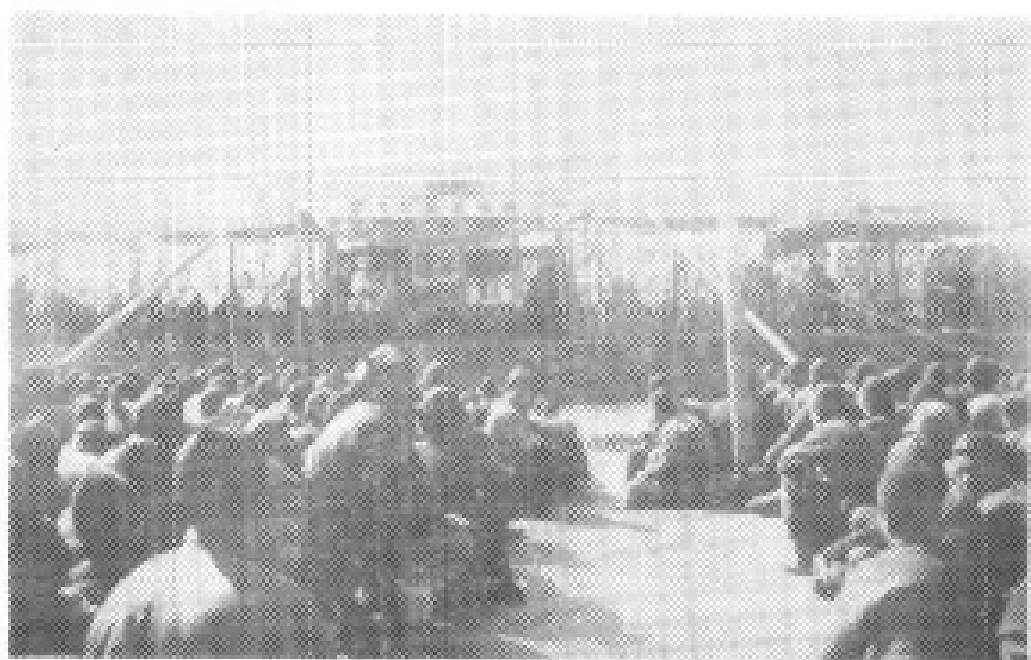
八路军东进抗日
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
委肖华于一九三八年
留影。



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举办党政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的基地——乐陵城文庙。



八路军一一五师
教导六旅政委兼冀鲁
边军区政委周蔚于一
九四〇年留影。



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在两区（冀鲁边区、清河区）合并后召开的“扩军参军大会”上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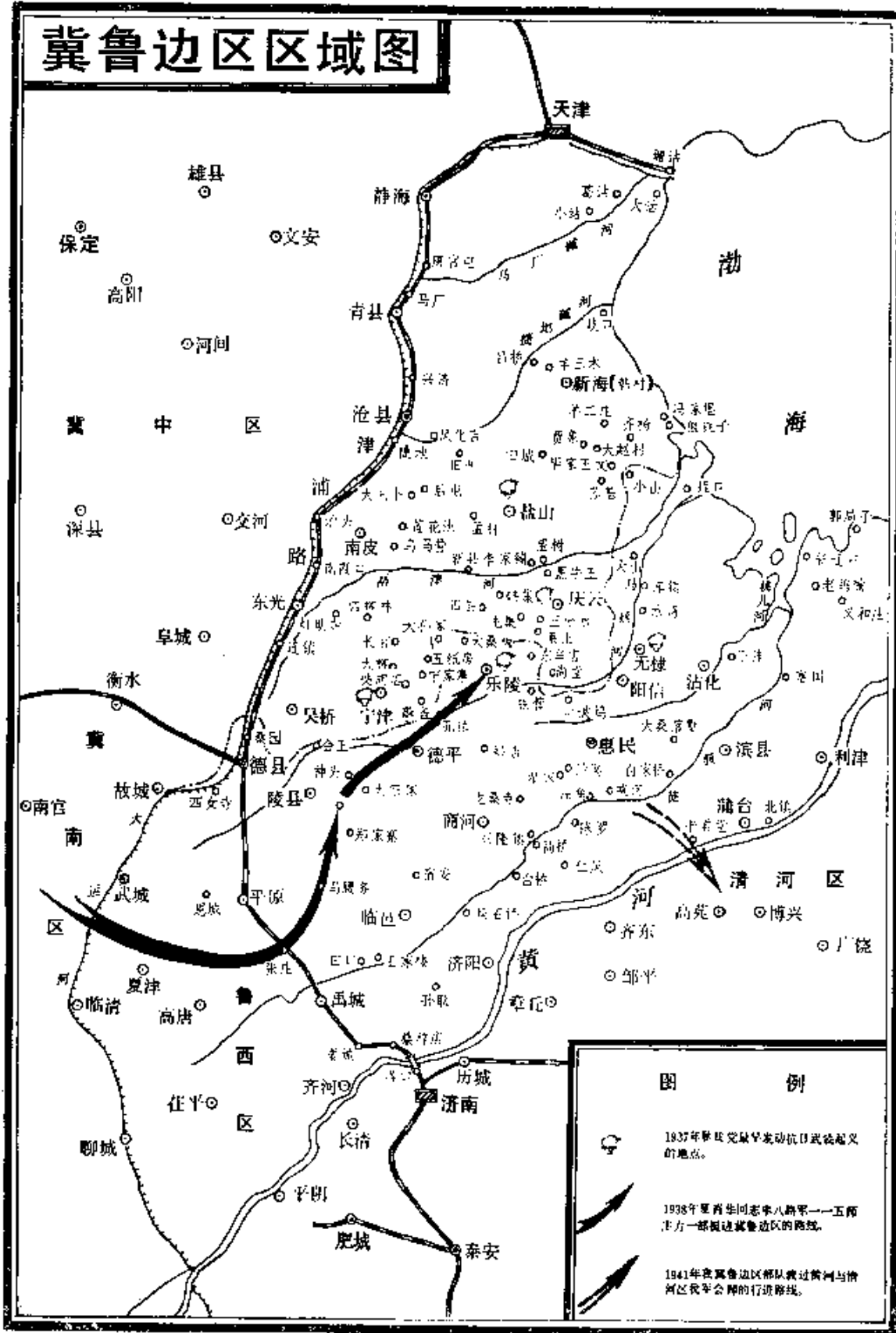


八路军一一五师
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
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
群烈士遗像。



渤海根据地行政公署负责同志和冀鲁边区、清河区抗日烈士的子女，同过中秋节。

冀鲁边区区域图



序

肖 华

翻阅周贯五同志的回忆录《艰苦奋战的冀鲁边》，感情的潮水难以抑制，我仿佛重新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我所熟悉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一幕幕血影刀光、英勇悲壮的往事，又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冀鲁边区的辽阔平原，是山东与河北突出的结合部，直接威胁着日本侵略者的南北大动脉津浦铁路，威胁着敌人的海上通道，威胁着天津、大沽、济南、德州、沧州等敌人的战略据点。它的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一九三七年秋，我八路军主力奉中央军委命令，挺进敌后，先后在华北各省收复了被国民党遗弃的大片国土，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我党我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震撼了日本侵略者。武汉失守之后，日军即抽调正面主力回师华北，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冀鲁边平原首当其冲，成为敌后斗争极其尖锐、极其残酷的地区。风回海上，波澜争立，血花溅处，烈火更红。在毛主席关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下，冀鲁边的党政军民同仇敌忾，生死与共，以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迎接着炮火的洗礼，用鲜血和生命，用

116

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蚕食”、“剔抉清剿”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武装挑衅，保卫着边区，保卫着家乡，使冀鲁边游击根据地岿然屹立于星罗棋布的碉堡群里，刺刀丛中，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这辉煌的胜利，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归功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归功于冀鲁边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前仆后继、壮烈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就有七十多名，基层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更是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渤海的碧波，广大军民燃起的抗战烽火照红了巍峨的泰山，杨靖远、马振华、杨忠、黄骅……等无数烈士的英名辉映着冀鲁大地。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惊天动地，气壮山河，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华儿女蔑视强暴的、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和共产党人的革命性格。

周贯五同志作为当时冀鲁边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率部在冀鲁边工作战斗，时间最长，从根据地的创建，直至抗战胜利。岁月沧桑，而今周贯五同志已年逾八十，然而雄心未泯，老当益壮，在迟暮之年，仍以崇高的革命责任感，不辞劳苦，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文学色彩浓郁的笔触，撰写了这部事件纷纭、人物众多的回忆录，将人生的余热和心血奉献给人民。这种精神，感人尤深。这部回忆录的有些章节，也提到了我，作为一名从冀鲁边烽火中走过来的老战士，在党的领导下，我仅仅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工作，尽了一个人民勤务员应尽的义务。作为战争岁月中的幸存者，我时刻怀念着那些同我朝夕相处过的逝去者，并决心为他们的未竟事业继续奋斗，在余年再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样，才不负先烈们鲜红的热血。

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历史，是最闪光的篇章；革命者回忆

过去，缅怀既往，是为了现在和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艰苦奋斗的冀鲁边》这部资料繁富、内容充实的回忆录，就不仅仅是一部血火交织的有价值的革命战争史料，而且是一部向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在新长征路上，年青的朋友如能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化为艰苦奋斗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工作，我想，长眠于九泉之下的革命先烈是会感到欣慰的。

一九八三年一月

目 录

东进敌后

- | | | |
|-------|------|----|
| 第 一 章 | 受命东进 | 1 |
| 第 二 章 | 烽火平原 | 9 |
| 第 三 章 | 针锋相对 | 19 |
| 第 四 章 | 晓以大义 | 43 |
| 第 五 章 | 除暴安民 | 59 |

保卫边区

- | | | |
|-------|------|----|
| 第 六 章 | 旗开得胜 | 69 |
| 第 七 章 | 雪夜奇兵 | 79 |
| 第 八 章 | 告毙安田 | 89 |
| 第 九 章 | 战火迎春 | 99 |

转危为安

- | | | |
|---------|--------|-----|
| 第 十 章 | 接受重任 | 114 |
| 第 十 一 章 | 吴桥除霸 | 123 |
| 第 十 二 章 | 斩断“铁腿” | 136 |
| 第 十 三 章 | 剥掉伪装 | 144 |
| 第 十 四 章 | 出奇制胜 | 152 |
| 第 十 五 章 | 友邻支援 | 162 |

东渡黄河

第十六章	空中桥梁	171
第十七章	徒骇河畔	180
第十八章	黄河初渡	188
第十九章	兵分两路	194

艰苦突围

第二十章	柳林英烈	211
第二十一章	激战王楼	221
第二十二章	宁死不屈	234
第二十三章	民族忠魂	242

“笼”中奋威

第二十四章	胡服指示	251
第二十五章	地道斗争	258
第二十六章	鱼游水中	267
第二十七章	瓦解伪军	279
第二十八章	挫败诡计	290

反攻前夕

第二十九章	特殊斗争	300
第三十章	回民支队	318
第三十一章	拔除“钉子”	328
第三十二章	渤海怒涛	336

后 记

东 进 敌 后

第一章 受命东进

那是一九三八年夏初的事情。

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我所在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在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后，继续转战于正太路与晋西敌后，相继取得了广阳、午城、井沟等数次大捷，粉碎了日寇觊觎陕北的企图。

六月的一天，我们风尘仆仆地向同蒲铁路逼近，准备在这一带寻找新的战机，继续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傍晚时分，我们来到同蒲路西侧一个叫兑久峪的山村里。

兑久峪，这是我们多么熟悉的地方！记得一九三六年初春，我们红二师与兄弟部队一起渡河东征。山西军阀阎锡山奉蒋介石之命，派大批军队前来截击，阻挡我军开赴抗日前线。就在兑久峪，我们同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消灭反动军队两个团，给了阎锡山的精锐部队以沉重的打击。战斗中，阎锡山军队利用山边的窑洞固守，集中炮火向我军猛轰。我们占领的山头，黄土全被翻了过来，仗打得很艰苦。当时任红二师政委的肖华同志，在战斗中负了重伤。现在，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了抗日

救国，改编成八路军转战敌后，不期又来到这个难忘的山村。旧地重来，大家对这个山村感到分外亲切。

这天晚上，我们旅政治部机关就在兑久峪宿营。旅政委肖华同志和我们一样，住在一孔傍山的窑洞里。当时，我是旅政治部的锄奸科长。

在兑久峪住了两天。到第三天下午，肖华同志的通信员突然跑来通知我们：“快！肖政委叫大家去开会。”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去参加会议。

到了开会地点一看，哟！司、政、供、卫机关的人员全都来了，还有许多从附近驻地赶来的团以上干部。大家挨挨挤挤地坐了一地。我心里不由得想到：看样子，准有重要任务！

肖华同志摆摆手，让大家静下来，然后，用洪亮有力的声音说道：“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因为我们将要迎接一项新的战斗任务！”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我们。

会场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地互相猜问：“什么新任务？”

肖华同志笑了笑，伸出两个指头说：“两个字：东进！东进冀鲁边！”他见大家一时不理解，就拉开了话题：“抗战爆发以来，我们八路军三大主力遵照总部的指示，分路挺进敌后，到去年年底前后，已经初步开辟了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目前形势怎么样呢？在前方，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致使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太原相继失守。但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华北敌后的抗日斗争却如风起云涌。今年以来，总部先后派遣孙继先支队、陈再道支队、宋任穷骑兵团、曾国华支队……从太行山横越平汉铁路东进，在冀南、鲁西北等广大平原上，开辟新的敌后根据地。现在，一二九师的徐向

前副师长亲自在冀南领导军事和政治斗争。抗战的烈火已经在冀鲁豫大平原上燃烧起来了。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中央军委、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首长命令我们：组织一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向津浦路以东的冀鲁边平原挺进，与那里的抗日武装会合，建立抗日根据地！……”

接着，他概略地介绍了冀鲁边的战略位置，布置了组建东进纵队的各项具体事宜。根据师部指示，东进纵队的组建，以我们旅政治部、直属队、六八六团为基础，再从其他团和旅教导队、干部连等单位抽调一部分干部参加。纵队有数百名干部，机关分司、政、供、卫四个部门，下辖教导队、通信连、骑兵连等单位。肖华同志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原三四三旅补充团团长邓克明同志任司令部参谋长，原红二师的符竹庭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组织部长兼锄奸部长。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太阳刚刚从东方探出半个脸来，我们这支新建的东进纵队，挥手告别了战友和兑久峪的乡亲们，踏上了东进的征途。

兑久峪渐渐地远了。欢送的人群也在我们的视线中模糊了。我们都被一种新的战斗任务所鼓舞，飞快地穿过同蒲铁路，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所在的太行山区进发。

说实在的，我们这支部队的指战员，绝大多数都是红军老战士，过去南征北战，经历万水千山，到处都留下我们战斗的足迹。可是，眼下要到大平原上去行军，去战斗，这对许多同志来说，确实还是件稀罕的事情。

“平原是个什么样子？那里长些什么庄稼？在平原上行军作战会象在山地上一样习惯吗？”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围绕这个新奇而陌生的话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有的说平原可能象海，一望无边；有的说准定象草原，

一马平川……总之，全凭想象瞎猜一气。有些同志的老家在平原，这会儿他们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大家一休息就围上他们，七嘴八舌地问个不停。

不管怎样争论，怎样听人描述，大家总是感到不满足。到后来，就只嫌两脚走得慢，觉得心里有个声音在喊：快！快到冀鲁边去！

几天后，我们两脚生风似地赶到了太行山区，与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会合了。我们驻在几个不知名的小山村里，与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的驻地相距三、四里路。

在我们忙着安排宿营时，肖华同志和纵队其他领导同志就到总部请示工作去了。总部的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都在百忙中接见了纵队领导同志，对开辟冀鲁边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第二天，肖华同志召集我们纵队全体同志，传达了总部和北方局首长的指示。首长们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组织东进纵队挺进冀鲁边，是非常适宜的。早了不行，因为冀南的局面没有打开，走不过去；迟了也不行，当地的抗日武装正处在伪、顽军和土匪武装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正因为如此，两个月前，北方局首先派遣曾国华支队（以三四三旅一个营为基础组建的）进入冀鲁边，与当地抗日武装——三十一游击支队会合，共同反击伪、顽军和土匪武装的夹击。尔后，又派首下太行的孙继先支队（以一二九师一个工兵连为基础组建的）从鲁南穿过津浦路，支援冀鲁边的抗日武装。为了统一领导，北方局还委派马国瑞同志任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书记，随孙继先支队进入边区，全面指挥那里的军事、政治斗争。但是，目前边区的局势仍然很严重。主要原因是那一带的伪、顽势力很强，土匪武装、地主民团和各种反动会道门也十分猖獗。要彻

底改变这种局面，发展抗日武装斗争，还需东进纵队这样一支武装骨干力量介入。

因此，东进纵队面临着三大任务：一、打垮日、伪、顽、匪的四面围攻，借打胜仗迅速地发展抗日武装，同时整顿改编三十一游击支队；二、大批培养干部；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逐级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首长们还指示说：冀鲁边区北迫天津，南接济南，西面威胁着津浦路，东面控制着渤海湾，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那里是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侧翼屏障，对于保障黄河东南岸的清河区抗日根据地，也有重大意义。只要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就等于在敌人心脏里插上一把锋利的钢刀！因此，一定要把冀鲁边区建设成坚如磐石的抗日根据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那里独立自主地坚持游击战争，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听完传达，大家的情绪十分振奋，都为执行这样光荣的任务感到高兴；同时又意识到任务非常艰巨，心里沉甸甸的，象揣着块石头。前几天行军的路上，我们被一种新奇感所吸引，又吵又闹，象群过节的孩子。现在，我们才真正意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是一场严峻的斗争！我们要用血，用生命去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插上一把致命的钢刀——这任务多么艰巨啊！

我们怀着渴望战斗的心情，又踏上了东进的征途。一路上，我们飞也似地前进，越过平汉铁路，穿过冀南平原，奔向冀鲁边区。

七月初的一个傍晚，夜幕拉开，月亮也升起来了。我们借着月光，静悄悄地逼近了津浦铁路。渐渐地，津浦路呈现在眼前；在灰蒙蒙的月光下，路基高高地耸着，北不见头，南不见

尾，象一条巨大的蟒蛇，黑乎乎地横卧在旷野里。

当时敌人对津浦路封锁还不怎么严，但是，铁路两侧的气氛也很紧张：远处隐约可见高大的岗楼，更夫“梆梆”地敲着竹筒，不时有装甲车隆隆而过，车上的探照灯射出刺眼的光，在空中乱扫，再加上偶尔响起的零落的枪声……这一切，给人以一种沉闷的压迫感。

担任前哨的几名战士，分头向南北两头警戒去了。我们在冀南区党组织派来的向导带领下，卧倒在路西的一大片小米地里，睁大眼睛，注视着铁路两侧的动静。

正在这时，“呜——！”一声长鸣的汽笛响过，日寇的一辆运货列车从北向南驰来。顿时，“轰隆轰隆”的响声震天动地，我们身子压着的地皮似乎也颤动起来。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不知是谁骂道：“这班狗东西！又往前方送枪送炮，屠杀我们的同胞去了。等着咱明天来收拾你吧！”

这列火车过后，“轧轧”的响声还在耳边，猛地有人喊了一声：“大家快过铁路！”我们从小米地里一跃而起，冒着纷纷散落的煤烟，箭一般地冲上路基，跨过铁路。过了铁路便是冀鲁边区的平原县境。我们现在已经踏在边区的土地上了。

经过一夜行军，第二天凌晨，我们跨入了陵县境内。这时候，东方渐渐地亮起来。不一会，太阳出来了。灿烂的朝晖照亮了平原。啊，这是多么美丽的大平原呀！那太阳，似乎是从地面上爬起来的，又大又圆，血红血红，仿佛近得可以用手去摸它；这庄稼，满地的玉米、高粱、花生、大豆，全都是绿油油的，象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清新的晨风吹来，庄稼波动起伏，犹如波浪滚滚，一直涌向遥远的天际。

这平原景象几乎把我们迷住了。我们贪婪地望着这瑰丽的景色，只觉得眼前金光一片。大家都大口大口地吸着清新的潮

润的空气，让这充满泥土香味的新鲜空气装满心胸。真是惬意极了！

有的人不禁高声欢叫起来：“哎呀，多好的大平原哪！”

我身旁有人接上说：“这可是青纱帐呀！千儿八百的部队往里一钻，影子也见不着，可得叫鬼子尝尝咱们游击战的滋味了。”

“你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后边有人插话道：“现在固然好，到了秋天，地里庄稼一收，光秃秃的一片，几十里外都望得见人，看你怎样游击？鬼子来的都是骑兵、汽车、坦克，那就有你好受的呐！”

“是啊！”听了这话，许多人都愣住了。

这时，肖华同志骑着马过来了。他看到这情景，翻身跳下马来，牵着马缰一边走，一边笑着说：“刚才这位同志提得对，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们还没有平原游击战的经验，但是这不要紧，可以摸索嘛！总不能叫敌人给吓倒吧。这土地是我们的，群众也是我们的，我们还有党的领导，还怕斗不过鬼子吗？”

我也插上说：“地形是死的，可人是活的，要能把地形加以改造，也能变不利为有利。”

肖华同志说：“对！反正鬼子就象孙悟空跑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最后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他默默地走了一阵，又接着说：“冀鲁边这一带，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臆、名将廉颇，宋朝的杨家将……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都在这块土地上征战过，他们的逸闻轶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接着，他就拉起杨家将的故事来。

北宋抗辽名将杨延昭，人称“杨六郎”，曾在沧州、东光

一带任保州防御使，后来调到高阳县镇守“三关”，使辽兵闻风丧胆，不敢轻易图犯中原。传说他的儿媳妇、巾帼英雄穆桂英也是抗辽名将，曾一举大破洪州（即现在的沧县旧州），收复许多州县。沧县东南有片小树林，名叫“挂甲林”，就是穆桂英在去洪州的路上挂甲歇息的地方……

讲完这个故事，肖华同志又深情地说道：“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维护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杨家将只是其中的一个优秀代表。今天，党叫我们在这块先人洒过血汗的土地上战斗，这是多么神圣的使命！别说眼前这点困难，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顶得住！”

一番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我们默默地沉思起来。我想起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我们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在行军的路上，沿途到处都可以看见目不忍睹的悲惨景象：大批的村镇被日寇的飞机炸成了废墟；田野一片荒芜；许多人家骨肉离散，到处流浪；有不少地方成了“无人区”，走上八里十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到一声鸡鸣犬吠……民族仇恨的烈火，时刻在我和同志们的心头燃烧，激励着我们去同日寇殊死血战。现在，肖华同志讲的故事，又激起了我们对日寇的仇恨，并使大家沉浸在一种收复河山、拯救民族的崇高责任感里。

队伍静静地行进着，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和“得得”的马蹄声。路两旁的庄稼拂在脸上、手上，我们都似乎感觉不到……

当天下午，我们到达陵县神头镇。在神头稍事休息后，次日继续挥师北上，两天后，我们进入了冀鲁边抗日游击区的中心——乐陵县城。

第二章 烽火平原

当我们进入乐陵县城时，受到了马国瑞同志和曾国华支队、孙继先支队以及当地抗日军民上万人的夹道欢迎。行至县城西关，我们参加了地方党组织召开的隆重的欢迎大会。马国瑞同志、肖华同志、国民党乐陵县长牟宜之和三十一游击支队领导人，先后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竭诚拥护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一致，齐心抗战。会场上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抗日军民一齐放声高唱，抗战的歌声响彻云霄。

会后，我们同边区党组织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亲切交谈，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抗战形势等情况，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冀鲁边区，拥有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北部相连的一大片地域，约六百万人口。这片地域包括二十四个县：沧县、南皮、东光、宁津、吴桥、庆云、盐山、新海（以上八县统称津南，属河北省）、乐陵、商河、惠民、阳信、沾化、无棣、德平、平原、禹城、陵县、临邑、济阳、齐河、滨县、利津、蒲台（以上十六县统称鲁北，属山东省）。一马平川的冀鲁边平原，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尤其是它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南北威胁天津、济南，东则可以封锁渤海湾，向西可以控制津浦路和运河水道。

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寇继续南侵，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北平、天津和冀鲁边区的大部分城镇相

继失守，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伤亡惨重，溃退下来；九月十日，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也率众仓皇南撤，于是济南沦陷；十二月底，华北平原几乎全部沦入敌手。

这时候，冀鲁边区二十四县的国民党政府消失了昔日的威风：大小衙门封窗闭户，文武官员销声匿迹。再者，日寇急欲“三个月灭掉中国”，在华北平原只是占领点、线，还来不及培植出伪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冀鲁边区暂时成了无人管辖的“真空”地带，似乎是被人遗弃的荒原僻野。肥沃富庶的土地上，弥漫着战火硝烟，裸露出被日寇铁蹄践踏过的斑斑伤痕，到处可见散兵游勇，遍地都有饥馑饿殍，呻吟、哭泣之声，惨不忍闻。

我们知道，冀鲁边地区民性强悍，人尚勇武。管子曾说过：此处傍临黄河，“水道遒劲而急，故其民粗而勇”，自古以来多悲歌慷慨之士，但“顽梗好讼，饰词相讦”者亦屡见不鲜。更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青皮、白赖，以及啸聚丛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另外，冀鲁边自古以来兵患频繁，遗散在民间的武器颇多，而且这块平原上的碱土、苧麻和枣树，极易制成炸药、火硝。这一切，都是发展武装的有利条件。

是非之地适逢多事之秋。沦陷后的冀鲁边平原上，迅速地冒出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增添了许许多多的混乱。譬如商河县，县城东南有孙唐臣的队伍六百余人，张训杰的队伍三百余人，李介峰的队伍二百余人，张老十的队伍三百余人；县城南面有展老八、赵栾的一贯道、九宫道；县城西面有张德功的队伍四、五百人……。这类武装多如牛毛，仅临邑一县就有七十二股，什么何狗子、赵瞎子、周蚊子、顶水子、马银子、谢八子、田旺子、李胖子、郭五嘟噜子、马大疙瘩子……。人马较多、实力较强的有：盐山的刘彦臣部，无棣的张子良部，阳信

的王福成部，惠民的刘景良部，吴桥的张国基部，德平的曹振东部。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兔子乌龟满地跑，土鳖司令多如毛！”极言地方武装势力之多。

这些应运而生的武装，大都属于地主民团和土匪。虽然全部挂着抗日的旗号，但脑后却藏着复杂的嘴脸：有的胸怀民族意识而无谋略大志；有的奉国民党为正宗，反共气焰嚣张；有的满嘴收复国土，暗中却与日寇勾结；有的见乱举兵，趁火打劫；有的拥兵自重，窥测时局，伺机择主……

这些蜂起的乌合之众，趁着兵荒马乱，割据称雄，相互并吞。今日这里内讧，明日那里交战。在同一个村庄，这伙派粮的人刚走，那伙又来征集车马。老百姓已经被日寇的烧杀抢掠弄得颠沛穷困、惶惶不安，哪里还经得住这么多牛毛司令的搜括，不知有多少人家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

然而，在这民族危亡，百姓灾难深重的严重时刻，冀鲁平原上一支真正抗日保国的人民抗日武装，已在旧县镇崛起。

旧县镇是个古镇，又名千童城。它座落在冀鲁两省的交界线上，中间十字街的南街和西街伸进山东乐陵县境，北街和东街却进入了河北盐山县境。这个古镇位于冀鲁边区的中心。

“七七”事变后，冀鲁边区的中共地下党在旧县镇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着手组织抗日武装，通过各种渠道去向“联庄会”、“乡农学校”甚至地主豪门征集武器，并用“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去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但是要做到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在党领导下的，包括大批民主人士在内的群众团体，去进行广泛的动员、组织工作。

“七七”事变后的旧县镇第一个大集（墟会），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边区党组织领导人马振华、邸玉栋等同志，将边区内具有较高声望和影响的一些开明士绅，邀请到旧县镇进

行商谈，取得了他们对我党组织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同情和支持。七月十五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北民众抗敌救国总会”（后改名为“抗日救国总会”）。总会下设十三个分会，宁津为七分会，盐山为九分会，无棣为十分会，新海为十一分会，庆云为十三分会……。抗日救国总会公开对外的发起人有八位：傅炳翰、邢仁甫、崔季章、周砚波、李子英、杨铮候、杨铮江、吕墨翰。

抗日救国总会和十三个分会一成立，会员们便高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以拯救中华民族为目的，广泛动员群众，积极从事抗日武装的筹建工作。当时冀鲁边有几支抗战前为护运私盐拉起的队伍，武器装备较好，兵员成份大多是农民穷哥们；领头的主要是崔月楠、刘子芳，也都是铁铮铮的热血汉子，胸怀保国之心，倾向抗日。救国总会在同崔、刘经过几次接触之后，便将这几支队伍争取过来，随后便以这几支队伍为基础，成立了抗日救国军。救国军的旗号一树起来，消息马上传开了，四乡八邻的青壮年纷纷前来投奔，队伍发展极快，不久便扩大到一千多人。司令由邢仁甫担任，他曾在旧军队里当过参谋，懂得点军事常识。政治部主任是范普泉，副主任是崔月楠。救国军下辖四个团：一团团长崔季章，二团团长李子英，六团团长杨铁珊，特务团团长邢仁甫、副团长路牟班、政治处主任马振华。

抗日救国军得以及时建立，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冀鲁边区已有在长期领导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在一九二二年，边区就有我地下党员在活动，一九二四年在庆云、乐陵一带建立了党支部，后来又建立了中共鲁北工委和津南特委（津南特委成立于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津南特委领导下，盐山县群众反对国民党当局的硝

磺税；庆云县近万名群众，反对国民党政府征款占地强修马颊河，涌进县城，冲入县衙门。这两次斗争最后失败了，津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特委书记刘格平被捕。鲁北工委的核心领导，也于一九三七年夏转移。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年底，津南特委由河北省委派来的赵博任书记（赵到中央参加会议后就留在中央，特委实由马振华、邸玉栋主持工作），兼管鲁北。此时冀鲁边归河北省委领导。同年年底，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派于文斌任鲁北工委书记，于也兼管了津南。此时冀鲁边归山东省委领导，直至一九三八年于文斌同志牺牲。这以后，河北省委派李启华、北方局派马国瑞先后来到冀鲁边，冀鲁边复由河北省委领导。自一九二四年边区建立党支部以来，党组织虽几经挫折和变迁，但越往后越加壮大，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如果没有这一条，边区就不可能在“七七”事变后及时建立和迅速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救国军。

救国军成立之后，为了取得合法名义，派参谋王昭明去武汉找国民党政府领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国民党政府批准救国军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委任邢仁甫为支队司令，王昭明为副司令。支队司令部的领导成员，还有参谋长周凯东，政治部部长崔月楠，秘书长张秀石，副官长张耀增，政训处长范普泉。司令部下设八大处。三十一游击支队下辖部队二十四路：一路指挥刘子芳，二路指挥李子英，三路指挥杜步舟，四路指挥罗宝炎，五路指挥冯立刚，九路指挥郑松林，十路指挥李之阳，十一路指挥刘虎臣，十二路指挥张策平，十六路指挥赵元顺，十七路指挥张春阳，十八路指挥傅祥吉，十九路指挥艾栋臣，二十一路指挥夔同义，二十二路指挥张策平，二十三路指挥李景文，二十四路指挥张宣武。其中为避免和八路军混淆，缺编第八路。余下几

路指挥的姓名现在记不清了。

三十一游击支队的番号在盐山县东南的杨家小营正式宣布以后，河北省委又派来了杨靖远、史甄、赵涣文、吕器等同志，以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

国民党得知我党在冀鲁边建立了武装，他们也在冀鲁边慌忙地恢复政府、发展武装。继韩复榘之后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收编了刘景良等几股较大的土匪地主武装，委任刘景良为鲁北督察专员兼鲁北保安司令、CC分子马泉如为鲁北党部主任兼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原沾化县县长薛儒华为副专员兼保安副司令，命令他们坐镇惠民，控制商河、阳信、沾化等几个县。鲁北保安司令部下辖三个旅。另外，沈鸿烈还在冀鲁边任命五人为山东省保安部队旅长：×××为四旅旅长，曹振东为五旅旅长，张子良为六旅旅长，于志良为七旅旅长，张训杰为八旅旅长。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也任命吴桥的张国基为河北省民军第二路指挥，下辖部队数千人。

与此同时，日寇也在华北收罗汉奸，拼凑伪军，建立伪政权，实施对占领区的控制。他们重用驻沧州的伪军头目刘佩臣，任命他为伪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为了加强刘佩臣在津南的力量，还特地从伪“满洲国”调来程照瑞的一支精锐部队和冀东大汉奸殷汝耕的几支人马，归他指挥。

我三十一游击支队集结在旧县一带。四周分布的日伪力量想消灭我军，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土匪武装也企图吞并我军，存心制造磨擦。三十一游击支队处在各种势力的包围之中，处境十分艰苦。但我军本着一切服从抗战的精神，对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土匪武装的挑衅，能忍则忍，能让则让；而对日寇和伪军则毫不客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三十一游击支队决定集中兵力，对

驻守在盐山城东南五堡一带的伪军刘佩臣部，予以狠狠打击，压一压日寇的嚣张气焰，为广大群众壮壮胆。因为这是三十一游击支队出师的第一仗，所以甚为谨慎，战前进行了大量“知己知彼”的工作。经侦察，得知伪军号称三千，实际上只有一千，而且驻地分散，无险可凭。他们还有个弱点，就是仗着手中武器精良，非常骄傲，根本不把三十一游击支队放在眼里，这就给了我游击支队以可乘之机。一天黄昏，游击支队组成若干精悍分队，以小股多路，秘密地接近五堡，向敌人驻守的十多个村庄同时发起突然袭击。一阵猛打猛冲，杀得没有防备的敌人晕头转向，顿时大乱，当场死伤二百多，日寇的两名军前参议也被我军活捉。敌人惨败后仓皇撤退，先在盐山城附近七牛里稍事停留，随即撤回沧州。

过了不久，三十一游击支队又决定乘胜拿下盐山城，再给敌人一次大的打击。

盐山城内驻守着日寇一百多人和伪军刘佩臣部五百多人。攻击是从夜间开始的。游击支队组织了三百多人的攻城部队，手持火把，在城的东、西、南三门（此城无北门）同时发起进攻。当时，有个名叫史良的战士，用手榴弹做了门土炮，对准城墙猛轰。枪声、炮声、呼喊声震天动地。敌人在夜里不知虚实，以为来了千军万马，吓得紧闭城门，胡乱打枪。等到天亮，我攻城部队早已撤到离城四、五里路的地方隐蔽下来。敌人登城了望，见空无一人，以为游击队暂时后退。到了晚上，敌人又盲目打起枪来，直打了一夜，游击队依旧在原地休息，不去理睬。这一来，敌人估计游击队早已走远，于是又神气起来，说共产党的部队连城墙的边都不敢沾，如果下次再到老虎头上搔痒，连半个人都别想回去。恰巧第三天逢集，敌人为了显示“虎威”，故意大开城门，照常让群众赶集。于是，游击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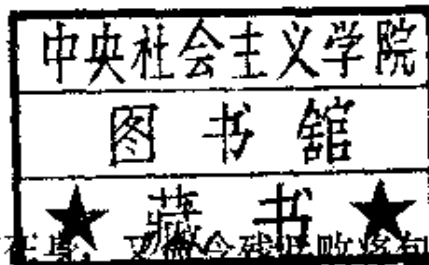
队派手枪队队长李景岳同志带三十几名战士，分成四个小组，携带短枪，化装成卖香烟、花生的小贩，混在赶集的群众里面钻进城去。到了晚上，集散了，城门关了，手枪队员潜伏下来开始秘密活动。他们机智地接近伪军岗哨，弄来了城门钥匙，在午夜时分打开了东门。隐蔽在东关民房里的我军指战员，便一拥而入。潜伏在城内的其余手枪队员见东门得手，立即策应，奋勇进攻。没多大一会，守敌失去了抵抗力，慌忙从西门夺路逃跑，溜回沧州。

三十一游击支队打下盐山城，正值一九三八年元旦，于是开仓放粮，救济附近穷苦百姓。同时，部队的枪支弹药、服装给养，也完全得到了解决。游击支队迅速地扩大到一千五百多人。

但是，驻在沧州的刘佩臣对部下的两次挨打非常恼火，没过几天就派遣独立旅旅长刘芳庭（绰号刘小个），率领三千伪军反扑过来，企图再占盐山城。这帮家伙来势凶猛，将盐山城围得水泄不通，连续攻了八天八夜，但结果连城门都没有跨进一步。刘小个还受了重伤，被人抬着灰溜溜地逃回沧州。

谁知就在刘小个攻城的时候，活动在盐山城附近的土匪武装刘彦臣，趁机将我军集结在城外一片树林里待命的一支小部队包围起来，抓了人，缴了械。游击支队领导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派人去同刘彦臣谈判。劝刘彦臣枪口指向日寇，不能为虎作伥，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来。谈判结果，刘彦臣慑于我军威力，同意释放被俘人员，但有个条件：把盐山城让给他。游击支队领导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救人要紧，没有必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同时也为了避免同还没有公开投敌的土匪武装大动干戈而消耗自己的力量，便答应了刘彦臣的要求。

刘彦臣得意洋洋地进城的消息传到了沧州，刘小个气得七



窍生烟，不愿重伤在身，又借令残匪败将包围盐山，同刘彦臣开战。原来刘小个在进攻我军之前，曾派人串通刘彦臣，暗地讲好同时出兵，合力攻城。不料刘彦臣耍了花招，来了个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了盐山城。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彦臣已暗地同日伪勾搭了。

我军在赶走盐山城的日寇之后，又一鼓作气，用火攻拿下了无棣县城，用智取占领了庆云县城，用强攻收复了乐陵县城……真是所向披靡，连战连胜，不多久便从日伪手里夺回了大片国土。

于是，三十一游击支队名声大振。这支抗日武装活动的范围，从旧县镇附近扩展到冀鲁边的大部分地区。穷苦百姓们振奋起来，从心眼里觉得有救了，纷纷打发子弟前来参军。盘踞在县城、据点里的日伪军，被声势浩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吓得胆战心惊，不得不稍稍收敛起嚣张气焰。那些占地为王的庞杂的地主土匪武装，也慑于三十一游击支队的威力，暂时停止了轻举妄动。有的表示愿意受我军节制，有的要求我党派代表到他们那里指导指导。还有的在我党争取下，接受了我军收编，如仇鸿印、崔五爷、宋刚峰等等。

仇鸿印是河北沧县仇小庄人，父亲是清末秀才，家有八百亩地、几辆大车和一辆用走骡驾的轿车。仇小庄二百多户人家，全都姓仇。同仇小庄紧紧相邻的另一个村庄叫孙小庄，也有二百多户人家，全部姓孙。两村积有世仇，互相戒备，各自森严壁垒，都筑有一座坚固的土围子。仇鸿印为了同孙小庄抗衡，拉起一支三百多人的武装，用以防村护院，同时也四出打击土匪。他的队伍每人有块臂章，红布黑字，上面大书一个“仇”字。这支队伍，打仗还有点办法。他们善骑毛驴，常常骑着毛驴出去偷袭土匪，但毛驴每到一个村庄总要甩甩尾巴，叫上几

声，这样就会暴露目标。仇鸿印命令部队在毛驴的尾巴上拴一只秤砣，毛驴甩不动尾巴也就不叫了。所以，他们的偷袭常常大获全胜。仇鸿印有勇有谋，又非常讲义气，打土匪夺得浮财，经常分给穷苦百姓，因此受到群众敬重。我军看中仇鸿印本质较好，爱国心也强，便派人去争取他。他开始还犹豫，不久刘佩臣暗杀了他的部下，他激于义愤，加上看到游击支队声威日炽，便毅然率部归顺过来。

崔五爷名叫崔振东，盐山高湾区崔柳杨家人，是崔月楠的五叔。当时他已六十多岁，一把白胡垂到胸口，在当地是条好汉，善骑烈马。在我军攻打无棣城时，他曾助我一臂之力。当时他手使双枪，骑匹白马，单人独骑闯城，很是勇猛。他经崔月楠的争取，二话没说便投身到革命队伍里来了。

宋刚峰是乐陵八区三间堂人，惯匪出身。他手下的三百多人，都有快马，全是骑兵，一律使用短枪，枪法极准。这支实力较强的队伍，在我方颇费口舌之后，也投到了革命队伍里。

由于三十一游击支队在军事上连连胜利，队伍日趋壮大，所以引起了国民党极大的恐慌。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再也忍不住了，他借口恢复山东行政统一，亲自率领重兵向我游击支队“收复失地”。他先向庆云逼近，被驻守在庆云城的支队副司令杨靖远同志亲率第三路武装击退。他又掉头转攻乐陵县城，但支队司令邢仁甫率领一、二路兵力坚守城池，使他久攻不下。刘景良只得同邢仁甫谈判，提出乐陵县县长必须由国民党方面委派。邢仁甫同意了刘景良的要求。刘景良便派了个叫牟宜之的人担任乐陵县长，这才罢兵休战。但国民党顽固派根本不讲信义。时隔不久，刘景良又对三十一游击支队发起军事进攻。他带领丁廷杰的一个整旅，兵分两路，一路直扑乐

陵，一路由他亲自指挥再攻庆云。同时，国民党山东保安六旅旅长张子良从无棣、地主土匪武装刘彦臣从盐山相继出兵，夹攻三十一游击支队早期活动的中心——旧县镇。三十一游击支队被分割包围，一时首尾不能相顾，情况危急。

这时候，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派出的永兴支队和津浦支队，兵力都约为一个正规营，在当年四月、六月先后赶到。永兴支队队长曾国华，津浦支队队长孙继先，都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孙继先参加过宁都暴动，随赵博生、董振堂加入红军，曾为抢渡大渡河的先头营营长，更是令国民党顽固派闻之胆寒的英雄。两支主力跨过津浦铁路，前锋刚刚抵达冀鲁边，国民党土顽已经闻风丧胆。刘景良、张子良、刘彦臣急忙将攻城部队撤走，暂时罢兵休战。

紧接着，肖华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也到了乐陵。从此，边区抗日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章 针锋相对

我们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之后，纵队司令兼政委肖华、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参谋长邓克明等同志根据上级指示，为了统一领导边区的抗日武装，将原在边区的三支抗日部队编入挺进纵队：三十一游击支队取消原来的番号，编为第六支队；曾国华的永兴支队为第五支队；孙继先的津浦支队为第四支队。六支队司令邢仁甫，政委王叙坤（不久王叙坤调出，由我继任），副司令冯鼎平、杨锋候，参谋长程正杰，政治部主

任崔月楠，副主任陈德。下辖三个营和一个特务连，一营营长刘子芳，教导员李逸民；二营营长李子英，教导员姜靖海，三营营长杜步舟，教导员关星甫；特务连连长路牟班。全支队约有两千余人。五支队司令曾国华，部队扩编为三个团，约四千人。四支队司令孙继先，下辖四个营，约三千余人。

在改编三十一支队时，邢仁甫不大乐意。他想要使这支部队保持独立性，成为自己能够操纵的力量，借口部队中有一部分人成份不纯，须待工作成熟后再说。由于大部分同志都期待整编，以统一军队领导，确保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邢仁甫又生一计，提出把不稳定的一部分人抽出来，编成一个小支队，由王昭明统率。这样，王昭明就带着二百多人枪，没有编进八路军。这支小部队单独游荡在外，不久便叛逃，在途中被我们消灭。

部队整编完毕，又调整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的成员，由肖华同志任书记（原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马国瑞同志已调赴延安学习）。

肖华同志在军政委员会上传达了北方局和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指示：冀鲁边区是个战略区，将来要划归中共山东分局统一领导，军区建制隶属一一五师。在一一五师开进山东之前，暂属一二九师管辖，地方则由冀南区党委代为领导。目前的工作方针，是巩固津南，发展鲁北。

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边区的局势，研究了如何执行上级提出的工作方针。大家认为，发展鲁北的最大障碍是国民党土顽刘景良、薛儒华、张子良、曹振东的部队，这些土顽建立了惠民、商河、阳信、沾化、无棣、滨县六县的政权，形成对我宁津、乐陵一带根据地的半月形包围；而且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也即将移驻鲁北。考虑到抗日大计，我们一方面

要争取团结他们，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加强国共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在鲁北开展各项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并且在陵县、平原、禹城一带开辟游击区。在津南地区，则利用日伪顽势力暂时还不是很强，我们的根据地比较巩固的条件，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大批培养干部，成立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成立农、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

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军政委员会拟定的诸项计划，逐步完成。根据地和各级党政军组织都有很大的发展。军队扩建了七团、八团和运河、津南、商河等几个支队，兵力增加到一万五千余人。共产党员由抗战初期的二百多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余人。成立了抗日军政干校，符竹庭同志任校长。还成立了战时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马振华同志任主任。在鲁北，乐陵、宁津、庆云三县的广大土地，几乎全在我军控制之下，成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德平、阳信、商河、无棣、沾化、陵县、禹城等县，也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在津南，成立了督察专员公署，杨靖远同志任专员；除吴桥县外，其他七县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边区各县都拉起了县大队，普遍地建立了农会、青救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群众组织，不少村庄还成立了抗日自卫团。自卫团和“青抗先”扛着刀枪，在村边站岗放哨，查看路条，防范日伪特务。沦陷在日寇魔爪下的土地又有一大批回到了人民手中，开始恢复生机，沸腾起来。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在鲁西聊城一带遭到日军“扫荡”，逃窜到鲁北惠民，并命令手下的吴化文手枪旅进驻附近商河一带。他不敢和日寇作战，同时更害怕抗日力量的壮大，害怕我党我军在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声望。不久，由于蒋介石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沈鸿烈便神气活现起来，打算把我们挺进纵队赶出冀鲁边这块

战略要地，“收复”他们拱手让给日寇而被我们收复的土地。

但我们挺进纵队活动在冀鲁两省交界之处，若山东沈鸿烈逼之太甚，我们可退入津南；若河北鹿钟麟逼之太甚，我们可转入鲁北。鲁北、津南均为我根据地。我军占据着有利的地域，进退两易，回旋余地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可以不同国民党正面交锋的。

老奸巨猾的沈鸿烈也料到了这一点。他同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串通，密谋出一条他们认为“万无一失”的诡计——“冀鲁联防”：山东方面负责用软的方法将挺纵赶出鲁北，河北方面负责用硬的手段吃掉或挤走我挺纵在津南的部队。他们以为软硬兼施、南北夹攻，必定会马到成功，于是很快分头活动起来。

沈鸿烈写信给安插在鲁北乐陵县的国民党县长牟宜之，指示说：“务必统一军令政令于国民政府，必须独揽党、政、军三权，一切事务不容共产党和八路军插手；要尽最大可能束缚他们活动，限制他们发展，处处事事予他们以掣肘、刁难，尤其在军饷、粮食、服装上不予供给，同时也不许他们建立政府向百姓征收摊派粮款。总而言之，务必使共党、八路无法存身。要达到目的，必须心肠狠，手段辣，做事绝。”他在信中还给牟宜之壮胆说：“你舅是吾党当今元老、中央委员，他们非但不敢动你一根毫毛，即使有丝毫的捣乱或不服从举动，哪怕稍稍的阻碍你政令、军令的施行，量他们也不敢，否则我们可以通电全国，给他们以破坏政令军令统一、破坏抗战的罪名。”

可笑沈鸿烈看错了牟宜之。牟宜之系山东日照县人，自幼读书，少年时代还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因不满蒋介石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才向其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舅舅丁惟汾

提出，要到敌后抗日。于是丁惟汾将他介绍给沈鸿烈，沈鸿烈又将他介绍给刘景良，刘景良才把他委派到乐陵。

当时，对于牟宜之的立场和为人，我们也不完全了解，因而在得知沈鸿烈部署牟宜之进行反共活动的消息后，便加紧了对其的提防。同时在群众中进行调查，了解牟宜之的政治态度，以便采取对策。群众向我们讲述了牟宜之上任后所做的两件事，使我们对他产生了好感。第一件事：乐陵县旧县府有个捕班老总叫周圣云，长期敲诈勒索，今天指控张三抢劫，明天诬陷李四作案，倘若榨不出油水，就把人抓去坐牢。他见钱眼开，视人命如草芥，逢到穷人控告地主、官僚，只要被告送给他几百块钱，这场官司马上就可以了结，原告当天夜里不是掉了脑袋，就是淹死在河里。所以民愤极大。牟宜之上任时听到群众对周圣云的议论，便暗中留心查访，察知属实时，立即将其逮捕，交给群众痛打一顿之后，下令枪决。第二件事：本县茨头堡区有七十名土匪，趁着兵荒马乱，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牟宜之为了杀一儆百，亲率兵丁前去讨伐，将匪首逮捕，并在南门杀头示众；同时勒令其余匪徒解散回家，驱散了这股土匪。此外，牟宜之还大刀阔斧地革除弊政，颁布新的施政方案；合理调整捐税，尽可能地筹集抗日军需物资；压抑豪门势力，明断民事诉讼，大力维护地方治安。

牟宜之的进步和开明，使我们喜出望外。肖华同志把我们几个支队的领导召集起来，商量了一番，决定争取牟宜之。并要我先去拜访牟宜之，进一步摸摸他的底，相机开展工作。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当天晚上派联络科长去同牟宜之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我便穿戴整齐，亲自登门拜访。

这是夏天的一个中午，骄阳似火，地皮被晒得烫脚。我不断抹着脸上的汗珠，大步走进了乐陵县政府。

刚跨进大门，一个胖胖的门房便伸手把我拉住。我知道他的意思，没有等他开口，便将姓名和来意告诉了他。他让我在门口等待，自己则返身向内走去。我趁他向主人通报的空子，把这座国民党的县府打量了一番。这县府可能是清朝县署的衙门。院子里有一座文庙，庙内大成殿正中供着孔子牌位，左右有四配：后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思子、亚圣孟子。庙门前有一座六、七尺高的石碑，及几棵苍老的古柏古槐。文庙的左首有座雅致的花厅。

门房出来了，态度显然变得恭敬了。他笑着说：“先生请进，牟县长在花厅里等着。”我点点头表示谢意，便走进花厅。只见牟宜之正倒背双手，独自在树荫花间踱步，神情苦闷、忧郁。他见我进来，没有虚伪的寒暄和客套，只是微微点点头，便搬了两把椅子放在阴凉地方叫我坐下，又亲自沏了两杯茉莉花茶。

“周先生找我有事吗？”牟县长一边递过茶来，一边堆起笑脸问道。他腿短身长，矮矮胖胖，脑袋很大，戴副眼镜，显得十分老练和精神。

我回答：“特来拜望牟先生，聆听高见。”

“噢，你太客气。”他大笑起来，“贵党人人精明，个个强干，鄙人生性愚钝，还想请你启蒙教诲。”

我也笑着说：“就我所知，贵党也不乏杰出人材，譬如你牟县长本人，入主乐陵不久，便深孚众望，赢得了百姓的拥戴。”

谁知我刚说到这里，牟宜之顿时消失了笑容，脸上又出现先前的那副忧郁，长叹一口气：“唉！兄弟为各界父老效力，只怕为时不会太久。做人难啊，不瞒你说，兄弟现在是骑虎难下。”

“这话怎么讲？是否我军有什么不是之处？”我故意急切地问道。

“不是，贵军处处从抗日大局出发，同县府通力合作，给本人诸多方便，兄弟不胜感激。兄弟的隐衷只在沈主席方面。”接着他呷了几口茶，将沈鸿烈给他的亲笔指示叙述了一遍。说完又重重叹了一口气：“唉！如果按沈主席的意思办事，本人于良心上不忍，如果拂逆了他的旨意，那他也不会善甘罢休。”

我听后也不免怒形于色：“岂有此理，经民济世，保国安邦，这是每个为官者的天职。想不到竟有这班糊涂官儿，受国家俸禄，食百姓脂膏，非但不思图报，还要挑拨党争，加深内乱，眼看着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亿万人民陷入火坑而不顾。真是荒唐！”

“岂止荒唐，简直伤天害理！”牟县长也按捺不住怒火，气呼呼站起来，在原地急躁地踱了两圈。他两眼望着院内的柏树，激动地说：“我去年隐居乡里的时候，常吟诵古人的《颂柏》一诗：‘盘根错节儿冰霜，古柏亭亭立夕阳，万壑风涛秋入韵，千年琥珀夜腾芒，非支大厦材难用，不出深山寿更长，毕竟天家栋梁器，何容久卧白云乡。’总觉得自己空怀壮志激烈，只恨无施展之地，没想到现在竟连当个区区七品县令都如此之难。实在是人心叵测，世事艰深。”

“那牟先生下一步准备作何打算？”我试探着问。

“是啊，兄弟近日来常为这事犯难。我想，实在不行，便弃官归隐，宁可闭上双目做个浪迹天涯的闲人，也不能睁眼看着日寇在中国横行，更不能为图个官位做出使亲痛仇快的事来。”

“这，这也未免消极了些。”我诚恳地说，“倘若牟先生

离开乐陵，个人丢官事小，可当局要是另派一个人来，真的按沈主席眼色行事，岂不涂炭一方？岂不葬送了乐陵县已有的抗日形势？你于心能忍？不知牟先生是否想过这些。依我之见，万马军中能夺帅，匹夫之志不可夺，你牟先生有仁有义有才，当今国运不济，正是报国效民的时候，怎能轻易任人摆布？大丈夫所作所为，只要上对得起苍天，下对得起黎民，则应挺起腰杆径直去做。纵使有少数人反对，但我们支持，群众拥护，何虑之有！”

没想到牟先生听了我说的这些，竟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眼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激动。我们又闲谈了几句，我就告辞了。

嗣后，肖华司令员又多次会晤牟县长。在肖司令的谆谆诱导下，牟宜之更加热心抗日和靠拢我党，而对沈鸿烈的反共布署则坚决抵制。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底，八路军总部以抗日大局为重，指示挺进纵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尽量争取沈鸿烈共同抗日。肖华同志根据总部指示，决定亲赴惠民。一天，他带着侦察科长刘友芝和一个骑兵班，偕同牟宜之，轻骑简从，去见沈鸿烈。进了惠民城，适逢冀鲁边各县的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地主民团、土匪武装头子来向沈鸿烈拜贺接风。沈鸿烈素以坚决反共而臭名昭著，他的到来，使这些乌七八糟的头头脑脑感到有了靠山，顿时神气起来，气焰十分嚣张。他们为了讨得沈鸿烈的青睐，为日后进身找个台阶，有的携金银珠宝，有的裹绫罗绸缎，有的抬山珍海味，纷纷前来沈府进贡。那天沈府大院的戏楼上正在演出《天官赐福》，这些牛毛司令坐在观众席上，都打着标明自己姓氏的旗号，张王李赵相杂，蓝黄黑白相间，煞是热闹。肖华同志看到这些打着“抗日”、“救国”旗号而各怀鬼

胎的乌合之众，他的脸上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沈鸿烈听说肖司令来访，先是一惊，继而又一转念，我沈某乱世闯荡多年，什么样的对手没碰上过，还怕他一个娃娃？于是吩咐手下：“以上宾相待。”

肖司令被迎进客厅，筵席早已摆好。他微微扫视四周，朱门绣阁，很是阔绰，在这僻陋之壤，竟有地毯铺地；再看桌上，四盘八碗，燕窝鱼翅，丰盛之极。联想起沈鸿烈来到惠民后，赌博、嫖妓、吸鸦片之风如瘟病发作，而广大沦陷区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肖司令不禁有些愤愤然。不过，他清楚自己这次来的任务，没有表露出愠色。

沈鸿烈上前迎过肖司令。沈是湖北天门人，清末秀才，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中将司令，后又任青岛市长，阅历颇深，诡计很多，尤其擅于辞令，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很难对付。单看他那脸上的松皮虚肉、挂下的眼险和游动的眼光，就知道他的脑袋里装的全是阴谋和狡诈。这时，他正将目光停留在肖司令身上。肖司令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着军装，穿草鞋，中等个头，膀阔腰细，白白净净，文雅和气。沈鸿烈见到肖司令英气勃勃，知道对手精明强干，忙让给上座。他的秘书长等人作陪。沈鸿烈拿起一杯酒，干咳一声，慢条斯理地说：“肖司令年轻英俊，气质文雅，不失儒将风度。兄弟早在肖司令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时就闻过大名，今日晤面，实为荣幸。来，为肖司令诸事如意干杯！”

肖司令也谦虚地答道：“我也早闻沈主席大名，今日专程来访，共商抗日大计。我提议，为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干杯！”

在座的都应声起立。沈鸿烈面部肌肉抽动了两下，还是慢慢地举起酒杯：“嘿嘿，共商抗日大计，不敢当，然而沈某倒想看看贵党贵军的抗日战绩，听听肖司令的良计妙策！”

听着沈鸿烈这种酸溜溜的话，肖司令感觉很不是味儿。但他很冷静，喝干了杯中的酒，缓缓坐下，清了清嗓子说：“沈主席客气，我们应该领教你的高见。至于战绩，我可以马上派人造表通报。目前我们在津浦一线开展了破袭战，配合正面主力作战，还广泛发动了群众，建立了根据地，为坚持持久抗战准备条件。”

沈鸿烈话锋一转说：“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如今进入山东，恐多不便。山东近年多灾，百姓负担很重，贵军军饷很难筹措，还须请往河北征粮派款……”

肖司令不等沈鸿烈说完，便截断他的话：“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令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事隔一年，沈主席不见得就如此健忘吧？”

“嗯，这——”沈鸿烈无言以对，拿着手巾直擦头上渗出的虚汗。

肖司令淡淡一笑，又说：“在这民族危亡之际，炎黄子孙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对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

沈鸿烈脸拉得老长，冷笑了一声说：“统一，该不是把各路人马都统一到你八路军的麾下？”

肖司令强压着怒火，正色问道：“沈主席这话是什么意思？”

沈鸿烈朝他的秘书长使了个眼色。秘书长狡黠地笑笑说：“听说，贵军吃掉了一些地方部队……”

“哦。”肖司令爽朗地说，“对于破坏抗日的汉奸武装，对于助纣为虐的害群之马，理应锄之！”

一直没有说话的牟宜之也忍不住了，在一旁开了腔：“是

呀，那些汉奸土匪不打日本人，光知道鱼肉乡里，老百姓谁不恨得咬牙切齿。八路军兴义师，锄奸逆，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箪食壶浆，迎接……”

“来，上酒！”沈鸿烈一声喝，打断了牟宜之的话。他呷了一口酒，骄横地说：“倘若有人借用抗日名义，私自积蓄兵力，扩张地盘，那又居心何在呢？”

肖司令昂然回答：“沈主席大可放心，我党我军光明磊落，诚心奉行国共合作方针，一切皆从抗日出发。我们收复之地，都是‘国军’遗弃、日寇占领的地方，收复这些失地，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决无其他图谋，天日可鉴。”

沈鸿烈冷笑道：“既然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统一领导，即宜卷甲收戈，静听调遣。乃人不散队，械不去身，分食于地，资货于商，据陆而复问水，市马而复造舟，其间能说终无异志？”

肖司令对沈鸿烈的蛮横和无赖，实在不想多费工夫去驳斥，只是恳切地告诉对方：“沈主席，眼下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我们彼此都应去掉成见，精诚团结。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曾经说过：‘倘邦中人不自觉，则鹬蚌相争，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

沈鸿烈眼皮一搭拉，摆出了省主席的架子：“不管怎么说，乐陵是卑人治下，还望肖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

肖司令坦然笑道：“我军为抗日进驻乐陵，同全县父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得到了各界民众的赞扬和拥护。牟县长，我们该没有什么使你感到不便的地方吧？”

牟宜之连连摆着手说：“肖司令，哪里话，哪里话。”

话不投机，都无心用酒，只一个小时就散了席。散席后，

沈鸿烈又留牟宜之单独谈了好久。

在返回乐陵的路上，牟宜之对肖华同志说：“沈鸿烈为了拉我，玩弄手腕，私下以高官相许，说让我当专员。他这是明升暗降，要削掉我这个县长的实权嘛。我婉言辞谢了。”

肖华同志笑了笑，说道：“沈鸿烈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哟。他的真正企图，是孤立、打击八路军，矛头是指向我们挺进纵队的。”

牟宜之望着肖司令，钦佩地点了点头。

不久，沈鸿烈又致函肖司令，说要前来乐陵洽商政事。很明显，他是企图再次同我们较量，妄想慑服挺纵，赶走我们；实在不行，也可显显省主席的威风，挽回在惠民失去的面子；再不然，那就带走牟宜之，另派顽固分子同我们磨擦。

肖华同志接到信函后，觉得这又是一次对沈鸿烈进行争取、教育的机会，同时也充分估计到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他命令我们摆下宴席，先是以礼相待，必要时再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又叫我负责军事戒备，以防不测。我便电告正在庆云、无棣、盐山边界庄科一带活动的六支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德和二营教导员王子翰，火速带部队回乐陵待命。其后肖华同志又找来乐陵县动委会主任王国华交代一番。肖华同志办事果断，有魄力，很快便部署停当。

这天，沈鸿烈带着国民党鲁北行辕副专员薛儒华及一个旅的兵力，前呼后拥，耀武扬威，坐汽车来到乐陵。

他走进县府大门，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牟宜之等人把他迎入客厅。那里已经摆下宴席，可沈鸿烈却假惺惺地装作俭朴，自称惯于吃素，尤其抗战期间更应简宴。但他还是未等邀请便已入席。

主客寒暄之后，谈到正题。肖司令再一次提到抗日统一战

线，说：“只要全国上下、民众各界，同心同德，共赴国难，日寇是一定会被打败的！”

“咳，谈何容易，谈何容易。”沈鸿烈摇晃着脑袋说，“日军兵器精良，国力雄厚，国军在徐州、南京重兵防守，尚且抵挡不住。贵军武器陈旧，装备简陋，如果同日军交战，岂不是以卵击石？”说着阴险地笑了笑。

邓克明等几位同志气得火冒三丈，愤愤地站了起来。肖司令用目光制止了他们，然后，爽朗地笑着回答沈鸿烈：“正义之师必胜，不义之师必败，这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为了捍卫国土完整，驱逐日寇，我们即使撞个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沈鸿烈眼珠子转了转，拉长了阴沉的脸说：“贵军精神可嘉，但日人强悍毕竟是事实，不强悍，怎么几个月便占了大半个中国？不强悍，宋哲元十几万大军怎么也被击溃？你们知道二十九军是中国陆军的劲旅，它有四个正规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特务旅，两个混成旅，连他们都敌不住日军，还……”他说到这里便截断了话尾，接着摆出一副忧伤的神色叹了口气：“唉，一方面是日人强悍，一方面也怪我国力弱，不是吗？动形落后，商战而败，工战而糜，乃至农业亦相形见绌，棉麦生货仰给舶来……”

“这能怪谁？”一直没有开口的牟宜之愤愤地插了一句。

“都是当局对外无统制之策，对内无富国之心，乐岁则挥霍无度，灾歉则束手待毙，民生所以枯萎，所以……”

“放肆！”沈鸿烈狠狠地瞪了牟宜之一眼。但牟宜之并不屈服，额头上的青筋蹦得更高。

肖司令向牟宜之投过去赞赏的眼光，然后，脸朝沈鸿烈说：

“沈主席，日寇固然强悍，我们也不讳言自己的国弱民穷，但落后总不能任人欺负，落后总不能看着别人把自己的国家灭

亡。我们虽然不强大，但日寇也有很多弱点。他们国小人少，而又野蛮暴虐到极点，国外树敌既多，国内矛盾又大。他们战线无限拉长，兵力分散，缺乏协同；在动员上，常见临时抽调；在财政上，更多挖肉补疮；军事生产供不应求；使用朝鲜、蒙古军队，更多顾虑；而其本国军队，厌战反战情绪也会逐渐增长。这一切，都不利于日寇支持长期战争。而我们有四万万同胞，只要大家攒足劲，坚持抗战，将日寇赶出国土，我想是一定能成功的。阳明堡的胜利、平型关大捷，不是已经说明了问题？”

肖司令说得慷慨激昂，使人听了感到热血沸腾。

沈鸿烈的眼睑挂了下来，阴冷地说：“肖司令，胆量并非表现在嘴上，有能耐别呆在后方。”

“对，躲在鬼子屁股后面鼓噪呐喊，净占些敌人扔了的地方，这也算抗日？”国民党鲁北副专员薛儒华也跟在后面帮腔。

“怎么不算抗日？”邓克明同志抑制不住怒火，愤愤地站了起来。肖司令也微微涨红了脸，但他善于控制感情，还是捺住了怒火，压低声调缓缓地说：“我们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就是控制了敌人后方，同前方形成了前后来攻的态势；至少是加重了敌人的后顾之忧，分散了敌人的兵力，拖住了敌人的后腿，限制了敌人向正面推进的兵力和速度。今后，日寇势必还将回师华北，企图巩固其占领区，因而这里即是前方。到那时，我们众志成城，日寇就不能横行无忌。能说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是抗日？”

肖司令义正词严。沈鸿烈脸色由灰变青，一时理屈词穷，耷拉着脑袋。忽然他又挺起脖颈，气势汹汹地说：“即便是抗日，也轮不到你们！”

沈鸿烈气急败坏，露出了赤裸裸的霸道，使得举座愕然。

肖司令气宇轩昂地站了起来，向四周环视了一下，严正地驳斥说：“沈先生如此说来，未必妥当吧？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反对我们抗日，岂不也拂逆了蒋委员长庐山讲话的意旨。”

沈鸿烈一时无言以对，他用手使劲拔掉下巴上的几根短须，突然气急呼呼地站起来：“道理我懂，而且沈某更懂得你们应该尽快撤出山东，否则不但夺了我的地盘，还夺了我的部下。”接着他扭头朝着牟宜之，声色俱厉地喝道：“立即随我回省府！”说完便率领兵丁亲随，气汹汹地走出餐厅。宴会不欢而散。

跟在沈鸿烈身后的两个马弁，挟持着牟宜之，不容分说，把他推上了汽车。

我们看着沈鸿烈那副斗败的模样，心里感到好笑，这家伙想用三寸舌头、几泡吐沫来吓倒我们，把我们赶出山东，结果自己在宴会上大丢其脸。但是眼看着牟宜之被他们带走，我们心里想：沈鸿烈今后另派个反共的人来接替牟宜之，出任乐陵县长，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他必定会这样做；上前救下牟宜之吧，又有点不妥，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不能干涉。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看了看肖华同志，见他镇静自若，只是鄙夷地望着远去的车队。原来肖华同志料到沈鸿烈此行不善，事先已作了周密的安排。

沈鸿烈的一溜汽车，刚刚驰到城外南关，便遇到上万名群众的拦阻。黑压压的群众，在我乐陵县动委会主任王国华同志的带领下，将汽车团团围住，并高呼口号：“拥护牟先生主乐！”“挽留主张抗日的牟县长！”“反对破坏抗日者！”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吓得沈鸿烈胆战心惊。他下令朝着人群开

车。这时拥在车头前面的几百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太太，扑通扑通跪倒在地上，恳求沈鸿烈留下牟县长。沈鸿烈无可奈何，又命令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无畏惧，不少青壮年汉子都怒目圆睁，卷起了袖子。沈鸿烈知道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群众见留下了牟县长，便让开一条路。沈鸿烈狼狈地逃出群众的包围圈，灰溜溜地窜回惠民去了。后来我们听说：沈鸿烈因为在乐陵丢了脸，恼羞成怒，回到省府后大骂共产党八路军，还咬牙切齿地说，“不赶走挺纵、不搞掉肖华，死不瞑目”。在敌人“扫荡”鲁北时，这家伙毫不抵抗，带着省府机关和吴化文旅逃到鲁南去了。

乐陵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反顽斗争情绪，也使牟宜之同我党的关系更加密切。牟宜之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曾先后两次去延安，见到了朱德总司令。

另一方面，在乐陵这场斗争中，也充分暴露了沈鸿烈的反共通敌嘴脸。其实，沈鸿烈在这以前和以后，都犯有大量勾结日寇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据国民党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说，一九三九年冬，沈鸿烈的省府住在临朐县吕厘店子一带，同八路军相距十余华里，牟中珩亲眼看见沈鸿烈指挥省府卫队，用蓝旗作联络信号，配合日寇向鲁村以南的八路军猖狂进攻。沈鸿烈还利用他的学生鲍文樾当汪伪政府军政部长的关系，经常同汪精卫秘密书信来往。由于这个反共通敌的家伙担任着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所以，山东全省的国民党行政专员和县长，以及十几个保安旅旅长，大都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号，暗中勾结日寇，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最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投降日寇，变成了伪军，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给我挺纵在鲁北从事抗日斗争增添了许多困难。

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

精心炮制的“冀鲁联防”，已经输了一半。无独有偶，河北的鹿钟麟则输得更惨。

鹿钟麟与沈鸿烈不同，沈鸿烈企图借口统一军令，用嘴皮和诡计把我军赶出鲁北；鹿钟麟则妄想用武力吃掉津南我军。他收买了盘踞在盐山四区大赵村、苏基村一带的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供给孙枪支弹药，要孙仲文替他消灭八路军，杀害共产党，侵吞我津南根据地。津南是救国军早期活动的地方，已经建成了庆云、盐山、宁津、南皮、东光、沧县等八个抗日县政府和一个督察专员公署，根据地比较巩固，但兵力还不雄厚。

孙仲文这个恶霸地主接受鹿钟麟的指令之后，便将手下的千余人马布置在大赵村、苏基村、丁村和附近的几个庄子。还在这些村庄里挖了寨沟，垒起寨墙，又凭借大车道将这些村庄联成一片，形成了一座可以连环呼应的反共堡垒。从这座堡垒里伸出的一只只魔爪，扣押了我党的来往人员，活埋了抗日干部，打死了我军游动哨兵……。孙仲文得寸进尺，越来越猖狂。

那时盐山县划分为五个区，城关为一区，旧县以北为二区，望树村以东为三区，王文村以北为四区，高湾镇以北为五区。这五个区，除了第四区以外，都是我军的根据地。其中第五区位于孙仲文盘踞的四区和无棣县之间，而无棣县又是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六旅旅长张子良的地盘。孙仲文见五区环境对他有利，便企图先吞掉五区，然后霸占整个盐山县。一九三八年秋末的一天，他先派副官带领大批武装，拿着他的亲笔札子到五区找我区委负责人。这个副官来到五区区委所在的村庄，便指挥部队包围了区委，将两挺机枪架在区委门口，而后大叫大嚷，要区委领导出来接信。

当时，五区区长周保成同志和区委另一个负责人姜仁奇同志，见是孙仲文的人马，知道来者不善，但还是耐着性子，接过了信。一看，只见信里写的净是狂言乱语：“……限即日起，贵区须听命于我孙团长统辖，从速缴纳钱粮，区部人员、武器、装备亦应统计造册报来，若有抗命，严惩不贷……”周、姜二人看罢，怒火直往上冲。但他们为了避免扩大事态，硬是按下火气，邀请那副官进屋，并交代炊事人员做饭招待孙仲文的人马。

可那副官将我方的忍让和大度，看成软弱可欺，越发趾高气扬。他竟当众将我方饿着肚皮省下粮食做成的米饭、馒头，扔在地上，用来喂马，同时还纵容部下在区委所在的村子里抢掠。

周区长和姜仁奇同志忍无可忍，严厉指责了那副官的挑衅行为。那副官不但置之不理，反而狂妄地耸耸鼻梁说：“哼，我们的孙团长和无棣的张旅长同时举兵，两下夹攻，你们挡得住吗？不叫你五区寸草不留才怪！”说完把手枪朝天上一抛，又伸手接住，还做了个极度蔑视的鬼脸。接着便骑上高头大马，在一群士兵的簇拥下，吹着铜号，哼着怪腔怪调，耀武扬威地走了。

看着孙家走狗那种旁若无人的嚣张气焰，区委工作人员气得牙齿咬得格格响。周区长立即写了封信，派人送到旧县镇，交给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杨靖远同志，报告了孙仲文派人前来恫吓，企图吞并五区的经过。

杨专员对党忠诚，办事精明，政策观念强。他接到周区长的信，决定先礼后兵，争取用谈判方式说服孙仲文放弃反动立场，平息这场风波，粉碎鹿钟麟的阴谋；如果这一步不行，再想其他办法。于是，他一面派人去乐陵给肖华同志送信，报告

孙仲文的反共活动和自己的打算，一面就亲自前去会见孙仲文。

肖华同志接到杨靖远的信后，便把在乐陵附近活动的几个支队的领导人，召集到乐陵碰头，研究同孙仲文的斗争。

我们几个干部赶到乐陵县城，走进肖华同志的宿舍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了。肖华同志还没有休息，他披件夹衣，坐在炕上，炕头放着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油印小册子。他见我们进来，便将我们让到炕上坐下，然后将杨靖远同志的信，交给我们几个人传阅。

等我们看完信，肖华同志拿起一根小木棍说：“鹿钟麟已经向我们动手了。”他用小木棍指着地图上盐山县的大赵村，

“据我估计，孙仲文那小子，仗着手下有千把人的队伍，背后又有鹿钟麟撑腰，准定是气粗胆壮，很难用道理说服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杨专员这次去同他会谈，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觉得肖华同志的分析很有道理，同时更担心杨专员深入虎穴，凶多吉少。我便将这种担心说了出来。

大部分同志听后都面露忧色，但孙继先同志沉思了一会，说：“老周，你对杨专员还不够了解，他虽然性子急躁，但粗中有细，有勇有谋，我相信他即使碰到危险，也会化险为夷。”

肖华同志朝孙继先点了点头。接着用征询的口气问我们：

“杨专员还没有回来，我们现在先从坏的方面考虑。假如我刚才的估计不错，孙仲文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继续向我们挑衅，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大家随便说说。”

“打！以牙还牙，不能客气。”我愤愤地建议。

其他同志也纷纷赞成：“不给他点颜色瞧瞧，他不知道八

路军的厉害！”“不挖掉毒疮不会消肿，除掉孙仲文，津南就少了一个祸害，就会安稳一阵！”“打了孙仲文，痛了鹿钟麟，看那老家伙下次还敢不老实！”

肖华同志听后点点头说：“对。沈鸿烈用文的向我们进攻，我们用文的对付；鹿钟麟用武力侵犯我们，我们也用武力回敬他。这就是针锋相对。只有坚持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向日寇妥协投降，不敢轻易发动内战。”

于是，我们决定，如果杨专员的会谈没有结果，孙仲文继续执行鹿钟麟指令向我们挑衅，我们便出兵消灭他。

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了，我们正要散会休息，忽然门外有人喊报告。我站起来打开门，一眼便认出站在门口的是杨专员的通信员。他从旧县骑马连夜赶到乐陵，是杨专员派来给肖司令送信的。我把他让进屋里坐下，肖华同志还亲自替他倒了杯水。

这位通信员抹着额头上的汗，没等我们开口，便报告起杨专员深入虎穴同孙仲文会谈的经过：

那天，杨专员只带了一个名叫吴二楞的警卫员。他俩骑马来到大赵村，见孙家寨门紧闭，便向站在门垛上的哨兵通报了姓名，说明了来意。

过了好大一会，寨门开了，孙仲文的管家出来迎接。杨专员随管家走进孙仲文的客厅，见孙仲文傲慢地坐在太师椅上，满脸杀气腾腾。杨专员不卑不亢地朝他点点头，便在排开的椅子上坐下。吴二楞则机警地守在客厅门口。

杨专员一坐下，便和孙仲文唇枪舌剑地交战起来。孙仲文原以为杨专员只带一个人，深入刀枪如林的大赵村，容易对付。没想到杨专员理直气壮，正义凛然，一句话象一颗炮弹，逼

得他招架不住。孙仲文在理亏语塞的窘迫中，光秃秃的脑门上露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两腮的肌肉一阵阵抽搐。他恼羞成怒，蛮横地撒起野来，右手狠命一拍桌面，震得盖碗、暖瓶“咣当”滚落地上。顿时，从庭院的影壁和客厅的背后，跳出十几个早就布置好的打手，一齐向杨专员扑来。

杨专员早有防备，他不慌不忙，右手掏出手枪，左手揪住孙仲文，大声喝道：“谁敢动手，就先宰了你们主子！”这时吴二楞已用身子护住杨专员。

孙仲文一时间吓得杀猪般地嚎叫起来：“弟、弟兄们别莽撞，杨专员，有、有话好说。”那班打手都傻了眼。

杨专员知道不宜再呆下去，便一手拎起孙仲文，脚不点地的直往外走。孙家的一堆饭桶瞪着双眼干着急，一时无计可施。转眼之间，杨专员和吴二楞挟着孙仲文已出了寨门。他俩将孙仲文丢在门口，跃身上马，疾驰而去。

好险呵！我们听后都长长地嘘了口气。同时，更对孙仲文的猖狂感到愤慨。

杨专员的通信员说到这里，从口袋里摸出杨专员的亲笔信。

原来杨靖远同志回到旧县之后，觉得不能坐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决定用武力斩断鹿钟麟伸到津南的魔爪。他已经部署兵力，准备讨伐孙仲文。

当时我军活动在旧县一带的有一支部队，代号叫冀南支队，支队长就是杨靖远，副支队长是傅祥吉，政委是常中芳。冀南支队下辖四个大队，一大队队长傅中云，二大队队长左庆甲，三大队队长王瑞印，四大队队长宋刚峰。兵力共有五百多人。

杨靖远抽调一支小部队潜伏在高湾一带，待战斗打响之后

虚张声势；又拨出另一支部队，插到盐山和无棣县交界处，防止土顽张子良的保安六旅增援；命令宋刚峰的四大队负责攻打许官村，左庆甲的二大队负责攻打云庄，这是为了首先扫除大赵村的外围据点；他自己和傅祥吉率一、三大队的剩余人马主攻孙仲文的巢穴——大赵村。杨靖远又考虑到盐山四区分东半区和西半区两部分，东半区是孙仲文的地盘，西半区还有地主姜雨村的一支民团武装，姜、孙两家常有来往。为了防止姜雨村出援，便叫我五区负责人姜仁奇同志写信劝告姜雨村严守中立。姜雨村是姜仁奇的伯父。

战斗行动准备采取夜袭方式。

杨靖远在信的末尾请示肖华同志，是否同意攻打孙仲文，如果同意，上述部署是否妥当。肖华同志觉得杨靖远的出兵计划同我们刚才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兵力部署也比较周到。便命令通信员立即返回旧县告诉杨专员：可以照此行动，但要谨慎小心；俗话说，“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孙仲文竟敢明目张胆地充当反共先锋，他是有一定实力的，我们千万不可轻敌。

这时雄鸡已经打鸣，我们在肖司令的宿舍里过了个不眠之夜，但大家却没有倦意。

杨靖远接到肖司令的指示后，便立即行动。第二天夜里，萧瑟的秋风吹在人身上，很有些凉意，月牙儿也躲进厚厚的云层里去了，天空乌漆抹黑，伸手不见五指。借着这风高月黑的掩护，杨靖远、左庆甲、宋刚峰兵分三路，同时悄悄出发。因大赵村路程较远，杨靖远为了能与左、宋二人同时抵达目的地，同时发起进攻，便找了个向导，想抄小路直插大赵村。谁知向导竟是孙仲文派出的密探，那家伙故意弯来绕去，直到天明才将杨靖远带到大赵村。

到了大赵村，只见寨门紧闭，丈把高的土围子垛口间都伸出了枪筒。很显然，孙仲文已有了防备。原来，左庆甲、宋刚峰已在头一天夜里偷袭成功，拿下了许官、云庄两个据点。但从许官和云庄逃出的残敌，连夜赶到大赵村，向孙仲文报告了两地失守的消息。孙仲文立即警觉起来，加以戒备。

事已至此，只得采取强攻。杨靖远同志手一挥，身先士卒，率领战士们向寨门扑了过去。但孙仲文在寨门两边的墙垛口里，布置了好几挺机枪。密集的弹雨，捎着尖利的哨声倾泻下来，封锁了通向寨门的道路。战士们被迫退了下来。接着又是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我军不能接近寨门，孙部也不敢杀出寨门，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杨靖远身边虽说有两个大队，但兵力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火器也不如孙部。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战场形势的发展逐渐对我军不利。

杨靖远伏在村西南角上的麦秸垛旁边，见大赵村久攻不下，战士们都被压在村外的庄稼地里，心里非常着急。他估计许官、云庄已经得手，便准备派人去调宋刚峰来增援。刚站起来，不料土围子的墙垛口飞来一颗子弹，打中胸膛。杨靖远同志站立不住，扑身倒地，当场殉难。

战士们见杨专员倒地，奋不顾身地涌上来抢救。但顽军居高临下，弹雨纷纷落在杨专员周围，抢救的战士连续倒下好几个，一时不能接近。接着土围子寨门大开，里面窜出来几十个凶悍的家伙，抢走了杨专员的遗体。

紧接着副支队长傅祥吉同志也中弹牺牲，三大队长王瑞印同志的头部被子弹划了条口子。战士们失去指挥，寡不敌众，只得撤出大赵村。

孙仲文这个老恶棍，夺得杨专员的遗体之后，残忍地将尸

体斩成三段，割下头来挂在寨门顶上，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我们听到进攻孙仲文失利和杨靖远同志遇害的消息，都为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我们少了一位亲密的战友，感到揪心的悲痛，同时更为孙仲文的凶残所激怒。

当天，我们就为杨靖远同志开了追悼会。肖华同志亲自写了一副挽联：“抗战方兴竟在盐山留遗恨，建国未艾空对鬲水吊英魂。”并且在会上介绍了杨靖远同志的生平。

杨靖远同志原名赵荣山、赵仙舟，辽宁沈阳市东陵人。生于一九〇二年。他幼年在私塾读过六年书，后又到中医专科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在沈阳、锦州一带行医期间，参加了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入沈阳的第二天，他趁乱率领数十人，在铁路隧道里击毙鬼子十余名。而后开动机车进入关内，在北京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他曾住在香山，任华北各界救国会执行委员。后又在京、津一带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四月间，党派他到冀鲁边来领导抗日。没想到只几个月时间便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

追悼会激起了指战员们的强烈义愤。我向肖华同志请战，要求让我带兵去收拾孙仲文。肖华同志答应了我的请求。

第二天，我便带领六支队的七团（这时六支队已由三个营扩展成七、八两个团），离开乐陵，连夜开赴盐山。走到距离大赵村一里多路的地方，我将队形摆成三路纵队，我率一个营居中，团长李子英带一个营为左翼，营长仇鸿印带一个营为右翼，齐头并进。

一到大赵村前的庄稼地，我们便展开兵力，向孙仲文发起强攻。孙仲文虽然强悍，毕竟不是我主力部队的对手。转眼间，大赵村即被攻破。孙部残余人马，大半缴械投降，少数企

图负隅顽抗的，全部被消灭。孙仲文这个狡猾的家伙，化装从地道逃走了。消灭了孙部以后，我军在盐山第四区设立了抗日区政府，调第五区的姜仁奇同志任区长。接着又趁势向东北发展，建立了渤海岸的新海县抗日政权。

至此，“冀鲁联防”宣告破产。沈鸿烈和鹿钟麟企图对我软硬兼施，南北夹攻，但也被我软硬兼施，各个击破。这一来，沈鸿烈和鹿钟麟老实多了，不得不稍稍收敛起将我们挺进纵队赶走的念头，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这场斗争的胜利，证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样一段话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

第四章 晓以大义

大赵村战斗结束后，我把各项善后工作处理完毕，就带着部队赶回乐陵。

深秋时节，萧瑟的秋风吹来，很有些寒气逼人。平原上的庄稼早已收尽，地上一片光秃秃的，越加显得苍茫、辽阔。

突然，一阵嘹亮的雁鸣声从天上洒下来。我抬头一看，雁群排着整齐的队列，振翅南飞……心里想，时间过得真快！我们来时还是夏天，遍野是绿色的庄稼；现在已是深秋天气了。

正想着，迎面驰来一匹枣红马。到我跟前，骑马的人翻身下马，向我敬了个礼：“周政委！肖司令要你马上到纵队司令部开紧急会议！”

我一看，原来是纵队司令部的通信员，就问：“什么内容？”

“不知道！”他摇了摇头，就上马走了。

我略一思索，吩咐仇鸿印和郑志英两人：“你们带着部队随后赶来，我先走一步。”说罢，和警卫员一齐上马，朝乐陵城飞奔。

等我满头大汗地走进纵队司令部，里边早已坐满了人。其他各支队的领导都到齐了。大家围着桌子坐成一圈，正等着开会呢。

我一进去，肖华同志就亲切地说：“你先喘口气。大赵村战斗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个大概了，以后再详细汇报吧！”随即提高了声音，对大家说：“同志们！大赵村战斗的结束，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冀鲁联防’阴谋的破产。但是，你们看，我们又要迎接一场新的斗争了！”他扬起手中的一张电文，接着说：“这是刚才接到的一二九师师部发来的电报，我给大家念念。”

电报上说，国民党军阀石友三的十军团已从鲁南调到河北，配合鹿钟麟向我军搞磨擦，在冀南到处建立反共反民主的“二政权”；十军团的暂编第一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进入鲁西北，正向冀鲁边区开进。要我们切实做好准备，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维护边区抗战的大好形势。

肖华同志接着说：“暂一军的来意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顽固派眼见‘冀鲁联防’破产，岂肯善罢甘休，调高部入境，是企图制造大规模的武装磨擦，把我军挤出边区。我们不能掉

以轻心哟！”

接着，他引导我们根据上级发来的有关情报资料，对高树勋进行了分析。我们感到，高树勋有可以团结的一面。高是盐山县城南高金钟人，早年给我们的刘伯承师长当过副官。他本人是比较倾向于抗战的，与顶头上司石友三貌合神离，齟齬很深。这次蒋介石派他前来，是想利用他以乡土情谊笼络人心，争取群众，孤立、排挤我军。但又怕他与我军靠拢，特地委派鲁北国民党党部主任、鲁北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CC分子马皋如任他那个军的政治部主任，监视他的行动。这说明他处在不被信任、受排挤的尴尬地位。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主动对高树勋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晓以民族大义，就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反共顽固派马皋如等人决不是吃素的。他们肯定要挑起高军与我们的冲突。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防止可能发生的武装磨擦。因此，我们确定了争取国民党中间实力派、孤立顽固派的方针，并作出了这样几条决定：一、以主动的姿态，欢迎高军北上抗日；在可能的条件下，协助高军搞好粮草供应。二、对高军中反共分子挑起的种种磨擦，予以坚决回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三、各级武装都要严阵以待，以防不测，不能轻心大意。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各支队的干部回去对部队进行传达、动员。

十一月下旬，高树勋的部队从鲁西北的夏津、恩县一带越过津浦路，进入鲁北。尔后转来乐陵，将在乐陵、宁津、庆云、盐山等地驻扎。

我纵队机关在旧县镇附近为高树勋召开了欢迎大会。会场上悬挂起大幅标语：“欢迎高军长北上抗日！”军民齐声高唱“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歌。肖华同志代表边区的抗日军民致欢迎词。高树勋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个头不高，说话有点口吃，一张口就“这个，这个……”地收不住。但是，他在会上讲的话还不错，说了一通抗战的道理，态度也比较诚挚。

会后，肖华同志把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派人专程送来的一封信转交给高树勋。刘师长在信中列举石友三、张荫梧、侯如墉、朱怀冰等国民党部队同室操戈，在敌后制造磨擦的种种痛心事实，恳切地劝诫高树勋要认清形势，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与石、张、侯、朱等辈为伍，沦为民族的罪人，遭国人的唾骂！

高树勋看了信，不禁长叹一声：“唉——”接着摇了摇头，显得心事重重。

肖华同志见此情景，就劝道：“高军长！刘师长的话出于一片诚意啊！高军长应该三思而行。”

高树勋叹道：“这我知道。师教敢不聆听！可是，这个，这个……”

肖华同志见他语不成句，就说道：“我们知道，贵党贵军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他们是反对内战的。在这民族危亡之秋，把枪口对着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得人心的。希望高军长以民族利益为重，与我们同心协力，共御外侮！”

说罢，把早已备下的一些礼品送给他。高树勋收下礼品，谢过就走了。

送走高树勋后，纵队领导一商议，决定趁热打铁，派支队司令员邢仁甫以盐山同乡的身份请高树勋吃饭，做他的工作。

邓克明同志笑着说道：“蒋介石派他来拉老乡，我们就先

拉他这个老乡，针尖对麦芒！”

第二天，高树勋应邀而来，邢仁甫请他吃水饺。言谈间，高树勋说起自己的历史、身世、处境，十分感慨地说：“要能早日驱除日寇，我也就告老还乡了。能在老家兴办一所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几个有用之材，我就满足了。”他还说起这次受命前来时，鹿钟麟曾说：“听说那边共产党正搞什么减租减息运动，你家祖宗的牌位恐怕要成碎木片了！”实际上，减租减息运动这时尚未展开，因此，他对鹿钟麟的话很反感。

此后，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等纵队领导又数次前往高树勋驻地，与他交换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看法，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毛主席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道理。通过这样一些工作，高树勋对我们的态度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表示要和我们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为了使高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接受我党的抗战主张，我们还征得高树勋同意，派出一批干部到他的部队中去作报告，宣传我党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方针。

肖华同志和纵队其他领导人也亲自去高军中作报告、讲形势。肖华同志在高军十三团作报告时，把党的抗日主张讲得深入浅出，鼓动性很强，在官兵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作完报告回来，官兵们沿街跟着他走，都想见一见他，说：“八路军真有能人！肖司令多年轻！”“讲得真在理！”“共产党就是行！”这样，使我党我军的威信在高军中树立起来，我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高军许多官兵的同情和拥护。

我们的工作顺利地进行了。

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以马阜如为首的反共分子也在暗地里磨刀擦枪，加紧策划着一个个新的阴谋。

他们照着石友三在冀南的样子，在津南各县建立反共、反民主的“二政权”，与我抗日民主政府对立，制造冲突。

为了拉拢收买高树勋，马皋如先保荐高树勋的大舅子刘松龄为宁津县长，由鹿钟麟下委任命。高树勋的夫人是宁津水郡庄人，对刘松龄当县长自然是高兴的。马皋如这一着得手，立即又着手组织了庆云、盐山、南皮等七个县政府，专门与我抗日民主县政府作对。

高树勋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情，听由马皋如等人所欲为。

这样，马皋如等反共分子越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不久，他们就在宁津县策划了一起震惊全区的袭击我抗日县政府的事件。群众把它叫做“复辟事件”。

在这之前，马皋如和驻宁津的高军一师师长“张大烟鬼”等人，曾在宁津组织了一支“河北保安队第二总队”。由鹿钟麟委任水郡庄大地主王淮川为大队长，网罗了惯匪高华胜等亡命之徒，寄居于吴桥县高集一带。刘松龄的“二政权”建立后，马皋如等人见时机已到，就召集王淮川等人面授机宜，周密策划，并派大队副梁连成化装进城，以同乡的身份策动我一连连长刘明福叛变，企图里应外合，夺取宁津县城。刘明福经不起引诱，答应和他们合谋。

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里，北风呼啸，宁津县城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早已熄了灯，人们都在温暖的炕上进入了梦乡。

这时，梁连成带着高华胜等二十多名亡命之徒，人人手持短枪，在叛徒刘明福的接应下，冲进了我抗日县政府的大院里。

这些暴徒把我县府工作人员从被窝里拉出来，惨无人道地

杀害在院子里。县长李毓楨同志听到枪声，知道不妙，连棉衣都没顾得披上，翻墙逃了出去。县府秘书盖津源同志却被抓走了。

刘明福又带这批暴徒砸开了监狱，打死我军看守，把各类在押犯人和土匪都放了出来。

这次事件，计打死打伤我县府工作人员和战士十多人，拉走六十多人，抢去步枪五十多支、手枪八支；放走在押的犯人数十名、土匪二十多名。

他们原定消灭我抗日县府后，就此占领县城，迎接顽县长刘松龄一伙进城。但是，这一阴谋暂时未能得逞。我九连连长盖平源闻讯后立即带队赶来，暴徒们抵挡不住，在浓重的夜色中仓皇逃走了。

几天后，刘松龄在高军一师师长“张大烟鬼”的护送下，大模大样地把“二政权”搬进宁津城，强行赶走了我抗日县政府。我抗日县政府在李毓楨同志领导下，只得召集跑散的同志，在农村中流动办公。

这个消息传来，大家都义愤填膺，干部战士纷纷要求予以反击，忿忿地说：“不能退让，一让他们，边区就完了！”请战书象雪片般飞到纵队司令部。

纵队领导敏锐地感到，这次事件只是个信号，后面还有更大的阴谋：马皋如等人显然企图以此为争端，挑动我们与高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以便坐收渔利。经讨论决定，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宁津县城暂且不动，避免与高树勋正面冲突；先消灭保安队这帮匪徒，给马皋如等人一个迎头痛击。

为了争取高树勋，在采取行动前，肖华同志曾亲赴高树勋驻地，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他，要他警惕马皋如等人的

挑拨，指出他们策划的“二政权”是反共反人民的。

但是高树勋吞吞吐吐，含糊其词，不肯就此认错，反而辩解道：“宁津、沧县等县长都是经鹿主席亲自任命的，名正言顺，无可指责。因贵县府未经当局任命，他们一时操之过急，可以谅解嘛！”

肖华同志愤然站起来，大声说道：“高军长，这是什么话！当初芦沟桥枪声一响，你们那些‘名正言顺’的大官老爷们哪里去了？千万人民的生死，国家民族的危亡，弃之不顾，却争先南逃！我们八路军抱着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决心，奋战于敌后，收复失地，建立民选的抗日政府，拯救人民。请问高军长：这错在哪里？如今，后方局势稍稳，你们又来‘名正言顺’搞接管了，甚至不惜怂恿暴徒袭击我抗日县府，枪杀我抗日人员，难道这竟是高军长的意思吗？！”

一番话说得高树勋哑口无言。他连忙摆着手，要肖华同志坐下，然后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我也不知情，肖司令请息怒，请息怒……”

肖华同志说：“我们讲统一战线是为了团结抗战，如果有人以为这是软弱，那就错了。对于破坏抗战的行为，我们从不手软。”说罢起身告辞。

肖华同志回来后，立即下令准备反击。

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曾国华同志的永兴支队首先袭击了刘曹庄，将保安第二总队的一部打得稀里哗啦，狼狈逃窜。大队长王淮川被打伤后，只身逃往北平。我抗日县府秘书盖津源同志被救了出来。

二月八日，我们又获知消息，说保安队抢劫了二十多辆大车，经过程庄逃往李家桥，占据了两家地主宅子，准备在那里过年。纵队领导即令五团二营长齐丁根带两个连包围李家桥，

务必将其一举歼灭。二月十四日凌晨，齐丁根带着五连、八连进攻李家桥。保安队凭借宅深墙高，并有三丈高的炮楼掩护，负隅顽抗。我军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勇猛地发起冲锋，不多时，就将两座宅子和炮楼全部攻克。保安二总队除三十多人逃窜、投入吴桥张国基部外，其余全部被歼。袭击我宁津抗日县府的主犯梁连成、高华胜、叛徒刘明福都被我们活捉，并俘虏了一百多人。

我们在乐陵县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阴谋活动，号召群众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不给“二政权”纳粮纳税，紧密团结在我抗日政府周围。并将梁连成、高华胜、刘明福等人当场处决。一百多名俘虏经教育后全部释放。

这一仗打在保安队身上，痛在马皋如等人的心上。他们的“二政权”原来神气活现地催粮逼款，招摇过市，这下子都隐匿到一些地主民团或土匪窝中。后来仍怕不安稳，一律随高树勋的部队行动，成了不起作用的空摆设。

这一仗也教育了高树勋。后来听说，马皋如以保安队被歼为借口，要高树勋出面干涉，企图扩大争端，结果被高树勋抢白了一顿，弄得马皋如下不了台。

边区军民对这一仗无不感到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宁津县一位大爷拉着我的手说：“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的气，你们早该揍这些狗东西了！对他们用不着手软，他们全属松花蛋——一砸就烂！”说着，又敲巴着旱烟锅，高兴地说：“唔，这回‘二政权’的小子们该瘪气了！”

这样，我们打赢了第一个回合，获得了斗争的主动权。

马皋如等反共分子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征粮问题上大做文章，直接挑动高树勋部队与我发生磨擦，企图制造更大

的冲突。

这时正是春季，青黄不接，全区出现了严重的春荒：粮食没有了，玉米芯、地瓜藤都被拿来充饥。数万部队的军粮成了大问题。

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挺纵领导带头挖野菜，吃糟糠，和全体同志一起，千方百计地节约粮食，争取渡过这一难关。

我各级抗日政府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还是尽可能地帮助高树勋的部队搞好供应。

但是，高的部队和其他国民党部队一样，军纪很坏。他们鱼肉群众惯了，吃着细粮、肉菜，还常常四出掳掠。甚至扮成土匪，夜入民宅进行抢劫。如驻在乐陵朱集的某部士兵，白天到店里吆五喝六，大吃大喝，最后分文不付，扬长而去；晚上又蒙着黑纱，扮匪抢劫了焦村地主王之明。至于敲诈勒索，吊打群众，糟蹋民女……更是屡屡发生，不计其数。

我地方抗日政府曾几次写信给高树勋，要他阻止这种军纪败坏的行为，保证这类事情不再发生。高树勋对此很不高兴，以为是我们有意诬蔑他的部下。

马阜如等人见有机可乘，就在高树勋的部队中到处煽动：“咱们为了抗日在枪林里钻，共产党政府在背后捣咱们的蛋，不叫吃饱饭，咱们跟他来硬的，看谁斗得过谁！”挑动高军官兵与我对立的情绪。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操纵随军的“二政权”，让他们出面，在高的部队保护下，四处催粮派款，刁难我区、乡政府，制造了一系列磨擦事件。

一次，宁津县“二政权”县长刘松龄，带着高军一个排，到二区要粮要款，开口就要粮食数千斤，钞票几万块。我抗日区长李武训回答：“眼下春荒，家家都揭不开锅了，哪来这么多

粮款？再说，本区军粮早已如数上交……”

不等他说完，刘松龄就吼道：“好个李武训，竟敢违抗军令！来啊，给我吊起来打！”一时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当场把李武训同志活活打死。

之后，在盐山、庆云、南皮等县又多次发生这种事件。我政府工作人员惨遭荼毒，有的给了粮款，仍被吊打致死。全区抗日军民对高军的行为气愤已极，纷纷要求给予严厉制裁。

我各地抗日政府一面与高军各部交涉，一面四处张贴布告，重申：除我抗日政府外，其他单位均无权征派粮款；部队军粮应与我抗日政府协商解决，不得擅自在驻地征派。

在马皋如等人的煽动下，高树勋的部队不但不收敛，反而更加横行无忌，四出催粮逼款。另外，还派了骑兵到处撕我政府布告，企图制造借口，挑起争端。

有一次，高军六师的一个骑兵，竟然在乐陵县城大街上撕我政府布告，被群众团团围住责问：“你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撕政府布告？”

那个骑兵歪着头说：“我就撕！你们敢把老子怎么样？”

群众气愤不过，把他扭送到县政府扣了起来。

我乐陵县抗日政府当即给高军六师刘师长发了一封公函，向他提出抗议，要求他管束部下，尊重我抗日政府，遵守政府法令，不得重犯；同时请他派人把那个骑兵领回去。

不料公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几天后，高树勋的部队反而抓走了我方几个工作人员，扣押起来；后来愈演愈烈，竟发展到抓起我们部队的人来。有一天，我带着六支队驻在宁津县南村，在村外放了几名便衣哨，结果也被高军六师的部队抓了去。我们派了一名指导员前去交涉，也被他们扣留了。

干部战士们为此气得嗷嗷叫：“这还了得！打鬼子象草

鸡，搞磨擦倒挺神气！把咱的人放回来便罢，不放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干！”

许多人围着我说：“政委！咱们去把人要回来，不肯放就跟他们干！他们欺人太甚，咱们也不能太软弱了。”

我安慰大家说：“同志们不要着急，这事不小啊！我们要报告纵队首长，从大局出发，妥善解决。大家放心，谅他们也不敢把我们的人怎么样！”好说歹说，把大家劝走了。

挺纵领导召集我们各支队领导，一起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大家认为：这又是马皋如等反共分子的新阴谋！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大作文章，挑动高军与我军发生磨擦。如果不迅速粉碎这一阴谋，照此下去，难免不出大漏子。

肖华同志严肃地说：“目前春荒严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捣鬼，是很容易引起磨擦的。抓人的事情，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在征粮问题上，不能含糊。原则问题是不能退让的。”

符竹庭主任接上说：“我们要以斗争求团结，以退让求团结是不行的。对高树勋不能一让再让。”

会后，肖华同志亲自去找高树勋交涉。高树勋起初气粗声高，绝不承认他的部下有违纪行为，反而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

肖华同志据理力争，列举种种事实，说明高的部队胡作非为，危害百姓，同时严肃指出，在粮荒严重之时，军粮问题要与各级抗日政府协商解决；否则，群众和他们斗争，他们也征不到多少粮食，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要他们承担！

肖华同志最后说：“高军长！你就不感到这是有人在背后捣鬼，企图坐收渔利吗？！”

高树勋听出话音，沉思起来。他在事实面前和肖华同志的劝诫下，终于在口头上答应了我们的两条要求：一、在各地抗

日政府的协助下，解决军粮问题。二、立即放回被扣的我方人员。

我接到肖华同志的通知后，马上找来支队宣传干事潘大可，对他说：“你拿着我的信，去找六师刘师长，请他把我们的人放回。”

“是！”潘大可敬过礼就要走。

我说：“你等等，换件新棉衣，拿出点八路军的样子来。”我把自己脚上的棉靴脱下来给他穿。在一旁的青年干事赶紧把新补发的棉大衣和小巧玲珑的手枪借给他，帮他穿戴起来。

我见他不太在意，就又叮嘱了几句：“对他们要讲礼节礼貌，原则问题一步也不能让。落太阳前赶回来，否则，我们就当发生意外情况考虑了。”

潘大可虽然初次单独外出，却挺好地完成了任务。那个刘师长一见面就对他说：“误会，误会！敝军部下太不懂事，即使贵军和政府扣了我们的人，也不该反过来扣你们的人。”

潘大可见他把责任全推给我们，就顺水推舟地笑笑说：“是啊！贵军人员撕了政府布告，理应与政府协商处理，不该无理扣我们的人。”

刘师长自讨个没趣，又说道：“敝军奉令来到边区，贵军的供应本应由我们负责，但我们能力所限，只好允许你们成立政权。不过……”他一挥手，参谋长取来个文件，毛笔写的正楷字，盖着大印，是我乐陵县政府送去的公函。他指着文中“不亚于张宗昌之虐政”一句问道：“怎么能把我们比作张宗昌呢？他是军阀，我们是国民革命军呀！”

潘大可理直气壮地答道：“刘师长！我们八路军奉命挺进敌后时，边区原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早已溃逃一空，我们帮助老百姓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这难道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

吗？不料贵军又到处成立政权，撕我布告，私征粮款，这恐怕不符合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宗旨吧！我政府要还被扣人员，乃是理所当然，刘师长也不必拘于片言只字！”

刘师长支吾了几句，只得将人放了回来。

这样，双方被扣人员都陆续放回，紧张的空气又开始松弛下来。马皋如等人眼巴巴地等着看大戏，戏刚开了个场就闭幕了。他们的苦心又白费了。

由于我们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斗得有理、有利、有节，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通过这几次斗争，教育了高树勋，粉碎了马皋如等人的反共阴谋。

一九三九年一月起，日寇开始回师“扫荡”。我们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原则，连战连捷，取得了韩家集、灯明寺等数次胜利。但是，高树勋始终沿用国民党部队那套老战法，既不肯东奔西走，作战略转移，又不愿化整为零，缩小目标，常常久驻一地不动。肖华同志多次劝他，他又不听。结果，他的部队在善化桥、刘背津、罗张家三次遭日伪军袭击后，又在乐陵县宁家寨被日伪军团团围住，处境十分困难。

宁家寨位于乐陵与宁津交界处，是个上千人口的大村。村外筑有寨墙，只有东、西两门可供出入。出东门二里是韩寨，出西门往西北方向是五纸坊。

驻在这一带的高树勋部队有二千人，并拥有钢炮十门、轻机枪十挺。但是部署很分散：除军部带警卫连驻宁家寨和三连驻韩寨外，其他部队都驻在五纸坊一带，相距较远。

七月十一日深夜，敌司令官宫泽文雄侦知我挺纵部队已离开宁家寨附近开往南皮，高树勋部队孤立无援，便集中了庆云、盐山等地的日伪军一千多人，携带八二炮四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四十多挺，分乘二十多辆卡车，突然奔袭，包围了宁家

寨。次日拂晓，日寇从四面发起进攻。高部警卫连依仗丈把高的土围子拚死抵抗。但日寇来势很凶，火力又很猛。高树勋眼看宁家寨即将失守，急令周围部队赶来救援。

五纸坊一带的部队还没有靠拢宁家寨，就遭到日寇外围部队的阻击。这些国民党的军队，平时骄狂自大，目中无人，实际上战斗力很差。一碰上日寇的凶猛拦击，就趴在地上起不来。日寇趁势一冲，几个连队顿时全垮了，七零八落的溃不成军。

韩寨的三连是高军中战斗力较强的连队，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去支援。从韩寨到宁家寨，要经过一片高高隆起的平坡。三连刚上坡，就遭到日寇十多挺机枪的袭击，不一会就全连覆没了。

高树勋孤注一掷，下令向西突围，想和五纸坊的部队会合。但日寇的两挺重机枪喷着两股火舌，紧紧地封住了西门。部队一露头，就纷纷中弹倒下，两次突围都被打回来。

到了下午，日寇见高树勋顶不住了，就派人喊话，要高树勋投降，同时火力也开始减弱下来。高树勋拒绝投降，一面下令部队死守宁家寨，一面向国民党土顽吴桥张国基、德平曹振东发报求援。但张、曹为了保存实力，装聋作哑，袖手旁观。

高树勋眼见张国基、曹振东见死不救，只得向我挺纵求援。

黄昏时分，肖华同志接到高树勋的求援电报，立即下令各部队准备驰援宁家寨。听说要去救高树勋，许多人想不通。然而大家相信党的政策，相信肖司令的决定，没有人说个“不”字。

晚上八时，肖华同志率领着部队，象一支无声的箭扑向无边无际的夜幕中。经过五十华里的急行军，深夜一点左右，赶到了宁家寨附近。

这时的宁家寨，黑乎乎地突出在地平线上。村子的四周，日寇燃起了数十堆火，刺刀在火光中一闪一闪地发亮。担任警戒的日寇，有一阵没一阵地打着机枪，枪声尖厉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

肖华同志命令骑兵连向南疾驰，故意暴露目标。敌人以为我大部队到来，在南面和我们打了一下，阵势就乱了。

深夜两点钟，我军发起进攻，指战员们象潮水般向敌人涌去。日伪军当即被撂倒不少，乱成一团。

高树勋见救兵已到，也下令部队冲出村来。日寇腹背受敌，又不明虚实，只听见怒潮般的吼声、枪声和脚步声，急忙下令撤兵。

西北部的敌人主力一溃退，我军就紧压着鬼子屁股，以排山倒海之势猛追过去。敌人正仓皇逃命，不料又遭到李宽和同志率领的津南支队的迎头痛击，顿时狼奔豕突，争先逃生。我军掩杀了一阵，因为天太黑，看不清，怕伤了自己人，就收兵返回宁家寨。

清点战果，仅我们就击毙鬼子六十多人、伪军一百多人，击毁汽车四辆，缴获两挺轻机枪、两百多支步枪和其他一些军用物资，还生俘了两名鬼子。

这一仗，我军从万分危急中解救了高树勋，使他看清了在抗日救国中，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是能真诚相助的，反共磨擦是没有出路的；也使他看到了张国基、曹振东这类“同党”的真实面貌。因此，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我军的看法。他一见肖华同志的面就拉着手不放，连声说：“谢谢！谢谢肖司令！”

肖华同志说：“高军长，我们不是早就说过，真正抗日的必将助之，破坏抗日的必将除之吗？我们是从不食言的呀！”

高树勋连忙说：“这我知道，贵军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钦

佩！对鄙人教益不浅，教益不浅哪！”

这以后不久，他就毅然带着部队撤离边区，越过津浦路向西去了。后来，他在濮县扣押并处决了投敌叛变的十军团总司令石友三；解放战争中，他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第一个在邯郸率军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他曾感慨地说：“共产党教会我做一个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唯有共产党是长存的！”

团结争取高树勋，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使我们在边区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这完全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第五章 除暴安民

国民党十军团暂编第一军撤出冀鲁边之后，马皋如等人扶植的“二政权”因为失去靠山，全作鸟兽散了。刘景良、张子良、曹振东、张国基等人，见我军声势浩大，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我们挺纵已经在冀鲁边初步扎下根来。

但这时边区仍然比较混乱。残存的土顽、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经常出来骚扰、抢掠、残害群众，有些反动武装甚至勾结日伪，蚕食我抗日根据地。

我和肖华、符竹庭、邓克明等同志，不断接到群众递来的“状子”。这些“状子”，愤怒控诉了盘踞在冀鲁边地区的于志良、孙唐臣、刘彦臣等股土匪、土顽横行霸道，奸淫抢掠等等罪行，强烈要求八路军为乡亲们报仇，除掉这批恶棍。

对此，军政委员会专门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除暴安民是当前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只有狠狠打击那些祸国殃民的反动武装，替群众解除苦难，才能进一步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更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才能使我军在冀鲁边的根扎得更深。我们决定，立即出兵，首先讨伐民愤极大的于志良、孙唐臣、刘彦臣和穆金城。

消灭于志良的任务由五支队去执行。

一九三九年正月的一天，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同志，带领两百多个战士，从乐陵出发，连夜直奔陵县。

在出发前，曾国华支队长经过调查研究，已经对于志良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于志良是鲁北陵县于集镇人，于集镇在县城东北十五里的地方。他的队伍起初只有两个中队加一个马队，约二百人枪、二十来匹骡马。

两年以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于志良与驻扎在陵县城东北神头镇的另一支地主武装——李会亭部发生冲突，击垮李部，占领了神头镇。此后，于志良的兵力扩大到七个中队、一个卫队及直属炮兵队、骑兵队，不下两千人；势力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于集、神头两地，向西扩展到德县地面，向南伸进了平原县境。

一九三八年七月，沈鸿烈跑到神头镇，委任于志良为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九旅旅长，兼陵县县长。此后，于志良更加肆无忌惮，横行作恶，残害乡里，闹得那一带鸡犬不宁。他还以国民党陵县县长的名义，收编了祝贞、任朝重、王书堂、李洪祖、程宝树、任善才、刘敬洲等多股土匪，反动气焰越发嚣张。

于志良虽把陵县视为自己的领地，但他的势力只伸到县城的西、南二面，而县城的东、北二面，则驻扎着另一支地方武装——十八团。

十八团起初为十八个村子的“联庄会”，以防匪护村为宗旨，团长叫郭仁山，团部设在仓上村。团的常备军只有二百多人，但散布在各村的大枪有两千多支，团众平时务农，一有情况个个上阵。到抗战初，参加十八团的会员村已增加到两百多个，基本上控制了陵县东部和北部，以及商河县西南部、临邑县北部，范围颇广。这个团在我党的影响和感召下，较为开明进步。我党也曾先后派出梁国栋、郝巨、李学瑞、李平、单福顺等同志，在十八团范围内的回河、高家、大辛等村建立了党的支部，成立了农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十八团限制了于志良向陵县东、北二面扩张的野心，成了于志良的眼中钉。于志良时刻想拔除十八团。

根据这种情况，曾国华同志决定从陵县东北部，经过十八团地面，向于志良进攻。这样便不致腹背受敌，没有后顾之忧，遇到意外情况还可以得到十八团的援助。

这天，我军靠近了陵县。中午，部队歇在公路两边野炊，忽然公路上一个人骑着快马，从陵县方向疾驰而来。那人见到八路军，赶紧跳下马来，焦急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曾国华不认识这人，但估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便急忙迎上前去。

那人估计曾国华是带队的，便向他鞠了一躬，然后结结巴巴地说：“救、救救我们吧，十八团的老百姓遭、遭殃啦！我是副、副团长……”这个自称副团长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说清是怎么回事。

原来，前天于志良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借口征收粮款，突

然向十八团团部驻地仓上村发起进攻。但十八团散布面积大，且是村村连环救应。邻村见团部驻地受困，连忙点拨人马赶来，反将于志良的部队团团包围起来，一阵砍杀，击毙了一百多个。结果，于部这个连，只有一个人活着逃出去。

于志良首战便大败，恼羞成怒。遂亲自上阵，指挥两千多人，分头进攻十八团。然而还是久久强攻不下。

于志良便派上次进攻仓上村时侥幸逃出的那个人，星夜去请日军前来帮忙，因那人的弟弟在日军里面混事。很快，那人便以十八团附近发现八路为名请来了日寇。日寇对高家、大宗家等村放炮轰击，平素只是看家护院的群众，没有经历过这种战阵，一时招架不住，被炮火轰得纷纷躲避。

于志良趁势率众进攻，连续攻下好几个村庄，残害群众。高家村的韩玉泉被活埋，韩文贞、韩文江的头被铡下来挑在杆子上示众；前仓村的丁春峰被挂在树上活活吊死；团长郭仁山也被活活绞死。于志良攻下十八团的大部分村庄之后，向部下宣布放假七天，纵容士兵在各村尽情地烧杀奸淫，为所欲为。

当时在后仓村的十八团副团长王如玉，逃出了于志良的魔爪，便骑马奔向乐陵向八路军求救。没想到刚刚跑出陵县地界，便碰到了八路军。

曾国华听了这消息，高声对正在准备开饭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赶快出发。于志良又在残害老百姓了，再迟一分钟，群众就多一分损失，等打完仗我们再吃饭。”

队伍迅速地集合起来。曾国华带领战士们，跟着王如玉，以强行军的速度朝陵县奔袭。

到了十八团驻地村庄，我五支队便展开队形，向正在村内烧杀抢掠的于部人马和十几个日本鬼子，发起猛烈攻击。王如

玉副团长也召集乡亲们助战。正在恣意妄为的土匪和日寇，做梦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神兵天降般地突然出现在面前，吓得屁滚尿流，纷纷逃窜。不到一小时工夫，于志良的大部人马和十几个日寇被我军歼灭，于志良被活捉。只有王书堂、李洪祖、吴宝树三个头目漏网逃走，投奔德平的国民党保安五旅曹振东去了。

于志良被俘后，自觉无脸见人，用剪刀自尽，结果未遂。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曾国华同志召开公审大会，宣布枪决于志良，替陵县人民报了深仇大恨。

陵县群众对八路军感恩不已，编出神话故事在当地流传。故事说：仓上村有座皈一殿，皈一殿旁边有座龙王庙，龙王庙的老龙王不忍心看着于志良残害百姓，便托梦给乐陵的肖司令，请他来解救一方灾难。肖司令带的都是天兵神将，当下地遁前来，数百里路，经宿便至，一阵风卷走了于部人马。

出于对八路军的感激和信任，十八团主动提出，要将所有人马和枪支交给八路军。根据乡亲们的愿望，我们收编了十八团，委任梁国栋同志为十八团团长，杨秀章同志为政委，刘德胜同志为特派员。十八团人马编为三个中队，我们又从挺纵调十多个连排干部到这三个中队去加强领导。这时，活动在滋镇以北一带的另一支民团武装，只有三十来人，名为二十二团，也要求我军收编，于是我们将其编入十八团，列为第四中队。接着，我们又派吴匡五、李玉池、王其元、戴豪亭等一百多人的工作组，到陵县各村开展工作，吴匡五同志任陵县县长，王其元同志任县总动员委员会主任。

从此，陵县安定下来，成了边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尤其是陵县三回河，后来威名远扬，人称“小莫斯科”。

曾国华同志在消灭于志良之后，便带领五支队回到乐陵。

准备再由乐陵出兵，向北进攻盘踞在盐山的反动地主武装刘彦臣。

五支队刚到乐陵，鲁北商河、津南南皮两县，又传来了歼灭孙唐臣和穆金城的胜利捷报。

消灭孙唐臣，是我纵队政治部锄奸部长匡庚山同志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完成的；时间也是在一九三九年一月。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天空的云缝中洒下清冷的月光。匡庚山领着战士们穿过一块块光秃秃的庄稼地，悄悄地逼近了商河县孙集东南的后坊村。

孙唐臣就住在这村里。这家伙十分凶悍，无恶不作。他是孙集人，早年便勾通土匪，作践乡里，曾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监狱。后来韩复榘委任的“剿匪”司令将孙唐臣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这时恰巧老县长卸任，新上任的县长石毓嵩，见孙唐臣有点武艺，便收他为保镖。抗战爆发时，石县长溜了。孙唐臣趁机回到孙集，杀死了控告他鱼肉乡里的叔父全家老少七口，霸占了叔父的家产，接着拉起一支土匪武装“黑团”。他的“黑团”横行乡里，糟蹋百姓。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然而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却封这个“黑团”为保安第五旅，委任孙唐臣为旅长。

孙唐臣的所谓旅部及一个连的卫兵，常驻在后坊村，其余人马则散布在后坊村周围的前堤子、后堤子、大蒲洼、陈家、李家等村。

匡庚山同志早就掌握了这些情况。为了防备“黑团”各部互相策应，他分兵多路，自己带一路人马主攻后坊村，其余的则分别包围前堤子、后堤子等村，切断土匪同后坊村“黑团”老窝的联系。这样虽然分散了兵力，而且“黑团”一旦互相策应，我们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但也只好这样，否则，便

顾此失彼，达不到全歼“黑团”的目的。

匡庚山带领的一部分战士，刚刚接近后坊村，不料村里的狗一齐狂吠起来。这后坊村约有二百来户人家。村外挖了一圈很深的壕沟，还筑有一道高高的围墙。围墙的东南西北有四座寨门。守在寨门上的匪哨兵，听到狗叫，又发现影影绰绰的人马，立即鸣枪报警。架在墙垛口上的机枪也一齐开火扫射。我军被压在村壕外面。与此同时，前堤子、后堤子、大蒲洼也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

匡庚山见偷袭不成，想要强攻。但他看看这后坊村壕深墙高，强攻会造成较大的伤亡。他皱皱眉头，决定用强攻的架势把敌人吓出来，在敌人脱离依托时，将其一举歼灭。他将一半兵力放在东、南、北三门，高声呐喊，虚张声势。自己则带领一半兵力，悄悄摸到西门。

后来据孙唐臣的一个马弁说，正躺在炕上和姘妇一起吸白面的孙唐臣，听到发现八路军攻村的报告，只是麻脸微微颤动了一下，仍旧躺在炕上吸烟，全然不把我军放在眼里。那个吓得抖抖索索的姘妇劝他快想办法。他还说：“娘们懂个啥，这后坊村沟深墙高，难道他妈的八路长了翅膀不成？老子的队伍都在邻近的村子里，他们不来救援？等会把八路包围起来，我们再冲出去，来一个里应外合，前后夹攻。嘿嘿……”又过了一会，警卫连长急忙跑来，结结巴巴地报告：“旅、旅座，八路火力很猛，弟兄们快、快顶不住了！”孙唐臣这才紧张起来，黑麻子瞬时变成了红麻子，双眼迸出杀气腾腾的凶光，从炕上一跃而起：“拿我的枪来！”马弁急忙从墙上摘下左轮手枪，恭恭敬敬地捧过去。

孙唐臣全副武装，跨上战马，奔向南门。他登上围墙一看，发现八路军火力很猛，而且对方隐在夜幕中，只见火光不

见人影。再看远处，只见无数影影绰绰的人，似乎已涌进前堤子、后堤子等村庄了，枪声也稀疏下来。事情非常明显，指望援兵已经不可能了。

孙唐臣的额头沁出了汗珠，心里萌起突围的念头。他见八路军对东、南、北三门攻得很紧，唯独西门只有零零落落的枪声，于是，他带着二、三十个骑兵，准备从西门突围。

西门外是一片开阔地，开阔地的左右各有一个水塘。时值深秋，塘水全部干涸，雪白的芦花在微风中摇曳。匡庚山同志带领战士们正埋伏在芦苇丛中。

孙唐臣带一小队骑兵，奔到西门，挪开顶门桩，蜂拥而出。刚跑到开阔地，没想到两边骤然响起枪声，从芦苇丛里射出的弹雨封住了路面，顿时有六、七个骑兵栽下马来。孙唐臣见遭到伏击，死命朝坐骑抽了一皮鞭，冲出火网。但没跑出十几米远，坐骑被后面追来的子弹击倒，他自己腿部也中了一枪，身子被压在死马底下，动弹不得。我军战士一拥而上，把他绑起来。接着掉头杀进西门，全数消灭了后坊村负隅顽抗的孙唐臣残部。这时我军进攻后坊村外围村庄的战斗，也先后胜利结束。

消灭孙唐臣，我们只用了三个多钟头，而吃掉穆金城土匪武装，更是干净利索。流窜到南皮县莲花池的穆金城，虽然手下拥有二千多人马，但都是乌合之众，只会鱼肉百姓。而执行消灭穆金城任务的运河支队，作战勇敢，负责指挥战斗的支队参谋长傅继泽同志，多谋善断，很会用兵。他指挥运河支队向穆部进攻，只花了个把小时，便攻下莲花池，灭掉了穆金城。

消灭孙唐臣和穆金城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正准备攻打盐山土匪武装刘彦臣的五支队。五支队的指战员们在曾国华同志率

领下，顾不得讨伐于志良后的疲劳，连夜赶到盐山，打响了进攻刘彦臣的战斗。

刘彦臣同日寇暗中勾结，在津南杀害了许多抗日志士。他的兵力共有六个大队。二大队和六大队随司令部驻在毛集，一大队驻在玉皇崔，四大队驻在黑牛王村，三大队和五大队也驻在司令部周围。这一带都属庆云县。

曾国华同志首攻毛集司令部。经过一场激战，匪部二大队和六大队缴械投降，刘彦臣带领几个心腹逃往黑牛王村。驻在玉皇崔的一大队也赶紧向黑牛王靠拢，同四大队汇合一处。刘彦臣指挥这两个大队继续顽抗。

我军将黑牛王里外围了三层，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终于消灭了负隅顽抗的残匪。刘彦臣的三大队和五大队驻在附近，吓得不敢来援。他们见黑牛王失守，赶紧投靠日寇去了。

我军进了黑牛王，没有发现刘彦臣的尸体。俘虏群里也没有他的影子。原来这家伙极其狡猾，他见大势已去，在黑牛王危在旦夕的时候，赶紧化装潜入村外的高粱地。等到我军涌进村去的时候，独自趁机逃跑。这条漏网之鱼，成了光杆司令，狼狈地跑到天津，不久便病死在那里。

消灭了于志良、孙唐臣、刘彦臣、穆金城等作恶多端的土匪和反动地主武装之后，残存的一些小股土匪和地主武装势力，再也不敢公开为非作歹。他们有的弃暗投明，要求归我收编，有的自生自灭了。至此，冀鲁边区基本上安定了下来。

我们除暴安民的这一军事行动，大大赢得了民心，冀鲁边二十四县的广大群众，出现了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庆云县柴林庄的石长润，在新婚的当夜参加了八路军；庆云县板营村的

李景岳，把家里的黄牛卖掉，买来一支湖北造的二把匣子，交给我县大队；沧县的开明士绅兰竹坡，也把自己的三个子女送进革命队伍。我们挺纵部队，迅速地扩大到两万多人。边区抗日根据地，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保卫边区

第六章 旗开得胜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斗争，从敌人手中收复了大片国土。而蒋介石在前方却连连丧师失地。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以后，日本侵略者开始认识到他们在中国的主要对手不是国民党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日本华北派遣军在给日本陆军部的报告中曾说：“即使现在的蒋政权失败，继之而来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以苏联势力为靠山的具有浓厚的共产色彩的势力掌握政权。……不要几年将出现之势态是，我们将不得不以比过去更加厉害的排日的中国为对手。”因此，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战场停止了战略性的进攻，把对国民党的方针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立即回师华北，企图使用重兵与我八路军作战，围而歼之，稳定占领区。他们从华东、华南、东北等地，抽调大批精锐部队，向华北集结。我们亲眼看到津浦路上，一列列满载着日寇兵员和军火的车皮，日夜不停，川流不息，在铁轨上疯狂地奔驰，震得津浦路沿线两侧的地皮都颤动起来。很快，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结集了二十个师团，超过他们侵华总兵力的

一半。

冀鲁边区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日本陆军部曾经在给天皇的奏折中说：“山东在政治和战略上具有极大的价值。”所以冀鲁边区是敌人回师“扫荡”的重要目标之一。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初起，日寇第五师团、第二十七师团、第一一四师团的各一部，共计二万多兵力，分别由沧州、德州、济南三地出发，向我盐山、庆云、乐陵一带抗日中心区进行合击。敌人一面“扫荡”，一面占领县城，修公路，筑碉堡，步步进逼，企图与我挺纵主力决战。

在日寇重兵压境的情况下，边区军政委员会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一个下马威。因为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卫边区。但为了避敌锋芒，军政委员会决定挺纵机关撤出乐陵城，挺纵四、五支队也跳出宁（津）乐（陵）边抗日中心区。同时对反“扫荡”作了具体部署：肖华、邓克明同志率纵队司令部机关和四支队一部活动于东光、南皮一带津浦路沿线；符竹庭主任和曾国华同志带领五支队南下鲁北，在陵县、济阳、商河、惠民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我带着六支队机关和七团留在盐山旧县镇附近活动。这样分散开来同敌人周旋，可以使其兵力分散，便于我军各个歼灭。另外，运河、商河、津南等几个支队和各县县大队都留守原地，相机四处出击，骚扰敌人，必要时就配合主力作战。

四、五支队撤离宁乐边后，我们六支队在旧县镇一带仗着人熟地熟，几次巧妙地避开了敌人主力的追击，同时寻找战机，准备狠狠地打击小股敌人。

六支队自编成以来，在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等纵队首长的关怀下，经过多次学习、整训，思想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我们多次组织指战员学习毛泽东同志的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使大家对坚持平原游击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前几个月，我们参加了粉碎“冀鲁联防”的斗争，参加了支援国民党高树勋部队反击日寇的战斗，参加了消灭孙仲文、韩树孔、刘陆桥、潘国珍、郝大萝卜等土匪汉奸的战斗，而且每仗都打得很漂亮。部队在战斗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现在，我们几次避开了气焰嚣张的日寇，有人就说起闲话：“六支队是土八路，打汉奸队行，打鬼子可不一定行。”因此，部队的求战情绪非常强烈，大家都想亲手同鬼子较量较量。战士们直跟着我转：“政委！咱们怎么老是避着鬼子走啊？”“政委！让我们跟鬼子干一场吧！”

面对这样好的战士，我只能笑笑说：“读过毛主席的书忘了？毛主席是怎么说的？敌强我弱的时候，要避实就虚，这是我们游击战的原则之一。现在时机不到，大家要耐着性子等啊。”

不几天，这样的时机来到了。

那是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安插在盐山县伪商会的内线王雅清，从敌人的闲谈中得知，驻在盐山城的日寇西村中队二百多人，抓了六十多辆大车，准备第二天到旧县镇来安据点。王雅清赶紧找个借口溜出城来，派人把情报一站接一站地送到旧县。

那天我正驻在旧县附近的一个村里，接到情报时，已经是傍晚了。

我马上派人把支队其他领导同志和七团的干部叫来，紧急磋商：打，还是不打？

大家分析了最近几天的敌情。认为周围一带的敌军不多，这股敌人孤军深入，又拖着几十辆大车的物资，包袱很重，我

们集中兵力打它个伏击战，消灭这股敌人还是有把握的。所以大家几乎同声说：“好机会，打吧！”

大家选定韩家集附近为伏击地点。韩家集位于盐山城到旧县镇这条公路的东侧，北距盐山三十里，南去旧县十里，是从盐山到旧县的必经之地。它是个大镇，镇子里院深墙高，镇外又有土围子，便于狙击敌人。它的对面还有马杯家、韩沙州等几个村庄和一片树林，易于隐蔽。韩家集附近确实是打埋伏的好地方。

会上决定，我带支队指挥部隐蔽在韩家集西边的韩沙州村，前线由七团的副团长仇鸿印和政委陈德负责指挥。

吃过晚饭后，参战的七团和支队警卫连集结完毕，等待出发。这时天气很冷，尖厉的北风呼啸着从头顶上吹过。灰土、草末、细沙粒打在脸上，针扎似的痛。但是，部队静静地站在月光下一动不动。

我看着眼前的部队，感到这仿佛是用钢铁铸成的一群塑像，心中一阵阵激动。我大声地说：“同志们！日本鬼子在我们边区横行霸道，残害了我们多少兄弟姐妹，毁坏了我们多少房屋庄稼，这口苦水能够吞下去吗？不能！今天报仇的机会到了。这次战斗，是我们六支队第一次大规模地同鬼子较量，全区军民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出威风，来一个旗开得胜，将西村中队二百多鬼子全部吃掉！”

部队士气非常高昂，一个个憋足了劲，摩拳擦掌。在仇鸿印、陈德等同志的率领下，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部队赶到韩家集后，仇鸿印、陈德带着连以上干部连夜察看地形，决定将公路南头拦腰挖断，在公路东西两侧和南头三面构筑工事，等敌人一进入伏击圈就收拢口袋，关门打狗。于是，部队连夜挖公路，修工事，利用寨墙和天然道沟，构成一

道道火力网。仇鸿印把十连连长左庆甲等人找来，指着眼前的公路说：“你们这一带很重要，公路边上多掘一些坑。”

左庆甲不解地问：“挖坑干嘛？”

仇鸿印朝左庆甲附耳说了几句。左庆甲听了大笑说：“妙，真是个绝招！”他赶忙回去照计布置。到天明时候，公路旁已经参差不齐地布满了许多有深有浅的坑。

第二天凌晨，部队早早地吃过饭，进入工事，等待伏击敌人。

太阳出来了，村寨、树林、公路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公路象条银练，蜿蜒地伸向远方；远处白杨、桦树、椿树组成的林带，象两道绿色的屏障，把闪耀着白光的公路夹在当中……

太阳慢慢地爬高了，还不见敌人的影子。有个战士揉着睁酸了的眼睛，嘀嘀咕咕地说：“都要等出汗来了，鬼子怎么还不来？”

旁边的一些战士也议论起来：“怕不会来了吧？”“会不会走漏了风声？”“不会吧！咱们不是封锁了要道吗？”

陈德同志看了看太阳，安慰大家说：“鬼子会来的，咱叫他来，他能不来吗？大家先起来活动活动腿脚，别冻坏了误事。这样望新娘一样眼巴巴地瞪着，不要害了相思病哟！”

一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部队的情绪又高涨起来。

这时，太阳已经有两竿子高了。有人突然紧张地低声叫了起来：“来了来了！看，鬼子的尖兵！”

远处的公路上，一队鬼子的尖兵挑着膏药旗，大摇大摆地走来。他们的后边，鬼子的大队人马蠢蠢爬来。六、七十辆骡马大车，满载着武器弹药、粮秣、被服和医疗器材，哩哩啦啦的拉了足足两里多长。近了，近了，听到了咣当咣当的大车响。鬼子的队伍穿插在车辆的行列中，神气活现地行进着。他

们做梦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打埋伏。

敌人全部进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前线指挥所一声令下，埋伏在公路两侧和南面的部队一齐猛烈开火，子弹飞蝗般射向敌群。埋伏在西头的一个连队见前边打响，赶紧收拢袋口，朝敌人背后开起火来。

敌人冷不防遭到这样突如其来的打击，当即死伤过半。活着的哇哇乱叫，有往大车下钻的，有来回跑的，有乱打枪的，象受惊的野马，乱成一团。

大车上的民夫一听见枪声，知道八路军来了，喜得撒下牲口，一哄而散。那些骡马，有的撒缰乱窜，有的中弹倒下挣扎，有的仍套在车上，惊恐地萧萧悲鸣。一时间，公路两旁，车马乱奔，尘土飞扬；人叫马嘶，喊声动地。

鬼子见民夫、骡马都跑散了，气红了眼，在后面叽哩呱啦地大叫。一个鬼子头目伏在地上，举着手枪乱嚷，被我支队手枪队长石长海看见了，他瞄也不瞄，抬手“叭”地一枪，把那鬼子的手给打断了。当他又抬起头的时候，石长海“叭”地又是一枪：“他妈的，叫你见日本老娘去吧！”那鬼子挨了两枪，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经过一阵混乱，鬼子慢慢冷静下来，开始有组织地向我阵地还击。机枪、步枪子弹刮风般扫过来，炮弹也落在我军阵地上。部队开始有了伤亡，战斗渐渐地形成了胶着状态。

我在支队指挥部里听到这个情况，急忙带着人赶往伏击阵地。这时快到正午了，太阳照在头顶上，使人微微感到暖意。我到了韩家集村边，只见阵地上成群结队地来了许多当地群众，大都是青年，扛着土枪土炮，要求参战打鬼子。也有些妇女和老大爷，在忙着运送伤员、包扎伤口，把烙饼、馒头、玉米饼、窝窝头分送到战士们手里……

有个老大爷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拍着一个战士的肩膀说：“打鬼子我是不行了，看着你们打，心里也痛快！吃吧，吃饱了，再好好教训他们！”

那个战士吃着个热腾腾的馒头，应了声：“好哇！”

我在一旁看着这军民并肩战斗的场面，心里非常激动，便走上前拉着老大爷的手说：“大爷！你放心吧，鬼子一个也跑不了。”老大爷高兴地笑了。

这时，仇鸿印同志跑过来了。他一边带我走进指挥所，一边把战场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鬼子组织了几次小型的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现在龟缩在约半里路长的一段公路上。我们昨天晚上在公路边挖的坑，正在发挥作用。鬼子因为无处藏身，急得象猴子似的直往坑里跳。有些坑里我们事先安置了地雷，小鬼子跳进去就上不来了。另一些坑虽然没有地雷，可是挖得很浅，鬼子跳下去伏在坑沿还击，就把小半个身子探出外头，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下。还有，我们土制的“马尾炸弹”，这时也正在发挥威力呢！

支队作战参谋王寰清提过来一副望远镜，领我到一堵墙洞前说：“政委，你往这看！”

我一看，果然不错，敌人正趴在坑边上顽抗，但把身子探出太多，纷纷被我军击中，滚进坑里。我们阵地上还不时抛出一个个炸弹，带着“马尾”晃晃悠悠地摇曳着，落进藏着鬼子的坑里。只听“轰！轰！”的爆炸声接连响起，腾起一股股烟柱，把鬼子炸得鬼哭狼嚎。

“好啊！打得好！这主意不错！”我高兴极了。

“这炸弹比迫击炮还管用，往这种坑里丢最好不过。”仇鸿印接上说。看得出来，他心里也高兴得要命。

我笑了笑说：“你老仇还真有几下子！”仇鸿印不好意思

地笑了。我想了想又说：“我们不能光打，还要来个政治攻势。”

仇鸿印说：“行！”

这时，陈德同志一阵风似地闯进来，一进门就说：“同志们情绪很高，鬼子快要全部完蛋了！”

仇鸿印把我的意思一说，陈德一推帽子说：“行，二营营长杨柳新就会喊几句日语。我去找他。”说罢一阵风似地冲出门去了。

仇鸿印望着他的背影，深有感触地说：“陈政委平日里那样文静，打起仗来就象老虎！”

不一会，阵地上枪声骤停，有人用日语高声喊道：“不克衣奥、斯蝶涝、靠涝萨纳衣！”

王寰清高兴得差一点跳起来：“杨营长，这是杨营长的声音！”紧接着，四面阵地上的战士们都大声喊起来：“不克衣奥、斯蝶涝、靠涝萨纳衣！……”

我抬头看了看太阳，估摸着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而敌人对我军的喊话又无动于衷。我就对仇鸿印说：“怎么样？进攻吧，争取天黑前结束战斗！”

仇鸿印说：“好吧！”回头对司号员下令：“吹冲锋号，出击——”

司号员举起军号，一扬脖子，吹起了雄壮的冲锋号。

“冲啊——”部队听到号令，高喊着杀声，排山倒海一样冲向公路。附近的上千名群众，拿着土枪、木棍、铁锹、粪叉，也一齐冲上前去，犹如潮水般漫上公路。

鬼子们慌忙跳出坑来，三个一堆，五个一团，东窜西闯，企图冲过人海。部队、群众一齐拥上去，几个人、十几个人围着一个鬼子，用刀刺，用棍打，用枪托砸。公路上只听得刀声

叮当和鬼子倒下时的哀嚎。

一个日寇军官在三个鬼子兵的掩护下，企图向西突围，被支队警卫连长柳润亭带人围住。经过一阵肉搏，三个鬼子都作了刀下鬼。日寇军官也受了伤，他双手持刀，眼里射出凶光，正要冲上来拚命，不料横里飞来一柄粪叉，不偏不斜正好扎在他的头上。紧接着一把铁锹把他拦腰劈倒，又一把粪叉死死地扎在他的脖颈上。这个日寇军官就这样翻了白眼，吐出了舌头，结束了侵略掠夺的罪恶生涯。后来查明，他就是西村中队长。

公路上和路两旁躺满了鬼子尸体，步枪、掷弹筒遍地皆是。这里一堆、那里一群的围歼渐渐结束了，只有六、七个鬼子突出包围，向北逃窜。

六、七两个连的战士远远地看见鬼子跑了，大喊：“鬼子跑啦——”一齐猛追上去。沿村的男女老幼也齐声高喊：“快追啊！追啊！鬼子跑不了啦，逮活的！”并用棍棒、砖头、瓦片乱舞乱扔，吓得鬼子更加丧魂落魄，鼠窜而去。

战士们一直追到盐山城下，见鬼子快跑进南门了，这才无限惋惜地返回。

后来据城里群众报告说，这几个鬼子因为饿了一天，又猛跑了几十里路，刚进南门，就跌死了三个。

这时，夕阳西下，暮色渐起，天空开始昏暗起来。部队连夜组织群众清扫战场，并把几十辆大车交由车主们领回。战场上，武器、弹药、粮秣等物资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象一座座小山。我们将被服、粮食分给当地群众，军械物资则连夜转移，以防鬼子主力赶来劫夺。

第二天大清早，韩家集西北方向的大吕宅村群众又帮助我军消灭了一个鬼子。这个鬼子在韩家集受伤后装死躺下，等到

天黑时，爬起来就逃，因为在黑暗中不辨方向，结果逃到西北方向的大吕宅去了。这家伙饿了一天，大概是跑不动了，就钻进村边的土地庙里躲藏。天明后，村里群众发现了他，把他包围起来。后来见这鬼子没有枪，大家就壮了胆。几个青年人抓住他的腿使劲往外拉。这鬼子被拖出庙来，又踢又咬，疯狂撕打。一个大嫂抄起把剪子猛扎过去，这鬼子吓得“哇哇”大叫。其他人有抄刀的、拿棍的，涌上去猛打猛戳，当场把这鬼子送上了西天。

日寇回师“扫荡”我们边区，见人就开枪，见房就点火，欠下边区人民多少血债！这些血债终于由他们来偿还了。

这次韩家集伏击战，我军以三十多人伤亡的代价，消灭了中队长西村以下二百多个鬼子，并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掷弹筒四具，“三八”式步枪二百余支，弹药无数，大米、面粉、压扁的小麦三十几车，军服、军毯、药品、医疗器材十多车，其他物资十几车。

清扫战场后，我带着支队机关和七团去往乐陵大桑树、官庄一带休整。那一带树林茂密，便于隐蔽，也便于运动作战。

沿途群众听说我们打了大胜仗，争先围观，问长问短。部队一住下，敲锣打鼓前来慰劳的乡亲们，一批接一批，络绎不绝。青年们要求参军的情景更是感人，他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报名。有许多十几岁的少年也成了我们部队的“小鬼”。

韩家集这一仗，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它给边区的广大抗日军民有力的鼓舞，也给那些患“恐日病”、持“怀疑论”的人一次深刻的教育。它证明了我们在广大的平原上，也能开展游击战争，并获得胜利；证明了毛主席号召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是无比正确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在这一年的年终总结中讲到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时说：“……我年青的挺进

纵队，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之下，一直坚持到现在，并未气馁，并且已取得了很多的胜利，尤以韩家集等战斗，更是平原战斗胜利的光辉战例。”

我们在大桑树一带稍事休整后，更加精神抖擞地与日寇展开斗争。我们运用毛主席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术原则，取得了许多胜利。但斗争是艰苦的，我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

有时，我一边和大家一起行军，一边想：肖华、邓克明、符竹庭等纵队首长怎么样了？曾国华支队和其他部队怎么样了？心中既想念，又不免有点担心。

不久，我们得知肖华同志带领纵队机关和部队在东光取得了连克灯明寺的胜利消息。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把我们乐坏了。

第七章 雪夜奇兵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的一天傍晚，北风发出尖厉的呼啸声，卷起纷纷扬扬的大雪，漫天狂舞，四下里迷蒙一片。地上积雪铺了厚厚的一层，雪光刺得人眼睛酸胀。这时候，在东光至吴桥的公路上，肖华和邓克明同志正带着纵队司令部和五支队一个营，在冰天雪地里疾速行进。

他们离开乐陵城一个多月以来，先后在孔家坊、苗家集两次伏击日寇，都出敌不意，打得痛快淋漓。前八天，又在东光南霞口一带，发动数千群众和民兵，把津浦线上十多里长的铁轨全部卸下来搬走了，使得回师华北的日寇运兵中断了好几

天。敌人十分恼火，派出大批部队跟踪追来，企图报复。但是，肖华和邓克明同志带着机关部队同敌人玩起了“捉迷藏”，弄得敌人疲于奔命，处处扑空。这天下了一天的大雪，天气寒冷，肖华同志估计敌人不敢出来，就和邓克明同志带着部队冒雪启程，准备向吴桥一带转移。

部队正走着，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只见一人一骑快速追上来。后卫部队迎上去一问，原来是运河支队的通信员，说有急事要向肖司令报告。后卫就把他引到肖华同志跟前。

他一见肖华同志，赶紧立正敬礼：“报告肖司令！俺支队首长有急信。”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被汗水浸湿的信来。

这封信是运河支队的支队长李文成、参谋长傅继泽和政治部主任康伯明写来的。信上说：昨天，东光城日军第五师团一部约四百多人，在联队长滕井的指挥下，押送着十多辆卡车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器材，到灯明寺去修据点。今天凌晨，滕井得知国民党民军二路张国基部正驻在吴桥县枣王庄，距离灯明寺只有十八里。他大概觉得这有碍据点的安全，就留下山本中队驻守灯明寺，亲自带领三个中队包围了枣王庄。张国基毫无戒备，又惊又怕，连忙派人向运河支队求救。傅继泽、康伯明同志和李文成考虑到身边只有百把人，无济于事，所以请示肖华同志应该怎么办？

肖华同志看完信，认为应该拉张国基一把，以免张部投降日寇，对抗日不利。他就同邓克明同志商量，说：“老邓！咱们来个‘围魏救赵’，雪夜奇袭灯明寺，你看怎么样？”

邓克明同志点着头说：“行！”

肖华同志立即命令送信的这个通信员给部队带路，掉头向东光县东部的灯明寺进发。部队冒着风雪急行军五十多里，于

当天夜里赶到了灯明寺附近。傅继泽、康伯明同志和李文成已经带着运河支队在这里等候。当下，两支部队会合在一起，悄悄地向灯明寺运动。

这灯明寺，是方圆几十里数得着的大村。村子东西长、南北窄，分为东、西灯二处。村里有座庙，叫灯明寺，建于金代大定年间。据说因为修了庙，这周围才人丁兴旺，成了个村子，所以这村也就取名灯明寺。

日寇之所以选中这地方设据点，是因为这里距东光城只有三十多里，既可以控制东光城东面这一大片地方，又可以与东光城据点结成犄角之势，确保津浦铁路的安全。

我军出其不意地包围了灯明寺。接着，肖华同志派人把各连干部找来，向他们布置战斗任务：命令两个连攻打东灯，一定要打狠打痛，引诱滕井回来救援；其他部队全部在村南大车道两旁埋伏，准备打敌人的援兵。

布置完毕，肖华同志一扬手说：“开始行动吧！”各连干部迅速分头执行去了。

攻打东灯的部队在风雪的掩护下，悄悄地摸进村去。日寇的哨兵刚欲喝问，就被一枪打死。部队从四下冲进村，把驻着鬼子的几座院落包围起来，猛烈开火。

鬼子从梦中惊醒，慌忙光着身子爬起来抵抗。在我军的一阵枪弹扫射下，有半数以上的鬼子非死即伤，其余的索索地抖着，与我军拚起刺刀。

在混战中，我军把敌人的弹药箱搬运一空，将敌人的木料、绳索、被服、甚至大车都堆到院子里，统统用火点燃。熊熊的火焰一窜老高，把屋子上的积雪都化尽了。

滕井听说八路军攻进灯明寺，山本中队孤军挨揍，顿时慌了手脚。他赶忙丢下张国基，领兵分乘十米辆卡车回来救援。

一溜卡车发疯似地在大车道上颠簸着。车队快驶进灯明寺时，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头一辆卡车被炸毁了。紧接着，路两旁枪声大作，子弹飞蝗般朝鬼子射来。

鬼子们叽哩哇啦地大叫着，急忙跳下车来还击。但是，他们在暗中看不见八路军有多少人，只听见遍地的枪声、呐喊声、爆炸声，震耳欲聋，就慌忙朝四下里胡乱开枪放炮。直到天将拂晓时，日寇才发觉八路军早已撤走，他们白白打了好一阵空枪。

滕井带队进村一看，山本中队死伤六十多人，加上路上被炸死炸伤的，共有百把人，差不多损失了一个中队。运来修据点的器材，也全都化为灰烬。滕井无可奈何，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垂头丧气地回东光去了。

鬼子一撤走，张国基就找到肖华同志，表示终生不忘救命大恩。

肖华同志对他说：“我们八路军抗日救国，是责无旁贷的。你也不用感谢了，还是下次多打几个鬼子吧，为国家、为民族出点力。”

张国基连连点头哈腰地说：“是，是！肖司令教诲，我一定刻骨铭心，永志不忘！下次我张某不好好打鬼子，不拿出个样子来，也枉读半生诗书，空怀满腹文章！”说罢，摇头晃脑地走了。

首战灯明寺胜利结束了。

两天后，滕井又带着三百多鬼子和二百多伪军前来灯明寺修据点。听说他上次回去后，曾被上司大骂了一通，说他“饭桶！连个据点都修不起来”，要他“珍视帝国军人的荣誉”。因此，滕井只得硬着头皮再走一趟。他嫌东灯不吉利，这次把部队驻扎在西灯，村头要道都用从群众家里搜刮来的家具、农

具、大车以及鹿砦、蒺藜堵死了。

村里的群众听说鬼子又来修据点，大部分人早就拖儿带女地跑散了。留下的群众当中，有些人舍不得自己的农具、家具被鬼子抢去，同鬼子争夺起来，结果被刺刀活活地捅死了。

这几天晚上，滕井特别加强了警戒，命令部下和衣而卧，防备我军夜袭。并派出许多便衣特务四处侦察我军去向。

肖华同志得知滕井又到了灯明寺，就把邓克明、傅继泽、康伯明等同志召集起来商量对策。

傅继泽同志说：“灯明寺是东光的东部重镇，鬼子千方百计要来这里安据点，我们偏偏不让他们安。我们要把鬼子再狠狠揍一顿，揍得他们丧魂落魄不敢来。”

邓克明同志说：“鬼子上次挨了揍，肯定有了警惕，咱们这次得来点新花样，迷惑迷惑敌人。”

肖华同志想了想说：“那好啊，咱们先来个欲擒故纵，麻痹敌人；再来个‘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惊扰敌人；最后来个乘虚而入，攻其不备。怎么样？”

几个人齐声说：“好！”

最后大家又研究了具体作战方案，然后分头布置去了。

滕井心惊肉跳地防备了一夜，可是不见八路军有半点动静。第二天，他派出去侦察的汉奸先后回来报告说：八路军大股部队都北上了；大黄庄一带的老百姓说，八路军整整过了两个钟头，马队、车队拉了几里路长，都向南皮、沧州一带去了。滕井这才下令赶紧开始动工，限期把碉堡修起来。

这几天，敌人忙得团团转。为了加快施工进度，滕井令伪军也和民夫一起搬砖运石，抬树送料，居然很快修起了碉堡的底座。后来，滕井下令日军也轮流参加劳作，企图进一步加快进度。他自己按着指挥刀，在工地上不停地来回督促。

这一天晚上，鬼子和伪军都因疲惫不堪，呼呼大睡了。半夜时分，村外突然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偶尔还响起一两阵炒豆般的枪声。鬼子和伪军赶紧滚下床，慌慌张张地爬上房顶，朝四野里开枪放炮。

过了一会，村外的号声、枪声停止了。日寇和伪军见村外好久没有动静，以为我军撤走了，都纷纷打起盹来，有的握着枪把就睡着了。

突然，军号声、枪声和呐喊声又响了起来。鬼子和伪军被惊醒了，睡眼惺忪地拿起枪就打，又打了个把钟头才住手。这时候，天色已经微明了。

就这样，整整闹腾了两宿。滕井大骂便衣特务谎报军情，命令他们再去侦察。侦察结果，原来这两天晚上是附近的一些民兵在“捣鬼”。滕井气得咬着牙直骂“八格牙鲁”。他这下断定八路军确实不在这一带，命令继续修据点。

到了晚上，号声、枪声、呐喊声又有一阵没一阵地闹了半宿。敌人开始还了几枪，后来就无声无息了。虽然滕井一再命令部下保持警惕，但士兵们已几夜不得安宁，困倦极了，一个个抱着枪呼呼大睡，就连放哨的也瞌睡懵懂，跌跌撞撞。

半夜时候，在凛冽的北风中，肖华和邓克明同志带着部队踏着冰雪，朝灯明寺扑了回来。到了村口，肖华同志对东光县民兵自卫队的刘队长说：“老刘，你们唱了几夜大戏，已经立了头功。这会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攻村没有你们的任务。”

老刘和民兵一听这话都急了：“首长，这咋行呢，我们只放枪吓鬼子，不拿枪打鬼子，还算什么民兵？首长……”

肖华同志拗不过他们，就说：“那好吧！”话未说完，几十个民兵已经呼呼啦啦地跟着部队向村里冲去。

指战员们一进村子，便按预定计划四面展开，向鬼子和伪

军的驻房开起火来，枪声、爆炸声响彻夜空。

村子最西头驻的是伪军，为首的伪军大队长姓牛。战斗一打响，他们就乱了套：喊爹的，叫娘的，啼哭的，躲藏的，乱成一团。伪军大队长扯着公鸭嗓拼命喊：“都给我顶住，顶住！”但是谁也不听他的。我们把伪军驻的八个院子全部分割包围起来，把枪架在院墙上开火。不到一顿饭工夫，伪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几十个当了俘虏。那个牛大队长也被打死。

村子中心区分布着日寇部队，这帮家伙却不象伪军那样一打就垮。他们凭借院落、房顶、围墙，负隅顽抗。敌人打起照明弹，用机枪和小炮的火力封锁了大街小巷，使我军的进攻受阻。

这时，我三连以神速的行动，从村南头向村中心插去。他们趁着照明弹熄灭的瞬间，迅速冲进一条横街，不料在一座穿心店前遇到敌人机枪火力的封锁。

穿心店是座狭长的杂院，南北各有大门，东西两厢分置着大车棚、草料房、茶水间、点心店，是供来往大车歇脚的地方。因为来往车辆住店，可以进北门出南门，也可以进南门出北门，所以叫“穿心店”。现在敌人用两挺机枪封锁了南大门，三连的指战员只得避入旁边的一条胡同。

这个连的张连长见部队受阻，心如火燎，对身边的两个战士说：“把大枪放下，准备好手榴弹，跟我来！”说罢纵身跳上院墙。两个战士也学他的样子，紧紧跟在后面。

三个人摸黑靠近了穿心店的房顶。张连长见下面的鬼子正从墙洞里朝外打枪，接过一颗手榴弹就甩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一挺机枪首先被炸哑了。其他两个战士也居高临下，猛扔手榴弹。下面的厢房被炸翻了，浓烟滚滚，灰土弥漫。过了

一会，见下面没有动静了，三个人才住手。

横街里的部队趁机沿着胡同冲向穿心店。正在这时，“咯咯咯……”敌人的一挺机枪又响了起来，显然，狡猾的敌人刚才打了“埋伏”。进攻的部队重新避入胡同，焦急地等待张连长他们动手。

张连长向那两个战士轻声说：“再拿颗手榴弹来！”一个战士回答：“糟糕，我扔光了。”另一个也说：“我也没了。”

张连长一听，心想事不宜迟，就对两个战士说：“跳！用手卡也要卡死他两个！”说罢纵身跳了下去。两个战士也飞身跳下穿心店。

张连长双脚一着地，就猛虎似地向敌人机枪扑去，一把推开鬼子，把机枪夺在手里。不料另外一个鬼子挺着刺刀从斜刺里窜出，朝张连长刺了一刀。张连长痛得跌倒在地，可是双手仍紧抱着机枪不放。

那鬼子正待再次下手，其他两个战士猛扑上来，抱住敌人。这时，外边的部队迅速冲进穿心店，把顽抗的几个鬼子全部结果了，然后向村中心插去。

从村北向村中心进攻的部队，也遇到鬼子一挺重机枪的扫射，我们伤亡了十多个战士。这挺重机枪架在一座砖房的角楼里，居高临下，对部队威胁很大。这时，有个小战士机灵地利用墙角摸了过去。这砖房背后正巧有棵椿树，他一猫腰，“嗖嗖”地爬上树身，然后一纵身跳上房顶，向角楼冲去。不料房顶另一头藏着一个鬼子，慌忙掉转枪口向他射击。这个小战士当即负伤。他忍着剧痛，一咬牙，连翻带滚，滚到角楼边，摸出个手榴弹放了进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角楼被炸塌了，鬼子的重机枪被炸哑了。我们这位可敬的小英雄，也壮烈

牺牲了！他用自己的生命，为部队打开了胜利的道路。

我军从四面迅速地逼近了村中心。在经过一阵激战之后，日寇被歼灭了一百多人。但滕井身边还有约两个中队的鬼子兵，他们龟缩一处，拚命顽抗。

肖华同志见敌人火力很猛，又有两三座高大的砖房作掩护，一时难以攻下；而且已到拂晓，东方露出了光亮。他就和邓克明同志商量，决定先撤出战斗，放敌人逃跑，然后在野外消灭他们。

部队陆续撤出战斗，向东南方向转移。撤不多远，有人惊呼起来：“看，灯明寺起火了！”

在渐明的天色中，只见灯明寺从东到西象条火龙，把大半个天空都烧红了。

敌人在放火烧村！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肖华同志，静静地等他下令。

肖华同志思索片刻，与邓克明同志耳语几句，然后拨转骡子，手朝着村子一扬，喊道：“除一连外，其他部队回去杀敌救火，我们不能眼看着乡亲们遭殃。”

邓克明同志喊道：“一连跟我来！”带着部队回身转向西南方向，朝灯明寺绕过去。其他部队在肖华同志带领下，跑步赶回灯明寺。

村子里烈火熊熊，热气炙人，敌人已经不见了。部队冲进村去，一面扑灭烈火，一面寻找鬼子。

滕井这家伙心狠手毒，诡计多端。他见我军撤走，并不派兵追赶，却命令部下撤出村子，在村西道沟中隐蔽起来。另派人浇上煤油烧房子。他估计八路军一见村子着火，肯定会回兵来救，到时他再杀个“回马枪”。

现在，他见八路军果然中计，就带着鬼子兵悄悄地从村西

的道沟里爬出，然后兵分两路，涌进村来。

我军迅速放下救火器具，取枪还击。正在这时，邓克明同志带着一连呐喊着冲进村来，朝鬼子背后猛烈开火。肖华同志见敌人乱了阵，也指挥村里的部队冲杀过来。两下夹攻，霎时间将鬼子消灭了一大半。余下的几十个鬼子保护着滕井，跌跌撞撞地夺路逃出村子，溜回东光去了。

战斗结束了。我军扑灭了大火，接着清扫战场。计消灭二百多鬼子和二百多伪军，缴获步枪四百多支、机枪四挺和大批的粮食、服装及其他物资。敌人折腾了几天还没有修好的碉堡，也被群众扒平了。

肖华同志见村中四百多间房屋被烧毁，下令部队把缴获的粮食全部分给陆续回村的乡亲们；并帮助他们修理房屋，重新安顿下来。待各项事情料理完毕，他才带着部队与群众挥手告别，北上南皮、沧县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反“扫荡”斗争去了。

八路军连袭灯明寺、大败鬼子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整个冀鲁边区。抗日军民欢腾鼓舞，群情振奋。日寇和伪军却闻风丧胆，他们说：“灯明寺就是‘灯明死’，灯一亮，就死了死了的。”从此以后，日寇再也不敢去灯明寺安据点。我们的部队和民兵则经常从这一带出击敌人，袭扰连镇、南霞口、东光县等铁路沿线车站，扒毁铁道，炸翻军车。有一次，我军从敌人出轨的火车上捉到一名鬼子，据说还是日本天皇的什么亲戚。

第八章 击毙安田

日寇在韩家集、灯明寺等战斗中连遭损失，这使驻德州的日军旅团长安田大佐十分恼火。他把驻商河的纳见、临邑的渡边、宁津的石黑、济阳的雪野、盐山的山田、东光的滕井、乐陵的宫泽文雄等部集中起来，四处搜寻我军主力，妄图报复。

一九三九年阴历二月十八日（阳历约在四月份），曾国华同志率领的五支队机关及其所属五团，来到陵县大宗家村一带短期休整。

大宗家村的东南面有个大洼。这里四周都是天然隆起的高坎，中间有块二十来亩的凹地，非常平整，很象现在体育馆里的足球场。支队机关便在这里开会演戏，进行抗日宣传。四乡八邻的群众纷纷涌来，坐在高坎上观看。这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但也引起了正在寻找我军主力的日寇的注意。

二月十九日晚，日军发现了我五支队驻扎在大宗家一带，同时也接到特务的密报，掌握了五支队的兵力散布范围和在大宗家邻村的驻防情况。于是，日酋安田大佐集结起快速部队两千多人，全是日军，其中步兵一千多，分乘六十多辆汽车，骑兵五百多，另外还有战车和炮兵，以浩浩荡荡的声势，风驰电掣的速度，星夜杀奔大宗家而来。安田企图用重兵偷袭战术，一举歼灭我军主力，以挽回他们前几次出师失利的脸面。确

实，这次安田占有许多有利条件：他的旅团隶属于板垣师团，是日军的王牌；兵力、火器优于我军；掌握了我军兵力部署；黄昏出发，采取了趁我不备的偷袭战术……。因此，他以为自己的阴谋必定得逞。

大宗家是个不足百十户人家的村落，东南方向两三里处有个村子叫侯家；东北方向两三里处也有个村子叫赵玉枝家，同赵玉枝家相邻的还有小王村。五支队司令部机关及五团三营的一个连、一个骑兵警卫连，约四百人，在支队长曾国华、政委王叙坤、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参谋长刘正的带领下，驻在侯家；五团团部及直属队、特务连，约四百人，在团长龙书金、政委曾庆洪、政治部主任朱挺先、特派员谢甲树的带领下，驻在大宗家；五团一营的四个连及一个重机枪排（有马克沁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八挺），在营长温先星、教导员唐文祥、特派员高子贵的带领下，驻在赵玉枝家；其余的部队驻在小王村。

因为头一天晚上支队司令部召开文艺晚会，驻在邻近的部队都出席观看，宣传队的节目比较精采，部队和群众一再要求增加节目，所以散会很晚。第二天部队起床也就迟了些。二十日这天早晨八点钟左右，我军指战员刚准备开饭，便发现了敌情：

起先看到德州方向腾起一股尘土，迅速弥漫开来，遮天蔽日，直向大宗家滚滚而来；继而听到了汽车马达的轰鸣和烈马的嘶鸣。接着，便看到黑压压的敌骑，撒开四蹄，成散兵队形飞驰而来。敌骑后面是首尾衔接的一溜车队，车上的钢盔和刺刀在太阳的映照下，反射出贼亮的光。

曾国华、王叙坤等支队领导同志，发现情况不妙，想要指挥驻在各村的部队转移，但已来不及了。转眼之间，敌人已经狂飙般卷到。

敌骑兵在离大宗家二三里处的一座沙丘旁勒马停下，作为机动驰援的兵力。敌步兵则跳下汽车，成两路纵队直插大宗家与侯家之间的地带。随后又左右分开，象两条蟒蛇将大宗家和侯家环绕包围起来，并逐步缩小包围圈，向两村步步进逼。日寇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不紧不慢地跨出直挺挺的步子，径直向前，眼里露出凶恶和得意的光。

敌人的气焰是那么嚣张，大宗家和侯家又无险可凭，但我五支队的指战员毫不畏惧，坚定沉着。他们大都是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平型关大战，能打能冲，善攻善守。当日寇逼近时，一部分战士已将手榴弹和机枪搬到村口，镇静地伏在地上；另一部分战士占据了村子四周的墙角、房屋、树干等，手指都勾着扳机。

日寇首先开火。一霎时，大宗家和侯家两村的外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村内光秃秃的枣树、白杨树上干枯的枝条，被子弹纷纷削断，扑簌簌落在地上。鬼子们挺着胸，分别向支队司令部和五团团部发起进攻。前排倒下去，后排又踏着尸体涌上来。

曾国华、王叙坤、刘贤权、刘正等支队领导同志，在一堵矮墙后面指挥战斗，研究对策。

曾国华望着前面黑压压的敌群说：“看来突围比较困难。”

“即使突围出去，转移也不容易。鬼子有马有汽车，速度快，机动能力强。我们走不了多远，就会被他们追上。被他们追上就不好办了，在旷野里我们更无险可凭……”刘正焦急地皱起眉头。

刘贤权想了想说：“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我们手头的兵力也不算弱。等到大大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再组织

突围。到时敌人丧了元气就不敢追了。”

“对！”王叙坤眉毛一扬，“依我看，立即命令赵玉枝家和小王村的部队投入战斗。要他们袭击鬼子的骑兵，只要把骑兵干掉一大半，我们就可以突围转移。鬼子步兵的两条腿想追也追不上，他们有汽车也不能在田野里驶。”

曾国华觉得王政委的想法有道理，便摇电话给赵玉枝家的一营，命令营长温先星带领一营全部和小王村的兄弟营几个连，进攻敌人的骑兵。又摇电话给大宗家，要五团团团长龙书金再坚持半个小时。

一营长温先星接到电话，立即命令小王村的部队迅速向赵玉枝家的一营靠拢。等到两村的部队合到一处，温营长一马当先，率领几个连的兵力，联成扇面队形，在还没长出庄稼的田野里，一阵风似地掠过。他们象一堵环形的墙壁，朝停留在侯家附近一座沙丘旁边的五百多敌骑压去。

安田大佐和他的指挥机关，在离沙丘不远的一片枣树林里。他原以为在我支队机关和团部被围的情况下，驻在赵玉枝家和小王村的我军主力必定前去救援，所以，他留下骑兵，企图等我两村援兵出来的时候，用骑兵迅速将援兵冲散、冲垮，甚至全部吃掉。他没想到我军主力既不去侯家，也不去大宗家，反而向他的骑兵冲杀过来。安田慌忙指挥骑兵应战。敌骑兵挥舞着马刀，几百匹东洋马窜上沙丘，又倾斜着俯冲下来。顿时沙土飞扬，天昏地暗。

我步兵呐喊着，朝着敌骑兵冲杀过去。每一个战士都象一头凶猛的狮子，人人挺起枪刺，对付敌人的马刀，抵挡敌骑的冲突，伺机用刺刀朝敌骑的腿上、肚上猛戳。旷野的平原上，出现了罕见的步骑兵混战。东洋马纷纷受伤倒地，敌骑兵变成了步兵。有些胆小受惊的、失去主人控制的洋马，则悲鸣着落

荒而逃，马镫上还拖着死鬼子。我军也有不少人倒下去了。倒下的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挣扎着爬起来，死死地抱住一条马腿，非把敌骑绊倒不可。战场上血流成河，尸体横陈，其壮烈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但敌我双方都不肯服输，坚持在混战中较量意志、实力，都希望最终消灭对方，夺得胜利。

曾国华等支队领导同志，听到侯家附近的沙丘一线杀声震天，人喊马叫，知道五团主力已同敌骑兵展开恶战。他们觉得现在应该突围出去，配合主力消灭敌人骑兵。于是决定，撤出守在侯家村西、南、北三面的兵力，并成一路，用还没有投入战斗的骑兵警卫连作为前锋，从村东突围出去。命令一下达，部队立即行动。

一直没有参加战斗的骑兵警卫连，早已憋不住了，听到出击命令，一个个立即飞身上马。他们从背上拔出明晃晃的马刀，然后一抖缰绳，百多匹健壮的骏马便从各家各户的院子里冲出来，齐集村东头。接着，骑兵连一线展开，后面跟着步兵和支队机关，突然冲出村外，扑进敌人步兵阵地。日寇猝不及防，更没想到还有如此勇猛的一支骑兵队伍潜伏在村里，顿时惊慌失措，纷纷躲避。骑兵连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又直扑沙丘，协同五团主力，对敌骑兵形成夹攻。正同我步兵厮杀的日寇骑兵，见背后又有我军骑兵袭来，只得拨出一半人马，掉头迎战。

我军使用骑兵同敌人骑兵混战，这是冀鲁边抗战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壮举。阵地上，人相厮杀，马相踢咬，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骑兵喧嚷喊杀，马匹长嘶悲鸣，这一切景象，全被奔腾的马蹄搅起的尘土罩住了。

敌骑兵遭我前后夹攻，伤亡大半，剩下的也已精疲力竭。在附近枣树林里督战的安田大佐，见骑兵危急，使用旗语指挥

包围侯家村的步兵，停止进村烧杀抢掠，立即前来增援。

发现日寇的指挥所后，我支队领导知道打蛇先打头的重
要，立即抽出一个步兵班和一个骑兵班，袭击日寇指挥所。安
田大佐见势不妙，慌忙翻身上马，在卫兵的簇拥下落荒而逃。
没逃出多远，就被我军掷出的一枚手榴弹击中。安田被手榴弹
爆炸的气浪掀下马来，四五颗蚕豆大的弹片嵌进了他的脑袋，
一命呜呼。

剩下的百十个敌骑兵，一看指挥官丧命，便撒马奔逃，跑
出一二里地才勒住马缰。准备前来增援的敌步兵，见骑兵窜远
了，也吓得急忙逃命。

支队机关、骑兵连等和五团主力虽然杀退了敌骑兵，但
五团团部仍被围困在大宗家，同数倍于己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战
斗。于是两处人马合为一路，又浩浩荡荡地杀奔大宗家，准备
替团部解围。

五团团部的战斗是十分艰苦的。

团长龙书金、政委曾庆洪、政治部主任朱挺先、团特派
员谢甲树等领导干部，自战斗一开始便亲临前线。他们分头在
村庄的四面，和直属队、特务连的战士们在一起，抵抗日寇的
进攻。鬼子见强攻不下，便架起掷弹筒、小钢炮，朝我方阵地
狂轰滥炸。一座座房屋被炸塌，一棵棵大树被炸断。村东和村南
都有大车道沟，本来是我军利用来当堑壕的，也被轰平了。曾庆
洪、朱挺先、谢甲树等同志先后壮烈牺牲。我军一时被炮火压
得抬不起头来，大批敌人却趁机掩杀过来。我军失去了赖以掩
护的地形地物，又见日寇攻击的势头相当迅猛，只得放弃村外
阵地，退守村内。

在村内，我军同蜂拥而至的日寇短兵相接，展开了逐房逐
屋争夺的白刃搏斗。日寇凶悍野蛮，我军更是勇敢顽强。

五团特务连的战士都是经过筛选的精壮汉子，一律的大块头，大高个，站出来齐刷刷地一般高低，威风凛凛。每人除了有一支快慢机以外，还有一把锋利的大砍刀。该连连长，个头一米八五以上，腰圆膀阔，紫脸膛，黑胡茬，象座铁塔。他舞起大刀来，寒光逼人。日寇见他厉害，便集中了七八个端着刺刀的鬼子，把他围在一个院落里。他面无惧色，大刀在他手上被舞得纺车般嗡嗡直响，一连削断了四五把刺刀，随后大吼一声，平地跃起，手中钢刀随着身子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旋转。围着他的七八个鬼子的脑袋，全部挨了刀。他刚立住脚跟，忽见七班长的身后有个鬼子举起了刺刀，他来不及喊叫，只是一扬手，大刀飞了出去，削掉了那家伙半个脑袋。由此，八路军连长飞刀斩鬼子的故事，一直流传下来。

鬼子们倒下了无数。但这些头脑中灌满了武士道精神的亡命之徒，仍不肯退却，而且背后又涌上来一大批鬼子。整个村子里都是枪声里夹着喊杀声、惨叫声。鬼子的尸体堵住了胡同，这些尸体又将追逐奔跑的人绊倒。

村子里的乡亲们也出来为我军助战。有的躲在墙拐旁边，有的藏在柴堆里，有的爬到屋顶上，都朝着敌人扔砖石瓦片。

然而毕竟寡不敌众。最后，我军放弃了同敌人逐房逐屋的争夺，退守村子北部的一座保险院。

原来这村有个大地主，叫钟子敬，时年七八十岁。附近几十顷地全都属于他，这村所有的居民也全是他的佃户。因为这个村没有土围子，而他的住宅既大又坚固，所以被群众称为“保险院”。保险院的东、南、西三面都是些零星土屋，北面则是一片苹果园，苹果园被圈在院墙内。这保险院的围墙全是青砖到顶，洋灰抹缝，四角还有高高的角楼，象是矗立在村中间的一座城堡。

直属队和特务连控制了这座“城堡”，把机枪架在四个角楼和围墙垛口间，居高临下，横扫日寇。日寇也爬上附近的土屋，同我军对峙。刚才的两军白刃格斗，现在又变成守城与攻坚。

团长龙书金在钟子敬的庭院里急速地踱来踱去。他曾摇过电话给侯家的支队司令部和赵玉枝家的一营，但都没有摇通。他估计这两个村一定也非常吃紧，可自己一时冲不出去救援他们，心里非常着急。

钟子敬一门老小十余口人，大都盯着龙团长，眼里流露出惊恐和焦虑。

“龙团长，我们能顶得住吗？”钟子敬捋着悬胸的白胡子，向龙书金问道。

“问题不大吧，我想拖到天黑总可以，到时再组织突围。”

“唉，早些天黑就好啦，再拖下去……唉，曾政委、朱主任、谢特派员、柳连长都是好人呵，早晨还活蹦乱跳，现在全都为国捐……”钟子敬说着，眼圈红了起来。

龙书金刚想安慰老人几句，忽然觉察到屋子外面似乎有点异常。他凝神一听，发觉我方的枪声稀疏下来。“这是怎么回事？”他提着手枪正要出去看看，这时司令部作战参谋刘克正大步急奔进来：

“团长，子弹快光了，鬼子已逼到保险院的墙脚了，怎么办？”

“发动群众搬砖头，拾瓦片，决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龙书金说着便离开临时指挥所，拔脚往外走。

“慢走，龙团长！”钟子敬突然拄着拐杖拦住龙书金，“跟我来，我有办法。”说完又朝围在旁边的儿孙们摆摆手：

“来，大伙都来帮帮忙。”

龙书金一时怔住了，他想这七八十岁的老头能有什么办法？但还是跟着钟子敬走去。

钟子敬走到后院的马厩，吃力地挪开一条牲口槽，再掀掉槽下的一块木板，顿时露出一个很大的洞口。洞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十几只木箱。钟子敬的儿孙们明白老爷子的意思，一齐跳下洞去，七手八脚地将木箱搬出来，里面分别装着枪支和黄灿灿的子弹。

“龙团长，别看我老朽不中用，但爱国心多少还有点。”钟子敬颤巍巍地说，“你们为保卫中华江山，能豁出性命，我怎能袖手旁观？这点小意思，是我以前置下准备防盗护院的。”

“谢谢你老人家。”龙书金激动地抓住老人的手。

钟子敬的儿孙们，扛起枪弹箱走出马厩。他的孙媳妇抽出一支手枪别在腰里。后来她在墙头上一连撂倒好几个鬼子。

战士们得到这批弹药，手中的钢枪重新扬起威来。从保险院墙垛口间泻出的弹雨，把鬼子们赶退到三十多米以外，压得他们伏在地上抬不起头来。但保险院仍处在敌人的包围中。

过了一会，敌人的后面忽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围困保险院的日寇纷纷溃退。原来曾国华同志带领部队赶到了大宗家。团部机关、直属队和特务连的干部战士们见援兵到来，士气大振，呼呼啦啦冲出保险院，杀进敌群，同曾国华等同志会合在一起，突出村外。

但出得村来，却不见了团长龙书金。于是曾国华等人又带着部队，再次杀进大宗家。

原来团部机关随同特务连等突围时，殿后的龙书金被一颗流弹打中，左臂肘骨被打碎，倒在地上，前面的部队没有察

觉，径直冲了出去。同龙书金一起负伤的还有司令部参谋刘克正。两人又被敌人围了起来。

龙书金和刘克正一边用手枪阻击敌人，一边重新退进保险院，最后又被逼到保险院的马厩里，情况十分危急。他俩心想宁死也不能当俘虏，都留下最后一颗子弹。不多时，忽见敌人纷纷闪开，曾国华等同志率领部队冲进来了。龙、刘二人真是喜出望外，赶紧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曾国华等同志把他俩扶到马上，又旋风般杀出村外，然后直奔东北。日寇眼睁睁地看着我军横冲直撞，勇似猛虎，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忽而杀进村内，忽而杀出村外，现在又一阵风似地向东北方向撤走。他们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敢追赶。

我军离开战场，径直越过大宗旱河。过河后休息片刻，便转移到宁津县的柴胡店休整。

大宗家战斗，从早晨八点开始，直打到傍晚四点。在这次战斗中，开始我方虽然处于被动地位，但由于我军指战员英勇奋战，打得坚决、顽强，终于消灭了日寇安田大佐以下五百余人，给敌以重创，打出了我军的威风。这一仗在冀鲁边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仗也震惊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东京的广播电台，为日寇的这一惨败发出了哀号。

第九章 战火迎春

继大宗家战斗之后，我挺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同志率领的部队，又与日寇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

符竹庭主任带着政治部机关、五支队二营和商河支队，自撤出乐陵、南下鲁北以来，先在陵县、平原、禹城、齐河等地袭扰日寇占据的津浦铁路，破坏交通运输。后来又转到鲁北平原的东南部，在济阳、商河、惠民一带寻找战机，打击日寇。

一九三八年的除夕夜，符主任带着部队，乘着夜色，静悄悄地来到济阳县陈、罗二庄宿营。这时的陈、罗庄，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大人小孩换上了干净衣服，吃过更岁饭，开始随意玩耍：串门的、游逛的、摆龙门阵的……三五人一群，四六人一堆，相当热闹。人们在紧张战争环境里，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新春佳节。

部队进庄后，很快驻扎下来：符主任和机关带两个连驻罗庄；商河支队支队长王权五带支队驻陈庄；二营一个连驻史庄。群众热情地送来了大批的年货，慰劳部队。军民一起欢度着除夕之夜。

这时候，济阳县我们的内线获得情报：日寇一个阙兵团将于明日从济阳出发，经过陈、罗庄去梁家据点视察。

当地方交通员气喘吁吁地把这份情报交到符主任手上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符主任看完情报，立即派人把王权五、二营长齐丁根等同志叫来，高兴地对他们说：“明天是大年初

一，鬼子就送货上门，咱们可真是生意兴隆啊！就把他们全部收下来吧。你们看怎么样？”大伙一听这话，全都乐了。

陈、罗庄四周都有敌人的据点：往东五里是梁家村伪军据点；往南十五里是仁风鬼子据点；往西十五里是岳桥据点；往北八里是龙泉寺（五高）据点。这就要求我军在战斗打响后速战速决，不能拖泥带水，以防四周敌人闻讯来援。根据这种情况，大家决定：明天一早，二营的两个连分别布置在各条要道上，准备打援；另一个连和商河支队埋伏在陈庄西头，将公路控制起来，准备伏击阅兵团的鬼子。

正月初一的上午八点多钟，一辆军用卡车载着四十多个鬼子，正向陈庄方向驶来，车轮卷起尘土，象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卡车渐渐地驶近村西头的一座古庙。

齐丁根和王权五带着部队埋伏在公路东侧的庙里、道沟里，紧盯着敌人。阅兵团的汽车到了跟前，齐丁根喊了声：“打！”顿时，机枪、步枪、手榴弹象雨点般向敌人汽车飞去。有一颗手榴弹正落进驾驶室，“轰”的一声，车头被炸烂了，喷出大股火焰和浓烟，把整个卡车都遮没了。车上的鬼子等到醒过神来，早已报销了二十多个；余下的争先恐后地跳下车，躲进沟里和汽车底下开枪还击。

一个鬼子向我军隐蔽的庙院里扔进来两颗燃烧弹，燃烧剂借着风势呼呼地烧了起来，整个院落都被炽烈的火焰和烟雾笼罩着。有四、五个战士身上溅上了燃烧剂，浑身上下烧得象个火人，其他战士赶紧帮他们扑火。等到全身的火扑灭时，他们已被烧得脱眉去发；衣服、绑腿都烧成黑乎乎的，抓一把全是灰。

日寇的顽抗更激起战士们的仇恨，大家恨不得马上冲出去，把敌人一个个消灭干净。但是，鬼子在一挺歪把子机枪的

掩护下，还在疯狂抵抗。

齐丁根急得直冒火。忽然，他看见商河支队的七小队队长王志勇也来了，连忙喝道：“给我回炕上躺着，今天不许你动一下枪把子！”说罢将王志勇手里的枪夺过来，推他回去休息。

这王志勇身手矫健，一纵身就能窜上房顶，而且胆大心细，枪法很准。这天他正患着病，躺在炕上。齐丁根不许旁人把战斗消息告诉他，让他好好休息。但枪声一响，王志勇就知道与鬼子交上了火，一个翻身下了炕，操起枪就往这边跑。

这会儿，王志勇见枪被齐营长收去，只得垂着头，快快地走了。

这时符竹庭同志从设在村内的指挥所里，派人去通知齐丁根和王权五，要他们尽快结束战斗，撤离这个地方。因为附近各据点的日伪军已经出动，打算增援陈、罗庄之敌。虽然仁风据点和龙泉寺（五高）据点的三、四十个鬼子，在增援途中已被我打援部队击退，但如果济阳县的大股敌人赶来，我军与他们粘上，那就不妙了。

齐丁根捋起袖管，一推帽子，正准备带部队向前硬攻，忽听通信员惊呼起来：“你们看，那是谁？啊，是王小队长！”

齐丁根一看，吃了一惊，只见王志勇象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突然出现在阵地前沿。他利用小沟、土坎、树木作掩护，时而伏下，时而跃起，灵活地向敌人那挺歪把子机枪扑去。到了机枪跟前，王志勇闪电般跃起，飞起一脚将鬼子机枪手踢出老远，机枪顿时哑了。

齐丁根高兴得大吼一声：“冲啊——”呼地从院墙上翻了出去。部队也从四面向敌人冲杀过去。

王志勇踢开鬼子机枪手后，正要弯身抓枪，猛听得身后一

阵风响，料到有人向他扑来，他一挫身，就地打了个滚。回身一看，一个鬼子的枪刺正扎在泥土里。他使个垫步直蹬，把鬼子蹬了个仰面朝天，迅速拔起地下的枪。这时候，又有一个鬼子恶狠狠地端枪刺来。王志勇见躲避不及，就一咬牙挺枪迎了上去。当部队围上来的时候，那个鬼子已经翻白了眼；我们的英雄王志勇同志，也因流血过多牺牲了。

顽抗的日寇很快就被消灭了。其中有个戴着镀边眼镜的鬼子中佐军官，困兽犹斗。一个机灵的战士向他迎面撒去一把沙土，其他几个战士一拥而上，几把刺刀同时捅进这军官的前胸后背，把他送上了西天。这家伙就是阅兵团的团长。

战后查点战果，共打死鬼子四十多人，缴获步枪三十多支、歪把子机枪一挺，以及其他许多军需物资。还从那个中佐军官的皮包里，搜获一份军用地图。

符竹庭同志兴奋地对王权五和齐丁根说：“咱们可是初一进宝，开门大吉啊！”王、齐二人听到这话，都忍不住笑了。

陈、罗庄的群众见八路军打了胜仗，人人欢天喜地，争先恐后地拎着馒头、煎饼、鸡蛋等来到村西头。他们硬是将食品塞到战士们的手里。尔后又帮助部队清扫战场。军民们捡着枪支、弹药，打心窝里飞出阵阵笑声。有些青年小伙子，还敲着鬼子的钢盔、水壶，轻轻哼起了《冀鲁边区进行曲》^①：

东临渤海，西胁津浦，
南凭黄河，北迫平津。
这里是敌人深远后方，

^①《冀鲁边区进行曲》是抗日时期冀鲁边区的流行歌曲，由挺进纵队政治部宣传队姜思毅和董红明同志作词、作曲，并经肖华同志修改润色。

曾经混乱沦亡；
这里是抗日的坚强阵地，
山东，河北的屏障，
准备反攻的堡垒。
我们高举解放的大旗，
驰骋在这广阔的平原上。

炮火连天中，
我们飞速地发展，
不断地壮大。
不怕，二百个据点的敌人疯狂“扫荡”；
任它，纵横的公路网，
离敌人三五里宿营。
不管吃的是树叶和糟糠，
永远站在我们的岗位上。
环境越困难，
越是我们的光荣。
我们一定干到底！
我们一定要胜利！

.....

正当军民们高高兴兴地打扫战场的时候，昨夜送信的那个交通员又来了。他骑着辆旧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跳下车来，气咻咻地说：“符、符主任，有情况！”说罢掏出一份被汗水浸湿的情报来。

符主任看完情报，蹙了蹙眉头，回头对王权五、齐丁根说：“通知部队，马上出发！”

王权五、齐丁根答声：“是！”集合部队去了。

原来，济阳县的鬼子得知阅兵团遭到伏击，赶紧向惠民的日军联队司令官水野清夫报告，结果挨了顿臭骂。水野清夫命令他们全部出动，拖住我军，以候各地日军前来围歼。济阳的鬼子不敢怠慢，急忙命令各据点的日伪军赶赴陈、罗庄。

太阳已经偏西，我军告别了陈、罗庄的乡亲们，匆匆踏上新的征途。经过五十多里急行军，部队在深夜时进入惠民县西南部，在沙窝、翟家、王家寨一带驻扎下来。

狡猾的敌人象疯狗一样，派出大批特务侦察我军去向。部队的行踪被敌人发觉了。

水野清夫一面请求济南派兵，一面调动惠民、济阳、商河等地的日伪军，共集中了三千多人的兵力。敌军分乘一百多辆卡车，并配有一辆坦克，迅速赶到惠民，于凌晨三时把我军团团包围起来。

符主任和王权五、齐丁根等人没想到敌军来得这样快。等到发现敌情时，日寇已将我军驻地围得水泄不通。符主任和王权五、齐丁根等人爬上屋顶朝远处一看，只见四周车灯雪亮，敌人正在布置第二线、第三线部队。在一支支灯柱的照耀下，敌人你来我往，人影幢幢；战刀、刺刀闪着耀眼的寒光；口令声、吆喝声、跑步声交织在一起，更加剧了激战前的紧张气氛。

符主任沉思片刻，沉着地说道：“必须马上组织突围！但是敌人有卡车，我们是跑不过他们的，要留下一支部队设法拖住敌人。”

一听这话，旁边的七连连长兼指导员王皓民闪出来说道：“符主任，把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这个连的前身就是惠民县大队，对这一带的情况很熟悉，一定能完成任务！”

符主任想了想说：“那好吧！你们在主力撤走后，坚持到天黑就赶快突围。”

王皓民答声“是！”立即转身跑回连队，布置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

不一会，沙窝村东头猛地响起激烈的枪声，还夹杂着大喊大叫的声音：“鬼子来了，狠狠地打呀，快打呀！”喊声和枪声响成一片，引得敌人枪炮齐发，集中各种火器向沙窝村东头开火。

趁这机会，符主任和王权五、齐丁根等人带着商河支队和五支队二营的两个连，秘密地转移到沙窝村西头的翟家村，然后悄悄地向村外摸去。等离敌人近了，部队勇猛地 向敌人冲去，各种枪支一齐开火。敌人原以为我军要从沙窝村突围，所以对翟家村防守不严，意外的打击使他们乱作一团。我军猛打猛冲，很快突出村外。

我军主力部队突出重围后，转向宁乐边一带，和我们六支队会合了。符竹庭同志向我们概述了战斗的经过，心情沉重地说：“七连的情况不知怎么样了？面对几十倍的敌人，他们的处境很困难啊！”我们听了，都为七连的同志们捏着一把汗。

七连指战员在我军主力突围以后，处境确实非常艰难。因为敌人见我主力突围而去，气得发狂，马上撤回翟家村一线的兵力，集中围困七连所在的沙窝村，将村子围得水泄不通。天一亮，敌人就从四面发起了猛攻。

王皓民、副连长孟广选和随军行动的惠民县委书记李毓芬带领四个排、二百一十六名战士，占据村外的土围子，分头扼守一面。

敌人首先用四十几门迫击炮猛轰，炮弹象下雨般倾泻在村

里。炸坏的房屋纷纷倒塌，炸伤的猪、牛、羊嚎叫着四处乱跑。村里一时鸡飞狗跳，火光冲天。

接着，敌人发起冲锋。他们成散兵队形，端着刺刀向村子扑来，六十米、五十米、四十米……。七连的指战员在灰蒙蒙的尘土笼罩下，坚守在围墙后面，睁大眼睛，沉着地等待敌人靠近。敌人离围墙只有二十来米了，我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子弹、手榴弹怒吼着向敌人飞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丢下四十多具尸体溃退了。

紧接着敌人又发起第二次、第三次……冲锋，都被我军英勇地打退了。敌人试图把卡车全部开到村边，在车上架起机枪四面扫射，用优势火力掩护步兵冲锋，但是也没有成功。村子的四周，横七竖八地躺着二百多具敌人的尸体。

中午时分，战场上变得寂静起来。干冷的东北风呼呼地刮着，刮过空旷的田野，刮过沙窝村高高的围墙。

“这风好怪啊，象有什么味道？”坚守在北面围墙后的三排战士中有人说。

“唔！象辣椒炒牛肉。”三排长王先锋用鼻孔吸了几下。

大家一致肯定：“对对！是这个味道。”

正议论着，大家忽然觉得浑身酸软，呼吸急促。一个个头昏眼花，纷纷跌倒在地。

原来，凶残的日寇见沙窝村久攻不下，便灭绝人性地施放了毒气弹。当时我们的部队没有防毒知识，不少同志中毒倒下。日寇用机枪、步枪火力试探了一阵，见村中毫无动静，就大批地涌进村来。

三排长王先锋在昏迷中恍惚看到鬼子冲过来了，他想站起来，可是眼前天旋地转，浑身无力。不一会，他身边响起了大

皮靴的响声和叽哩呱啦的说话声，他一咬牙，挣扎着摸出两个手榴弹，猛地一拉弦，“轰隆”一声巨响，把十多个鬼子送上了西天。我们的王先锋同志，就这样壮烈地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敌人惊魂未定，只听四周“轰！轰！轰！”连声巨响，又有成批的鬼子和伪军倒下去。这又是三排的几名战士在昏迷中拉响了手榴弹。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抗战史上光辉壮丽的篇章。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敌人战战兢兢地跨过同伙的尸体，开始全面突破，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的部队逐步撤向村中，依仗房屋、院墙、胡同，节节阻击敌人。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经过一阵逐巷逐屋的争夺战，我军退到村中心两条南北向的小巷里。敌人步步进逼、压缩，把我军层层包围起来。

沙窝村的群众从战斗打响起，就忙着给部队端水送饭，把过年的年糕、包子、饺子都拿出来，送上阵地。妇女们帮着照料伤员，擦洗伤口，喂水喂饭。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伤员不断增多。绷带用光了，卫生员刘传均把自己的衣服、绑腿全部用上了还不够。房东大娘是个织布能手，她一声不响地抱来一大卷新布，那断头的地方，完全是新剪的痕迹。原来她把织布机上没有织完的布剪下来了。刘传均感动得泪花儿打转，哽咽着叫了一声“大娘……”再也说不出话来。大娘说：“还愣着干嘛？抢救伤员要紧哪！”就这样，这位大娘日夜操劳织成的新布，包扎在一个个伤员的伤口上。伤员们听说了这布的来历，都激动得哭了起来。大娘见大家哭了，就一字一句地说：“同志们别哭了！还等着你们再去打鬼子呐！”说完，又和其他妇女一起忙着照料伤员。

沙窝村的青壮年们支援部队作战的事迹，更是感人。他们

抬伤员、送子弹，忙得一刻不停。大伙这时见部队退进小巷，就把家里的大车、农具、板凳全搬出来，把巷子的两头严严实实地堵死。

敌人见步兵冲不进小巷，就用坦克开路。坦克“轰隆隆”地怪叫着，从东边一条巷子的南头冲进来，后面跟着一溜五辆卡车，车上架着机枪。堵在巷口的大车、农具，全被坦克碾烂了。坦克一边开炮射击，一边向两旁的院墙猛撞，象头拱食的野猪，在尘土飞扬中肆意横冲直撞。

眼看东巷要被敌人占领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共产党员、班长刘瑞林掂起十多颗手榴弹，对身旁的战士谭士杰、弭文贵喊道：“跟我来！”

三个人冒着弹雨，爬上院墙探头朝巷子里一看，见坦克正从眼下开过去，后面跟着五辆卡车。刘瑞林喊道：“你俩打后面的卡车，我去炸坦克！”说完顺着院墙猛跑几步，追上了坦克，一个飞身跳了下去，正跳在炮管上。他飞快地掏出两个手榴弹，揭开车盖塞进去，只听见车内沉闷地响了一声，坦克就再也不动了。他跳下坦克，又朝卡车冲去。

谭士杰、弭文贵两人趁第一辆卡车开过来时，一齐朝车上丢了俩手榴弹，当即把卡车炸毁，车上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这时刘瑞林追上来，三人并作一处，接着又炸毁了第二辆、第三辆、第四辆卡车。当他们英勇地扑向第五辆卡车时，不幸遭到车后伪军的枪击，三个人一起扑倒在血泊里，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三百多伪军在日寇机枪的督促下，战战兢兢地越过炸毁的卡车，冲进巷子里。我们的指战员为了节省弹药，用乱砖碎瓦雨点般砸在伪军头上。一个伪军头目见我军停止了射击，得意地扯起公鸭嗓子喊道：“弟兄们，不要怕，八路军没子弹啦！”

接着便指挥伪军一窝蜂似地拥进小巷。不料巷子两侧房顶上又猛地响起震耳的枪声，弹雨呼啸着泼下来，伪军争先回逃，自相践踏，死伤无数。伪军正逃得起劲，督战的鬼子机枪又朝着他们无情地扫射，直打得他们嚎啕哭叫。就这样两头挨打，伪军先后倒下二百多人。余下的一百来人，吓得钻进炸坏的车底下，一时不敢出来。

这时候，天色开始昏暗起来。夜，渐渐地降临了。房屋、院墙、树木，都在夜色中模糊了。只有冷彻肤骨的北风，呼啸着刮过东、西两条巷子里的我军阵地。东巷的大半截已被敌人占领，王皓民同志带着三十几个战士，被压缩在巷子尽北头的两所院落里。西巷也被敌人拦腰截断，李毓芬同志带着五十多个战士，孟广选同志带着三十多个战士，分别被包围在巷子的两头。还有些战士，三三两两，各自坚守在巷子两侧的院落里。我军的阵地已经很小，部队又被分割开来，不能互相救应，处境是十分危险的。

敌人见天黑了，暂时停止对我军进攻，又换了个新花招。日寇让伪军四处向我军喊话：“弟兄们，投降吧，皇军有赏哪，每人二百块！投降吧，为一块津贴费卖命值得吗？……”

战士们肺都气炸了，七嘴八舌地回答：“别当狗汉奸啦！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良心别叫日本狼狗给吃了！”“你们等着吧，全国的老百姓总有一天要砸扁你们这些狗头！趁早投降吧！”

在王皓民身边的一个小战士激动地说：“指导员！咱们死也不投降，死也要死得光彩！”

王皓民说：“对，我们要战斗到底！”他见战士们情绪激奋，临危不惧，心里很高兴。他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们要为祖国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们举手宣誓！”

三十几只手高举起枪支，齐声宣誓：“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要为祖国战斗到底！宁可粉身碎骨，决不投降敌人！”

高亢入云、气吞山河的战斗誓言，在无边的夜色中久久回荡，传得很远、很远……

敌人的劝降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更激起我军战士与他们血战到底的决心。他们又一次失败了！

敌人在无可奈何之余，用炸毁的汽车将巷口堵上，又在四周房顶上遍布岗哨。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八路军就是插上翅膀也难飞走。然后，日伪军就在院落里、巷子里点起一个个火堆来御寒，鬼子们围着火堆烤火煮饭。群众家的木器、木料被搜括一空，投入火中。

夜色越来越浓了，天黑得象口倒扣的锅，几步以外就看不清人影。王皓民同志觉得现在正是突围的好机会，但是要想从这密不透风的敌群中突出去，真是件不容易的事。他左思右想，总想不出个好办法。旁边有个战士猜出了他的心思，凑到他的耳边说：“指导员，我有个主意，你看可行？”

王皓民急问：“什么主意？快说！”

那战士踢踢脚下的一个鬼子尸体：“我们穿上这衣服混出去。”

王皓民眼前一亮，连忙说：“好主意！好主意！”当即悄悄地吩咐大家把鬼子尸体的衣服剥下，赶快穿戴起来。

不一会，三十多个全副武装的“鬼子”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跨进一条东西向的横巷里，向烤火的敌人迎面走去。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皇军”也有冒牌的，头也不抬，让他们过去了。王皓民同志带着战士们在敌人火堆间穿来插去，向村西摸去。

警戒西门的伪军，在夜色中看不清行人面目，只见一队“皇军”走过来了，赶忙“叭”地立正敬礼。

扮成鬼子军官的王皓民回了个礼，带着队伍朝野外走去。走了一程，见四周没有敌人，这才命令大家向商河辛店一带快步前进。

王皓民等人脱险不久，被困在西巷南头一所大院里的三十来名战士，也在孟广选带领下，悄悄地打开角门，摸到了巷子里。巷子尽头被一辆破汽车横塞住了。孟广选命令大家隐蔽在巷子两侧，自己先带领两个战士从车底爬出去，干掉了敌人哨兵；然后战士们一个个从车底下爬出去，来到野外。他们也毫无阻挡地突出了敌人重围。

夜，已经很深了。西巷北头的几座院子里，李毓芬和五十多名战士还在坚持着，一时无法突围。李毓芬腿上负了伤，流血不止。但他依然鼓励大家坚定沉着，想法突围。

邻院的房东王成从墙上悄悄地翻了过来，对李毓芬悄声说道：“李书记，老呆在这里咋行？”

李毓芬说：“敌人包围这么严，出不去呀！”

“我带你们出去。”王成胸有成竹地说，“我知道从哪里好走过去。”

李毓芬连忙把五十几个战士和分散在其他地方的几个同志全部集中起来。他们在王成的带领下，向村外摸去。因为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王成为了防止队伍走散，叫战士们解下绑腿带连接起来，用手牵着，一个拉着一个走。李毓芬由通信员尹玉良和另一名战士轮流背着走。

这支奇特的队伍，静悄悄地穿过几座院落，在一条窄得仅可容身的夹弄里挤了过去，摸到村外围墙边。几名战士在两棵桑树的遮掩下，用刺刀在墙上挖了个洞，五十几个人一个接一

个地钻出墙洞，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这时，敌人还在做着等到天明活捉八路军的好梦呢。

第二天一早，敌酋水野清夫下令总攻，不料我军已经不翼而飞。敌人搜房查坑，掘地三尺，还是一无所获，只得垂头丧气地撤兵了。水野清夫感到莫名其妙，就问伪军大队长：“你说，八路军哪里去了？”

伪军大队长怕加罪于他，唯唯诺诺地说：“太君围得这么严，八路军咋能出得去？莫不是他们会土遁？”

水野清夫问道：“什么土遁？”

伪军大队长把中国古代有地下遁行的传说，神乎其神地解释了一番。水野清夫听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四天后，七连突围的同志先后回到宁乐边一带，和我们会合了。

沙窝、翟家突围战，我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以伤亡六十多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敌人五百多名（据沙窝群众说，鬼子拉走十八卡车尸体），并且奇迹般突出了重围。尤以七连打得最出色。符竹庭同志异常高兴地夸奖他们：“奇迹，奇迹，你们创造了平原突围战的奇迹！”肖华同志在一次总结中，也曾高度赞扬七连的孤军坚持、英勇善战：“我们一个连的兵力，拖住了三千多敌人，掩护了主力部队突围，而且消灭五百多敌人，这在平原游击战中，是十分罕见的先例……”

据传，水野清夫为此曾受到上司痛斥。他还诌了一首歪诗：“车马滚滚炮火轰，铁桶围村不透风，一夜八路土遁去，一场辛苦两手空。”这是当时的传说，至于这个敌酋会不会写诗，有没有写过这样的诗，就不得而知了。

我挺纵的三个支队，在反“扫荡”中连战连捷，有力地保卫了冀鲁边根据地。同样，边区的地方武装、政府和广大人民

群众，对于保卫根据地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一九三九年正月十六日，宁津县大队化装袭入宁津县城，打死日寇三十余人；正月十八日，商河县大队捣毁李家集等据点，歼灭敌人一个中队；二月二十七日，德州民兵声东击西，焚毁敌人的兵工厂、武器库；三月中旬，乐陵县大队在城南埋伏，消灭日寇骑兵四十多，缴获一批东洋马……。此外，津南、鲁北的各个抗日民主县政府，积极筹集给养、搜集军事情报、发展民兵、设置交通站。广大群众则一面坚壁清野，封锁敌人的粮食来源，一面秘密制造地雷炸药，为我军提供军火。

总之，日寇回师华北后，虽然疯狂地“扫荡”冀鲁边区，企图搞垮我军，占领整个边区，但是我军在党的领导下，有各级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有六百万人民的支援，不但没有被敌人压垮，反而越战越强。我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歼灭了大量敌人，使敌寇无法占领广大村镇，巩固了津南根据地，发展了鲁北根据地，扩建了宁津第六团、泰山支队等地方武装。我军还在频繁的战斗中，逐步摸索出平原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对坚持平原游击战更加充满了信心。

转 危 为 安

第十章 接受重任

日军主力回师“扫荡”华北各解放区，虽然到处遭到我抗日军民的沉重打击，但是，他们继续增设据点、岗楼，向我根据地步步进逼，还常常聚集重兵，寻找我军决战。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方面准备接受日寇的诱降，偷偷派人到南京和汪伪政府接洽，一方面则开始配合日寇疯狂地向我解放区进攻，企图用“剿共”的战绩来讨好日寇。这些，使冀鲁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我们在平原地区保存兵力，遭遇到巨大的困难。

另外，从一九三八年秋天开始，边区出现了三十年没有见过的特大旱灾和蝗灾。田地旱得裂开了口子，庄稼一片枯黄。从天津卫南洼的芦苇滩里飞出的蝗虫，不断南移，象遮天蔽日的乌云，黑压压地覆盖在大平原上，蝗虫所到之处，一片精光。旱、蝗之灾造成的粮荒异常严重，许多群众只得以树皮、粗糠充饥，有些群众则用麻袋将蝗虫背回来，当粮食煮来吃。虽然我抗日政府大力组织农民生产自救，军政人员也节衣缩食，但也很难以解决目前的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主力部队如果久驻边区，势必给群众增添负担，加剧粮食困难。

当时整个山东战场的形势是：一一五师师部率少量部队驻在鲁南山区（包括沂蒙山区、鲁山和抱犊崮山区）；杨勇同志率黄河支队约一个营的兵力，战斗在鲁西和鲁西北；由于我军在鲁南、鲁西和鲁西北的兵力不足，要打开这三个地区的局面就比较困难。而这三个地区，都是战略要地。尤其是鲁南山区，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是华北与华中的结合部，是华中平原、鲁西平原、冀鲁平原的战略依托，只有建立鲁南山区根据地，八路军才能在山东站稳脚跟，才能坚持山东的长期抗战。此外，国民党顽固派石友山的第十军团，盘踞在冀鲁豫三省结合部的十几个县，修筑坚固工事，并配合日寇对我鲁西、冀南、豫北根据地进行破坏和“扫荡”，割断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与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及苏北新四军的联系。

鉴于这些严重情况，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师部命令我们挺进纵队主力调出冀鲁边，一部开往鲁南，一部开往鲁西（包括鲁西北），去执行争夺鲁南、创建鲁西游击根据地和配合兄弟部队消灭勾结日寇反共的石友山军团的任务。这一部署，是根据整个山东战场和抗战全局的需要而采取的极其重要的战略措施。

一九三九年初，我挺纵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的斗争外，主力开始分批转移。分批是为了缩小目标，便于秘密行动，也是为了使边区减轻压力。第一批是孙继先支队进入鲁南滨海地区，协同山东纵队开辟了滨海根据地。第二批是我率领六支队的七团开赴鲁南。我和七团团团长李子英、政委崔月楠，带着三千多人，在曾国华同志的五支队掩护下，穿过津浦铁路，经茌平，在东阿和平阴县之间渡过黄河，到达肥城以西的南尚仁一带山区。第三天，我就同先期到达的孙继先同志接上了头，不久又碰到了一一五师的陈光代师长。陈光同志要

我们继续南下，到泗水、平邑、新太、蒙阴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后，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的特务大队就来寻衅，当即被我军击走。嗣后我们收编了五个大队的红枪会，打退了一千多日军和二千多伪军的进攻。第三批是宁津第六团和泰山支队，也进入鲁南山区，同师部率领的六八六团主力合并，开辟了抱犊崮根据地。第四批是曾国华同志带领的五支队，第五批是王叙坤同志带领一部，第六批是邓克明同志带领机关一部，第七批是军政干校，第八批是肖华同志带领纵队司令部机关及特务连，他们都转移到鲁西。这些到达鲁西的机关部队，奉师部命令，同杨勇同志率领的黄河支队合编，成立了鲁西军区及教导第三旅。肖华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杨勇同志任副司令员。鲁西我军将盘踞在鲁西北的汉奸齐子修部队三千余人全部歼灭，巩固和发展了鲁西游击根据地。

紧接着，八路军总部命令鲁西、冀南、冀鲁豫、冀鲁边的主力和冀中的一个纵队，组建成华北讨逆野战军，由宋任穷同志任司令员，肖华同志兼任政委。一九四〇年二月，华北讨逆野战军在宋、肖二同志指挥下，出动二十五个正规团，向石友山军团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战役，歼其三千余人，至三月，终于将石部彻底击溃。这次讨石战役，打通了苏北、山东与太行山区的联系。此后，肖华同志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最后一批离开冀鲁边区、转移到鲁西的，是符竹庭同志带领的挺纵政治部机关。

在符竹庭同志离开边区之前，我在鲁南突然接到肖华同志拍来的电报，要我返回冀鲁边。要我回冀鲁边干什么，电报里没有细说。我东猜西猜，越是猜不出头绪，心里越急。

一九三九年中秋节这天晚上，我把部队工作向李子英等同

志交代了一下，便带着一个骑兵班和警卫员周德保、勤务员侯延江，共十一个人，骑着快马，披着皎洁的月光上路了。我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跨过津浦铁路，于阴历八月底、阳历十月上旬，又回到了冀鲁边。

我回到边区后，立即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李广文同志一起，赶到宁津县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尚未转移的符竹庭主任，向他请示工作。

符主任见我们到来，很高兴，他笑着说：“老周，我正在派人找你，你倒先寻上门来了，怎么样，一路上顺利吧？”

我也笑着回答：“敌人封锁很严，但沿途都有我们的交通站。他们的封锁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我们笑着扯了几句，符主任的谈话便转入正题，他对我说：“主力奉命转移了，组织上决定你回来坚持斗争。整个冀鲁边的工作，主要由你领导。”

“啊，这怎么行呢？”我急忙摇着两只手推辞。

“怎么不行？恐怕担子重了，把身子压坏？”符主任笑着说。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自己没有这能力。”我赶忙解释，“个人苦点累点无所谓，耽误了党的工作可了不得。”

符主任笑着拍拍我肩膀：“别再推了，这件事组织上已经定了，你就是想出一箩筐的借口也没有用。再说，这也是党对你的信任，对你的考验。”

我无话可说了。

先后九批从边区转移出去的机关部队，共达一万五千人左右，这就极大地加强了鲁南和鲁西的战斗力量，使鲁南和鲁西形成了师部的两个拳头。这是冀鲁边军民对开辟鲁南山区和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有力支持和贡献。同时，主力的转移，也

缓和了边区由于旱、蝗灾造成的粮食匮乏，相应地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主力转移之后，边区尚有六支队的八团一、三两个营（团长杨铮候、政委陈德、副团长杨承德），及津南支队、运河支队各一个营，在津南活动。此外尚有挺纵直属队的一个连和陵县地方武装升级的五百人，组成鲁北支队，由杨忠和龙书金同志率领，在鲁北活动。冀鲁边区的部队总共有千六百人。

主力转移后，日寇趁机向我根据地进行蚕食，不断增设据点，在很短的时间内，据点就由原来的八十八个增加到一百四十个。日寇还对我边区大规模地实施破坏，摧毁我基层组织，逮捕我地方工作人员。并且扩大伪军，普遍建立维持会，推行伪化政策，妄图毁灭我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冀鲁边的顽固派和投降派，也掀起反共的恶浪。惠民的刘景良、无棣的张子良、吴桥的张国基、德平的曹振东、商河的李光明和田三秃子等大大小小的国民党顽固派，一齐蠢动，互相策应，步步向我根据地进逼。我们处于日伪顽的夹击和包围之中。

形势如此严重，情况又是这样复杂，要我负责一个地区的全面领导工作，我心里感到沉重。要不要坚持？能不能坚持？如何坚持？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党组织要我留下坚持斗争，我必须服从。我想：边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有六百多万人口，战略地位又很重要，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钢刀。特别是边区的广大人民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日要求，对我党我军有深厚的感情。我们挺纵在进入边区的时候，群众热情援助，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把鸡蛋、大红枣送过来。无棣县的刘大娘为了抗战献出了五个子女。还有无数群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军掩护伤员，传递情报……。这样好的河山怎能轻易让给日寇！这样好的人民怎

能让敌人任意蹂躏！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决不可丢，我必须坚持下去。

不久，我们又接到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罗荣桓、肖华同志的指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冀鲁边。冀鲁边根据地绝对不能丢失。它是清河区的屏障，也是我军发展抗日武装的兵员基地。它牵制了日军两个联队、三千六百余人，牵制了伪军一万五千余人和顽军万余人。没有这块战略基地，我们在冀鲁平原的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据。分局和师部首长的指示，更加坚定了我坚持边区斗争的决心。

能不能坚持？靠什么坚持？我仍日夜思虑着这个问题，并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还多次与留在边区的地方党的领导同志马振华、李广文、李启华、张耀增（均为军政委员会成员，马振华兼津南地委书记，李广文兼鲁北地委书记）和部队的一些负责同志杨忠、龙书金、陈德、杨承德等交换看法，征求他们的意见。

马振华同志诚恳地对我说：“边区的群众基础好，有革命斗争传统，地方党和部队也非常团结，坚持边区斗争准定能行。只要大伙有决心，依靠党，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我们完全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其他同志也不断给我鼓劲，献计献策。领导同志之间的互相信赖、互相支持，共同挑担子，使我的信心增强了，心情不象以前那样沉重了。

后来，马振华同志觉得有些事情还不够清楚，又去追赶符竹庭主任，在津浦路东赶上了。他向符主任提出要明确边区的领导人员。符主任便向他补充交代说，由周贯五同志担任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书记，你们要好好协助他工作。马振华同志听后又说，自杨靖远同志牺牲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

公署专员的职位还空着，最好也由贯五同志兼任。符主任同意了他的建议。随后，马振华同志便连夜赶回，在拂晓时把我叫醒，将这些情况告诉了我，也向其他同志作了传达。

这以后，我便以冀鲁边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的名义，召开县委书记和县长联席会，部队骨干分子会，军政民联席会……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山东分局、北方局和师部的指示，说明主力部队转移的原因，解释继续坚持边区斗争的有利条件和必须克服的困难，动员大家坚定信心，艰苦奋斗。并且向部队和群众提出了军政委员会议定的坚持边区根据地的几点办法：一、巩固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逐步向外围发展，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把敌占区变为我军的游击区和根据地，造成有敌人无敌区的局面。二、加强县大队和区中队的建设，发展武装，扩大队伍。因为毛泽东同志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三、进一步加强党、团、群众组织的建设，广泛地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开明士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总的口号是：恢复元气，振兴边区！

军队方面则作了具体的部署和分工：鲁北支队仍在鲁北坚持，并负责破坏德州以南到黄河岸的津浦线，保持同鲁西根据地的联系；六支队的八团一营保卫渤海沿岸的盐山、新海等地，相机袭扰天津；津南支队破坏南皮、沧州、青县一段的津浦路；运河支队在东光东部、南皮南部及吴桥北部地区坚持斗

争，开辟根据地；六支队八团三营的十连、十一连、十二连及新编第九连（原无棣县县大队），归杨承德指挥，到盐山、新海、无棣、阳信、济阳、商河一带开展工作；六支队八团三营第九连、东光青年连和庆云县县大队（相当于一个连）合编为特务营，负责保卫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由于军政委员会采取了这些措施，边区军民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局势也较为稳定了；边区所属的二十四个县当中，约有二十个县相继恢复和健全了县委、县政府和各种群众团体，部队也不断扩大。

但是，粮荒的阴影仍旧笼罩着边区，饥饿时时折磨着广大抗日军民。穷苦百姓吃的都是秫秸、棉籽饼、喂牲口的苜蓿、花生壳炒熟磨成的面粉，吃了之后，大便干燥难解，大便时鲜血淋漓。有些群众饿得没有法子，便扛上破破烂烂的家具到集上去典当，想兑换些粮食，结果跌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我们部队的指战员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倒有四两粮食的定量，但都是些连糠带壳、早得瘪瘪的杂粮。每当我们在群众家里做饭时，饥饿的孩子，眼巴巴看着我们粗糙的饭食，使人不忍心下咽。我们常常将杂粮做成稀汤，掺些树叶，分给群众，大家一起吃。

严重的粮荒如果不能迅速缓解，势必影响军心民心，涣散人们的斗志。

这个严峻的问题，时时揪着军政委员会每个领导同志的心。面对粮荒的无情挑战，我们挺起腰杆，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实行减租减息；合理摊派捐税；发动部队指战员凿井抗旱，开展生产自救，减轻群众负担；命令乡农会派出工作组向地主借粮；组织运粮队，外出采购粮食。

这些措施，即刻见效。鲁北陵县二区的一个乡农会，在大

柳店村说服了毛、王两户财主，向他们借得三万多斤谷子、苞米，为该村几十家穷苦百姓解了燃眉之急。津南盐山的武装运粮队，驾着骡马大车，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打退敌人的狙击，从天津运回几十车粮食，酌量分给濒于饿毙的群众。边区抗日军民终于熬过了灾荒，蜡黄的脸上又露出了喜色。大家重新抖擞起精神。

到了一九四〇年一、二月间，边区根据地内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这时根据地的生存，仍旧受着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的严重威胁。这些家伙始终认为我主力转移后，边区根据地困难重重，大势已去，他们的反共气焰越来越嚣张。他们大肆造谣毁谤，大打出手，妄图趁机将边区的我党政军赶净杀绝，毁掉这块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文章《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这篇文章强调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这之前还说过：“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根据这样的精神，我们决定对向我根据地猖狂进攻的国民党顽固派和投降派，予以狠狠回击。我们的力量虽然比较单薄，但对打退反共浪潮，使根据地转危为安，还是充满信心的。

在后来的反顽斗争中，我们首先消灭了吴桥的张国基。

第十一章 吴桥除霸

吴桥的张国基是旧乡绅出身，为人狡诈，生性多疑。抗战初期，他仗着自己有钱有势，趁乱招兵买马，拉起一支乌七八糟的队伍，他也就成了吴桥境内“一跺脚，地也动”的霸王。不久，他的队伍被国民党收编为河北省民军第二路，分驻在吴桥县的彭庄、老鹅张、牟家庵一带，约有两千人枪，是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的亲信武装。

张荫梧是臭名昭著的反共顽固派。他和山东的秦启荣，当时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华北的两个“磨擦专家”。就是这个张荫梧，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受蒋介石的唆使，伙同秦启荣，在冀、鲁两省发动大规模的反共磨擦。他特别授意张国基要与鲁北的国民党军队刘景良、张子良、曹振东等部互相配合，共同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在我们以后缴获的密信中，张荫梧这样写道：“我提出的‘曲线救国’论，已为蒋委员长所赞许……吾弟（指张国基）可放胆行事，与刘、张、曹诸人合力同心，收复八路军侵占的失地。切毋犹豫迟疑，坐失良机！……”

在张荫梧的指使下，张国基日益暴露出反共嘴脸，彻底忘记了肖华同志在灯明寺战斗中对他的救命之恩和他亲口许下的诺言。尤其是在我军主力转移之后，张国基的反共气焰越发嚣张。他高喊着“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共投降论调，在刘景良，张子良的配合下，猖狂

地蚕食我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初春，张国基派出大批部队，到我根据地东光、南皮一带，横征暴敛，强索粮款。我抗日政府派人前去交涉，竟遭到毒打。他手下的人还扬言：“这一带都是我们二路的地盘，归我们管；这是上头鹿主席、张司令的指令！你们八路军的大部队已经滚蛋，剩下几个土包子，有个屁的能耐……”

我和杨忠、龙书金、陈德、杨承德等同志听到这消息，都非常气愤。但我们还是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决定先礼而后兵。我先以津南专员的身份给张国基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我列举了他怂恿部队横征暴敛、胡作非为的大量事实，指出这是一种挑衅行为，令人不能容忍；严肃地警告他“不要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必须就此住手，不许再犯”。

这封信送到吴桥不几天，德平县的山东省保安五旅旅长曹振东忽然派他的副官来找我，说张国基愿意和我们谈判。并建议我们和张国基在他的驻地会谈，由他出面调停。

曹振东曾于一九三九年春在陵县魏龙姜遭到日寇追击，情况万分危急。当时杨忠同志带领五支队一部奋勇阻击日寇，苦战一天，歼敌六十多人，救下了曹振东的人马；营长谭端瑞同志就是在那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为此，曹振东感激涕零。我们了解到他与张国基的交情颇深，曾通过他对张国基做过不少工作。

我和杨忠等同志研究后认为：曹振东说“出面调停”，可能是出自真心；张国基的所谓“谈判”则是假的，他想利用“谈判”进一步摸摸我军的底细。但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再次阐明我党的政策，劝诫他停止反共活动。于是，我就让这个副官转告曹振东，我们愿意对一些问题与张国基交换看法。

这天上午，我和杨忠同志各带一名警卫员，纵马驰往曹振东的驻地——德平县义渡口。

谁知到了义渡口，张国基借故未来，却派了他的副司令宋达民作为代表，来同我们“谈判”。宋达民是德县人，曾留学日本，是个亲日分子。这个人阴险狡猾，善于两面三刀，人称“申公豹”。肖华同志在边区时曾称他是“游击流氓”。我和杨忠同志一下马，宋达民就和曹振东迎上前来。只见他梳个大背头，头发抹得油光贼亮，穿着高腰马靴，反剪着双手，神气十足。我和杨忠同志都不免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同时交换了一下眼色：对这个人要认真对付！

在会谈中，宋达民首先把张国基没来的事掩饰一番。然后他歪着头说：“眼下国难当头，应当以抗日为先。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向百姓派粮要款是用之于民族大业，这有何不可？”

我针锋相对地对他说：“抗日救国，自然无可指责。但是，请问副司令：你们到今天为止有没有抗过日寇？这是一。第二，国有国法，军有军纪，象你们这样私征粮款，涂炭百姓，还要不要政府，要不要法纪？”

宋达民两只贼眼滴溜溜地转了转，又狡辩道：“我们二路现在有四、五千人马，枪好弹足，装备精良。无奈吴桥地薄人稀，本部的粮草供应严重不足，总不能让我们饿着肚子抗日吧！”

这家伙打肿脸充胖子，想来吓唬我们！不过我还是心平气和地回答：“既是为了抗日，粮秣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不过，需要具表造册，上报专员公署。我代表公署答应，可以按表供给部分粮款。”

“这个，这个……”宋达民做贼心虚，一时说不出话来。

杨忠同志见了，在旁边催问道：“怎么样啊？这总两全其

美了吧！”

宋达民越发慌了，掏出手帕抹了抹额头，干咳了两声，眼睛直朝曹振东瞟过去。

曹振东会意，就连忙站起来打圆场：“诸位！听兄弟进一言。周政委的建议，在兄弟看来，确是两全之策。不过，张司令未能亲来，宋副司令也不便自作主张。我看先请宋副司令回去，与张司令商妥了再作答复，怎么样？”

宋达民赶快抓起白手套，扬了扬说：“那好吧，兄弟先走一步，告辞了！”说罢出了门，骑上马匆匆地溜了。

这次“谈判”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和杨忠同志在回来的路上，说起宋达民刚才的丑态，不由得哈哈大笑。

宋达民溜回吴桥对张国基煽动说，共军在主力转移后没有什么本钱了，很害怕统战关系破裂，写抗议信不过是为了虚张声势。张国基听了这一番话，更加趾高气扬，变本加厉地向我们进行挑衅。他的武装征粮队不但继续在东光、南皮恣意妄为，而且竟然窜到德县、宁津等地。

紧接着，又接连发生了这样几件令人气愤的事：东光县抗日政府的一位参议员，是开明绅士，与沧县参议长兰竹坡等人一起做过许多抗日工作，在东光县很有名望。他因抗议张国基的部队横征暴敛，惨遭毒打，并被野蛮地抓去扣了起来。东光县抗日区长姜书奎和两个同志在大石村了解敌伪情况，也被顽二路的人无理绑架。张国基的参谋长对他们施行威逼利诱，要他们投靠张国基，遭到姜书奎同志的严词拒绝。另外，张国基还派人破坏了我们设在梁家集的地下交通站，把站长抓去残酷地活埋了……

这几件事犹如火上浇油，更加激起全区抗日军民的强烈义

愤。部队和群众要求我们予以惩罚，坚决打退顽二路的猖狂进攻。

我和大家一样气愤不过。我觉得一让再让不是个办法，便立即写信给张国基，强烈抗议捕杀我抗日人员。并警告他说，若不立即把人放回，一切后果由他负责！同时，我打算集中津南、鲁北的全部兵力，待命行动；如张国基拒不接受放人要求，就狠狠地教训他。我和杨忠、龙书金、陈德、杨承德等同志商量，是否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大家齐声叫道：“对！就这么干！”

大家马上分头行动起来。鲁北支队、六支队八团、津南支队、运河支队和部分县大队都按照命令，逐步移向吴桥边境，隐蔽起来，准备随时投入反击。可是，这时我却意外地接到了张国基的“求援信”。

张国基在信中写道：“……这几日，东光、南皮、吴桥等地日军均来信威胁，要我率部投敌，否则将大军压境，消灭本部。望贵军速来彭庄一带，共御日寇……”信里对捕杀我抗日人员一事表示了歉意，说是他手下人瞒着他干的，还表示要立即将人放回等等。

我接到这封信后，东光县那位参议员和姜书奎等人果真相继被放回。我觉得这事蹊跷，便请杨忠、龙书金、陈德、杨承德等同志速来商议对策。

陈德同志说：“八路军正在华北敌后发动‘百团大战’。华北各个主要交通沿线和大小据点的敌人，同时受到我们几十万大军的进攻，交通都中断了，敌人正在一片混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怎能‘大军压境’，去打这个从不抗日的张国基呢？这里面有鬼！”

大家听了，都觉得他的分析有道理。龙书金同志还补充

说：“会不会是他和鬼子勾搭好了，设下个圈套来诓我们？”

我接上说：“是啊！如果日、张合伙的话，倒要小心防范。从目前的情况看，张国基上有张荫梧的指使，下有宋达民的怂恿，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商量结果，大家决定乘机进军吴桥。为了防止日、张合谋，我们作了具体部署：

一、杨忠、龙书金带领鲁北支队，进至德平、吴桥、德县北部边境，负责牵制吴桥、桑园和津浦路沿线的日伪军，同时暗中监视宋达民部的动静。宋达民这时正带着他的第三支队，活动在这一带。

二、傅继泽、康伯明带领运河支队、东光县大队、南皮县大队，到铁路沿线的连镇、东光、泊镇、南霞口等地，负责破坏日伪据点，截断交通，牵制敌人。

三、宁津青年营和沧县县大队袭扰宁津、沧县的重要城镇，不使日寇出动。

四、津南支队四个加强连移至东光县东部、南皮县东南部，作为机动兵力，集结待命。

以上各部队务必拖住各地日伪军，不使出动。并准备随时集中到彭庄。

我和陈德、杨承德带部分主力进入吴桥南二路的老巢彭庄及老鸹张、牟家庵一带。日军如果不出动，谅张国基也不敢动手，趁此机会，我们可以摸清张国基的工事设施。如果张国基胆敢动手，我们马上就聚师彭庄，完全、干净、彻底地消灭张部。

张国基见我们果然去了，可以说是又惊又喜。他对我军大胆进入吴桥感到吃惊，又对我军进入他们的圈套感到得意。他

一见到我，就急不可待地提出换防的要求：让我带部队进驻彭庄、老鹅张、牟家庵等处，他带自己的人马移驻其他地方，以避风头。

我因为胸有成竹，满口答应了他的换防要求。随即，我带津南支队特务营的三个连和六支队八团三营的十二连进驻牟家庵；陈德带八团一营的四个连驻彭庄；杨承德带八团三营的三个连和机炮排驻许连九村；六支队司令部、骑兵连驻桥上村；老鹅张与吴桥城相距很近，所以派了一个便衣手枪队秘密进驻。部队安顿完毕，一面加强戒备，一面派人侦察张国基部的动静。

张国基兴冲冲地撤出彭庄后，和他的参谋长带二支队、特务营驻在东光大高台、小高台一带；他的弟弟张国英带一支队驻于东光沙洋贵村（日寇因村名与“杀洋鬼”谐音，从不进村）一带；宋达民带三支队仍驻吴桥、德县边境。他们一边监视我军举动，一边磨刀擦枪，只等各地日寇一出动，就回头向彭庄扑来。

东光、南皮、吴桥等地的日寇，接到宋达民的密报，正要集结部队出发，不料各地却纷纷告急：各县境内都有大股八路军活动；尤其是铁路沿线，南起吴桥、北至沧州的一段铁路几乎全部瘫痪了，几里、几十里的铁轨被拆毁搬走！岗楼据点被端！……日寇一时吓慌了手脚。

这一段铁路，前不久被我冀中、冀南的数万部队和民兵破袭，鬼子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刚刚修复不几天，眼看着又断了。鬼子哪里还顾得上袭击我军，赶紧调部队、抓民工修铁路去了。可是，白天修好，晚上又断了；这里修好，那里又断了，忙得鬼子焦头烂额。后来，这一带的电话线也全断了，鬼子四处联系不上，气得直摔话筒。

就在这几天，我们在张国基的老巢里，连日察看地形和张部的工事。在几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还悄悄挖了暗道，以便将来进攻。我带的十二连，就在牟家庵村北面的圩寨里，把靠墙的三个苞米秸垛移开，在墙上挖了三个大洞。洞口不挖穿，外墙上只留一层薄土，以便将来用脚一蹬就蹬开，外面仍将苞米秸堆好。这样，连片的院落，不连片的孤院，大小巷子，可攀援的树木……都象图画一样印在我们的脑子里。

几天以后，我派人送信给张国基，请他回来。因为我们虽然估计他与日寇有了勾结，但还没有抓到真凭实据。为了打得有理、有利，我们决定先撤出彭庄一带，对他再观察一段时间，看他还要耍什么花招。

张国基接信后，只得带着部队回来。他见日军被我们牵制住了，猜想我们识破了他的阴谋，做贼心虚，见面后竟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见他心怀鬼胎，语不成句，心里不禁好笑，就说道：“你手下人马号称四千，有枪有炮，人熟地熟，只要真心抗日，日寇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当初，你在灯明寺对肖司令拍着胸脯打包票，大概还没有忘记吧！”

张国基头上冒出汗来，他一边擦汗，一边结结巴巴地说：“周政委言、言之有理……兄弟我聆教，一定不、不负前言……”

我笑着说：“那好吧！今后就看你的行动罗！”说罢带着部队启程。

离开吴桥后，我带着特务营、运河支队驻东光六合村一带；仇鸿印副支队长、何参谋长带领津南支队驻宁津、东光边境的张大庄、杏桁村；杨承德同志率八团三营驻沙羊贵村；陈德同志带一营驻东光柳寺村；杨忠、龙书金同志带鲁北支队三

个营退驻宁津西南孟家寺一带。

各路部队安顿妥当，我立即派出一批便衣侦察员，前往彭庄等地，侦察吴桥民军第二路和附近日寇的动静。这时候，张国基依靠他的二支队和特务营保驾，仍龟缩于彭庄；张国英率一支队的两个大队驻牟家庵；一支队的另一个大队驻许连九村；宋达民率三支队驻老鸱张村。民军第二路一回老巢，就与日寇频频来往。这些，全被我们的侦察员悄悄地看在眼里。

不久，一个侦察员回来了，兴冲冲地向我汇报了侦察经过。那天，他依照我的吩咐，化装成卖花生、香烟的小贩，在彭庄街上摆起了小摊，正巧遇见一个早年相识的人。那人很神气，说他现在当了民军第二路特务营营长张国智的护兵。侦察员就请他进酒店喝酒，从他口里了解到许多内情，把张国基写“求援信”的来龙去脉也搞清楚了。

原来，张国基一面向我们蚕食、挑衅，一面又害怕我军报复。当他接到我的抗议信，继而又听到我军发兵吴桥的风声时，就吓得六神无主，坐立不安。他找族弟张国智、张国英商量，可是他俩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张国基又找宋达民商量。宋达民到底阴险狡猾，眼珠一转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先把抓来的人放了，再以日军要袭击彭庄为理由，顺势请八路军进入吴桥助战、移驻彭庄；然后请东光等地日军前来围歼，我们配合日军，两头一夹攻，八路军不就完了？这条毒计当即博得张国智、张国英的高声叫好。张国基听了，也连称“妙计！”马上动手写了那封“求援信”。

紧接着，另一个侦察员也回来报告了日、张合谋的新动向。原来，民军第二路三支队有个大队长叫张相臣，去东光县给日寇送信，回来时绕道吴集安顿家属，被这个侦察员盯上了。张相臣对家里人说，张国基已和日本人谈妥了投降的条

件：一是不动他一兵一卒；二是由日本供给枪弹、粮秣；三是暗里勾结，明里不公开。张相臣还说，“过几天日本人就准备从天津调部队来，和我们一起消灭八路军。”

侦察员把这些情况一报告，我想：张国基这个恶霸果真投敌，如不割除这颗毒瘤，吴桥附近的抗日根据地将永远不得安宁。于是，我们立即作了战斗部署：命令各地县大队、区中队马上出动，破铁路，袭县城，务必牵制日寇，掩护主力作战；杨忠、龙书金率领鲁北支队向吴桥城北的老鸱张进军；我和陈德带八团一营进逼彭庄一带；杨承德和杜步舟带八团三营开往牟家庵附近；津南、运河支队包围许连九村。

黄昏后，我四路部队四千余人同时进发，于夜间十一点钟左右，分别将彭庄、牟家庵、老鸱张、许连九村团团围住。

谁知，杨忠、龙书金同志率领的鲁北支队包围老鸱张时，却扑了一个空。原来驻老鸱张的宋达民狡猾透顶，他一听到我军动静，就带着三支队的一个大队逃之夭夭，窜到连镇，躲进了日寇据点。三支队的另外两个大队，则转移到彭庄。杨、龙二同志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带领部队赶到彭庄以南，会同陈德同志率领的八团一营包围彭庄。

拂晓前，我各路部队正准备向彭庄、牟家庵和许连九村发起总攻。这时，却见曹振东的秘书长骑马驰来，说张国基发报向曹振东求救，曹振东派他前来调停。我严肃地对这个秘书长说：“请你回去转告曹司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张国基紧跟张荫梧，残杀抗日军民，如今又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样的民族败类，难道能够容忍吗？”说罢挥手让人把他送走。

凌晨六时许，各部队准时发起攻击，军号声、喊杀声、脚步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

我和陈德、杨忠、龙书金同志指挥八团一营及鲁北支队，

很快地扫除了彭庄外围几个小村的顽军，但一时却难以攻下张国基的巢穴彭庄。防守彭庄的顽军约有六个大队，而我们围攻彭庄的部队也只有五个营，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所以战斗非常激烈。

津南支队和运河支队经过一阵激战，攻进了许连九村。但顽军退到村中心，躲进一座三层的砖楼里，负隅顽抗。双方形成了胶着状态。

围攻牟家庵的八团三营，在杨承德和杜步舟同志的率领下，当夜扫除了外围顽军。担任主攻的两个连队，因上次预先挖了三个墙洞，轻而易举地攻进了村中。但张国英的一支队约有千把人，并配有迫击炮两门，战斗力较强。我们的部队一冲进村中，双方就展开激烈的战斗，逐院逐屋地争夺，有时一座院子要反复抢占几次。副营长张真化、教导员杨爱华、总支书记文保元等干部带领部队，勇猛地冲杀在前。

下午一点钟左右，杨承德、杜步舟同志撤去牟家庵西面的部队，集中火力，加强其他三面的攻势，迫使顽军从西门进入道沟向许连九村逃跑。同时派人与运河、津南支队联系，请他们抽出一支部队埋伏在许连九村和牟家庵之间的道沟里。

张国英见东、南、北三面我军的攻势很猛，他的一支队渐渐招架不住，就下令冲出西门，沿着道沟向许连九村方向突围，企图和许连九村的顽军会合。一支队听到撤走的命令，争先恐后地涌入道沟，向西狂奔。我们的部队尾追上去，打得他们喊爹哭娘，叫苦连天。这批顽军眼见得接近许连九村了，不料我们的一支部队早已埋伏在这里，一挺重机枪怒吼起来，子弹刮风般地扫射过去。顽军拥挤在这条长约五华里的道沟里，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纷纷被击毙。

牟家庵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不久，津南支队、运河支队也攻下了许连九村的三层砖楼，全歼顽军一个大队。部队抓紧时间喝水、吃饭，准备继续战斗。

这时候，彭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八团一营主攻东面，鲁北支队主攻南面。但由于彭庄工事坚固，沟深墙高，张国基带着手下八百多人躲在里面顽抗，而我们只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火力不强，所以久攻不下。

牟家庵、许连九村战斗结束后，我派人告诉杨承德同志，叫他带队前来助战。杨承德立即带着十一连和一个重机枪排、两个轻机枪班赶来彭庄。十一连是个战斗力很强的连队，能攻善战；连长刘虎臣是一员虎将，能打能冲。

我将增援部队拨给围攻彭庄的一营，并派人告诉一营长杨柳新：“务必在天黑前拿下彭庄！”杨营长接到命令后，亲自带着部队，在一个重机枪排和两个轻机枪班的火力掩护下，发起猛烈冲锋。指战员们冒着弹雨，排除了村外的鹿砦、蒺藜、铁丝网，越过村壕，翻过寨墙，冲进村子。后续部队也潮水般涌进来。顽军见大势已去，犹如惊弓之鸟，四处逃窜。敌工干事朱辉成遇见一股顽军逃过来，他用手枪指着喝道：“哪里走？缴枪不杀！”三十多个顽军纷纷丢下枪支，举手投降。

大批大批的俘虏被押了出来，四处的枪声渐渐地停了，战斗眼看着就要结束，可是张国基还没有下落。战士们在张国基的司令部里搜查了一阵，发现后面有座院子，院门紧闭，就搭起人梯翻墙进去。原来张国基和他的参谋长、张国智正缩成一团躲在里面，索索发抖。

有个战士见其中一人四十岁上下，长方脸，蓄着小胡子，就上前将他劈胸拎了起来，问道：“你就是张国基吗？”

张国基吓得瘫在地上，哆嗦着说：“我、我……知罪，

知、知罪……”

战斗胜利结束了。活捉张国基等一千多人，毙伤张国英以下八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数十挺，长短枪两千多支，弹药无数，以及电台一部、一箱军用地图和机要文件。张荫梧指使张国基向我军挑衅、进攻的手令，也被我们查获了。张国基的电台上，还残留着他向张荫梧和日寇求援的电文：“……八路进犯彭庄，我决率七千健儿抵抗，然而，八路凶悍异常，兄弟各处吃紧，势在危急，务请……”可惜张荫梧泥菩萨过河，自身都保不住，哪里还能来救他这位可怜的部下呢？日寇倒是赶来救他们这位“盟友”了，可是晚了，结束战斗的第二天他们才得脱身赶到彭庄，我们早已捉住张国基远走高飞了。

我们部队是在拂晓前转移的：鲁北支队向吴桥南部，继而向德州东部地区转移；运河支队回到东光一带；八团三营回到商河一带；津南支队移驻邸桥镇一带；延安支队转向龙王寺、孔家桥一带；我带司政机关移驻东光吴家集。

几天后，我们即将罪恶累累的恶霸张国基处决了。一千多俘虏在教育后大部分愿意参加抗日，被分入各个部队中；其余的则发给他们路费，让他们回家。可惜没有捉住宋达民这个老狐狸。

这次消灭吴桥张国基的战斗，斩断了“磨擦专家”张荫梧伸向冀鲁边区的一只反共黑爪，并牵制、调动了津浦路沿线的日寇，有力地配合了华北的“百团大战”。

不久，我们回到宁乐边，在宁家寨召开了隆重的祝捷大会。我和陈德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演出了京剧《三打祝家庄》。宣传干事郑正还表演了一场魔术，什么“火烧钞票”、“仙人栽豆”、“鸡蛋变鸡”、“九连环”等等，使人眼花缭乱，目

不暇接。全场掌声雷动，一次又一次地要他再演下去。此情此景，反映了广大抗日军民在消灭张国基之后，个个扬眉吐气。

第十二章 斩断“铁腿”

我回到乐陵，住在城南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天中午，我感到很疲劳，就在炕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谁知刚合上眼睛，警卫员小周拿着厚厚的一封信走了进来。他见我躺下了，忙说：“这是济阳县大队的同志送来的，你先歇会儿，起来再看吧。”

我一眼瞥见信封上那遒劲的字迹，就知道是济阳县县大队副朱宝承同志写来的。他早先是东北讲武堂的学生，后来参加了八路军，被派往济阳。我估计有什么急事，便赶紧爬起来，拆开了信。朱宝承在信中说：在反共顽固派向我军挑衅和进攻的一片喧嚣声中，顽军鲁北保安第七旅也在济阳大打出手了，捕捉、残害我军侦察员和地方工作人员，袭击我小股武装，包围我县、区抗日政府，蓄意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腥惨案。前不久，他们又抓走了我济阳县抗日政府的几个干部。顽七旅旅长赵芙亭，亲自带着兵弁，把这几个抗日干部活埋了，就埋在他所住的村子老赵家的东头。他公开对部下说：“杀一个日本人只能算半个英雄，杀一个共产党就能算一个英雄！”怂恿部下向我们猖狂挑衅。朱宝承曾邀请一些开明绅士去做他的工作，要求他放弃反共立场，共同抗战。但赵芙亭毫不理睬，还破口大骂：“你们这批混蛋，胆敢为共产党说情，来动我的脑筋，

下次老子再听到你们说共产党半个好字，定叫你们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朱宝承在信的最后说：“政委！这家伙铁心反共，倘若不除此人，我们丧在他手里的同志就会越来越多，而且济阳和整个鲁北的工作都无法开展……”

我看完信，脑子里老转着这几个字：“赵芙亭”！顿时，一个五大三粗、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浮现在眼前：赵芙亭，原名赵而蓉，济阳人，祖上几辈都是大地主，曾被义和团和我地下党发动的群众几次抄过家。他自己曾就学于上海体育专科学校，因擅长跑，被他的喽罗们吹嘘为“铁腿”。后来当过国民党济阳县政府的科长。“七七”事变后，他跑到老赵家一带拉起一支武装，被刘景良封为鲁北保安第七旅旅长，他的三弟赵而冉、四弟赵而易都当了团长。

符竹庭同志在边区时，出于团结抗战的愿望，派人向他做过工作。但这家伙毫不理睬，气焰嚣张地说：“我赵芙亭身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势不两立！蒋委员长为了抗日才肯容纳共产党，我可决不通共！”符竹庭同志临行前向我交代工作时曾经说过：“边区的这些顽军头子，大部分骨子里都是反共的，而且有些人是铁心反共派……济阳的赵芙亭就是一个！”

想到这里，我翻身下炕，起草了一份给二分区曾旭清同志的电报。当时他在齐河县。我在电报里通知他：立刻带领部队赶赴济阳，根据“先礼而后兵”的原则，再次警告赵芙亭就此罢手，放下屠刀；如果赵芙亭继续进行反共挑衅，就彻底消灭他！

曾旭清同志接到电报后，带着两个营和齐河县大队进入济阳境内，和济阳县大队会合。他听了县大队副朱宝承的汇报，决定先派人送一封警告信给赵芙亭，令其停止挑衅。

不料警告信送出不几天，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齐河县大队的三名便衣侦察员，路经济阳城西南的孙耿时，被赵芙亭的

部下抓走了。赵芙亭要将他们砍头“示众”！

这真是火上浇油！消息传来，曾旭清同志非常气愤，决定立即出兵攻打赵芙亭。正在这时候，齐河县抗日县长兼大队长李聚五同志，从晏城赶到了济阳县。他对曾旭清说，过去他和赵芙亭是同学又是同僚（李聚五曾任国民党齐河县政府科长），他想凭着这层关系，只身去见赵芙亭，说服赵芙亭把人放回来。曾旭清迟疑了一阵，最后还是按下怒火，同意了李聚五的要求，决定对赵芙亭进行最后一次教育。

不久，李聚五同志来到赵芙亭的驻地。谁知赵芙亭一见李聚五就讥讽地说：“李老兄，听说你当了共产党的县长啦！怎么样，是来要人的吧？”

李聚五正色道：“赵兄！这三名战士被你的人无端绑架，这恐怕有负于团结抗战的宗旨吧！”

“这，这……”赵芙亭一摸下巴，狡诈地说道，“他们如果为了抗日，当然不该抓；但这三人借机勒索民财，强奸民女，难道也不该抓？难道也称得上无理绑架？”

“无耻！”李聚五火从心头起，拍桌而起，“真是无耻之尤！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谁不知道？想不到你赵兄也会信口雌黄，捏造莫须有的罪名了！”

赵芙亭蛮横地回答：“实话告诉你吧，你们的信我收到了，可是我赵芙亭不吃这一套！蒋委员长有令，攘外必先安内，铲共第一！这三个八路休想活着回去。不看你老同学的面子，你李兄也走不了。你既然不愿看他们人头落地，现在就请便吧！”接着扯起嗓子喊道：“来人哪！送客——”把李聚五连推带拉地赶了出去。

李聚五怒气冲冲地回到部队，把这些经过情况向曾旭清同志作了汇报。曾旭清说：“狼总是要吃人的，这叫恶性难改。

我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现在是迫不得已，只有出兵。”当晚便集中两个营和齐河、济阳两个县大队，星夜进击，突然包围孙耿附近后张家一带的顽七旅驻地。

赵芙亭在李聚五走后，马上派刽子手杀害了我们的三个同志，把头挂在后张家的寨门上，并放鞭炮，大摆酒席，庆贺“胜利”。这时刻，酒席上已经杯盘狼藉，大吵大闹了一夜的匪徒们，一个个东倒西歪地睡着了，有的鼾声如雷，有的还在睡梦中哼着淫荡小调……

曾旭清同志见部队分头包围完毕，下令吹号出击。只听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响起，随着发出一片海啸般的喊杀声，部队从四面八方涌入村中。

赵芙亭的部队等到酒醒后拿枪抵抗，才发觉村子的围寨院墙、大街小巷几乎都被我军控制了，四面都是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顽军知道抵抗无用，纷纷把枪支从院子里扔出来，举手投降。惟有赵芙亭带着他的卫队五十多人，挥舞匣枪，拚死顽抗。这批亡命之徒，边打边走，企图从村西突围出去。

我们的三营正守在村西。战士们见一大群拿短枪的顽军蓦地从横巷里冲出来，想开枪阻击已经来不及了，就一个个奋勇地迎上前去。

卫队中当头的一个家伙，块头很大，手握双枪，野兽般冲过来，打伤了我们好几个战士。但是没等这家伙窜出巷口，从斜刺里冲出一个胖乎乎的战士，猛扑上前，双手把大块头的两支匣枪机头抓住，并弯腰低头将他狠命地抵在墙上。这家伙打也不能打，逃也不能逃，急得拚命用膝盖去撞对方裤裆，可是这个战士机灵地侧过身来，两人就这样死死地顶着，把这狭小的胡同也堵住了。后边的卫队慌忙丢下同伙，掉头逃走。我们

的部队也涌上来，向溃逃的卫队追去，同时留下几个战士帮助解决大块头卫兵。

这大块头卫兵被捆绑起来了，但他仍然死命挣扎，乱踢乱打。一个战士指指边上的一个小胖子战士，点着大块头的鼻子说：“你看看给谁逮住了！这么大一个块头，还不如咱们的小八子！还起劲个啥？留这劲儿撒尿去吧！”大块头瞟了小八子一眼，羞得低下了头。大块头被带走了，大家亲热地看着小八子，称赞他立了一功。小八子是营部的侦察员。他被大家看得脸红起来，扭头就跑：“敌人还没有消灭光，快追吧！”话音中还带着点孩子气。大家也跟着他向前冲去。

赵芙亭的卫队退回去，见村子中心已被我军占领，四面都是“缴枪不杀！”“八路军宽待俘虏！”的呐喊声，只得又回头向村口冲来。

尾追上来的三营战士一齐闪开射击，几十名卫兵纷纷被击毙在胡同里，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战士们立刻搜寻赵芙亭，尸体堆里，俘虏群里，都查过了，结果连他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曾旭清同志听到这消息，气冲冲地命令部队：“再搜一遍，决不能让这个杀人魔王跑了！”但是大伙搜遍了各个院落，翻遍了所有可以存身的秫秸堆，仍然没有找到。这狡猾的狐狸哪儿去了呢？

原来，赵芙亭在指挥卫队向村西突围时，见大块头卫兵在巷口突然被人扭住，一时难以脱身，就命令卫队返回村中。他自己则偷偷地避开众人，跳进小巷旁边的一个院子里，躲进猪圈隐藏起来。等我们的部队向村中心合拢时，他就溜出村头，撒开“铁腿”跑了。

曾旭清同志见没有抓住赵芙亭，气恨恨地说：“难怪这家伙号称‘铁腿’，逃起来还真快。好啊，你小子等着吧，逃得

了三十，逃不过初一！”

这次战斗结果，我军俘获三百多人，毙伤一百多人，缴获武器五百多件，消灭了赵芙亭的大约半个旅。可惜跑掉了赵芙亭这个杀人魔王。

后张家一仗，使赵芙亭知道了八路军的厉害。这以后，赵芙亭带着残余人马，东躲西闪，不敢久驻一地。但是，这家伙反共本性不改，继续残害抗日军民，疯狂地进行报复。他亲手杀死了我们的几个抗日人员，并且扬言：“还要再屠几个八路，以雪后张家之耻！”

转眼间到了一九四〇年的三月。在济阳一带，三月初三的春会是十分热闹的。初三前后的四天之内，各集镇商贩云集，搭棚为市，农具、百货、布匹、牲口、木料、家具、各种土产、当地风味饮食，摆得遍街遍巷；春会上演出山东梆子戏，加上说书的，玩马戏、十锦杂耍的，拉“洋片”的……热闹非凡。所以每逢春会，各村各户往往倾家而出，扶老携幼，去赶热闹。

曾旭清同志估计赵芙亭的人马这几天肯定要出动，这正是找到他的藏身处，来一次彻底算账的机会。于是，曾旭清派出大批侦察员，化装成赶会的群众，分头到济阳各集镇，侦察赵芙亭的下落。果然不出所料，三月初三这天，赵芙亭的部下分头出动，三五成群地到各地春会上白吃白喝，巧取强夺。然后抱着讹诈、掠夺来的财物，陆续回到孙耿的大代子村。

我们的侦察员发现这一情况，赶紧回来报告曾旭清同志。曾旭清高兴地说：“这次看你赵芙亭往哪里跑！要叫你大小肥瘦一锅煮！”说罢，吩咐部队开饭后马上出发。

在深沉的夜色中，部队飞快地向大代子一带开进。大家想起赵芙亭杀人如麻，残害抗日军民的行径，心里燃起愤怒的

火。同志们大步流星地赶路，后来干脆小跑起来。

半夜时分，部队将大代子村紧紧包围起来。曾旭清同志指着夜色朦胧中的村子，向几个干部作了详细分工，命令他们一定要围紧围严，务必抓住赵芙亭，不使漏网。他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定要抓到他，讨还一笔笔血债！”几个干部听了都点点头。

嘀嘀哒哒的军号声响了，部队从四面发起冲锋。赵芙亭的喽罗们只会鱼肉群众，没有什么战斗力，一听见号声、枪声、呐喊声，一个个光背露腩，爬起来就跑，你撞我挤，乱糟糟的象锅烧开的水。有些人摸黑向村口冲去，一出院门就被密集的弹雨打得缩回了头。

我们的部队把各个院子包围起来，大喊：“缴枪不杀！”顽军们成群结队地举起枪，走出来投降。少数躲在院子里顽抗的也不经打，我们从四面一开火，扔了几个手榴弹，里面就象杀猪一样哀嚎起来，也有高声直喊投降的。不到一个钟头，顽七旅的残余人马就死的死，降的降，报销了一大半。赵芙亭的四弟赵而易，杀人越货，掏心挖肝，什么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坏事都干得出来，人称“赵四阎王”，也在顽抗中被我军击毙。

赵芙亭带着十几名卫兵，躲进村南一座楼房里负隅顽抗。我们的三连长和身旁几名战士嘀咕了几句，几个人抱来一堆秫秸，堆在楼房四周，然后从四面点起火来。霎时大火冲天，火舌呼呼地朝房里窜，浓烟弥漫了整座楼房。

赵芙亭身边的残兵们眼睛被熏得通红，睁也睁不开，纷纷大声地咳嗽着，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走出来投降。

这时候，在一片烟雾中，北院房屋里“呼”地窜出个人来，一枪打伤了我们的一个战士。他再一扣扳机，只听“咣”

的一声，哑火了。几个战士见他没有了子弹了，一齐端着刺刀围上前去。一个战士见他长着一脸大胡子，个子也很大，高兴地大喊起来：“赵芙亭！赵芙亭！抓活的呀！”

院外的三连长听见“赵芙亭”三个字，飞也似地冲进来，一边高声地喊：“在哪里？在哪里？抓住他，要活的！”

他冲进院里一看，只见赵芙亭两眼射着恶狼般的凶光，手拎匣枪带子，疯狂地乱挥乱舞。三连长怒火冲天，抓过一个战士的大枪说：“靠边去，我不戳他个大窟窿，谅他也不服气。”说罢大吼一声：“杀——”挺枪朝赵芙亭腿部刺去。赵芙亭往下一蹲，刺刀扎进了他的腹部，一时污血涌流，蜷曲在地。

曾旭清同志听说逮住了赵芙亭，三步并作两步地赶来，一见面就表扬了三连长和几个战士：“好样的，咱八路军说话算数，说他逃不走就逃不走！”然后，对赵芙亭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小子听着！谁要是专门同室操戈，残害抗日军民，就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谁也逃不脱人民的惩罚！即使你是‘铁腿’，我们也能斩断。”说罢把手一挥：“抬走！准备出发——”

部队处理了战利品和俘虏，向临邑县境内开拔。赵芙亭被捆在担架上，仍然拚命扭动身子挣扎。到达临邑齐家集时，这家伙终因惊惧交加，一命呜呼，结束了他残害人民、铁心反共的罪恶生涯。

第十三章 剥掉伪装

灭掉吴桥张国基，干掉济阳赵芙亭之后，我便带着两个连和警卫员小周，准备穿过宁津县去商河县检查工作。

走到宁津的柴胡店，正巧碰上县大队负责人郭盛云同志。他见了我很高兴，不等我开口，便滔滔不绝地汇报起前段时间的工作来。他告诉我，最近不知怎么搞的，县大队一到城西活动，鬼子就知道了，县大队遭到鬼子好几次袭击。

“这是怎么搞的？”我也觉得蹊跷。

“这准是城西一带的哪个村子藏着汉奸，在专门搜集我们的情报，向鬼子告密。”

“要迅速查清楚，把鬼子的耳目挖掉。我们是游击队，游击队不能隐蔽自己的行踪还行？”

“我已派侦察员小王到城西一带去了，这小家伙机灵，家又在城西，准定能把情况搞清楚。”

“去了几天啦？最近能不能回来？”我接着问。因为宁津县的工作基础比较好，我不打算久呆，想尽快到商河县去看看。

郭盛云大概看出了我的意思，急忙解释说：“已经去了整三天了，最近准能回来，最迟也不会超过明天。”

我想，既然这样，那就等小王回来，弄清谜底再走吧。

当天中午，我和郭盛云正在县大队队部吃饭，侦察员小王回来了。

他站在门口向郭盛云敬了个礼，因为不认识我，只向我笑了笑。这小家伙只有十八九岁，胖乎乎的，笑起来一副稚相，模样很甜。

“怎么样，有收获吗？”我拉了张凳子让他坐下。

“有，清楚啦，是王蒲圉村的小红门搞的鬼。”

“小红门搞的鬼？”我和郭盛云都睁大了眼睛。

小红门是一种封建道会门组织。当时冀鲁边区到处都有道会门组织，而且名目繁多：什么一贯道、皈一道、圣贤道、九宫道、无极道、中央道、黄门道、老爷道、一炷香道、一心天道、天元会道、无极老道、黄沙会、禁食会、万国道德会、天知门、小红门、混元门，等等。这些道会门用扶乩、设坛、看病、送祟、算命、跳火神、看阴阳、供奉五大仙（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老鼠）等鬼名堂，欺骗和敲诈百姓。如盐山县望树村北面的平家坊，有个人叫肖林彪，他到处妖言惑众说：“世人遭劫，在数难逃。然而东南方黄羊山的黄羊，系老祖显灵，普渡众生。善男信女，如能全家去黄羊山求法学道，可以躲过劫数，得道成仙。”有好几百人信以为真，上当受骗，都变卖家当上路，大车小驴，拖儿带女，相约到无棣县城戏楼前集合，同往黄羊山。结果黄羊山未到，半路上遭到肖林彪勾引的土匪的截径，财物全被劫去。

王蒲圉村我曾经去过，离县城只有十五里。这个村的小红门同其他道会门组织差不多，也是在村口摆设吕祖坛，吸引外乡人前来叩拜、参谒，借此骗几文香火钱。这个惯以骗取钱财为目的的封建道会门组织，怎么突然变成了反共的罪恶工具呢？

“你这消息可准？”我问小王。

“没有错，绝对没有错。”小王急了，他连连拍着胸口，

一口气将掌握的情况全部端出：

原来，王蒲圉的小红门首领王文同，前不久收留了一个大法师。王文同和村里人见大法师道貌岸然，满口忏语，以为他久经修炼，道行高深，却不知这大法师竟是沈鸿烈派来的特务。他打进小红门，是企图毒化和操纵这个组织，使之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这个大法师虽然把他的嘴脸捂得很紧，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原来他是吴桥县尚家集人，正巧侦察员小王的姑妈在他家当佣人，知道他在国民党里混事，还亲耳听他夸口说，这次是沈鸿烈派他回来的。

这个大法师到了王蒲圉之后，便怂恿王文同将小红门改名为大刀会，说大刀会是天庭在人间最神圣的代理机构。王文同听信了他的鬼话，在村口正式竖起一面大旗，上写六个大字：“北方坎大刀会”。

接着，大法师又替王文同在村内物色了一个叫王树恩的地痞，要他披头散发，装疯卖傻，担任大刀会的所谓“神”。随后又帮助王文同制定了一整套会规、章程，并搜罗道徒，聚敛钱财。不久，受骗加入大刀会的便达两千多人，敛集的资财更是无数。王文同和王树恩得意起来，对大法师越加敬重，言听计从。大法师说今日“开红场”，提拔道众，二王连连称是；大法师说今日改“开白场”，超度亡灵，二王丝毫不敢违拗。

大法师见自己已在王蒲圉的大刀会里树立起权威，便更加放手大干起来。他封王文同为掌盘的，是大刀会的坛主，附近各村则设甲乙盘、丙丁盘、戊己盘、庚辛盘、壬癸盘，并任命各分盘首领。规定分盘必须绝对听命于坛主的指挥。大法师还借口保卫大刀会组织，弄来枪支弹药，日夜训练道徒。至此，他已把大刀会变成了自己手中能够随意操纵的武装力量。

武装了大刀会，大法师又开始培养道徒们的“勇敢”精神。他弄来些朱砂，涂在黄表纸上，画成各式各样的符，叫道徒烧成灰、兑上水吞下去，说是吞了符水刀枪不入。正巧该村有个叫王村林的道徒，一次去赶集，途中遇到几个剪径的强人，他拔腿就逃，这时听到背后一声枪响，但自己并没有受伤。他以为是自己吞下的符水起了作用，其实是子弹打偏了。那大法师便充分利用王村林这件事，广为宣传，一时迷惑了不少人。道徒们纷纷吞服符水，吞下之后便胆壮气粗，不可一世起来，以为自己真的有了神祇的护佑。

大法师把道徒们教唆得狂妄起来之后，便开始离间老百姓同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煽动道徒仇恨共产党和八路军。他宣传说：“日本天皇是上界的金翅大鹏鸟下凡，而八路军则是上界的一群恶魔，恶魔犯了天规，被玉帝发落人间，要大鹏鸟前来收拾。倘若恶魔一旦杀光斩尽，大鹏鸟便可令其部下班师回国。中国也就太平无事了。”又说：“协天大帝已下令北方坎大刀会助大鹏鸟一臂之力，并已在冥冥中赐来大雄宝殿中的一柄透龙宝剑。”

不少受蒙蔽的道徒竟信以为真，将日寇侵略中国的罪恶归在我党我军身上，从而把反共当成他们的神圣天职。

大刀会首领王文同的住宅有座高高的门楼，门楼顶上因天长日久堆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尘土上又长出了密密的狗尾巴草。大法师和王文同便常常爬到门楼顶上，隐蔽在草丛中，居高临下，窥探附近我军的动向，尔后派人报告日寇，所以使我军吃了几次亏。而且，听说大刀会的人，前天还杀了我们的两个交通员。

我们听完侦察员小王的报告，都非常气愤。郭盛云同志忍不住骂了起来：“妈的，沈鸿烈真是无孔不入，他不但在军事

上政治上向我们进攻，还操纵道会门来搞我们。这老小子为反共，简直不择手段。”

“是啊，沈鸿烈也会发动群众，他这种发动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是利用了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迷信和无知。这个问题不能轻视，如果沈鸿烈把散布在各地的道会门都操纵起来，那就麻烦了。”

“那怎么办？”郭盛云睁大了眼睛。

我没有答腔。

郭盛云想了想说：“他们欺骗群众，我们就去教育群众。只要把大法师的真实嘴脸揭露出来，戳穿国民党特务的骗局，受骗的群众就会觉悟，大刀会就会瓦解。其他道会门也就不会轻易受他们指使。”

郭盛云是位老红军，经验丰富，他提出的这种处置方法比较稳妥。我便点点头说：“你就这样办，要快些。但我们必须记住，重点是消灭大法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大刀会的道徒则是以教育为主，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伤害他们。”

当天下午，我便离开宁津，到商河去了。

我走后，郭盛云同志便派县大队的一个小队长带五、六名队员，到王蒲囤去，准备揭穿大法师的嘴脸和阴谋，说服大刀会停止反共活动。

这天，县大队的几位同志到了王蒲囤的村前。村前有一条小河，几个妇女正在河边洗衣服。小队长便向她们打问道：

“大姐，王文同在村里吗？”

几个妇女回头打量了一下他们的装束，知道是八路，就瞪圆了眼睛，闭紧嘴唇半句话也不说，接着把辫尾使劲朝后一甩，端起木盆就走。

“乖乖，中了大法师的毒还不浅呢！”

“就是，恐怕我们这次来，不会有什么效果！”

几个队员嘀咕起来。

但小队长还是坚定地说：“走，去村里瞧瞧，能说进多少道理就说多少道理。我们尽量避免武装冲突，避免群众流血，用说理把受蒙蔽的道徒争取过来。”

这几个同志到了村口，只见刚才还是敞开的寨门，突然“咣当”一声关闭了。这村子防守非常严密，村壕足有一丈多深、五尺多宽，厚厚的寨墙全是用夹板夯实的，全村共有四座寨门，顶上都有雄伟的门楼，四角还有四座角楼。寨门外密布着蒺藜、鹿砦。

县大队的同志正看得出神，忽听一声鼓响，寨墙上站出一排人来，全都睁着圆鼓溜溜的双眼，居高临下，怒目而视。有的捧着大刀，有的端着大枪。他们的枪支杂七杂八，有什么老套筒、土压五、汉阳造、马来匣、捷克式。可见国民党顽固派虽然到处蛊惑人心，拼凑反共力量，但也不敢把好武器交给道众。

道徒中间簇拥着三个人：大法师、王文同、王树恩，大法师居中，王文同在左，王树恩在右。全都道袍、道冠打扮，还装出微闭双眼、面呈慈悲的模样。

小队长站在寨墙下面，双手捧成个喇叭高声说：“各位大师傅，请把寨门打开，我们有话要说。”

那大法师双手合十，喃喃地说：“道门乃圣洁之地，岂容逆障闯突，且修炼之人耳根清静，尔等休得胡言妄语，坏了吾辈道行。徒儿们，还不快些把魔鬼赶走。”

他的话音一落，排列在两旁的道徒，一齐举枪开火。县大队的几位同志没有料到这批家伙如此狠毒，因此没有防备，一

时又来不及躲避，全部中弹身亡，倒在血泊中。

道徒们狂欢鼓噪起来，一齐拥出寨门，捡回枪支，将尸体抛入河中。

郭盛云同志听到这消息，怒不可遏，立即调集了整个县大队两百多人，由他亲自带领，直奔王蒲囤而来。

王蒲囤的道徒们杀死我们几位同志之后，越发猖獗起来，而且仗着有神符护身，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根本不在乎我军将会还击。

然而那大法师知道自己所制造的神符是什么货色，从骨子里害怕八路军会举兵前来惩罚。他明知自己的乌合之众不是八路军的对手，但他又不肯放弃这支已经到手的武装，于是假借协天大帝的旨意，连夜到宁津县城搬来了伪军。伪军连夜在王蒲囤加固了村寨，增设了岗楼，将王蒲囤变成了一个伪军据点。

郭盛云同志带着县大队，一到王蒲囤便将村子包围起来。同时还派出一些工作组分头去王蒲囤邻近各村，劝告大刀会各分盘的道徒不要助纣为虐，不能策应和支援王蒲囤。各分盘首领经我耐心解释和揭穿大法师的特务身份之后，都幡然醒悟，表示愿意悔改前非。有些平素受过大法师和王蒲囤二王盘剥、欺诈的道徒，还找来狗血、脏布，交给我军，说是可以破掉大法师的法术和神符。

争取了王蒲囤的外围群众，县大队便开始对大刀会展开政治攻势。郭盛云同志向守在寨墙上的道徒高声解释道：“乡亲们！大法师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是化装前来造谣惑众、蒙蔽大伙、从事反共活动的。大家如果不信，我们可以暂缓攻村，撤兵于村外一箭之地，让大家选派正直可信的人到吴桥尚家集去打听大法师的真实身份。”

大法师躲在墙头后面，急得脸色煞白，他声嘶力竭地叫嚷：“徒儿们，别听八路的妖言惑众。他们想把我们骗出村去杀掉，谁有胆量敢到尚家集去，我就把谁放出村去。徒儿们，把性命送给魔鬼，还不如在自家门前的树上吊死，吊死还算家鬼，假如被八路杀掉成了野鬼，那就永世不能投胎，永世不能重返人间。”

“乡亲们，别听这混蛋的造谣，快些把这个摇唇鼓舌的家伙绑起来，免得全村遭难。”我军继续进行政治攻势。

但王蒲圉的道徒们中毒太深，而且仗着神符护佑，不但不听我军的解释，反而辟辟叭叭开起枪来。

按我军当时的愤怒情绪，大家本想一举攻进村去，但唯恐如此一来难免玉石俱焚，伤了无辜群众。只得退出几十米远，一枪不发地困住王蒲圉，切断村内水源，等待村内不攻自乱。

过了两天，村里断了水，道徒们开始恐慌起来。有几个人半夜里吞下神符，偷偷摸出寨门弄水，被我们的战士一枪一个撂倒在河沟旁边。第二天，道徒们看到同伙们的尸体，开始怀疑起符的神力，心内越发惊慌。

趁着村内大刀会人人自危、无心防守的精神状态，我军发动了凌厉的攻势。战士们虽然枪口朝天，尽量避免伤害无辜群众，但还是把这批乌合之众吓得奔走逃命。

我军很快从王蒲圉的东、西、南三门，杀进村去，消灭了协助守村的伪军，击毙了大法师、王文同和王树恩。我军从大法师身上搜出了他的特务证件和《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书》。《反共计划书》第二章“实施办法”中写道：

“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分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不觉中从事为吾人效死。……”

“一、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各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帮会中之前人、老头、老大，教民中之司铎、牧师、长老等，在表面要完全适合身份，不带半点色彩，诡称为该团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

……

“一、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

“一、在进行操纵运用之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之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恨，而必须归吾人之怀抱掌握。……”

郭盛云同志当即将这份《反共计划书》昭示众人，撕下了大法师的画皮，使他现出原形。道徒们醒悟过来，立即解散了大刀会组织，把会旗放火烧了。

我军攻破王蒲围大刀会，使国民党利用迷信团体从事反共活动的阴谋大白于天下，从而教育了误入道会门的群众，瓦解了附近百里方圆之内的各类道会门。

第十四章 出奇制胜

一九四〇年七月，我带着随行人员，秘密地来到了商河县。

一天上午九点多钟，我和警卫员周德保走到一个村的村口，只见几个被太阳晒得皮肤乌油油的半大孩子，一边拾

粪，一边哼着歌谣，歌声七音不全，吐字不清。我侧耳听了好一会，费了很大劲，才揣摸出歌词是这样几句：

“督察总队太猖狂，掳去良民及牛羊，鼎镬刀俎谁忍得，赎来倒篋又倾箱。”

这是什么意思？我感到纳闷，心想弄个明白，便停下脚步打听：“小兄弟，你们唱些啥呀？”

拾粪的孩子听到喊声，都直起腰，仰起小脑袋，远远地打量着我，眼睛扑闪扑闪的，满脸狐疑的神色。突然，这些小家伙互相看了看，一溜烟逃了。

“唉，难怪这些孩子，碰上这种混乱的年头，谁不是悬着心过日子。”我一边想，一边进了村。

村头有颗苍老的槐树，茂密的枝叶伸在空中，象柄张开的巨伞。浓荫下有两位老人，一个留着白胡，一个没了牙齿，都坐在露出地面的树根上乘凉。我和警卫员小周走过去，笑着向他们打了招呼，便在他们对面坐下。

“老大爷，庄稼地里的活计忙吧？”我问。

“忙什么，忙个屁！忙出了庄稼，不招来鬼子，也惹得国民党眼红。”白胡子老人说到这里，赶紧捺住怒气，转脸问我：“你们两位是干啥的？”

我笑着回答：“别害怕，老大爷，我们是八路军。”

“八路军！”两位老人惊喜地瞧着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才喃喃地说：“象，象八路军！”说着便紧紧抓住我和小周的手。

白胡子老人抓着我的手说：“同志，前些年，俺们这里到处有你们的人，那时日子太平。可这年把，你们的人都上哪里去啦？”

“可不是吗！”那位满嘴都掉了牙的老人接着说，“你们

大部队一走，老百姓遭殃啦，鬼子常来不说，国民党也跟着杀人放火，抢掠东西。”

两位老人盼望八路军的急切心情，使我很感动。我握着老人颤颤发抖的手，安慰他们：“老大爷，我们八路军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回来。”

“回来后可要跟那些乌龟王八算账，这一阵，老百姓被他们害苦啦！”那没有牙齿的老人，情绪激动，眼眶里泛出了泪花。

白胡老汉从腰带里拔出旱烟袋，愤愤地说：“要说算账，第一本先算张德功。”

“张德功是谁？”小周问道。

白胡老汉往烟锅里填了几撮烟丝，便开始向我们介绍张德功的罪恶历史。

张德功本是乐陵县第三堡一带的地痞无赖，常聚集一伙强盗，做些绑票、抢劫、诈骗的勾当。抗战初期的一天，他见村口来了六个被日军击溃的散兵，手里都拿着大枪，心里就生出一条诡计。他召集同伙悄声布置了一番，然后和颜悦色地把六个散兵迎进村，捧出六百块银元，表示愿意收买大枪，这些散兵见了白花花的银元，满口答应。做成了这笔交易之后，六个散兵欢天喜地走了，哪晓得出村才七八里路，在一堆荒坟前遭到了几个土匪的袭击，全部毙命，六百块银元全部归了土匪。原来这些土匪是张德功派来的。张德功在得到六支步枪以后，便立刻命喽罗持枪抄小路赶到坟堆埋伏，用散兵的枪打死了散兵，收回了本钱。就这样，张德功很快便武装了他的部下，拉起了一支不小的队伍。后来，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初，刘景良到商河，发现张德功和自己一样，也是块瘟神的料子，况且他手下还有一帮乌龟王八蛋，就封他为鲁北保安司令的督察

总队长。这小子当上了狗屁总队长，更加无法无天，做尽坏事。

白胡老汉说到这里，气愤得胡子颤颤发抖。他将烟锅使劲在鞋底上敲了敲，接着说：“不知怎么搞的，这一阵子，张德功这小子成天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

“这准是欺咱主力转移后力量单薄，他的胆子才大起来，才敢在我们的根据地胡作非为。”小周气呼呼地插了一句。

小周说的虽然有些道理，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近来张德功的反共活动突然变得猖獗，是因为他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他的反共活动，有着鲜明的政治背景，不能等闲视之。

我刚把这想法说出来，那位没有牙齿的老人便一拍大腿，接上来说：“对，是这个理。我就亲耳听到过张德功挥舞着手枪大嚷大叫：‘不能跟共产党搞他妈的什么合作，对付共产党只有动刀子，这是上头蒋委员长的命令！’……”

“看来张德功已经死心塌地充当了蒋介石的反共打手。那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坏事？”我问两位老人。

“坏事可多啦！”白胡老汉将刚插进围腰里的烟斗又抽出来，在空中狠狠地点着说，“谁同共产党沾亲带故，谁说共产党好，或者替共产党送个条子，张德功要是知道了，马上带着人来，一根麻绳，捆了就走。别说共产党、八路军的家属不敢呆在村里，就连一般平民百姓也整日提心吊胆，料不定哪一天被张德功戴顶‘通共’的帽子抓去。那家伙绑走了票，便丢下话，限定时间、票额，叫人去赎，凑不齐钱或过了限期，就被他撕了票。就说大前天吧，东村有个姑娘，给督察总队五花大绑捆走了。张德功说她是共产党县政府的抗属，要她家拿一百块大洋去赎。乡亲们心想救人要紧，按捺下怒火，硬是变卖家当

凑足了一百元。等到把钱如期送到的时候，人已经死了。可怜这好端端的姑娘死得真惨。张德功和他的几个龟孙子，将姑娘架到野外，糟蹋够了，然后扔到河里活活淹死。末了又把尸体捞上来吊在树上，还在前胸后背写上字：‘谁当共产党，谁就这副好下场’。”

“这个畜牲！”没有牙齿的老人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光俺们这一带，被他绑走的就有上千，没有钱赎就被杀了头的，也足有四五百。闹得我们这一带，老老少少人心惶惶，许多人家人财两空。”

“所以这位老哥恨不过，就编了首歌谣，叫孩子们四处去唱。”白胡老汉说着，拍了拍没有牙齿的老人的肩膀。

我听到这话，想起在村口听到的歌谣，原来就是指的张德功。这家伙真毒，他用绑票的手段来搜刮民财，来威吓群众别向我党我军靠拢，以割断我党我军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他比在军事上向我们进攻的其他国民党顽固派更为险恶，企图将我党我军赖以生存的基础给扒掉。这家伙非收拾掉不可。于是我对两位老人表示：“老大爷，请放心，你们的嘱咐，我全都记住了。张德功猖狂反共反人民，欠下了乡亲们的血债，我们饶不了他！”

两位老人听到这话，激动地紧攥着我的手，眼神里充满了喜悦和兴奋，他们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又扯了一阵之后，我和小周便告辞两位老人，出了村子。

第二天，我找到商河抗日县政府的同志，对这个地区当前的斗争形势作了一些了解，又对反顽斗争、发展武装等问题作了一番具体部署。当晚，我便带着随行人员离开商河，连夜赶往无棣，准备去通知正在无棣活动的原六支队八团团团长杨承德和营长杜步舟，要他们火速带部队赶赴商河，消灭张德功。

在无棣南部的一个村子里，我找到了杨承德、杜步舟同志。他俩见到我，忙着问这问那。我无暇细说别的，先将张德功在商河的反共暴行说了一遍。

杨、杜二同志听到这事，气得直咬牙，还没等我说完，便拍着胸脯请求：“政委，把张德功收拾掉，这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好！”我笑着说，“你俩还真有先见之明。你们即使不抢挑这副担子，我也会把这副担子往你们肩上搁。”

听到这话，杜营长咧开嘴直笑，杨团长也高兴得直搓双手。

“不过，”我接着说，“你们要抓紧动身，越快越好，不能让张德功继续胡作非为。而且仗还要打得干净利索，不可留下后患。”

“政委，你放心，一定误不了事情。”他俩拍着胸脯保证。

七月中旬，杨承德、杜步舟同志率领三营的四个连，连夜赶到了商河。

可是到了商河的常庄一带，得知张德功前两天刚在这里掳掠了大批人质，他大概听到八路军主力已经开进商河的消息，慌慌张张地逃走了。不知他现在躲在什么地方。

“他妈的，真是只狡猾的老狐狸。”“可不是，臊味闻到了，影子却不见了。”战士们都焦急起来。

杨承德等几位领导同志，心情也不轻松，但他们都不把情绪流露在脸上。杨承德笑着问杜步舟：“杜营长，你看怎么办？”

杜营长搔了搔后脑勺说：“姓张的会躲，我们就有办法叫他乖乖地出来。”

“有什么办法，爽快点，别卖关子。”杨承德把脸凑到杜步舟面前。

杜步舟眨眨眼睛回答：“张德功抓走了人质，准定还会回来索款。眼下只是因为我们的部队开到了这里，他听到风声后发慌了，所以才暂时逃走。如果我们……”

“好！好计策！”杨承德明白了。

于是杨承德率领部队离开常庄，径直向北，向乐陵、阳信佯动，沿途大张旗鼓，装出撤离商河县境的态势。翌日黄昏，部队又偃旗息鼓，以每小时十五里的急行军速度，悄悄返回商河城东的崔、翟两庄。刚进得村来，就听到群众交头接耳地传说：“张德功又到商河来了。”“就是，听说住在常庄一带。”

“哎，有多少人家能交得出钱？最后还不是活活被他们撕了票。”

为了获得确切的消息，杨承德和杜步舟便到崔庄的一家油坊里去打听。开油坊的是崔孚瑞大伯和他的儿子崔五哥，都是我党信得过的基本群众。时间虽然已是半夜十二点左右，但油坊里还亮着灯。

杨承德和杜步舟带着通讯员，刚走进油坊，迎面正碰到崔孚瑞大伯。崔大伯神色略显慌张地抓住杨、杜二位的手说：“同志，我知道你们会回来，但不知你们带多少人马。张德功那家伙有千把人呢！……”

这时崔五哥也走了进来，他打断爸爸的话：“你先别问八路军来了多少人马。张德功没有什么可怕，他是刚从惠民城东南的魏、胡二集镇一带赶来，正累得慌。虽说他人多武器好，有炮有马，但都是土匪，光会抢抢老百姓，没有多少战斗力。再说他们这次回来，准是探听到你们昨天向北边去了，估计一时不会回来，更不会料到现在八路军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所以思

想上是麻痹的。”

“说得对，有眼力的小伙子！”杨承德和杜步舟拍拍崔五哥的肩膀称赞道。

崔五哥有点腼腆，脸上泛起了红晕。他想了一会说：“依我看，要打就趁现在天还没亮，神不知鬼不觉地打他个措手不及，把那些混小子掐死在被窝里。”

听到这话，杨承德和杜步舟不由得相视一笑，都满意地点点头。接着他俩又向崔家父子详细地询问了张德功的兵力、布防等情况，然后道了谢，告辞出来。

杨承德和杜步舟回到营部，立即派人通知各连干部前来参加战前会议。会上，大家根据张德功部队分别驻在常、刘、苏、颜四联庄的情况，议定兵分四路，对四联庄逐一包围。具体分工是：副营长张真化带一个连主攻常庄；教导员杨爱华带一个连主攻苏家庄；营长杜步舟带九连的两个排主攻刘家庄；组织干事文保元带一个连主攻颜家庄，兼防从惠民城出来的日寇援兵；杨承德和团特派员张希武则从杜步舟所带的九连中抽出一个排，组成指挥机关，设在常、刘两庄之间的村外洼地里。与会者考虑到敌众我寡，还建议这一仗必须打得快，打得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胜。

计议停当，全营提前开饭，饱餐一顿。随后便在夜幕的掩护下，披着满天星斗，悄悄占领了常、刘、苏、颜四联庄外围，分别将四个村庄包围起来。这时已临近拂晓。

但四联庄寨门紧闭，门外都布了暗哨和双岗，使我军不能秘密接近寨门，更不能秘密摸进村内。杨承德、张希武和四路指挥都暗暗着急。

没过多大一会，晓星出来了，四庄八村的雄鸡也啼叫起来，东方天际出现了黎明前的黑暗。天快要亮了，怎么办

呢？

正在这时，常、刘、苏、颜四联庄内都响起尖利的哨子声，不久又隐隐传出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四庄寨门大开。睡眼惺忪的张部士兵从各家各户拥出来，汇集到四个寨门口，又象四股浊浪似地奔出村外。他们一个个披衣敞怀，歪戴帽子，倒拖鞋跟，斜挎着大枪。其萎靡不振的样子，活象一群群逃荒的难民。

杨承德等同志开始以为张部开拔转移或外出抢掠，倒是暗暗吃了一惊，但很快便明白这是惯称训练有素的张部在准备早操。于是又高兴起来，因为这是个再好没有的机会了。

潜伏在村外庄稼地里的我军指战员，在尺把高的青纱帐掩护下，全都睁大眼睛，紧握武器，准备随时听令出击。

四联庄村外均有一块较大的场地，本是庄稼人碾麦子、晒高粱、剥玉米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张部的操场。张部四路士兵以乱糟糟的队形，径直奔到各个操场，然后纷纷把大枪、小炮架到场边上。张德功的骑兵队也占据了操场一隅，把马匹拴在场边的白杨树上，忙着打水饮马和扫刷马的腹背，鞍子和马镫都卸在一边。

机会到了，杨承德同志拔出手枪朝天“砰砰”打了两枪。

顿时，潜伏在四联庄外的我军指战员，一跃而起，猛虎下山般扑向四个操场，扑向静静地架在场边的枪支。而我军架在庄稼地的机枪，则将密集的弹雨，倾泻到一时呆立在各个操场中央的顽军。

猝不及防的顽军纷纷倒下，霎时间死伤大半，剩下的企图取枪抵挡，但枪支已到了我军手里。这些赤手空拳的家伙，失去了赖以逞凶的武器，也就失去了平日气势汹汹的威风，有的举手投降，有的跪下求饶，有几个侥幸窜出包围圈、落荒而逃

的，也被子弹追上，倒在地上象死狗一样。

歼灭了四个操场上的顽军，我军指战员立刻返身攻进常、刘、苏、颜四联庄。张德功当场被击毙。他的残余人马除少数被打死外，全都作了我军的俘虏。

然而，正当我军清点俘虏、清扫战场的时候，从四联庄附近的李家村里，突然窜出一支几十人的队伍，使的全是一色匣枪，簇拥着几个骑马的家伙，朝四联庄张望了一下，便仓皇地向北逃奔。

我军事先不知道李家村驻有顽军，所以没有防备，一时也来不及将李家村围住。杨承德同志估计逃奔的顽军不是一般角色，便带着指挥所一个排的兵力，从斜刺里穿插过去，紧紧追击。追了一程，虽然没有赶上，但撂倒了几个家伙。其中有个胖胖的，翻身落马之后，又被众人拥上马背逃走了。

杨承德同志命令部队停止追击，收容带伤的俘虏。这时才从一个名叫吴宝华的俘虏——刘景良的保健医生口中得知：刚才逃跑的是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和他的手枪卫队；那翻身落马又被人救起的，正是刘景良，他的腿部和左臂中弹，两处都被打穿。

刘景良没有被逮住，但这一仗全歼了张德功部。我以六百人的兵力，毙、伤、俘张部近千人，缴获长短枪八百余支，战马一百多匹，自行车四十多辆。狠狠痛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他们的反共气焰。

后来，我军利用缴获的这批枪支，为商河县大队补充了两个连；同时为三营补建了一个特务连，三营由原来的六百多人扩大到九百多人。缴获的马匹则上送边区，成立了边区骑兵连。

就这样，我们在主力转移、边区兵力减弱的情况下，以少

胜多，消灭了顽军张国基、赵芙亭、张德功等部，打垮了反动大刀会；还震慑了土顽张子良、曹振东、李光明等人，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曹振东还派人来同我们讲和。这一系列的胜利，积成了一个大胜，那就是：我们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严重威胁着边区根据地生存的反共浪潮。因此，边区根据地得到了稳定和巩固，我抗日武装力量也得到了较大发展，主力部队由原来的一千六百人扩大到四千五百多人。

第十五章 友邻支援

边区的元气基本上恢复，形势在逐步好转，这使人感到振奋和欣喜。但在乐观的背后，却隐伏着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边区缺少干部，各级领导班子很不健全，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为这事，我时常茶饭无心，彻夜难眠，老是琢磨着怎么办？

一天，我把军政委员会的几个领导同志邀到我的住处，共同商议。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心里也很焦急。

杨忠同志搓着手，在房间里急速地踱了两圈，说：“主力转移，走了不少干部，最近在反顽斗争中又牺牲了一些，党、政、军三家都缺干部。按说，干部是提起来的，缺多少就提多少，可是眼下我们却不能这样做……”

“对。”没等杨忠同志说完，陈德同志就接了上来，他锁着眉，一口广东腔。“因为现在的各级成员不全的领导班子

子，大都是主力转移后才配起来的，这些干部对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工作刚刚熟悉。如果我们再来一次大的调整，将区里的干部充实到县里，将县里的干部推上地区，地区的干部再往上调，势必打乱许多机关，使许多干部都得挪个窝，离开已经熟悉的工作，到陌生的岗位上去。这样一来，各级机关又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稳定。所以解决干部缺乏问题，还得另想办法。”

过了一会，李广文同志想了想说：“办法总会有的，实在不行，也可以向上级请求支援。”

“对！向上级请示，请兄弟地区支援。”同志们纷纷表示赞同。

我沉思了一阵，觉得也只好这么办了，便打算派人去冀南。因为冀鲁边区在建制上虽然属于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领导，但师部曾有指示：有事可同冀南区党委和冀南军区取得联系，他们离边区近。

我们几个人商议了一阵，决定派李启华、辛国治、张耀增三同志，分别代表边区根据地的地方党组织、军队和政府到冀南去。

一九四〇年九月的一天，他们三位同志踏上了西往冀南的路途。

李启华、辛国治和张耀增，都打扮成学生模样，头戴礼帽，身着长衫，脚穿圆口布鞋，长衫的大襟上别一支自来水笔。他们一行从乐陵一带出发，沿途有时夜行晓宿，有时日夜兼程，很快便穿过宁津县的柴胡店、大柳等村，到达冀鲁边区同冀南区交界处的连锁。

连锁横跨在津浦路上，是个较大的镇子，这里有个火车站，所以南来北往的人很多，相当热闹。日伪对连锁控制得非

常严密，把大街小巷都封锁起来，四处设立关卡，对来往行人进行严格盘查；还派出许多便衣特务，在车站、酒店、茶馆、旅馆等公共场所东张西望，象狗一样地嗅寻共产党、八路军的过往人员。

李启华、辛国治、张耀增三人，持着地下党给他们办的“良民证”，以度过暑假回校的学生这一身份，巧妙地穿过了敌人的几道关卡。

中午时分，他们走到了连镇中心的一条街上。此时烈日当空，晒得地皮发烫。他们觉得闷热难当，喉咙里渴得象要冒烟似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便走进一家大车店，要了几碗白开水和七八个窝窝头，坐在土炕上吃起来。吃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穿着蓝布长裤，赤着上身，一副农民装束的人，不时用眼睛瞟过来。三人立即警觉起来，心里嘀咕道：会不会是敌伪密探？有没有看出我们的破绽？被敌人盯上可就麻烦了。

他们三人互相使了个赶快离开这里的眼色，便大口咽下窝窝头，一仰脖子喝光了开水。然后背起行装，起身出店，仍然大大方方地朝镇外走去。

出得镇来，太阳已经微微偏西，但炎威未减。张耀增用袖子揩揩头上的汗，吐了吐舌头说：“好险！那人八成是敌人的特务。”

“我们总算没有落到敌人手里。”李启华也松了一口气。

“你们看！”辛国治突然压低声音，指了指身后。

李启华和张耀增掉头一看，只见在大车店碰到的那个农民装束的人，象尾巴一样地随在后面，紧紧跟上来了。

“他在镇上不动手，盯梢到镇外来干什么？”李启华不解地自言自语。

三人顾不上细想，加快脚步往前走。可是后面盯梢的，也

一步不拉地紧紧跟上，而且不断加快速度，越追越近。

前头有个村子，李启华等同志来到了村口。跟在后面的那人，突然打了个响亮的唿哨。霎时，从村口的麦秸垛后面跳出几个民兵，一拥而上：“不许动！”

李启华、辛国治和张耀增，见是民兵，放了心，但想分辩几句，又不敢暴露秘密，只得老实地站着。心想，暂时委屈一下吧。

这时那个盯梢的人，到了跟前，指着他们三个人，对那几个民兵说：“今儿我去连镇办事，在大车店碰上这三个小子，一个个土不土、洋不洋的，后来他们又径直往咱根据地来了。我想，这一阵小鬼子老他妈的派特务到咱根据地来捣鬼，我就在后面跟上了。”

“啊，误会了！”辛国治同志笑着说。

“误会？哈哈……”那个盯梢的人得意地大笑起来。

“走，到村里再说。”那几个民兵对“俘虏”威严地下了命令。

李启华等三同志在民兵的簇拥下，朝村里走去。快到村子中心的时候，迎面碰上两个身穿军装，佩带短枪的八路军干部，一个黑脸膛，一个瘦长个。

“你们押的什么人？”黑脸膛汉子笑着向民兵问道。

“还没弄清楚。”民兵中一个为头的回答。

辛国治见来人是八路军，便回答说：“我们不是敌人的特务，也不是学生，我们是从冀鲁边来的，我叫辛国治，这两位叫李启华和张耀增，是……”

“啊呀，原来是你们三位！”辛国治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两位八路军干部便惊喜地迎上前来，紧紧地握着三人的手。黑脸膛汉子激动地说：“啊，太巧了，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你们。”

前天，冀鲁边区的周贯五首长给冀南军区发了电报，说你们三位要来，我们的陈再道司令和宋任穷政委便派我们前来接应。想不到在这里碰上，真是太巧了。”

“谢谢你们，谢谢陈司令、宋政委！”李启华等也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民兵们见到这种场面，一时你看我，我看你，用手直搔后脑勺。

瘦长个接着笑呵呵地问民兵：“你们怎么把客人也给俘虏啦？”接着又掉头对李启华等同志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

憨厚的民兵同志，有的不好意思地搓揉着衣摆，有的望着客人笑了。

大伙又亲切地说笑了一阵，李启华等三人便辞别民兵，在黑脸膛和瘦长个的护送下，启程上路。几天后，他们便来到了冀南区党委和冀南军区的驻地。三人一到这里，便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接待。黑脸膛和瘦长个，将他们引到一间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布置得清清爽爽的房间住下，紧接着便有几个战士，七手八脚地端来洗脸水、大碗茶和热气腾腾的饭菜。还有几个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的战士，一齐围着他们问长问短：“靠海边的地方，究竟是个啥样？”“你们那儿的小鬼子多不多？”

李启华和辛国治、张耀增，虽然连续几天奔波，一路风尘仆仆，但此时有一种游子归家的感觉，打心底觉着温暖，什么累啊饿的，好象全都没有了。

当天下午，他们来到冀南区党委，见到了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宣传部长王任重、组织部长张策等同志。他们向冀南区党委的领导同志，详细汇报了冀鲁边区的武装斗争、政治工作、支部建设、群众工作、敌伪工作和当前缺少干部等情况。冀南

区党委领导同志对我边区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给予高度赞扬，尤其是听到边区党政机关和部队在环境恶劣、战斗频繁的情况下，仍能每天坚持两个小时的学习时，更感到惊讶。他们表示对冀鲁边根据地的斗争，要尽可能给予支持和援助。

第二天上午，辛国治又独自来到冀南军区驻处，见到了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尔重等同志。

陈司令和宋政委穿着朴素，和蔼可亲。他们见到辛国治同志，很高兴，热情地让了座。

“怎么样，路上辛苦了吧？”宋政委亲切地问。

“谢谢首长，一路还算顺利。”辛国治将来时在路上发生的误会，说了一遍。陈司令、宋政委和刘主任听后，都笑了起来。

接着，陈司令、宋政委和刘主任便急切地问起冀鲁边近来的斗争情况。辛国治将边区的近况作了汇报。陈司令、宋政委和刘主任对兄弟根据地非常关心，听得十分专注，问得也非常详细。

辛国治同志在谈到缺少干部这一困难时，说：“我们边区的干部，在主力转移时走了一些，主力转移后，又陆续伤亡了一部分。津南地委书记马振华，就是不久前才、才……”

“什么，难道马振华同志牺牲了？”宋政委吃惊地站了起来。

辛国治同志默默地点点头。

“怎么牺牲的？”宋政委着急地问。

辛国治将马振华同志牺牲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一九四〇年九月，也就是辛国治等三人离开边区前不久，军政委员会成员、津南地委书记马振华同志，到宁津县检查工作，布置抗灾、反顽斗争。一天，他和宁津县委书记张维明同

志带着九位同志，到了城东的长官一带，召开了几个会。当晚便住在薛庄的一户基本群众家里。

不料，马振华等同志的行踪被日寇的特务嗅到了。

当天夜里，宁津县的日寇宪兵队长，带着三百多个日伪军，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赶到薛庄，将村子包围起来。

马振华等同志半夜里听到村中的狗“汪汪汪”地叫个不停，还隐约听到杂乱的脚步声，知道不妙，赶紧披衣下床，抽出匣枪，拔步就往外冲。可惜发现敌情太晚，敌人已将村子围得严严实实。

敌人一见有人出村，立即疯狂地开枪拦阻，密集的弹雨堵死了各条要道路口。马振华等同志见硬冲不行，只得折回村里，准备另想办法突围。但一时又无计可施。村中有几个胆大的群众，偷偷开门出来，要马振华等人到自己家里找个地方躲躲，但马振华担心连累乡亲们，执意不肯。

这时敌人欺负我方人少，而且已经陷入重围，猖狂得大嚷大叫起来：“出来啊，投降吧。”“归顺皇军，重重有赏。”这使得马振华等同志气坏了。马振华和张维明掏出手榴弹，朝嚷得最凶的地方扔了过去。沉闷的爆炸声和一阵鬼哭狼嚎声响过以后，四周平静下来，敌人的嚣张气焰收敛了几分。

拂晓时分，敌人向村子发起进攻。马振华、张维明等同志退到村西，利用一片房屋废墟作掩护，抗击敌人。不一会，县委书记张维明等同志先后中弹牺牲。

废墟旁只剩下马振华同志一个人了。他捡起战友们遗留下的武器，双枪齐发，猛扫敌人。这时候，一股敌人爬上马振华背后的墙头，朝他连开数枪。马振华同志站立不住，扶着矮墙慢慢倒在血泊里，壮烈地为国捐躯了。

宋政委和陈司令、刘主任听到这里，心情十分沉痛。宋政

委缓缓地说：“你们冀鲁边的困难，我们一定设法帮助解决。”

当天下午，宋任穷政委又将辛国治同志介绍给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周桓同志，周部长当时正带着八路军总部巡视团，在冀南巡视。周部长听了辛国治的汇报后，立即给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等总部首长发电报，汇报了冀鲁边区的斗争情况。总部首长回电说，冀鲁边区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坚持，要成为一个巩固、统一的根据地，还指示北方局和冀南区党委与军区给予大力支持。

没过几天，北方局和冀南区便派张晔、郝炬、曹戎等领导干部，随李启华、辛国治、张耀增一起来到冀鲁边。为此，我们开了欢迎大会。辛国治和张耀增同志在会上汇报了他们冀南之行的详细情况。

不久，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指示，冀鲁边区正式成立了冀鲁边区党委，李启华代理区党委书记兼任宣传部长，张晔担任组织部长。下设三个地委，一地委书记曹戎（后由彭瑞林同志接任），二地委书记郝炬，三地委书记李广文。接着，根据一一五师的命令，冀鲁边区部队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我任旅政委兼代旅长，杨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团，十六团团团长杨承德，政委陈德；十七团团团长龙书金，政委曾旭清；十八团（后来成立的）团长杨柳新，政委杨爱华。不久又成立了冀鲁边军区，我任军区政委兼代司令员，杨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军分区（旧县以西为一分区，旧县以东为三分区，鲁北为二分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承德，政委陈德；二分区司令员龙书金，政委曾旭清；三分区司令员杨铮候，政委李广文。

由于区党委没有书记，再就是准备成立边区行政主任公署，需要一批干部，于是我们又派李广文、曹戎、辛国治三同志再次去冀南。

他们三人到了冀南，除了再次见到宋任穷、陈再道、刘志坚、王任重和周桓同志以外，还见到了正在冀南检查工作的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同志。

李大章同志听了李广文等三人的汇报之后，经请示北方局，决定派冀鲁豫行署秘书长王卓如到冀鲁边担任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冒着极大的危险抵达边区）。至于行政主任公署领导，李大章同志建议辛国治到冀中联系。

不久，辛国治带着周桓部长给冀中区的介绍信，离开了冀南。

他一路上穿过道道封锁线，几经艰险，终于抵达冀中根据地，在深县、武强、饶阳三县交界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宣传部长周小舟和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等同志。

辛国治同志到冀中去，是冀鲁边和冀中这两块根据地的第一次交往，增进了这两个地区的相互了解和战斗情谊。

冀中领导对兄弟地区的客人，非常热情。吕正操司令员多次接见了辛国治同志，详细地询问了冀鲁边区的斗争历史和近阶段的形势，对辛国治的来意非常重视。黄敬同志几乎每天晚上都叫辛国治同志到他的住处，向辛国治详细了解冀鲁边区的情况。后来黄书记和吕司令员，经请示北方局和总部，决定选派冀中的张永逊等同志和正在冀中的十八集团军总部巡视团的李雪炎、戴夫、段培圣同志到冀鲁边区工作。随后，边区成立了行政公署，下设三个专署。张耀增和张永逊分别担任行政公署的主要领导职务。

至此，冀鲁边区领导机构健全了，党政军民有了统一领导。部队在这前后也得到很大发展。边区摆脱了主力转移后的困难，又开始回升到一个兴盛时期。

东 渡 黄 河

第十六章 空中桥梁

一九四〇年十月，我们接到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个重要指示：开辟鲁北东部，打通与清河区的联系，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

接到这个指示，我们的眼睛豁然亮堂，看清了边区形势好转以后我们的斗争方向和目标。我和张晔、李启华、杨忠等同志的兴奋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分局和师部的这一战略部署，非常正确。因为，边区的东北是渤海，南面是济南，北面是日寇的屯兵重地天津，西面又为日伪重兵封锁的津浦路和运河所断；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边区与津浦路以西的冀中区、冀南区、鲁西区等根据地从战略上打成一片，显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东进：开辟黄河西北岸的鲁北东部游击区，与黄河东南的清河区根据地打成一片。这是边区根据地唯一可行的发展方向。

清河区拥有广饶、寿光、高苑、青城、邹平等十六个县，四百万人口。杨国夫、刘其人、景晓村等同志指挥的山东纵队第三旅，主要活动在小清河以南的益都、临淄、广饶、寿光一带。如果我们边区与清河区打成了一片，就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

机动余地更大。同时，我们还可以经清河区往南，穿过鲁中区、滨海区，与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所在的鲁南区经常取得联系。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打通与清河区的联系，在战略上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但是，要想与清河区打成一片，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日寇为了限制我们两区向鲁北东部发展，除了在黄河两岸修筑了大批据点、岗楼，驻扎重兵进行封锁以外，还派遣一个联队的兵力占据了鲁北东部的惠民、滨县、阳信、沾化、利津等县城，作永久盘踞之计；而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副司令薛儒华与张子良、王福成、李光明等数股顽军，则长期盘踞在这些县的广大农村，与日寇一起组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黑暗王国，横隔在我们两区之间，使两区抗日部队无法接近，更不用说互相支援、配合作战了。同志们把这块地区叫做“心脏病”。

我们摆出了困难情况，又分析了有利因素。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区党委和旅党委研究决定：集中全旅兵力，从正面向惠民、滨县、蒲台、利津、沾化、阳信一带挺进，打他几个胜仗，歼灭敌人的一部分有生力量；与此同时，在这些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控制黄河沿岸地区。

我后来又想，如果在出兵之前，能给清河区送封信，取得他们的配合，我们的东进就顺利多了。我把这想法同杨忠、李启华、张晔等同志一说，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一面调集部队准备东进，一面以教导六旅的名义给清河区的山东纵队三旅写了封信。

我们把这封信交给了二分区的领导同志，要他们派一个可靠的秘密交通员，将信送过黄河，交给清河军区司令员兼山东纵队三旅旅长杨国夫。

一个多月后，送信的交通员回来了。他已经顺利地把信送到清河区，还带回了清河区的复信。当他把复信送到旅部时，我们都高兴极了，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送信的经过。

这个秘密交通员，中等个头，方方的脸，长得浓眉大眼，仪表堂堂。我们在同他交谈中了解到，他叫王壮基，是商河县一个镇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公开身份是镇上的教书先生。因为他长期工作在黄河沿岸，对黄河两岸的地形、敌情比较熟悉，所以二分区领导就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他。

那天，王壮基同志穿着蓝布大褂，打扮成商人模样，从学校出发了。走到惠民县境内的一个渡口，看见日寇正在严格搜查上下船的人。他早已把密信藏在夹袄的棉絮里，所以没有被敌人发觉。他渡过了黄河，便直奔东南方，在小清河附近遇上了清河军区的部队，并见到了杨国夫司令员。杨司令员象接待贵客一样，热情地接待了他，向他询问冀鲁边区的斗争情况，留他住了十多天。王壮基临回边区前，杨司令员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请他喝酒吃饭，对他说：“你是冀鲁边区的第一个使者，希望你能够经常来。”并派了一支小部队一直把他送过小清河……

王壮基眉飞色舞地讲完了这一段经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王壮基离开旅部去休息后，我和张晔、李启华、杨忠等同志仔细地阅读了清河区的复信。信上说：他们也接到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指示，要求他们跨过小清河，开辟黄河东南岸地区，他们正在部署；但因这一带敌情严重，进行开辟工作有一定的困难，希望两区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共同完成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我们研究了复信，决定派王壮基同志再渡黄河，把我们的电报密码送到清河区，以便沟通空中通讯联

络。

我把王壮基叫来，把密电码交给他，郑重地叮嘱他：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任务，不准泄露给任何人；要千方百计把密电码送到清河区，亲手交给杨国夫司令员；遇到危急情况时，首先把密电码销毁。

王壮基接过密码本，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把密电码送到。万一我出了事，也绝不让密电码落到敌人手里。”说完，他就踏着坚定的步子走了。

我望着他宽厚的背影，心里默默地说：“真是好样的！”

半个多月后，我们的电台突然收到了清河区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空中联络终于沟通了！我和张晔、李启华、杨忠等同志都高兴得什么似的；机关的同志更是又跳又闹，庆贺这个难得的喜讯。

我们也给清河区拍了一份电报，向杨国夫、景晓村等同志致意问候。过了不久，杨国夫司令员来电讯问：王壮基同志平安返回否？我们这时才知道王壮基已经离开了清河区，便立即派人到惠民县的黄河岸边去接。

可是，去接的人回来了，王壮基却没有回来。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王壮基的消息。我们的心情不由得沉重起来：难道他出事了？我立即通知二地委，一定要设法找到他的下落。隔了几天，二地委送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王壮基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了！

接着，惠民县地下党的同志，通过种种关系，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王壮基同志被捕牺牲的详细经过——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旬的一天，王壮基告别了杨国夫司令员，离开了清河区。他头戴礼帽，身穿黑缎棉袍，仍旧打扮成商人模样，冒着怒号的西北风和纷纷扬扬的雪花，朝着黄河岸

边疾走，很快便来到了临近渡口的黄河大堤前。

渡口的河面不宽，现在又是枯水季节，河面就显得更窄了。平缓的河滩裸露出宽宽的一大片。日伪军在渡口的河滩上，设下哨卡，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在渡口两岸的高高的黄河大堤上，竖着岗楼，架着机枪，好象野兽的两只眼睛，居高临下地监视着周围的一切。

王壮基跨上黄河大堤，到了岗楼跟前，放慢了脚步，警惕地朝岗楼里的敌人扫了一眼，然后顺着土坡，一步步走下大堤。他到了渡口河滩，便迎着哨卡上的两个伪军走去。

“干什么的？”两个伪军不等王壮基靠近，便凶神恶煞般地吼了起来。

王壮基十分沉着。他装着恭恭敬敬的样子，摘下礼帽，朝着敌人弯弯腰，掏出两支香烟递过去，殷勤地笑着说：“老总，今儿轮到你俩坐班？哎啊！这么大冷的天，还抱着个枪在外面转悠，真是遭罪，咋不回屋里去暖暖？”

“妈的，少废话。”两个伪军把香烟别在耳朵上，仍旧气势汹汹地喝问：“你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是说假话，老子就崩了你，枪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对对，枪子不是闹着玩的。”王壮基装着胆怯的样子后退了半步，“不过，俺可是良民，你俩不信，到齐河镇上打听打听，俺是和仁堂药店的掌柜，做药材生意的。今儿要不是出来讨账，谁肯到这冰天雪地里来颠！”

“哼！”其中一个伪军吊起眼梢，将王壮基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狡诈地冷笑了一声说，“装得倒挺象，我看你准是八路。”

王壮基心里明白，敌人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只是故意恫吓。他带着点讨好的口吻回答：“嘿嘿，老总，你真是抬举俺

了，凭俺这点能耐，能当八路？就算俺是八路，还能逃得过你俩的眼睛！再说，今天你俩亲自守卡，八路即使有十个八个脑袋，也不敢随便出来。”

两个家伙听到这话，虽然仍旧横眉瞪眼，但脸色已经不是十分阴冷。趁这机会，王壮基摸出几张“准备票”（汪伪政府发行的钞票），笑嘻嘻地递过去：“老总，算是兄弟请客，小意思，买碗酒暖暖身子。”

那两个家伙接过票子，龇着一嘴狗屎牙笑了。然后在王壮基身上胡乱搜了一通，便挥挥手放行。

王壮基一边掸掉身上的雪花，一边跨上了渡船。船夫拔起竹篙，轻轻一点，小船便逆着北风朝河心驶去。王壮基站在舱板上，望着漫天的雪花一片片无声地落进水里，望着浑浊的河水静静地向东流去，心里长长地舒了口气。他朝四周悄悄瞥了一眼，接着用手摸了摸黑缎棉袍的衣襟，嘴角露出了难以察觉的微笑。

他的棉袍衣襟的夹层里，藏着清河军区杨国夫司令员给冀鲁边区的一封回信。这封信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就泄露了两区准备打通联系的计划，敌人就会在黄河两岸加强防守，阻止我两区部队向黄河岸边靠拢。这样一来，我们东渡黄河就格外困难。所以这封信万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现在王壮基已经闯过了一关，但对岸滩头上还有敌人的哨卡。想到这里，他的心又揪紧了。

渡船很快便靠近了河滩。滩头上两个守卡的伪军，披着黄狗皮似的破大衣，肩上荷着枪，眼睛盯着渐渐驶近的渡船。这两个家伙大概刚喝过酒，眼珠血红，喉咙里喷出一股股浑浊的热气。其中一个还油腔滑调地哼着京剧：“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渡船停稳了，王壮基跨上码头。他提着棉袍的下摆，迎着敌人走过去，边走边呵着冻僵了的手指，肚里暗暗盘算着应付敌人的办法。

“到哪里去？”那个哼京戏的家伙突然变了腔调，凶声恶气地喝问。

“齐河镇。”王壮基不慌不忙地回答。

“什么地方来？”

“高苑。”

“和他罗唆什么，共党、八路的嘴皮滴水不漏，甭想问出什么名堂。”另一个伪军瞪了他的同伙一眼，便把大枪背在肩上，动手搜查。

王壮基发觉有些不妙，但神色仍十分镇静。

这个伪军将王壮基内外衣的口袋全都翻遍了，又检查了鞋帽，结果一无所获。但他不死心，仍在王壮基身上摸摸捏捏。

敌人的魔爪摸到了黑缎棉袍的衣襟，王壮基的心跳到了喉咙眼，但他一时也想不出摆脱的办法。

魔爪大概感到棉袍衣襟里的棉花有些异样，便用两个指头一捏。王壮基浑身一震，后脊梁刷地涌起一股冷流。他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这个伪军一把揪住王壮基的棉袍衣襟，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狞笑：“想骗老子，没那么容易，棉花里藏的什么，拿出来看看。”

另一个哼京剧的伪军，见同伙发现了秘密，也狂喜地趋近眼前。

王壮基平静地回答：“老总，那是几张钞票。不瞒你说，俺生来胆小，身上有了几文，就常揣在烂棉絮里，恐怕别人偷去。”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黄灿灿的镀金怀表递过去：“老

总，这玩艺还值几文，你俩先收着。这烂棉絮里的几张钞票，是俺买卖人的本钱，请二位抬抬手，给个方便。兄弟日后手头宽了，一定补报。”

“不行，偏要看看。”两个家伙仍旧是凶神恶煞一般。其中一个劈手夺过怀表。另一个则拔出匕首，刀尖在衣襟上使劲一挑，棉袍顿时豁开了一道半尺来长的口子，棉絮露了出来。

王壮基见事已至此，只好先下手为强。他朝手拿匕首的那家伙的鼻梁猛击一拳，那家伙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好几步，一屁股坐在地上。接着又飞起一脚，踢翻了另一个伪军。趁这机会，王壮基顺着大堤，拔腿就朝东北方向猛跑。

“快，快，来人哪……”“抓八路，八、八路跑啦！”两个鼻青脸肿的家伙从地上爬起来，一面叫喊，一面“砰砰叭叭”地放枪。

喊声和枪声，惊动了黄河大堤上岗楼里的敌人。敌人追了出来，岗楼里的机枪也朝着王壮基疯狂扫射。

王壮基的左面是陡立的大堤，右面是漂着冰块的水。他只能在宽阔的河滩上奔跑，但河滩地近乎一马平川，别说无法藏身，就连找一道棱坎或一块洼地暂时隐蔽一下都十分困难。他的额头上迸出了汗珠，心里想：个人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但密信落到敌人手里就糟了。他把全身的力气都倾注在两条腿上。

突然，王壮基感到右腿象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有些麻酥酥的，接着腿弯一软，栽倒在地上。他挣扎着坐起来，撩开棉袍一看，只见大腿已被机枪子弹打穿了两个洞，鲜血顺着裤管汨汨往外流，染红了地上的一大片白雪。

“八路跑不了啦，抓活的……”敌人嚎叫着蜂拥上来。

“把信毁掉！”王壮基脑子里飞快地闪过这个念头。他迅

速从棉袍衣襟里抽出信纸，“嚓嚓”撕碎，团起来塞进嘴里，使劲嚼了一阵，便往肚里咽。谁知因为刚才跑得激烈，现在喉干舌燥，粗糙的信纸怎么也咽不下去。他又使劲咽了几次，结果卡得眼睛翻白，喉咙里血都咯出来了，还是没咽下去。

怎么办呢？他用手使劲在地上刨了几下，但黄土冻得硬梆梆的，一时不可能刨出个坑来。

敌人渐渐逼近跟前，情况十分危急。王壮基从嘴里吐出信纸，突然看到信纸上殷红的血迹，顿时眼睛一亮：腿上的伤口有两个枪眼，子弹穿进去的那个枪眼很小，但子弹穿出去时炸开的那个枪眼，却有鸡蛋般大，足足可以藏纳一团信纸。

他背对着只距离十几步远的敌人，屈起右腿，将纸团狠命朝伤口里一塞。纸团深深地藏进了大腿，他也痛得昏迷过去了……

等到王壮基同志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敌人关进了监狱。

敌人把他吊起来拷打，要他说出机密，他只是闭目微笑，一字不吐。他连续遭受了两天两夜的严刑审讯，四肢全被打断，仍然守口如瓶。敌人无可奈何，最后对他下了毒手。

王壮基同志临刑前，将他的被捕经过告诉了同狱的一位战友，要他设法转告党组织：“我已经完成了任务，虽死无憾！”

后来这位同志越狱出来，在黄河岸边找到了王壮基同志的遗体。他发现信纸仍旧深深地藏在烈士遗体的大腿里，字迹已被血渍模糊了。

我们听了惠民地下党员报告的这些情况，心情十分悲痛。王壮基同志的形象又呈现在我的面前：中等个头，浓眉大眼，方方的脸……多么可敬可爱的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他为了打通两区的联系，第一个慷慨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不久，杨国夫司令员听到王壮基同志牺牲的噩耗，也发来电报，代表清河区全体指战员对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

无线电波在黄河上空回荡。那是一座横跨黄河，沟通两区联系的空中桥梁。这空中桥梁，是王壮基同志用生命和鲜血搭成的啊！我们深深地沉浸在对烈士的怀念和敬仰之中。

有了这座空中桥梁，两个军区便可互通信息，加深了解；便能够互通情报，取得配合，发动大规模的对敌联合作战。这桥梁缩短了两区间的距离，使两个军区的部队紧紧地靠在了一起。而且这桥梁无形无影，胜似蓝天长虹，敌人无法砍断。

第十七章 徒骇河畔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日夜里，我们到了徒骇河北岸，在商河县的兴隆镇一带驻了下来。杨承德、陈德同志带十六团分驻在贾桥、小张家、张家庙、武集等村庄；我和张晔、李启华等同志带旅部机关和一个警卫连驻于兴隆镇；杨忠、龙书金同志带十七团驻于兴隆镇左侧的几个村庄，并派一个连进驻徒骇河南岸的高桥村；贾乾瑞教导员带领旅部特务营两个连驻于兴隆镇后面的一个村。

春季的徒骇河，河水很浅，卷起裤脚就能涉水来往。据当地县志记载，徒骇河是大禹治理的九河之一，“禹疏九河，此河工难，众惧不成，故曰徒骇”，老百姓也有叫它大土河的。它是流经边区境内的一条大河。兴隆镇位于徒骇河下游，距黄河大堤仅约四十华里。

部队沿着徒骇河北岸驻下之后，我一边派出侦察员，一边派人去找当地地下党的负责人。

这时候，我的腰骨一阵阵地剧痛。因为白天行军经过朱家寨寨门的时候，我见寨门很低，就弯腰伏在马背上，不料后面的马闯上来，惊了我的马，我的马猛地向上一窜，把我的脊背顶在石头门框上，腰骨碰伤了。我只得在炕上躺下来。

不一会，当地地下党的负责同志来了。他告诉我，顽军八旅二团李光明的一个营，被日寇围歼在马家洼一带，据说是被当作八路军打的。仁风镇的“二鬼子”（当地群众对伪军的称呼）头目曾派人告诉李光明，要他带部队避走，李光明不相信，结果吃了个大亏。

“鬼子是不是嗅到了我们的行踪？”我正思虑着这个问题，地下交通站的同志急匆匆地送来一个情报，说西边白桥据点的敌人已经出动，正向贾桥一带扑来。

紧接着，侦察员接连送来几个情报，说附近据点的敌人正在急速增兵，济阳、商河、惠民的敌人也有出动的迹象。看样子，敌人很可能已经把我们盯上了。

我马上派人请张晔、李启华同志和杨忠、龙书金、杨承德、陈德等团以上干部前来紧急磋商：打，还是不打？

大家说，这次东进就是准备打几个大仗的，这一带又是新区，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如果不打就走，可能会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大家都主张要打。

我把敌情作了分析，觉得如果只有附近这几股敌人，打个胜仗是有把握的。但如果济南、德州、惠民的敌人出来增援，这一仗很可能是个硬拚硬打的消耗战，不符合游击战的原则。转念又考虑到，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屁股一拍就走，是很省事，但不利于扩大我军影响，不利于在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

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同意了大家的主张。

会上还议论了战斗布署计划。然后大家分头去执行。杨承德、陈德同志带领十六团为右翼，把团部设在小张家；杨忠、龙书金同志带领十七团为左翼，把团部设在兴隆镇左侧的一个小村；我带领旅指挥所，进驻兴隆镇东头一所坚固的砖房里；旅指挥所背后驻扎旅特务营等单位。就在当天，各部队沿着徒骇河北岸摆开了一条东西长约二十华里的长蛇阵，利用村寨、河堤，抢修工事，准备迎击敌人。

杨承德、陈德、杨忠、龙书金等同志，一边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一边向部队进行动员。他们说：这一带都是新区，这一仗非打不可，我们要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振奋民心！部队的战前情绪十分高昂。

第二天凌晨，太阳还没有露出脸来，徒骇河上空雾气迷蒙，象一条白色的纱带飘向东方。我正在指挥所里望着堤岸凝思，突然，东边远远地响起激烈的枪声。

不一会，杨承德同志派人前来报告：驻贾桥的十六团一部已经同敌人打上了。敌人约有一个中队鬼子、一个大队伪军，共四百多人，在遭到我们的一阵打击后，损失惨重。但敌人正在组织新的反扑。

贾桥这股敌人是从白桥据点出来的，看来他们对我军不摸底细，否则，不敢这样孤军前来，大胆进攻。我派人告诉杨承德同志，要贾桥的我军以逸待劳，十六团的其他部队不要过早暴露。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徒骇河上的雾气正在散去，河水象一条银色的缎带，在阳光照耀下闪着光芒。这时候，敌情也渐渐严重起来，十六团的部队全部与敌人打上了，团部小张家的北面也发现了大批敌人。这些敌人全是从惠民各地乘车赶来的。

鬼子们下了卡车，用重机枪、掷弹筒向我军阵地猛扫猛炸。

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济南、德州、商河、济阳等地的敌人也蜂拥而来，越聚越多。兴隆镇左翼的十七团、旅指挥所背后的特务营和部分县大队，都先后投入了战斗。据事后敌伪报纸报道，与我们交手的有十几路敌人，总数在两万人以上。

十六团正面的敌人最多，火力也最猛。敌人企图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突破我军阵地，所以他们的轻重机枪、掷弹筒一古脑儿对着十六团狂扫乱炸。在激烈的战斗中，杨承德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被打伤了左臂，鲜血染红了整只袖管。他“哗”地撕下半截衣袖，把伤口一缠，依然沉着地指挥部队还击敌人。坚守在武集的三营营部和十一连，抗击着数十倍的敌人，战斗打得很艰苦。营长张真化、教导员杨爱华不断地鼓励大家：要沉着，敌人不到眼前不开枪，一枪消灭一个敌人！十一连连长刘虎臣在激战中负了伤，执意不下火线。同志们劝他进村子包扎一下，他说：“这点伤算什么，注意前面敌人，给我顶住！”后来，几个战士见他伤势不轻，就强拉他去包扎了伤口。可是一转眼，他又上了阵地。陈德同志和副团长杜步舟看到这种情况，就下令把十一连调到兴隆镇北面去警卫旅指挥所，刘虎臣这才把阵地交给九连，带着部队撤了下来。

到了下午，兴隆镇周围的敌情更加严重起来，镇北面千把米外的开阔地上，出现了敌人的大批卡车，成群的敌人跳下车向镇子扑来。旅部警卫连和我身边的一个警通排全都拉出去占领阵地，准备抗敌。接着刘虎臣也带着十一连赶到。十一连利用一条天然道沟和几座坟包作掩护，沉着应战，朝着冲上来的敌人猛烈开火，接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敌人见强攻不下，就集中火力远远地对着他们扫射，小钢炮也“冬冬”地打过来，把几座坟包炸成了平地，坟边两颗碗口粗的椿树，也被

拦腰劈断。刘虎臣冒着纷飞的弹雨，一会儿跑到一排，一会儿跑到二排，对大家说：“大家隐蔽好！有我们在，就有阵地。我们一定要打出个样子来，鼓舞鼓舞黄河两岸的老百姓！”

在激烈的战斗中，机枪手中弹牺牲了，排长王凤林接过机枪就扫了起来。王凤林平时机智灵活，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野猫”。他端着机枪东打一阵，西打一阵，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乱滚乱爬。鬼子被他惹火了，集中了四、五挺机枪的火力来压他，可是，还没等敌人看清他的位置，他早就转移了。敌人正在东张西望地寻找他，他的机枪又在另一头“咯咯”地叫了起来。就这样，敌人的几挺机枪都先后被王凤林打哑了，敌人始终不能靠近我们的阵地一步。

与兴隆镇隔河相对的高桥村里，昨天晚上派去的十七团一个连，在战斗打响后已奉命撤回北岸阵地。高桥村马上被敌人占领了。这股敌人约有一个大队、四百多鬼子，大概见我们没有什么动静，就偷偷地从徒骇河涉水过来，企图从背后偷袭我们，与北面的敌人形成夹击之势。十六团二营营长仇鸿印发现这一情况后，在北岸的大堤后面集中了四、五挺轻机枪，命令一字儿排开。四百多鬼子在河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好不容易过了河心，前边的已经爬到河堤了。这时仇鸿印一挥手，喊了声“打！”四、五挺机枪就一齐怒吼起来，手榴弹也刮风般飞向敌群。霎时间，河当中水花迸飞，泥浆乱溅，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嗷嗷乱叫，争先恐后地往回逃。我们的机枪、步枪追着敌人的屁股又一阵好打，打得敌人七零八落，只剩几十个人了。河里躺满了敌人的尸体，污血把河水都染红了。

我在旅指挥所抬头看了看太阳，只见太阳西沉，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光景了，就命令各部队：在天黑前，一定要坚守

各自的阵地，争取多消灭一些敌人！

各部队接到命令，重新进行了部署，命后备力量都投入了战斗。徒骇河两岸，只听枪炮轰鸣，杀声震天。敌人在我军勇猛的反击下，纷纷狼狈地溃退了。大片的开阔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敌人来不及抢回的尸体和各种枪支弹药。

我和杨忠、张晔、李启华等同志碰了个头。杨忠等同志认为，这场战斗再打下去将会对我军不利，我军应当在天黑后撤出战斗。因为，战士们已经打了一整天，眼下十分疲劳，弹药也不多了；敌人虽然遭受重大伤亡，暂时溃退了，但还会卷土重来；再者，今天敌人来得匆忙，没有形成一个指挥中心，攻击很分散，如果明天敌人有了充分准备，我们就更难对付了。我觉得同志们的意见很有道理，便决定部队撤离徒骇河，暂时退回宁乐边一带根据地，待到稍事休整后，再相机东进。

夕阳西落，天边收尽了最后一抹晚霞，夜色悄悄地降临了。

我们的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分头撤退。大家拾起敌人丢弃的枪支弹药，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抬着、背着伤员，离开了经过一天激战的徒骇河畔。

杨忠、龙书金同志带着十七团向临邑、陵县一带转移。杨承德、陈德同志带着十六团向乐陵五大店一带转移。我和张晔、李启华等同志带着旅部机关，在特务营的掩护下，向德平孔家镇方向转移。

临行前，我考虑到路上可能还会与敌人遭遇，部队带着伤员不方便，就命令十六团五连连长杜万祥带着全连，负责掩护几十名伤员转移。

我问杜万祥：“怎么样，有困难吗？”

杜万祥腰一挺说：“政委放心吧！有咱‘铁帽子五连’在，

一个伤员也丢不了！”

杜万祥这个连的装备，全是从日寇手里缴获来的，人人头戴钢盔，手持“三八”大盖，远远地一看，谁都认为是鬼子。他们用这身装扮，多次骗过了敌人的耳目，大家都羡慕地叫他们“铁帽子五连”。

杜万祥敬过礼就大步地走了。我和张晔、李启华等同志，也随着机关部队，向着黑暗中的西北方向转移。

日寇因为激战了一天，遭到很大伤亡，再加上天黑，所以，他们尽管探知我军正在转移，也不敢出兵追赶。

但是“铁帽子五连”在横穿商（河）惠（民）公路时，却与一股敌人遭遇了。杜万祥发现影影绰绰的日寇正从西边顺着公路走过来，他立刻命令大家不要出声，火速通过公路。可是当几十名伤员和三个排刚刚穿过公路到达路北，还有一个排正走在公路上的时候，敌人已经快到跟前了。杜万祥知道，现在万万不能穿越公路，否则就会暴露已经到了路北的伤员们和三个排，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伤员们行动迟缓，很难摆脱敌人的追击。

他当机立断，毅然带着这个排，大模大样地迎着敌人走过去。日寇以为是“自己人”，丝毫不加理会。杜万祥到了敌人跟前，对准走在前面的鬼子，“叭、叭”就是两枪，全排战士也跟着一齐开火。鬼子们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等到敌人清醒过来，杜万祥等人已经撤向路南，隐入夜幕中去了。敌人气得嗷嗷直叫，也跟着跳下公路，往南紧追。杜万祥等人将敌人向南引了一程，然后迅速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重新越过公路，飞也似地向北追赶连队去了。

可是，这股日寇十分狡猾，他们在路南扑了空，估计我军是向北撤走的，就在黑暗中紧紧地尾追上来。第二天凌晨，杜万

祥带着五连刚刚到达乐陵五大店与团部会合，尾追的日寇就发起了进攻。我军不得不忍受着极度疲劳，立即投入战斗。杨承德和陈德同志考虑到部队已经战斗行军一整昼夜，不宜久战，就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分散转移。

徒骇河战斗，我们集中了边区的主力部队，与数倍于我的敌人浴血奋战，打垮了敌人的十多次进攻，给了敌人以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据兴隆镇一带的群众反映，敌人来不及运走的尸体就有五、六百具。听说龙桑寺据点的日寇出来五十多人，只回去了八个缺胳膊少腿的伤兵。敌伪的报纸也承认：“皇军此次受挫甚重，阵亡三百余人……”

这次战斗，虽然是硬打硬拚的消耗战（这是我们预先估计到的），但它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对盘踞在这一带的顽军刘景良、薛儒华、李光明等部震动很大，使他们又一次看到了我军的实力和战斗力，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更重要的是，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徒骇河两岸的广大群众。群众争相转告，说十里徒骇河岸如何枪炮齐鸣，八路军如何英勇善战，鬼子怎样狼狈。甚至连四百鬼子从高桥过河，被八路军一家伙消灭在河心；八路军一个首长骑着马，在道沟中来回奔驰，指挥作战；刘虎臣带伤参战；王凤林灵活歼敌……群众都说得有声有色。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黄河沿岸地区，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新闻。

首次东渡黄河虽然没有成功，但徒骇河战斗产生的深远影响，为以后鲁北东部的开辟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十八章 黄河初渡

徒骇河战斗后，我率旅部和区党委、行政公署机关一直在津南活动。杨承德、陈德同志带十六团活动于盐山、新海一带。杨忠、龙书金同志仍带十七团辗转于鲁北西部。

从这个时候起，日寇看出了我军试图东渡黄河、打通同清河区的联系，因而感到极大的恐慌。日寇在徒骇河战斗后，抽调了大批伪军进驻黄河沿岸的据点、岗楼，并组织了几支机动部队，常驻黄河岸边。敌人在黄河一线戒备森严，给我军再次东进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坚持津南的抗日斗争，一面派人侦察鲁北日、伪、顽的动静；同时命十七团经常迫近鲁北的惠民、滨县一带，寻找新的东进机会。还要求二地委在鲁北东部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级政权、组织抗日群众团体等等。

七月初，平原上已经是玉米吐穗、高粱扬花的季节，漫野的青纱帐又起来了。我们的部队和民兵如鱼得水，在这青纱帐的海洋里，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端据点、炸岗楼、破铁路、炸火车……每天都有胜利的消息报到旅部来。

就在这时候，一一五师首长决定，委派黄骅同志担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并通知我们，黄骅和派往边区的一批干部已从鲁南动身，要我们准备接应。

黄骅同志早年在山西保卫部工作时，曾同我有过交往。他

精明干练，对行军、作战很有一套。听说他来担任边区的军事领导，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这年把来，边区一直没有配备军区和旅的军事干部，军政主要负责人的工作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经常忙了这头顾不上那头。现在听说老战友要来并肩战斗了，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

不久，黄骅同志通过清河区电台给我发来电报，说他们已经穿过鲁中到达清河区，目前暂随清河军区司令部活动，希望我能派部队去接他们。

我接到电报，立即通知杨忠、龙书金同志带十七团渡过黄河去迎接。但是，由于敌人在黄河两岸封锁很严，十七团两次在济阳附近组织渡河，都没有成功。

黄骅同志又几次来电催促，我就决定自己带旅特务营去接。我带着部队从乐陵到达商河、惠民一带时，与杨忠、龙书金同志带领的十七团会合了。杨忠告诉我说：“敌人在黄河两岸的防守很严，我们一靠拢大堤，鬼子的机动部队就乘着汽车，骑着东洋马，刮风似地卷过来。”

龙书金接着说：“敌人发现我们两次试图在济阳附近组织渡河，神经格外紧张起来，将这一带封锁得更严，简直连鸟都别想飞过去。”

听了他们的汇报，我沉思了一会说：“既然如此，我们就来个虚晃一枪：派少数部队在这一带佯装偷渡，迷惑敌人；我们的大部队则掉头向东，在惠民境内寻找渡河机会。”

龙书金同志想了想说：“行，这也是个办法，或许有些把握。”

于是，十七团抽出一个排，留下来吸引敌人。十七团其余部队以及旅特务营，则在我和杨、龙二同志的率领下，悄悄地向惠民进发。为了避免同敌人遭遇，我们派出一个侦察队在前

面开路。大部队尾随在侦察队的后面，拉开一段距离。

我们夜行晓宿，很快便进入了惠民县东部。敌人在这一带对黄河的封锁果然松多了。这天拂晓，我们来到惠民县东部一个叫老君堂的村子里，驻了下来。

部队刚刚驻下，侦察队便来报告，说村东不远就是黄河大堤，他们沿着大堤来回走了一段，没有发现敌人活动。他们在附近找了个老农作向导，据向导说，现在黄河水很浅，可以涉水过河。

我和杨忠、龙书金同志喜出望外，立即集合队伍，随侦察队和向导，穿过村前的庄稼地，奔向黄河大堤。这时正当中午，烈日悬空，天气闷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当我们钻出密不透风的青纱帐，爬上二十多米高的大堤时，个个都已汗水淋漓了。

我们站在大堤上，放眼远看，只见大片的河滩地上，长满了绿荫荫的水柳和一蓬蓬的荆条，稍高些的坡地上，还种上了花生、大豆等庄稼。我们都疑惑起来：这就是黄河吗？怎么不见水呢？

当向导的这位老农，大概猜出了我们的心思，他捻了捻灰白的胡须笑着说：“你们八成是头一次看见黄河吧？”

我笑着点点头，问道：“老大爷，河心离这还有多远？”

“噫，这可不近，至少也有二三里地。”他一边说着，一边带领我们走下大堤。过了一会，这位健谈的向导，又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们：“在早几年，黄河可不是这副样子，特别是到了眼下的雨季，水势可大啦，河面足足有四五里地宽，浑浑浊浊的一片。而且水流特别猛，老远就能听见哗哗的响声，有时连大堤都被冲得似乎摇摇晃晃，真叫人发怵。后来，蒋介石炸开花园口大堤，使黄河改了道，别的地方遭了殃，可俺这一带

的水势就小多了。大片的河滩露出来，俺就掂量着种些庄稼。河心也只剩百十米宽，俺有事就常打河心里蹿过去……”

我们一边听他介绍黄河，一边跟着他走，走了约莫二里多路，终于到了河心。只见河水在我们面前懒洋洋地流着，活象一匹疲倦了的弩马，在烈日的烤炙下，拖着无比沉重的套子，慢吞吞地向前挣扎。

大家望着这面前的黄河，都十分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不由得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噢！黄河就这点点水？还不如徒骇河的水多呢！”“你看，水多平静，哪象流的样子！”

这时候，侦察队在向导的指引下，选择了一处下河地点，一边向河心走去，一边在河水稍浅处插上高粱杆，作为标志。

我见他们已经快蹿到对岸了，就大声招呼部队：“抓紧时间过河！”

大家挽起裤腿，一个个手拉手地朝对岸走去。河水确实不深，最深的地方也只淹到腹部。不到半个钟头，部队就全部顺利地过了河。

上岸后，我们稍事休整，就告别了那位向导，直奔清河区。傍晚时候，我们到了清河根据地的清西军分区境内。不久，我们便在清西地区的一个村子里，与清河区党委、行政公署机关及清西军分区的领导同志会合了。

会面的时候，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清西军分区郑司令员和李曼村政委带着部队，热情地迎上前来，和我们紧紧地握手。双方象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样，亲热地彼此问候。

我们带去的部队也和他们的部队汇在一起，互相新奇地打量对方的武器装备，互相询问部队的情况……

那个场面，真是感人至深！

抗战四年多来，由于敌人的封锁、分割和黄河大水的阻隔，两个兄弟根据地的部队从未相会过，更不用说互相支援，配合作战了！所以，我们都深切地感到，这眼前的一切，是多么的不平常啊！

当天晚上，我和杨忠、龙书金与景晓村、李人凤、李曼村等同志彻夜交谈。我们谈论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这两块根据地的诞生、坚持和发展；谈论在黄河沿岸开辟游击根据地，将两区连成一片的设想。彼此都非常兴奋。

经过磋商，我们对今后为打通两区联系所应采取的步骤，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就是：第一步，在黄河两岸地区继续广泛地发动群众，逐步建立党的组织、群众团体以至各级抗日政权，使这些敌占区逐步发展成为我军的游击区和根据地；第二步，在适当的时候，组织一次两区部队的联合行动，沿海边打开一条连接两区的通道。

第三天，黄骅同志和同他一起从鲁南来的一批干部，从寿光县赶到了清西。黄骅从老远的地方就认出了我，笑着向我跑过来：“贯五同志，你好啊！”

我也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前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好啊！好啊！你也好吗？”

他挺了挺胸脯说：“老样子！就是瘦点，可是这里面结实着哪，不打跑鬼子，咱们是垮不了的。”

我笑着用手点着他说：“你呀！真是一点没变，说出话来还是带着那股逗劲。”

他笑笑说：“变不了啦！你不也是老样子吗，满口江西土话，把同志叫做‘国志’！”

我笑着接上说：“乡音难改嘛！你的这口湖北口音，比我强不了多少，对这儿的群众讲话，要不变变调，比说外国话还

难听，可麻烦啦！”

从鲁南来的其他干部听着我俩说笑，也都乐了。

这天晚上，我和黄骅同志坐在屋子里，拉起别后的经历、工作、学习和斗争，话儿越说越多，象流水般淌个不止。

黄骅同志告诉我：他从八路军总部机关离开后，参加了著名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晋西事变”中，他们“决死队”与阎锡山的反动军队展开了血战，终于打垮了反动军队的猖狂进攻。前不久，他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调到一一五师工作。师政委罗荣桓同志考虑到冀鲁边区缺少军事干部，就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到边区来？他回答说：“干革命还能挑挑拣拣吗？组织上要我去，我就去，再说，到冀鲁边工作，还有个老战友搭档。”罗政委说：“那好吧。”于是，他第二天就动身了。

接着，我也把自己东进冀鲁边后的经历和感想对他说了一遍。并着重介绍了眼下打通两区联系的进展情况。

第二天中午，我们告别了清河区的景晓村、李人凤、李曼村等领导同志，带着部队踏上了归途。

我们沿着原路返回了黄河西北岸，继而转回宁乐边一带，与冀鲁边区党委、行政公署和旅部机关会合了。杨忠、龙书金同志带着十七团，仍回鲁北西部的商河、惠民一带活动。

这次渡河成功之后，我们又开始酝酿再次东进的计划。

第十九章 兵分两路

一九四一年六月底，旅部、军区和区党委的领导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趁现在田野里青纱帐起来的机会，再次组织东进，并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兵分两路，双拳出击。

这个方案的具体部署和分工是：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十七团政委兼二地委书记曾旭清、十七团团团长龙书金，带领旅政治部机关和十七团的一、三两个营，为第一路，从惠民县的淄角、夹河两地之间穿过，向黄河岸边的老君堂一带迫进；沿途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时拔除几个敌伪据点，目的是开辟一块通向黄河的狭长的游击区域。第二路由十六团的团长杨承德和政委陈德带领十六团，从无棣县的小山出发，在攻克大魏庄顽军据点后，跨过桃儿河，同山东纵队第三旅在黄河入海口以西的垦区会师，聚歼垦区顽军；这样就可以在渤海湾沿岸建立一条连接冀鲁边区和清河区的通道。

除两路人马外，我和黄骅副旅长带领旅部，活动于惠民县和无棣县之间，以便居中指挥；旅特务营对外假称十六团，十七团二营也打着十七团主力的旗号，分别在商河、惠民等县活动，以麻痹敌人；三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则虚张声势，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减轻敌人对我两路东进部队的压力。

七月二十四日，杨忠、曾旭清、龙书金等同志带领的这一路机关部队，首先向东挺进。他们到达惠民县的淄角镇、夹河村一带，便驻扎下来，着手开辟游击区。旅政治部宣传科长辛

国治同志，带着一支精干的宣传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旅政治部敌工科长杜杰同志，还带着小岛、桐山、山口等几个日本人和一个叫徐文进的朝鲜人，都穿着日军服装，巧妙地接近敌伪据点，宣传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开展瓦解敌军的工作。十七团则组成若干工作小组，分散到附近的村子里，一面帮助群众挑水、看庄稼、堆秫秸等等，一面发动和组织群众。

不到一个月时间，被日、伪、顽长期控制的这一带地区就出现了生机：不少乡村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民主政权和抗日自卫队；人民群众争着帮助我军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封锁消息；有些伪军也被我们争取过来，暗中为我军提供方便。这块新开辟的游击区，不断地向东面的黄河岸边延伸。

旅政治部和十七团的工作进展情况，杨忠主任常常通过电台向我和黄副旅长报告。我们听到这些消息，都十分高兴。

不久，淄角、夹河一带发生的巨大变化，被日寇侦知。日寇感到极度震惊，对这个地区连续进行了几次“扫荡”。我军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每次都及时转移，使敌人扑了空。

但是，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为虎作伥，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他派出大批便衣侦探，探听我军动静，向驻惠民的日寇联队司令部密报。日寇接到密报，又调集人马对我军进行“扫荡”。刘景良还亲自带领顽军，偷袭十七团和旅政治部的驻地。

在日、伪、顽的疯狂夹击下，杨忠等同志带领的这一路东进部队很快陷入了困境，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换几个地方宿营，才能摆脱尾追的敌人。当我和黄骅同志得知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场艰苦、壮烈的突围战已在夹河一带发生了。

九月四日下午，我和黄骅同志带着旅司令部机关，隐藏在

商河县龙桑寺北面的一个村子里。这天天气十分炎热，空中没有一丝风，人闷得喘不过气来，即使坐在屋子里也会全身淌汗。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和黄骅同志出村察看地形，忽见从东北方向急匆匆地跑来几个老乡，看样子他们是从惠民县淄角镇一带来的。这几个老乡一到我们跟前，便气喘吁吁地说：“夹、夹河附近，枪声响、响了好几个钟头，听说是八路军跟鬼子干、干上了！”

我听到这话，心里不由得一沉：难道杨主任他们与敌人遭遇了？我看了黄骅同志一眼，只见他焦急地皱起了眉头，眼睛里射出灼人的光。我俩决定：立即带领旅司令部机关赶赴夹河。

我们出村走了不远，发现曾旭清同志带着十七团三营，从田野的青纱帐里冲了出来。指战员们的衣服象水浸过一样，全部被汗水湿透了；十几个伤员由人背着。看来部队是经过激战后突围出来的。

曾旭清同志高卷着袖管，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我劈头就问：“见到杨、杨主任他们没有？”“没有！”我和黄骅同志摇了摇头。曾旭清失声叫了起来：“啊呀，糟糕！”

我解下水壶递给他：“不要急，出了什么事，慢慢说。”

他接过水壶，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喝了两大口，然后用袖子一抹嘴巴说：“我们是上午到的夹河一带，杨主任和龙团长带旅政治部和一营驻在夹河村，我带三营驻在陈牛庄，两村相距五、六里地。中午，我们正在吃饭，村外的岗哨发现了大批鬼子。敌人是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偷偷地摸过来的，哨兵发现的时候，敌人已经包围了陈牛庄。我见情况不妙，立刻带着部队冲出去。部队突围以后，我不能向夹河靠拢，恐怕把敌人引过去，增加杨主任他们那边的压力，所以只好带着部队

边打边向西撤。同时，我派了个通信员去夹河给杨主任送信。通信员已经去了三四个钟头，如果杨主任他们没有危险，也该……”

曾旭清同志说不下去了。我和黄副旅长感到情况严重，便传令全体机关人员，继续向夹河进发。曾旭清同志要求带部队返回去。我考虑到战士们已十分疲劳，没有同意，并用命令式的口吻，要他们在惠民县西部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休息。

这时，夕阳渐渐西沉。空中不时地吹过微风，天气渐渐凉爽起来。但我和黄副旅长的头上仍旧冒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我们的心情十分焦急，恨不得一步跨到夹河。队伍在急速行进，田野的土壤上响起一片沙沙的脚步声。

我们走了一程，发现远处有一群人迎面走过来。来人到了跟前：四个壮实的老乡，抬着一把圈椅，圈椅里躺着一位胸前缠满白布的伤员。

我正想俯身看看这伤员是谁，这时伤员轻轻叫了一声：“政委……”啊，原来是旅政治部宣传科长辛国治同志！他脸色苍白，话音很低，看来伤势挺重。我赶紧拿过水壶，拧开盖子，慢慢地喂了他几口水。他逐渐有了精神，说话也硬朗起来。他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

今天中午十二点钟光景，驻在夹河村的旅政治部机关和十七团一营的指战员们正在吃饭，突然听到村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炮声，其中还夹杂着东洋马的嘶鸣和鬼子的吼叫。杨忠主任和龙书金团长赶紧搁下饭碗，带领机关部队冲出村子。

跑到村口，只见鬼子和伪军象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大片的庄稼被踩倒了，敌人的钢盔、刺刀，一亮一亮地闪着耀眼的光。

杨主任和龙团长简单商量了一下，便命令一营长带两个连在前面开路，旅政治部和骑兵排居中，一营的另一个连殿后，向陈牛庄方向突围，以便与曾旭清同志带领的十七团三营会合。（后来我们打扫战场时，在陈牛庄至夹河的路上，找到了曾旭清同志派出的那个通信员的遗体。这才知道，那个通信员还没有把信送到夹河，便在半路上牺牲了。）

命令一下，部队便向村西北方向的敌人猛扑过去。但是冲到一片豆子地的时候，遭到了日伪军的疯狂拦击。敌人集中了几挺歪把子机枪，架在一个高坡上，组成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我军前进的道路。机枪子弹泼水似地向豆子地倾泻过来，打得豆叶“扑簌扑簌”往下落。我军指战员被压得趴在豆子地的垅沟里，抬不起头来。

这时敌人已经切断了部队的退路，而且远处的日伪军还在继续向我军的背后、侧翼压过来。我军进退两难，眼看就有冲不出包围圈的危险。

一营营长火了，他大吼道：“不怕死的跟我上！”说罢，带领十几个战士一跃而起，朝着敌人的机枪阵地冲去。可是他们没有跑出几步，便全部中弹倒地，壮烈牺牲了。

在这危急关头，突然从豆子地里站起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黑乎乎，矮墩墩，手里抱着一挺机枪。他名叫小岛，是“日本人反战同盟冀鲁边支部”的支部长。日寇见是“自己人”，不觉一愣。趁这机会，小岛将枪口指向日寇的机枪阵地，一阵猛扫，顿时有几挺机枪被打哑了。

“打得好！”杨主任和龙团长高兴地叫道。

我军抓住敌火力减弱的机会，迅速从豆子地里站起来，勇猛地冲进敌群，杀开一条血路，突出包围，然后直奔陈牛庄。

我听到这里，心中默默地说：“小岛可立了大功！”同时

眼前又出现了小岛的身影。他是日本北海道人，被迫参加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九年初的陵县徽王战斗中，我们把他包围在一个苇子湾里俘获了。后来经过教育，他进步很快，经常拿着个话筒，对据点、岗楼里的日军喊话、唱歌，要他们放下武器，参加反战。他也常和我们的战士一起，帮助群众扫地、挑水等等。开始群众不大理睬他，还悄悄地骂他，后来熟悉了，对他很亲热，大人小孩都爱和他拉呱。记得有一次，他高兴得一蹦三跳，满脸是笑。我问他有什么喜事。他拍拍凸出的衣袋，掏出好几个鸡蛋来，用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说：“大娘，说，给我吃，说我，是好人！”说罢调皮地眨眨眼睛，满脸得意的神色。

我将思绪从回忆中拉了回来，继续凝神静听辛国治同志的叙述：

部队在突围时，辛国治负了重伤，右胸被子弹打穿，鲜血染红了大片衣襟，他用手捂住伤口，血又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他的通信员见科长负伤，刚想赶过来搀扶，不料中弹倒地。另一个姓刘的宣传员，见到这种情况，赶紧撂下刷标语的石灰桶，抢到辛国治跟前，架着他朝前奔跑，可是没跑几步，这个宣传员也不幸牺牲。辛国治咬紧牙关，忍住伤痛，挣扎着踉踉跄跄地奔跑，终于跟随部队杀出了重围。

杨主任和龙团长带着机关部队朝陈牛庄方向奔了一程，暂时摆脱了敌人。他俩见队伍中伤员较多，况且天气太热，便在几棵大槐树前停住，要同志们坐下来歇会儿再走。

大家钻到树荫下休息了不到一袋烟工夫，炒豆般的枪声再次响起，敌人又追上来了。

杨忠和龙书金、辛国治同志立即上马，带领指战员们再奔陈牛庄。未走几步，龙团长的腿被流弹打伤了。他和辛国治两

人的伤口都流着血，不能放马猛跑，只得勒辔缓行，以减轻颠簸。这样一来，他俩就慢慢落到了队伍的后面。

部队很快到达陈牛庄，不料曾旭清同志已经带领三营撤出，村中驻着密密麻麻的鬼子。鬼子发现我军，立即蜂拥上来，同时架起机枪、小炮向我军狂轰猛扫。我骑兵排倒下了将近一半。

杨忠同志喊道：“快走！”一抖缰绳，带着部队向西南方向冲去。龙书金、辛国治等同志落在后面，一时跟不上部队，便拨转马头，拐向西北。

龙书金、辛国治等同志冲出陈牛庄不远，又遭到敌人的阻击。龙团长的坐骑被敌弹打倒，他也跌下马背，被死马压住。他的警卫员勒马来救，当场牺牲了……

说到这里，辛国治同志哽咽起来：“龙团长恐怕已经牺牲了，杨主任也不知怎么样……”

我们心里都感到一阵阵难受。我给他擦去眼角上的泪花，又问道：“后来呢？你是怎么出来的？”

辛国治同志顿了顿说：“当时，敌人涌上来了，我只得拨转马头向南跑。谁知跑到一片棒子地旁边，马失前蹄，把我摔倒在田垅里。我从昏迷中醒来，马已不见了，我就咬着牙在棒子地里爬，爬了一路的血。爬到一块西瓜地边，碰见一个看瓜的老乡。他看了看我臂上的‘八路’符号，赶紧摘下个西瓜，用拳头捶开来喂我。老乡说：‘同志！俺这儿呆不住哇，四边尽是鬼子，你得快走啊！’说着，脱下头巾给我捂住伤口，并让我换上他的衣服。我感动得直掉泪。这以后，我就慢慢地朝西走，走几步，爬几步。到了商惠公路边，又遇上个放牛的老汉。他把我扶上牛背，牵着牛走到了一个村子里，找了把圈椅让我坐下，说是坐圈椅比睡担架好，免得仰着身子伤口痛。

过了一会，老汉又找来四个民兵，关照他们抬着我去找部队……”辛国治同志说到这里，感激地望了一眼抬他的几个老乡。

我也不觉心头一热，便上前紧握着民兵同志的手说：“谢谢，谢谢你们！”这几个小伙子都不好意思起来。

我看时间不早，便命令几个战士留下来，护送辛国治同志到西边村子里去隐蔽。然后，我和黄副旅长带领旅部机关，继续向夹河一带赶路。

晚上十点多钟，我们赶到了夹河。这时敌人已经撤走，四周笼罩着一片战争浩劫后的悲惨、萧杀的气氛。村外的庄稼被踩得乱七八糟，村中被炸塌的房屋还在冒着缕缕青烟。

我们一边打听杨主任和部队的下落，一边借助惨淡的星光月色，在夹河、陈牛庄这两个村子的附近，寻找被敌人冲散的我军零星伤员。

不久，我们便找到了龙书金、罗长波、李青山等同志，他们都是在群众掩护下，才得以幸存。龙团长被死马压住后，冲上来的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挣扎着爬出来。爬到陈牛庄外的一片晒场上，被一位大娘发现，大娘将他藏在秫秸堆里，躲过了鬼子的搜查。十七团参谋长李青山和军区电台台长罗长波，也是在负伤后，分别被陈牛庄的群众藏在村外的水塘里和三官庙中，才得化险为夷。

但是杨主任究竟怎样了呢？我和黄副旅长仍十分焦急。

下半夜，我们又碰到了旅政治部的组织干事徐德民和三十多个战士。徐干事告诉我：部队离开陈牛庄后，就被敌人冲散了，这些战士都是在群众的指引下，才慢慢汇拢到一起的；其中一个杨主任的警卫员，他的胸部负了重伤，现在已经昏迷过去。

等到杨主任的警卫员苏醒过来以后，我们才知道杨忠同志已经牺牲了。原来，杨主任离开陈牛庄后，拍马直奔西南方向，不料又碰上了另一股鬼子。鬼子架起机枪、小炮拦阻，杨主任不幸被一颗炮弹炸中，连人带马倒地。他的这位警卫员正想上前抢救，也中了敌人的子弹。这位警卫员向我们断断续续地说完这些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我和黄副旅长默默地站立着，久久地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我的心象被人揪着似的难受。杨忠同志是和我一起从兑久峪受命东进的，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子！在老乡的热炕上，我们同盖过一床被子；在暗淡的油灯下，我们共同部署过多少次战斗！这位性格坚强、军政兼优的好同志，长期战斗在鲁北地区，使敌人丧胆，受人民崇敬。今天，他匆匆地离开了我们，但他没有走远，他永远含笑站在我们面前。

我默默地望着皓月下的青纱帐，青纱帐在微微的夜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也在诉说着对他的怀念……

夹河一战，悲壮的景象是难以描述的。一营的三个连队为掩护机关突围，损失很大；骑兵排几乎打光了；旅政治部机关、宣传队的大部分同志牺牲了；朝鲜同志徐文进和“反战同盟”的一位日本同志，也为了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幸存的同志几乎全是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下来的，这又使我们从悲痛中感到无比的欣慰：杨忠同志和几百名烈士可以瞑目了，他们用鲜血浇开的花朵，正在结出丰硕的果实！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这难道不是他们为之战斗，为之流血的意愿吗？

几天以后，我们回到宁乐边一带，为杨忠同志和牺牲的烈

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场上，军民一齐举手宣誓：一定要把烈士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把整个鲁北建设成抗日根据地，以告慰为之献身的先烈们！为了纪念为开辟鲁北新区作出巨大贡献的杨忠同志，我们还决定在他带部队开辟出来的游击区——商、济、惠三县交界处，新设置一个县，命名为杨忠县。

夹河战斗后的第十八天，也就是九月二十二日，十六团团团长杨承德和政委陈德率领的第二路东进部队，也踏上了征途。

这是一次冀鲁边和清河两军区的联合军事行动。在十六团出发的四天前，即九月十八日，我给清河军区杨国夫司令员通报了十六团即将沿渤海岸东进的计划和时间，并请杨司令员派部队配合，杨司令员欣然应允。他第二天给我回电说，清河军区准备调集山纵三旅的五个营，与冀鲁边军区十六团同时行动，从马家庄和左家庄两地西渡黄河，尔后向前推进一百八十里，进逼黄河入海口以西的垦区，同十六团会合，聚歼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在垦区义和庄、老鹅嘴一带的顽军。

这天，杨团长和陈政委带着十六团到了无棣县北部的小山。小山是一座孤零零的土山，南北长一公里多点，北头向西拐，形状象英文字母“L”。这座土山的东边和北边各有一个村庄，名叫小山村和山后村。这一带临近渤海，水土咸苦，日、伪、顽不常来。

我军在小山驻下后，杨团长和陈政委及三个营的负责人，便分头了解大魏庄据点的敌情和地形。大魏庄位于无棣、新海两县的交界处，在小山的东面，离渤海不远，是我军东进的一大障碍。这块拦路石不搬掉，就很难在渤海沿岸建立冀鲁边区至清河区的通道。大魏庄驻扎着顽军山东保安第六旅旅长

张子良的一个营。张部对这个村庄的防守很严：村外两里内的道沟全填平了；村四周布着明碉暗堡，组成交叉火力；围墙高达三丈，十分坚固，墙上凿出密密麻麻的枪眼；村内还有地道暗洞。

根据这种情况，杨承德等同志觉得对大魏庄据点不宜强攻，决定夜袭，并对三个营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当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杨团长带着二营，埋伏在小山的西北，准备阻击可能会从沧县、新海、羊二庄来援的敌伪军。陈政委带着三营，埋伏在小山西南，准备阻击可能会从盐山来援的日寇。担任夜袭大魏庄任务的一营，由副团长杜步舟等同志带领，也从驻地出发了。

小山与大魏庄相距三十多里，不到一个半钟头，一营便悄悄赶到了大魏庄。部队在村外二百米左右的地方停下，喘息片刻，便按照预定方案，展开队形，将大魏庄包围起来。

这时，除了附近的村庄传来几声狗吠外，只有从渤海湾吹来的带着咸味的海风，“嗖嗖”地从身边吹过。夜，静得出奇。

杜副团长和营长杨柳新、教导员潘大可，对担负突击任务的二连二班的战士们低声嘱咐了几句，二班便扛着软梯，悄悄向围墙摸去。这时正逢庄稼快要成熟，枯叶被秋风吹得沙沙响，这就掩盖了二班战士们的脚步声。二班到了大魏庄跟前，顽军还没有发现。

二班的战士们越过围子沟，到了墙脚边，架起软梯。所谓软梯，就是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一个个用麻绳做的扣子。战士们在班长的带领下，登上软梯，一个接一个地向上爬。二班长快到墙顶的时候，突然下面有个战士一脚踏空，跌下软梯，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

围墙里的顽军哨兵听到动静，昏头昏脑地把轻机枪从围墙垛口里伸出来，枪管正巧伸在二班长面前。二班长眼明手疾，不等对方扣动扳机，便双手抓住枪管，使劲往外一拉，连人带枪都拖了出来。那个哨兵从三丈多高的墙上跌下，摔了个半死。二班长趁势一跃，登上围墙，端着机枪就朝围墙拐角上的碉堡猛扫。其他几个战士也跟着登上围墙，很快便占领了围墙拐角上的碉堡。

我后续部队随后跟进。指战员们纷纷翻过围墙，杀进村去。顽军从睡梦中惊醒，慌乱成一团，象群鸭子，被我军从东赶到西，从西赶到东，最后走投无路，只得举手投降。

战斗很快结束，共毙、伤、俘顽军副营长以下三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三挺，步枪三百余支。但顽军营长没有被逮住，这家伙趁着混乱，从村里的暗道中逃走了。

战斗刚结束，村里的群众就拿着棍棒、扁担、铁锹等家伙，怒吼着涌向俘虏。俘虏们惊恐万状，有的面无血色，有的索索发抖，有的双手抱头跪在地上求饶。教导员潘大可连忙叫战士们挡住愤怒的群众，并向乡亲们解释我军的俘虏政策。

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冲破战士们的阻拦，一边怒喊着“叫这些野兽偿命，还我们的人来！”一边扑到俘虏跟前乱踢乱咬。接着放声大哭起来：“八路军同志哟，这班畜生杀了我们多少人哟！村南头几十个坑，天天要活埋一个抗属，还不准我们收尸！哎唷，孩子他爹，你死得多冤哪！……”

听着这撕心裂肺的哭声，战士们都落下了眼泪。

杜步舟、潘大可等同志含泪劝走了这位妇女之后，便告别乡亲们，带着俘虏返回小山。

顽军保安第六旅旅长张子良，听说他的主力营在大魏庄被歼，十分恼火。他亲自领兵杀奔小山，并沿途扬言：“不雪大

魏庄之耻，誓不罢休！”同时，盐山和沧县两城的日寇，也配合张子良，分别派兵进犯小山。

杨承德、陈德同志一面命令三个营分头迎战，一面用电台向旅部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我和黄副旅长立即命令无棣、盐山、沧县的地方武装，配合十六团作战。由于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很快便击垮了向小山进犯的张子良部和盐山、沧县两地之敌。

可是，紧接着日寇又从天津出动九架飞机，对小山进行低空轰炸。我军开始没有防空准备，出现了一些伤亡。但在战士们爬上山顶，架起机枪，将弹雨泼向天空的时候，敌机的嚣张劲头消失了，一架架争着爬高，爬到机枪射程之外盘旋了几圈，乱扔了几颗炸弹，便哼哼着溜回天津去了。

十六团在小山进行了短暂的休整。然后，在一天晚上，背上淡水、梨子、红枣窝窝头等干粮，离开小山，向垦区进发。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部队渐渐靠近了海边。越靠近海边越荒凉，沿途没有什么人家，地上也没有什么路。漫野里长满了一蓬蓬的荆条、苇子，象山区的灌木丛，老是缠腿绊脚。而且前几天下暴雨，地上密布着大大小小的泥塘，一脚踩下去，溅起稀泥一大片。战士们在这样的地区行军，还是第一次，感到十分吃力。

按计划，今晚的行军是长途奔袭，路程一百八十里，在天亮前赶到桃儿河。

部队旋风似地向东疾进。因为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所以没走多长时间，大家便疲惫不堪。许多同志一面行军，一面打瞌睡，常与前头的人碰撞。有个战士被碰醒了好几次，还是睡着了。后来一头撞在骡子屁股上，他醒了，迷迷糊糊地以为是前面的同志停下了，就用手拍拍骡子的屁股说：“伙计，掉

队啦！还不跟上吗？”结果被骡子尾巴狠狠扫了一记，这才清醒过来，引得别人哈哈大笑。

拂晓前，部队到了桃儿河渡口。渡口有三只大船，但全拴在对岸，而且有张子良的一个排顽军在把守。杨承德同志派出十几个战士，悄悄地泅水过河，将正在熟睡的顽军全部消灭，弄到了渡船。

渡过桃儿河，上岸就是垦区。

垦区是一片方圆数百里的盐碱地，属于黄河扇形冲积平原的一角。据当地渔民、盐民说，由于从黄河上游冲下来的泥沙太多，这里的陆地每年都向海里延伸一华里左右。也许垦区就是这样形成的。

走进垦区，那是多么荒凉的地方啊！举目望去，十几里、几十里内荒无人烟，看不见一个行人。地面泛起厚厚的碱花，白茫茫的一片；碱花底下就是盐痂疤，人走在上面，“咔嚓咔嚓”作响。只有人把高的红荆条，是这里的主人，漫野丛生。荆丛中常有一群群野雁，扑扑地飞起，撒下一串串凄凉的鸣声，回荡在这荒无人迹的苦海边沿……

由于垦区是个不毛之地，水土咸苦，日寇从不敢在这里驻足。只有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的几个团（号称“四大团”），盘踞在垦区中心的老鹳嘴、义和庄一带。

杨团长和陈政委带领部队，踩着厚厚的碱花和盐痂疤，“咔嚓咔嚓”地朝老鹳嘴方向飞奔。

天，渐渐亮了。太阳从海上探出头来，万道金光顿时照亮了辽阔的平原。

十六团在快要接近老鹳嘴时，忽见东边尘土飞扬，一支庞大的队伍，从老鹳嘴飞奔而来：前边是跃马奔驰的骑兵，后边是黑压压的步兵。

“啊！是清河军区的部队！”

“山纵三旅的同志来啦！”

“我们胜利会师罗！”

十六团的指战员们欢腾起来，争先恐后地跑上前去。三旅的同志们也老远跳下马来。大家互相握手，高呼“共产党万岁！”“庆祝兄弟旅会师！”的口号。三旅的干部被我们的战士抬起来举在空中，我们的干部也被三旅的同志抛起来。口号声、欢呼声和渤海湾的涛声汇在一起，震荡在垦区上空，也激动着每个指战员的心。

原来清河军区部队在十六团到达垦区之前，就已赶到了垦区。他们已经歼灭顽军“四大团”大部，攻下了老鸱嘴、义和庄和罗镇。

杨国夫司令员、刘其人副政委和杨承德、陈德同志费了老大的劲，才使两区部队平静下来。大伙坐在老鸱嘴村外的荒地上，召开了庆祝大会。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杨国夫司令员首先讲话。他说：“教导六旅的全体同志们！我代表三旅的全体同志，对今天的会师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你们远道赶来表示亲切的慰问……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会师，我们没有别的礼物，只为你们每人准备了一把清河区造的刺刀、一袋清河区造的小手榴弹……”接着是刘其人副政委讲话。他表示今后要同冀鲁边军区指战员更好地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粉碎日、伪、顽对黄河两岸的封锁，把清

的最后胜利！”

会场上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家的手掌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

十六团返回后，我们便组织了三支武工队，活动于冀鲁边区和清河区之间，以保护两区之间的陆上交通线。

同时，由于打开了垦区，我们也就建立了一条从新海县的冯家堡、狼坨子，直达垦区郭局子和老鹅嘴的海上通道。

当时冀鲁边军区在渤海湾拥有一支“海军”部队，名叫海上特务团。海上特务团的前身是渤海湾内的一股海匪。这股海匪有三、四百人，为首的叫陈子芳、陈子远，人称陈二虎、陈大虎。这陈二虎胆子大，枪法准，能够在风起浪涌的海上，站在船头，双手开枪，以二十发子弹打碎距离五十多米的二十个鸡蛋。海上封冻前，他们就在海上抢劫渔船、商船，追不上对方时，陈二虎就“当当”几枪，打下对方的篷帆，然后追上去抢掠。官船来追捕他们时，也靠这一手从容逃走，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每到冬季，他们就上岸到新海冯家堡、狼坨子一带修理船只，筹集给养。一九四〇年八月，我们派新海抗日县长杨耀爽去做陈二虎的工作，向他晓以民族大义，劝他参加抗日、为国立功，还说弹药、给养等物资由我们供应。这陈二虎很讲义气，听了这些话，就拍着胸脯答应了。我们又派傅炳翰同志前去负责具体收编工作。不久，成立了海上特务团，由陈二虎任团长，傅炳翰任政委，我们还派了崔奎生、傅近民等同志去当指导员。以前海上特务团只能在新海、盐山、无棣一带的海面上活动，无法在垦区找到登陆点。现在垦区成了我根据地，就为海上特务团在渤海湾开辟了一条通向垦区的航线。再由垦区到清河区，那就较容易了。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奋战，冀鲁边同清河区这两块根据地

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打通了：渤海湾有了陆地和海上两条通道；黄河上空有了一条用无线电波架成的桥梁；被同志们称为“心脏病”的介于两个根据地之间的鲁北东部地区，一部分已开辟成为我军的游击区，这块“心脏病”基本上治愈了。

我们原来计划在垦区会师后，继续与清河军区的部队协同行动，彻底打开整个鲁北东部地区的抗战局面，把黄河两岸建成我们的抗日基地。可是不久，冀鲁边区的敌情日益严重起来，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计划，带领全区六百万军民投入了反“扫荡”的残酷斗争！

艰 苦 突 围

第二十章 柳林英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对付英、美，急需巩固其占领区，将华北建成它的后方基地。因此，日寇在华北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惨无人道地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使抗日军民失去生存的条件；同时，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扫荡”。

仅在这年年底，日寇就数次“扫荡”冀鲁边根据地。其中一次，从济南、德州、沧州、天津等地出动八千人左右的兵力，实行“合围扫荡”。到了一九四二年，敌人对我们边区的“扫荡”更加疯狂，时常一出动就是上万人，并配有飞机、大炮、坦克等。什么“分进合击”、“对角清剿”、“梳篦战术”、“剔抉战术”……凡是想得出的毒招都用上了。小规模的合作、奔袭，则几乎无日不有。

边区的顽军一个个原形毕露了：曹振东公开投敌，刘景良、张子良、王福成等人也暗中依附日寇……这批伪化和半伪化的顽军共达一万人以上。他们专在我军的背后打黑枪，放暗箭，干着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

我们边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我和黄骅、张晔、李启华等同志的心情是沉重的。这几年来，我们八路军部队和人民群众坚持边区的抗日斗争，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但终于建成了冀鲁边这块抗日根据地。可是，现在形势又恶化起来，我们是不是还能顶住？这块辽阔的平原会不会得而复失？

有时候，讨论工作晚了，我们几个领导人一起踱出村外，望着皓月下的千里平原，怀念起长眠的烈士：杨靖远、马振华、曾庆洪、朱挺先、杨忠……一个个活生生地浮现在眼前。他们的英姿举止，音容笑貌，多么清晰，使我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想起挺进纵队东进时八路军总部首长和北方局领导的嘱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在那里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心中更不平静。我想，党的嘱咐，烈士的鲜血，人民的希望……这一切，都在鼓舞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我们能让这块洒遍烈士鲜血的土地再沦入敌手吗？我们几个领导人下了决心：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动边区六百万军民战胜敌人，度过黎明前的黑暗！

这时候，一一五师首长罗荣桓、肖华等同志也在深切地关注着我们。他们决定抽调一批干部来充实边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加强边区的领导力量。其中有原挺进纵队六支队的司令员邢仁甫。邢仁甫一九三九年底从冀鲁边调去鲁西后，曾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恒河支队长，后任山东军区地方工作部部长。师首长考虑到边区干部队伍中，一部分是挺纵留下的，一部分是从外地派去的，原籍是边区的人很少；另外，邢仁甫又一再要求回边区，不安心本职工作。师首长从大局出发，派他回来，任教导六旅旅长兼军区司令员。

一九四二年四月，师部派来边区工作的邢仁甫和四十多名军政干部，从鲁南到达清河区，在垦区老鸱嘴上船，由海上特务团护送到了无棣县小山。这批干部中，有师部作战科副科长陆成道同志，就任教六旅和军区参谋处主任；还有就任后勤部政委的王文模同志，就任三分区副司令员的黄荣海同志等等。另外，山东分局派来的巡视团的于寄愚、彭瑞林、刘干、叶尚志等十多位同志，也随同这批干部到达小山。

我们在小山的山后村，召集县团级以上干部开了欢迎会。大家欢聚一起，共同商议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决心把边区的抗日斗争进行到底。会后，巡视团的同志下到基层检查工作，其他干部也到各单位上任。

不久，我们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三万日伪军，将于五月一日向冀中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军委要我们派部队到津浦路沿线，接应冀中军区突围出来的部队。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也为反“扫荡”一事对我们作了具体指示：“冀鲁边的位置十分重要，日寇很可能在‘扫荡’冀中以后，复来‘扫荡’边区，尤其是津浦路沿线……你们务必作好准备！”

根据这两个指示，我们紧急磋商后决定：十八团（新近成立的）在团长杨柳新、政委杨爱华带领下，马上到津浦路沿线的东光、南皮一带，接应冀中部队；教导六旅的主力部队和各分区的地方武装，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防备敌人围攻。我们军区的几个领导人也分了工：黄骅同志带部队到盐山、庆云、乐陵一带活动；我和陆成道同志带部队到吴桥、沧州一带；邢仁甫提出自己带旅部机关，在新海县冯家堡、狼坨子等海边渔村活动。

我和陆成道同志带着旅部特务营三连和十六团的“铁帽子

五连”，很快便从盐山、新海之间，进入沧州、吴桥一带。陆成道同志当时才二十七岁，长得身材高大。他看问题很尖锐、深刻，带兵打仗有一套，是个优秀的军事人材。他告诉我，他是四川人，放牛娃出身，很小就当了“红小鬼”，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们有时候夜行军找不到向导，他就拿只指南针走在头里，在敌人据点之间穿来插去，从没出过差错。我真为有这样一位好助手、好战友感到高兴！

我们到达沧州一带后，日寇对冀中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开始了。冀中八分区的后勤人员、教导队五百多人、武装宣传队七十多人、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及冀中军区主力二十三团，由于早先听到过辛国治同志在冀中时对冀鲁边情况的介绍，所以，他们先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都顺利地跨过津浦路，进入了冀鲁边区的沧州一带。我和陆成道带着部队，连夜将冀中的同志护送到新海、盐山一带的海边隐蔽。之后，我俩又带着部队到了宁津、乐陵一带。

这时，杨柳新、杨爱华同志带着十八团，仍在东光、南皮一带，接应从冀中突围出来的零星人员。

日酋冈村宁次在“扫荡”冀中之后，又调兵遣将，对冀鲁边区进行血腥的大“扫荡”。冀鲁边广大抗日军民立即投入了空前激烈的反“扫荡”斗争。这场“扫荡”和反“扫荡”的斗争，持续了五十多天。

五月二十六日晚，冈村宁次飞抵德州坐镇，指挥日寇两个旅团及伪军共两万多人，从德州、连镇、泊镇等铁路沿线据点出发，以多路奔袭的战术，对我东光、南皮、宁津、庆云一带实行“拉网包围”。拂晓后，包围圈基本上形成。敌人的骑兵、装甲部队在包围圈里反复“拉网”、轮番“清剿”……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简直是一群野兽！

敌人的合击圈以东光县四柳林（赵家柳林、孙家柳林、王家柳林、官家柳林）一带为中心，东起南皮县沟章寨子，西至东光县秦村，南自宁津县双堆镇，北至宣惠河畔刘夫青，方圆六十余里。我边区的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机关和部队全都陷入敌人的包围圈。

在日寇发动大“扫荡”的这天，我和陆成道同志带部队驻在乐陵县大桑树一带。因为一分区、一地委和一专署没有电台，我前几天派人给他们送了两次信，都没有听到回音，也不知道信送到了没有。为了同他们取得联系，我和陆成道商量，准备沿着鬲津河南岸向西活动，到东光县边沿的刘宅一带去寻找他们。

当夜，我们就带着部队出发，沿着鬲津河南岸走了一夜，拂晓时到达刘宅村边。这里与敌人的合击圈仅有一河之隔。我们正准备进村，只见对面跑来一个挑担子的。我忙迎上去问道：“大哥，西边有什么动静吗？”

那个人用衣袖擦了把满脸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同志，你们快走吧！那边尽是鬼子，遍野地跑，还有马队、大炮，黑压压的望不到边儿。”

我听到这话，与陆成道对视了一眼，只得命令部队沿原路返回大桑树。

部队刚走了一、二里路，担任前卫的三连就与敌人打上了。原来，我们来时，后面就跟着一股敌人，我们一回头，就与他们遭遇了。

我侧耳听了听枪声，估计这股敌人不少，就命令部队退回刘宅。部队在离刘宅不远处涉水过了鬲津河，朝北又走了三里多路，才在一个村子里歇下来。

与我们遭遇的这股敌人，没有追上来，继续赶往西边

去了。

部队在村中休息了一会，正准备烧水做饭，哨兵跑进来向我悄悄地报告：“政委！村外发现敌人！”

我和陆成道出去一看，村外远处的道沟里，闪出一大片刺刀的亮光，脚步声、武器碰撞的丁当声……嘈杂地混在一起。

好险哪！我们马上命令部队转移，脱离这股敌人。部队把半生不熟的饭扔下，就悄悄地向东出发了。

中午时候，我们听到从西边传来的枪声、炮声和隐隐约约的喊杀声、马嘶声。我估计日寇已开始大规模“扫荡”，一分区、一地委和一专署的同志们可能陷入了重围。到了下午，路上奔走着一群群逃难的群众，有的是大爷大娘，有的是妇女小孩，都背着包袱衣物，哭哭啼啼。有几个妇女一见到我们，便边哭边诉说：亲人被鬼子杀害了，房子被烧了，遍野里尽是鬼子，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我们的心沉重得象块铅，眼望着西边被战火硝烟笼罩的天际，听着那沉闷的炮声和隐约传来的杀声，真为一分区、一地委和一专署的同志们担心！我们真想冲到西边去，跟鬼子拚了！但理智告诉我们，这万万使不得，鬼子正希望我们去自投罗网。

黄昏时，不幸的消息传来了：一地委、一专署和一分区机关全被敌人包围在四柳林、大小单家一带，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妇救会主任崔兰仙、文救会主任吕器等一百多名干部壮烈牺牲！从冀中突围来到边区的同志们，有的也陷入敌人的包围圈，英勇牺牲了。

这真是前所未遇的、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啊！我悲痛得几

乎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地听着几个突围出来的干部、战士在悲愤地诉说——

昨天夜里，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带着一地委和一专署机关及一个警卫连，驻在东光城东南靠近南皮的大小单家。凌晨，杜书记和石专员发现村子四周都有鬼子，鬼子密密麻麻地围上来，一边用各种火器猛打猛扫，一边叽哩呱啦地狂呼乱叫。他俩见敌情严重，就亲临村口组织部队突围。

敌人冲到村口时，我警卫连突然猛烈开火，打倒了一批敌人，杀出个缺口。警卫连乘势掩护着机关冲出村外，向北面四柳林一带撤去。

谁知部队刚冲到赵家柳林附近，迎面又是一片黑压压的敌人，后面的鬼子则紧追不放，子弹象飞蝗般扫过来。在敌人两头夹击下，我们的一批干部、战士倒了下去。

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见情况危急，便准备豁出命来，掩护机关、部队突围。杜子孚高声喊道：“同志们快向东撤！”说着，带领一个班的战士，迎着正面的敌人冲杀上去。石景芳同志也带着一个班，转身朝尾追的敌人猛烈开火。这样，暂时顶住了从两边压过来的敌人。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其余人员，趁机从敌人的夹击缝隙中冲出，边打边顺着道沟向东撤。

敌人气得嗷嗷叫，以加倍的疯狂，将杜子孚、石景芳等人紧紧包围起来。这时，战士们的子弹已打光了。杜子孚和石景芳同志带着两个残缺不全的班，挺着刺刀，背靠背围成圆圈，怒视着敌人，准备肉搏。杜子孚对同志们大声说道：“我们生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死是中华民族的鬼魂，一定要和敌人拚到底！”

鬼子恶狠狠地扑到了跟前，我们的十几个同志，用刺刀、拳头、甚至用牙齿，同敌人拚杀、撕咬，进行殊死搏斗。杜子

孚见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向石景芳的后背刺去，失声喊道：“老石！敌人——”随即拾起一块砖头砸过去，打倒了那个鬼子。不料他自己却被后面的敌人刺了一枪。他捂着伤口，摇晃着回过身子，怒目圆睁，对敌人骂道：“狗、强、盗！”说罢倒在血泊里。石景芳冲上去救他，不幸也被敌人刺中，壮烈牺牲了！

两个班的战士，也先后全部倒下了。向我述说战斗经过的这个战士，是在和敌人拚断了刺刀后，装死躺在血泊里，等敌人离开才逃出来的。他是那两个班的唯一幸存者。

向东撤退到大小单家的地委，专署机关和警卫连，刚刚摆脱了夹击的敌人，转向东南撤走，又遭到大批日寇的阻击。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对大家喊道：“机关继续向东撤！部队跟我来！”他带着警卫连占据了一条东西向的道沟，向两边的敌人猛烈还击，掩护机关干部从道沟中折向东北，转移到南皮堂孙庄一带安全的地方。

邸玉栋的右臂已经被敌人打断了，鲜血染红了整只袖管和大片的前襟。他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手枪支在沟沿上，用左手扣动扳机。同时还鼓舞大家：“瞄准了打，打倒一个够本，打倒两个就赚了！”后来警卫连一边打，一边沿着道沟向东撤去。邸玉栋带着身边的几个战士，仍留在原地阻击敌人。敌人端着机关枪狂扫，邸玉栋同志和这几名战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光荣地流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鲜血。

就在杜子孚、石景芳同志在赵家柳林与敌人殊死血战的时刻，一专署妇救会主任崔兰仙和一个小分队，也在孙家柳林被日寇包围了。小分队的战士都先后牺牲，崔兰仙同志也负伤被俘。她见敌人想把她推上卡车押走，便对着鬼子猛踢猛咬，口中还大骂道：“你们这些强盗！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中国人

绝不屈服！”鬼子恼羞成怒，当即把她杀害了。一专署的文教会主任吕器，也在这附近不幸遇难。

第二天，一分区机关又在四柳林西边十来里路远的几个小村里，遭到敌人骑兵的袭击。分区副司令员傅继泽同志指挥机关、部队，利用还未长成的青纱帐，边打边撤。机关、部队损失很大。幸存者大部分都是分散隐蔽后突出来的。

杜子孚、石景芳、邸玉栋、崔兰仙、吕器……我默默地念叨着这些熟悉的名字，心中充满对他们的敬仰之情和对日寇的仇恨。杜子孚是南皮黑龙村人，石景芳是无棣人，邸玉栋是盐山邸家楼人，崔兰仙是旧县镇人，他们都是津南地区早期的党员，为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吕器同志又名杨希玲，是一九三八年和杨靖远、李启华等同志一道从外地调来边区的。如今，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冀鲁边的土地上！他们都是宁死不屈、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

“一定要为他们报仇雪恨！”这是我心底的誓言。

天色黑下来以后，我和陆成道同志带着部队到了宁津、东光两县交界处的一个大洼里，打算继续向东进入宁津县寻找战机。但战士们因为连日行军，十分疲劳，就在大洼里坐下来休息。“铁帽子五连”连长杜万祥走过来对我说：“政委！大家实在太累了，肚子又饿，走不动了，今晚上就在这儿露营吧！”

我生气了，回答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你能睡大觉？都起来给我走！走不动就爬，爬不动就滚！马上离开这里！”

天明时，我们到了宁津县境，听说昨天夜里，日寇“扫荡”了宁津、东光两县交界处的那个大大洼。听到这消息，杜万祥直伸舌头：“我的妈也，真玄哪！”

这天，我和陆成道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趁日寇“扫荡”东光四柳林，宁津、乐陵一带敌人兵力空虚的机会，发动一次进攻，拔除几个据点，煞煞敌人的威风。我们对此作了具体部署：特务营一连攻打宁津长官南边的一个据点；特务营营长贾乾瑞带两个连，攻打盐山圣佛寺西北的一个据点；我与陆成道亲率“铁帽子五连”，攻打乐陵王相家据点。

是夜，夜色很浓，没有一丝月光。我们三路人马悄悄出发，分别逼近敌人的三个据点。然后发起猛烈攻击，很快便摧毁了这三个据点，全歼王相家据点的伪军一个中队，重创另外两个据点的日伪军。这一胜利虽不算大，却吓得日寇把附近的一些临时据点都撤掉了；而且鼓舞了四周群众反“扫荡”的斗志。

这时候，我相继接到黄骅同志和邢仁甫发来的电报。黄骅同志已带着部队从庆云、盐山一带撤回新海县，和邢仁甫带领的旅部机关会合。他在电报里说，邢仁甫胆小怕死，只顾经营自己个人的安乐窝。邢仁甫则在电报里说，黄骅骄傲自大，主观武断。他俩都要我回去做对方的工作。我只得和陆成道同志带着部队赶赴小山、冯家堡一带。

到了冯家堡，得知邢仁甫在渤海上找了个名叫望子的小岛，把后勤机关和自己的家都搬到那里，他自己也常住岛上，将边区军民的反“扫荡”大事丢到了脑后。我非常生气，便和黄骅、陆成道等同志赶到岛上，召开党委会，批评了邢仁甫。邢仁甫在大家的严肃批评下，勉强地作了检讨。

一个多月后，敌人对我一分区的疯狂“扫荡”陆续结束了。可是在这之前不久，七月二日，我十八团在南皮大七拨附近也被敌人包围。部队虽然突出了重围，但损失很大。团长杨柳新和警卫员小高都牺牲了。会计张金铭负重伤后，为了不让

全团的伙食经费落在敌人手里，将钞票点火烧了，后被敌人用刺刀挑死……

日寇的大“扫荡”结束后，我们又迅速配齐了一地委、一分区、一专署的领导班子；山东分局派到冀鲁边巡视工作的彭瑞林同志，经上级批准，接任一地委书记；原乐陵县委负责人王亦山同志接任一专署专员；曹戎同志任地委副书记。许多遭到破坏的群众团体也相继恢复。一地委辖区的工作又迅速开展起来了。四柳林等地的广大军民，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了牺牲的烈士，又英勇地投入了新的斗争。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复仇的怒火在炽烈地燃烧！日寇是永远也摧不垮我们英雄的人民的！

第二十一章 激战王楼

日军集中兵力“扫荡”了我一军分区之后，又开始部署兵力，合围我二军分区。

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的部队，活动在鲁北的十来个县。这个地区一马平川，处于济南、德州、惠民的三角地带中间，极利于这三大重镇的日寇对我进行“合围扫荡”。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二军分区的地方武装，在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徐尚武、政委曾旭清（兼二地委书记）和二专署专员孙子权的领导下，活跃在临邑、济阳、齐河、陵县一带。他们炸毁敌人军车，劫夺敌人军火，割断敌人电线，拔除敌人据点，不断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成为鲁北敌人最为头疼的

“心腹之患”。

次年一月二十六日（农历腊月二十日），日寇集中济南、德州、惠民三个重镇及济阳、商河、禹城、齐河、临邑等县的二千日军和三千伪军，对鲁北我军实行“合围扫荡”。

一月二十五日，我二分区、二地委和二专署的领导干部，正集中在济阳县皂户李家村开会。保卫这三个领导机关的，有分区基干营、黄河支队和平禹县大队，总兵力在一千人左右。

第二天，三个领导机关从骑兵侦察员的报告中得知，五千多敌军已对鲁北实施合围，而且正在收缩兵力，向济阳、临邑一带压迫。于是，三个领导机关决定分两路突围：孙子权带领地委、专署机关和基干营第四连，为一路；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带领分区机关和基干营的三个连、黄河支队、平禹县大队等，为另一路。

孙子权专员带领的一路机关部队，离开皂户李家村之后，转移到距徒骇河南岸十多里的岳王庄。后又转向西北到达刘家口附近，再转向东北跨过徒骇河，接着便径直向北。这时右边、前方都压来了敌人，逐渐形成包围圈。孙专员带着机关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仍旧向北，迎着敌人冲过去，很快便杀开一个缺口突围出去。因为这时敌人的包围圈还很大，兵力比较分散，容易被冲破；而且包围圈上的敌人也不敢掉头追赶，如果一追赶，包围圈便成了网开一面，便破坏了他们既定的合围计划。但是敌人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兵力比较集中，他们就会随追随扑了。敌人不敢追赶，二地委和二专署机关也就安然破网而出。

孙专员突围出来，立即派人向我报告日寇“扫荡”鲁北的消息。当时我正活动在津南的吴桥、德平一带，听到这消息，心里非常挂念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同志及二分区机关

部队的安危。我立即派出五、六个侦察员，扮成卖扒鸡、卖花生的小贩，前往鲁北打听消息。但这毕竟不是应急的办法。如何才能减轻日军对鲁北的压力，缓解二分区的紧急局面呢？我和副旅长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打法：命十六团主力和一、三分区地方武装，在津南全线出击，以钳制津南日军入援鲁北，动摇鲁北敌军的士气。这样虽然不能完全替二分区解围，但至少可以减轻二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的损失。

当天晚上，我们就下达了作战命令：十六团三营向北进入沧县，佯攻沧州；东光县大队和南皮县大队，破坏津浦铁路；吴桥、德平两个县大队，发动群众，虚张声势，围攻县城；盐山县大队破坏敌人通讯联络。我和陆成道同志率领十六团二营五连，在吴桥和宁津之间袭扰敌人。

这天夜里，在津南平原这块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威武壮观、惊天动地的好戏：敌人的十几个据点相继被拔除；无数岗楼腾起了熊熊大火；津浦路上的铁轨挪了位置，一列军用货车被颠覆；沧（州）盐（山）公路上的电线杆被放倒，电线被割掉几千米，敌人通讯中断……

这一切，使津南日军大为恐慌。第二天，我们打进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送出消息：日军驻沧州的第九师团三十九旅团的旅团长安江纲彦大佐，昨晚接到各县纷纷打来的告急电话，急得暴跳如雷。他午夜十二点给济南的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发电报，声称津南危急，请求撤销原计划，免调津南部队入援鲁北。细川忠康中将将他训斥一顿之后，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们虽然钳制了津南日军，但鲁北日寇还有五千多人的兵力。二分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心里仍旧非常着急。

没过几天，派去鲁北打听消息的侦察员纷纷回来了。我这

才知道，二分区的大部分主要领导人和机关干部，以及一些部队，都已经脱险，但也有许多同志壮烈牺牲。这些死难烈士在反“扫荡”中表现出的英勇气概和顽强精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膜上，时时激动着我的心，使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那天，也就是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分区机关和基干营三个连、黄河支队等，在龙司令员、曾政委和徐副司令的带领下，离开皂户李家村以后，因为人数多，目标大，不久就被敌人发现。于是，日伪军便对二分区机关跟踪合围，这时的包围圈直径不过二十余里。

基干营营长赖金池和黄河支队支队长郑亚刚，指挥基干营、黄河支队和平禹县大队，保护着分区机关，向北转移。行至临邑县城南的王家楼，正碰上从济阳出来的日伪军近千人挡住去路。我军掉头向南，行不多远，又遇上齐河、禹城之敌。再转身向东，只见东面黑压压的逃难群众，跌跌撞撞地奔来，杂乱的脚步声、哭喊声由远渐近。我军复向西，仍然发现逃难的群众。

我军遭到了敌人重兵的包围。渐渐地，敌人的钢盔、刺刀已隐约可见。包围圈在很快地缩小，包围圈的“壁”增厚了。起先敌兵的间隔距离只有一步左右，不多时敌兵已经肩碰着肩，后来敌人的单线包围圈化成了里外三层。我军被紧紧地围困在王家楼。

这王家楼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孤零零地座落在荒野的大洼中间。大洼里没有庄稼，遍地都是荒丘、坟堆、芦苇塘和稀稀拉拉的枣树、零零星星的红蓟草；草丛里和洞穴中隐伏着野兔、狐狸，显得十分荒凉。

这时正是下午三点多钟，凛冽的西北风怒吼着，天空的鹅毛大雪被刮得飘飘扬扬往下落。地上早已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阴沉的天空迷迷茫茫，而且狂风常常把地上的积雪卷起，送上天空，又撒向四周，搅得人睁不开眼睛。

敌人的包围圈越收越小，已经到了子弹可以交互穿射的程度。

压进圈子里的逃难群众，背着包袱，担着箩筐，推着小车，牵着毛驴，拖儿带女，也涌到王家楼附近。他们看到八路军的大部队驻在这里，惊恐顿时减了大半。年轻力壮的返身站住，纷纷抽出扁担，从小车上抓起撑棍，准备协助我军作战。

龙司令员、曾政委和徐副司令，先指挥战士们将老弱病残的群众扶到村里安顿下来，然后对兵力作了具体部署：基干营一连，由连长赵易昌带两个排坚守村北的一座土丘，余下的一个排，则坚守村东北的一片坟地，全连的任务是用扇面形的火力，抗击从东北方向进攻王家楼的敌人；基干营三连，守住村西南的刘家大屯；基干营二连，埋伏在村东南的枣树林里；平禹县大队把守村西北；黄河支队留在村内待命，以作驰援危急之处的机动兵力，同时负有保卫分区机关和逃难群众的责任。三位领导同志的意图是暂时顶住敌人，拖到晚上再设法突围。

我军部署停当，敌人也距王家楼村不到百米远了。狂妄的鬼子以为我军在他们的重兵合围之下，已成网中之鱼，所以不开枪也不打炮，一个个挺胸突肚，慢吞吞地向王家楼逼近。

我军指战员静静地伏在各自的阵地上。漫天飘落的雪花很快将每个人都盖住了，白皑皑的积雪抹去了阵地上伏兵的痕迹。战士们在雪被的伪装下，紧盯着步步逼近的敌人，巴不得他们快些上来，好让他们早点尝到子弹的滋味。

敌人嗷嗷地叫着上来了，到了距离我军阵地只有二十多米

的地方。我军阵地上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几十个伪军和鬼子被撂倒在阵地前沿。敌人原以为我军退守在村里，没料到突然从厚厚的积雪下面窜出无数子弹，一时措手不及，赶紧退了下去。但他们似乎感到被网里的鱼儿刺伤是莫大的耻辱，很快就又以加倍的疯狂蜂拥上来。

坚守在村北土堆下面的一连长赵易昌，见敌人上来，便把帽子一甩，抱起机枪，跳上土丘的顶端，朝着敌群“哒哒哒”地猛烈扫射。机枪的怒吼和震动，使他也周身剧烈地抖动起来，但他咬紧牙关，毛发倒竖，额头上的青筋暴突出来，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巨人般地屹立在土丘顶端，将愤怒的子弹喷射出去。

伪军们被慑住了。鬼子们却依然踩着死者的尸体往上冲，但冲上一批，倒下一批。这时有个日寇小头目，躲在一棵枣树后面，举起盒子枪，瞄准了赵连长。

“当心，赵锤子（赵易昌的绰号）！”一连指导员发现了那个正将枪口瞄准赵连长的敌人，但他正在填压子弹，一时来不及将敌人干掉，便急忙一面喊叫，一面纵身跃上土丘的顶端，用身体护住连长。就在他跃上土丘顶端的时候，敌人的枪声响了，罪恶的子弹击中了指导员的胸膛，指导员壮烈牺牲了。

赵连长看到战友倒下，火冒三丈。他刷地拨转机枪口，对准藏在枣树后面的凶手，“哒哒哒”就是一阵点射，将那日寇头目的脑袋打了个稀巴烂。

就在赵连长拨转机枪口的时候，刚才被他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正面敌人，趁机一齐举枪向他射击。赵连长的左臂被一颗子弹打伤，机枪“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这时候，已被敌人炮弹炸断双腿的、只有十九岁的连队党

支部书记刘文豹同志，将手枪往腰里一别，双手着地，手腿并用，飞快地爬上土丘。他双膝跪在地上，将机枪的枪管顶在头上，双手攥紧，稳住枪身，让赵连长单手勾动枪机，继续扫射。

一连只有两个排守在这土丘后面，而正面之敌有五、六百人。加之土丘陡削，地面泥土松散，既难架枪，又不易发扬火力，所以打得异常艰苦。

战斗已经相持了个把钟头，敌人非但没有突破我方阵地，反而在阵地前沿铺下了一层尸体。但日寇将同伙的尸首作为掩体，继续同我军对峙。

坚守在村东北坟地的一连的另一个排，战斗更为激烈。敌酋见这里人数不多，却久攻不下，十分恼火，一面督令士兵们硬着头皮往上冲，一面调集了大小炮数十门，用炮火支援步兵进攻。一群群的炮弹落到坟地上，炸得雪泥纷飞。有些坟堆被削为平地，平地又被炸出无数个弹坑。荒凉的一片坟地，浓烟密布，坟墓中的白骨被炮弹掘起，纷纷抛上天空，又雨点般落下。

我军的这个排伤亡大半。剩下的同志，跳进弹坑抗击敌人，但弹坑很快又被毁平，有的人竟被埋在里面，窒息死了。

这个排的火力大大减弱，大批鬼子趁机嚎叫着冲上来。阵地上仅存的几个战士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虽然打死不少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相继壮烈牺牲。最后只剩下了四班长一人。

四班长生得虎背熊腰，五大三粗。他端着打光了子弹的步枪，左挑右戳，横扫竖劈，一口气干掉了六、七个鬼子，杀开一条血路，退到坟堆后的一个苇塘里。

这苇塘内的水已冻得厚厚实实，冰上稀稀拉拉地露出一些

苇子。几十个鬼子把苇塘团团围了起来，又胆战心惊地跨下苇塘，一步步向苇塘中间逼来，企图活捉四班长。等到敌人逼近身边的时候，四班长手中的刺刀又挥舞起来，忽左忽右，忽前忽后，点谁谁伤，刺谁谁死。他自幼练过武功，此时施展开来，以一当十，令数十日寇胆寒。

鬼子们见对手勇猛，便打消了活捉的念头，一齐举枪射击，四班长双腿中弹，倒在冰上。趁这机会，鬼子们的四、五把刺刀同时向他戳来。他坐在冰上，右手奋力一个横扫，拨开了敌人的刺刀，尔后左手掉过枪刺，对准自己的咽喉扎了进去。他不甘被敌人生俘，也不愿死在敌人刀下，选择了为中华民族自我捐躯的壮举！

这股日寇占领了坟地，又立即从侧翼进攻我土丘阵地。赵易昌连长带领的两个排腹背受敌，情况危急起来。

与此同时，坚守在村西南刘家大屯的三连，坚守在村西北的平禹县大队，以及由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同志率领的坚守在村东南的二连，与敌战斗同样十分激烈。有时敌人已经逼近阵地，又被我打退，有时敌人已经占领了阵地，又被我夺回。我军伤亡渐趋严重，处境也更加艰难。

不一会儿，风停雪止，夜幕降临了。龙书金、曾旭清、徐尚武同志认为突围的时机已到，便派警卫员王贤忠传令各阵地，要大家务必坚持最后几分钟，顶住敌人的进攻。接着又派人进村通知黄河支队，立即保护着分区机关和群众，从村南突围。

黄河支队接到命令，火速将分区机关和群众夹在中间，冲出村南。这支生力军将所有机枪集中起来分成两组，一组放在队前用以开路，一组放在队尾用以殿后。日寇见我军突围，慌忙分兵从东、西、北三方前来堵截。黄河支队以锐不可当的凌

厉攻势，奋力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径直向南转移。

我分区基干营和平禹县大队，拚命拖住敌人，掩护分区机关、黄河支队和乡亲们突围。但敌人除了继续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向我阵地进攻之外，又分出一支部队尾追我突围部队。

我突围部队因为夹带着老弱群众，行进速度大受影响，只能在一尺来深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南缓慢行走。

不一会，日寇追赶上来了，但遭到我殿后机枪火力的阻击。日寇一时不敢靠拢，便拉开一段距离，跟着雪地上的脚印，不紧不慢地追赶。

行不多远，我军前面横出一条大河——徒骇河。河宽约一百米，河水都结成了厚厚的冰。河岸两边的斜坎，本来就比较陡峭，加之现在斜坎上的积雪都冻结了，表面滑溜溜的，真象两块倾斜、光滑的玻璃。

我突围部队到了徒骇河跟前，知道倘若沿着河岸走，无论向东或向西，都很难摆脱敌人的追赶。于是沿着斜坎溜下河里，在冰上歪歪斜斜地朝对岸奔跑。我军刚到南岸，敌人也赶到了北岸，在河堤上架起机枪扫射。我军赶紧上岸，但要爬上又陡又滑的斜坡，十分困难。不少人刚刚爬上一半，又“哧溜”一声滑了下来。尤其是老弱病残的群众，简直无法向上爬。大爷、大娘们一个劲催促年轻力壮的子弟兵：“孩子，你们快走，别管俺，俺的老骨头就是丢在这里，也没啥子要紧。”但战士们执意不肯，硬是顶着北面射来的弹雨，拚命将乡亲们扶上河岸。

待到活着的人全部上了河岸，河面已躺着不少牺牲者的尸体。鲜血染红了白雪，融化着冰块。

战士们上了南岸，立即将机枪一字儿排开，防止日寇继续

尾追。日寇见我方大部分人马已隐入南岸大堤的背面，走进低洼的田野里，而且南岸已摆下机枪等待，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我军和群众突围出去。

军分区机关和黄河支队虽然脱离了险境，但龙司令员、曾政委、徐副司令和基干营等部队，仍被敌人困在王家楼，而且剩下的人数已经不多了。坚守在村西南刘家大屯的三连和坚守在村西北的平禹县大队，除少数人突围外，其余全部阵亡。坚守在村东南的龙司令员、曾政委、徐副司令和二连，也只剩下少数人。坚守在村北土丘周围的一连的两个排，只剩下三个人。但他们仍顽强地进行殊死战斗。

村北土丘阵地上剩下的三个同志，一个是连长赵易昌，一个是班长李光谛，另一个是机枪射手，名字记不清了。机枪射手的左臂刚被炮弹炸断，他用右手拾起一根被子弹击落的柳条，在牙齿的协助下，将伤臂扎紧，继续抱起机枪扫射。不久机枪的枪管被炮弹炸弯了，他见旁边有一挺战友牺牲后遗下的花机关枪，便挣扎着爬过去。就在这时候，日寇的一发炮弹打来，正落在他的头上……。班长李光谛，浑身枪伤无数处，早已成了个血人。在他的机枪打光子弹的时候，他无力转身去拿战友遗下的武器，继续打击敌人，便趴在雪地里，挣扎着将机枪零件拆卸下来，再用手刨开冻得硬梆梆的积雪，将机枪零件埋掉。然后趁着还有奄奄一息，使劲抽出别在腰间的手榴弹，用小拇指勾住引线环。等敌人冲上来时，他骤然拉出引火线，拖住十几个鬼子同归于尽。

土丘周围已完全消失了抵抗的枪声。唯一活着的连长赵易昌，身中七弹，已昏倒在雪地上。他的呼吸微弱得难以用手触摸出来，血液几乎停止了流动。敌人见这个极难对付的八路倒在地上，还以为是诈死，唯恐受到突然袭击，久久不敢接近。

以后慢慢地走拢来，见他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尤其是脸上的积雪没有化开，这才互相叽咕了几句，确信赵易昌已死。但这批野兽对已“死”的这位八路还不肯放过，因为他们日本帝国的军人，死在这位八路的机枪下的实在太多了；他们临走前，用皮靴在赵连长的头部狠狠踢了几脚。

赵连长因为流血过多，出现昏死性休克，不久又苏醒过来。他醒后便挣扎着爬起来，用臂肘、膝盖支撑着身子，以惊人的毅力向正北方爬行。爬不动了就喘息一阵，再向前挪。一直到下半夜，终于爬到一座村里，被一位老太太抱到家里掩护起来。这老太太从此终日终夜守在他身边，用鸡汤给他调养，终于使他治好了枪伤，恢复了健康。赵易昌同志现在还活着，听说在山东聊城军分区任副司令员。

我军阵地相继陷落敌手，现在只有村东南的枣树林阵地上，还响着断断续续的枪声。龙司令员、曾政委和徐副司令，仍然坚持同敌人战斗。但枣树林阵地的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各处的日寇和伪军全部集中到了这里。

他们身边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三人都被敌人分别隔开，各自带着几个人，各自为战。他们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更不用说互相策应了。

不久，矮矮胖胖、短小精干的曾旭清政委，身边只剩下警卫员小耿一个人了，他的坐骑也早已被敌人打死。这时从敌方惊逃过来一匹高大的洋马，曾政委叫小耿骑马强行突围，由自己掩护。小耿说什么也不肯。最后曾政委决定自己骑马持枪在前开路，让小耿拖住马尾巴，一道突围。于是曾政委翻身上马，小耿使劲揪住马尾巴。曾政委双腿一夹马腹，洋马狂奔起来，小耿也双腿离了地。洋马冒着弹雨，冲进敌阵。日寇吓得一时没了主意，纷纷闪到两边，来不及躲避依旧爬在地上的，被马蹄

踩得嗷嗷直叫。转眼之间，曾政委和小耿闯出重围，疾驰而去。

紧接着，龙书金司令员在一个战士的掩护下，也手持驳壳枪突出包围。

现在王家楼村外的所有阵地上，只剩下徐尚武副司令一个人了。他见自己孤军奋战实在抵挡不住了，便边打边退，退到王家楼村里，又退到一个院子里。

他关上大门，倚在影壁旁边喘息了一阵，擦了擦伤口上的血，然后走到当院里设法隐藏。这时从正屋里走出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太太，她望着徐副司令，用手指了指当院东边的一个角落。徐副司令醒悟过来，明白那里有个地瓜窖。他掀开盖子，跳进地瓜窖。老太太走过来替他盖上盖子，又拖来一捆柴草盖上。

不料徐副司令的行动，被趴在隔壁墙头上的一个老地主发现了。

日寇撞开院门闯了进来，东翻西搜了一阵，结果连徐副司令的影子都寻不着。鬼子们挺着刺刀威逼老太太交出人来，老太太装聋作哑，坚决不说。就在鬼子们无可奈何之际，那个地主从隔壁赶了过来，无耻地朝日寇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接着便说出了徐副司令的藏所。

日寇用刺刀拨开柴堆，刚挑开地瓜窖的盖子，冷不防从窖子里飞出一颗子弹，一个鬼子应声倒下。其余的鬼子吓得四处散开，远远地举枪朝地瓜窖射击。然而地瓜窖口子小，肚子却很大，徐副司令贴壁蹲在里面，安然无恙。鬼子又朝窖里扔了两颗手榴弹，结果都未投进。后来虽然投中了，但又被徐副司令扔了出来，反倒炸死炸伤了好几个鬼子。

日寇大为恼火，搬来了秫秸，点上火，惨无人道地将浓烟朝窖子里灌。就这样，抗日英雄徐尚武同志被活活地熏死在

里面。

过了好久，日寇才跳下地窖，将徐尚武烈士的尸体搬了上来。他们给尸体拍了照片，又把首级割下来，悬挂在临邑县城南门的门楼上，以宣扬他们“扫荡”的“赫赫战果”。殊不知这一颗人头是以数十倍的代价换得的。

徐尚武同志原名徐荣耀，一九一二年生于无棣县大庄街一个中农家庭里。高等小学毕业，一九三二年开始在盐山县的一所学校执教。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更名尚武，立志从事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一九三九年冬，他任临邑县抗日县长。一九四一年秋，他在临邑县宿安东北小寺村的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伤愈，升任冀鲁边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徐尚武同志牺牲后，二分区人民莫不痛哭失声。当时鲁北广大群众为悼念徐副司令，还编了这样一首歌谣：“临邑抗日县政府，县长就是徐尚武。为国家，为民族，披星戴月不辞苦。除恶霸，灭日寇，拯民水火胜父母。王楼战斗威名扬，民族英雄垂千古。”

王家楼战斗之后，陆续回村的群众，为纪念八路军烈士，在村边竖了块抗日英雄纪念碑。但碑文只刻了一部分，日寇又来“扫荡”了。乡亲们匆忙将石碑埋入地下。直到解放后，石碑才掘出来，又重新竖起了。人们尊重历史，缺的碑文未加补全。这残缺不全的碑文，说明了当时敌人“扫荡”的频繁，也是冀鲁边人民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对子弟兵一片爱戴之心的见证。

后来冀鲁边军区的老同志郑正，忆起此事，还写了这样一首短诗：

王楼血迹斑，
烈士眠九泉。

刻石词未尽，
先驱创业难。

第二十二章 宁死不屈

王家楼战斗之后没几天，驻济南的日军师团长细川忠康中将、驻天津的日军第九混成旅团旅团长藤冈武雄少将，以及驻惠民的水野清夫联队长、驻沧州的安江纲彦大佐、驻德州的五十九师团独立大队大队长势田重利中佐，又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对我第三军分区进行血腥“扫荡”。

我和黄副旅长接到这个情报，立即用电台同三军分区联系，并派人分别给三地委、三专署送信，通知这三个机关及军分区所属部队迅速转移，向渤海沿岸撤退。这三个机关接到通知后，都及时分散转移了。但是，正活动在乐（陵）庆（云）阳（信）三县交界处铁家营大洼的庆云县大队、阳信县大队、县政府机关、直属分区领导的抗日五小队、乐陵县花园区小队，以及在铁家营大洼检查工作的三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同志，得到消息已经迟了，没有来得及转移。

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日（阴历腊月二十九日）凌晨，连续飘了几天的雪停了，天空仍被厚厚的浓雾笼罩着。就在这光明即将降临人间的黑暗时刻，敌人集中了上万兵力，配备有骑兵和装甲部队，分头从德平、商河、乐陵、惠民、滨县、蒲台、阳信、庆云、沾化、盐山、宁津、沧县、德州、天津等地出发，包围了铁家营大洼。

铁家营大洼是个纵横十多里的荒原僻野，经过天长日久的雨水冲刷，到处露出浅沟、低坎。这里地势低洼，所以十年

九涝，加上一片片“碱场”地，显得十分贫脊、荒凉。这个大洼里，村庄稀疏，少有人家。但就是这块荒凉的土地，却有着光荣的历史。早在唐、宋、元、明各朝代，就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据县志记载，这里还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之一。大洼的中心有个村子，就叫铁家营，铁家营周围数里之外，还有一些户不满百的小村子。这一带群众基础很好，抗日道沟四通八达。

二月二日这天夜里，庆云县大队的三个连驻在铁家营村东北的张王官村，另一个连则由三军分区的一位参谋带领，驻在张王官附近的南杜村。半夜时候，县大队副李子贞同志接到将有日、伪军前来“扫荡”的情报，立即通知了分区的参谋。于是，四个连向正北的小王、张立之间穿过，沿着马颊河北岸向东转移，巧妙地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是驻在铁家营村的李永安副司令和阳信县大队、县政府，直属分区领导的抗日五小队、乐陵县花园区小队，在第二天拂晓接到情报的时候，敌人已将铁家营大洼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了。这时天空大雾弥漫，能见度甚底。我军屡屡听到枪声，但看不见敌人，只得同扶老携幼、背着包袱、牵着牲口、提着棍棒的群众混在一起，四处奔突。

我军先是向南，没走多远，迎面碰见花园区小队派出侦察的小刘同志。他气喘吁吁跑来，焦急地报告说，南面发现了敌情。我军便立即顺着道沟向北转移。将要接近阎家集时，天刚蒙蒙亮，漫天的大雾使人看不清眼前的一切，只隐隐约约地听到由北向南传来的枪声和敌人骑兵的铁蹄声，随后又听到孩子的哭声、老人的叹气声和群众对鬼子汉奸的怒骂声。过了一会，由北向南逃难的群众陆续到了跟前，乡亲们见了我军就说：“北边来了好多鬼子和汉奸队，可不能往北去了！”于是

我军转向西方，只跑了几里路，又遇到了从西向东逃难的群众。我军又回头向东，而东面也发现了敌情。一时间，四面八方都出现了敌人，到处是枪声。我军多次试图突围，都没有成功，只得和逃难的群众一起，在敌寇的重兵层层包围之中奔跑，后来只能在铁家营大洼中心的铁家营村附近周旋了。

三日上午十点多钟，太阳高悬，大雾散去。这是连日大雪之后的第一个大晴天，树枝上的冰凌、房顶上的白雪，开始慢慢融化，流下滴滴水珠。包围圈里的队伍和群众已全部暴露。敌人用机关枪、掷弹筒、迫击炮连续向包围圈内扫射、轰击，我军和群众不断出现伤亡。

敌寇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包围圈里的抗日军民也越聚越密集。被包围在铁家营大洼的，有李永安副司令率领的一小部分武装；阳信县长吴大风同志率领的县大队；李清寿同志率领的五小队；还有几个区小队，总兵力不到五百人。而敌军却有上万人。敌人是有计划地进行包围，我军则是被动应战；敌人有精良的武器，有充足的弹药，有装甲部队，有骑兵，而我军却只有步枪、匣枪和手榴弹，机枪也只有两三挺。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军战士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一当十，以十顶百，与敌寇浴血苦战，给敌以重大杀伤。许多同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还在继续战斗。

一九四三年二月三日，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里，铁家营大洼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敌寇，到处是战场。我军指战员胸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顽强地与敌人搏斗。许多同志子弹打光了，就拚刺刀，刺刀弯了，就从敌人尸体上缴来武器再打。在敌寇重重包围之下，我军没有后方，无法把伤员抬下火线，许多伤员流着血坚持作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战

斗从拂晓到天黑，持续了一整天。全体指战员和被包围的群众，一整天没有吃过一口干粮，没有喝过一口水，仍然咬紧牙关，坚持战斗。

我军在同敌人浴血奋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尤以李永安、吴大风、李清寿三位同志的壮烈牺牲，更是感人至深。

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同志，两天前带着一个手枪班离开军分区机关，到铁家营大洼来检查民兵工作。结果被敌寇团团围困。

李永安是一位为人忠厚，勇敢而又勤奋的同志。他文化程度较高，写得一手好字。他写的文件，多半是将字反写在纸上。开始我们还看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要将纸张反过来，在光下一照，就可清晰地看到他那刚劲有力的字迹。为了保密，他才采用这种反写字的方法。

当时敌人的炮声和机枪扫射声，震耳欲聋，日伪军正向我抗日军民步步进逼。但永安同志身披大衣，神色泰然，镇静地注视着敌人。他一面指挥战斗，一面组织群众分散转移。他亲切地对群众说：“乡亲们，你们赶快走，我掩护你们。”

当大批群众转移的时候，他迅速带领阳信县大队向群众转移的相反方向退却，将黑压压的敌人吸引了过来。

他退到小白张家附近的一处古窑废墟后面，利用敌人还未逼近的机会，迅速召集在场的同志，对他们严肃地说：“这次敌情比较严重，敌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围困了我们。看样子，敌人的兵力还远远不止这些。在铁家营村正北，日寇又以二千多人，在刘桥、阎集、纪王桥一线展开，向这里压来；在铁家营村正西的杨桥、盖家、双庙村、关王堂、兴隆镇一线，也有

一千五百多敌人，正向这里推进；在铁家营村正东，敌人起码有两千人的兵力，摆在南侯、崔郎坞；在铁家营村正南，还有大批敌人抢占了郭楼、桑庄、胡家、西堡、坡赵等村，布下防线。一句话，我们突围非常困难。但是为了保存力量，还是要设法突出去！”

随后，李副司令命令阳信县大队教导员王志诚同志，带领一部分战士，趁敌人正向白家北边的古窑附近集结的间隙，从小赵家方向突围。自己则带领少数同志凭借古窑废墟的有利地形，截击敌人，掩护王志诚等人突围。

王志诚等人含泪告别了李副司令，离开了这里。后来王志诚终于突出重围，但由于沿途拚杀，脱围时他身边只剩十六个人了。

敌人见王志诚等人向小赵家方向转移，并不追赶。因为他们知道铁家营大洼外围还有他们的层层重兵，所以仍旧把注意力和包围中心放在白家北边的古窑附近，仍旧不紧不慢地缩小包围圈。没过几分钟，包围圈直径已经缩小到只有半里路左右，而且每隔十米就围上一层，共计围了七层。摆在李副司令等同志前后左右的敌人火力和兵力相当强。据后来日伪人员交代，当时有机枪百把挺，小炮五十余门，汽车几十辆，骑兵一百多人，步兵数千人。而李副司令身边的兵员不满一百，大多数人手中仅有短枪。敌我双方兵力的悬殊是惊人的。

李副司令甩掉大衣，伏在一个土堆后面，手掂匣枪，紧盯着敌人。敌人到了他跟前，他立即射出愤怒的子弹，将敌人一个个撂倒。后来他嫌用手枪打不过瘾，又抓起成捆的手榴弹，扔进敌群。在手榴弹爆炸的火光中，只见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李副司令的面前，已铺下一层横七竖八的尸体。可是不一会，他的手榴弹甩光了，枪膛里只剩下一颗子弹，身边的战士

也全倒下了。敌人再次蜂拥上来。

日寇军官手指着他，对部下声嘶力竭地哇哇乱叫。汉奸也得意忘形，乱哄哄地直嚷：“抓活的，抓活的！”

在这紧急关头，李永安同志宁死不当俘虏，他神色凛然地举起手枪，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神圣的抗日事业献出了一切。

阳信县长吴大风同志，也是铁家营大洼反“扫荡”战斗中涌现出的一位赤胆英雄。

吴大风同志，原名吴同心，庆云县人。河北泊镇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三一年加入共产党，曾参加和领导庆云县著名的马颊河暴动。“七七”事变后，历任庆云县抗日县长、宣传部长、阳信县县长。

二月三日这天，他先是带着县政府机关和县大队，同李永安副司令及李清寿小队长等人在一起，都被围困在铁家营大洼，但不久就让敌人的骑兵给冲散了。他的身边只剩下十几个战士。后来他们被敌人压在大洼的一条道沟里。

同吴大风同志一起被压在道沟里的，还有许多群众。有人认得这位身穿黑棉袄，扎着宽腰带，戴副近视眼镜，只有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便是阳信县的抗日县长，就焦急地对他说：

“吴县长，听说你准备春节结婚，可现在离春节只有一天工夫了，你怎么还在外面转？你要是昨天回家，就没有这场灾啦！”

吴县长笑了笑，仍旧注视着敌人，没有吱声。

另一个大娘接着说：“吴县长，别管俺，你先顾自闯出去。俺这号老头老婆子，没啥牵挂，你万一有个好歹，你那没过门的媳妇咋办！”

“谢谢大爷大娘们的好意。共产党是不兴撇下群众，光顾自己的。咱们要死死在一起，要活也活在一道！再说现在突围也晚了。”

“不晚，我有办法，吴县长。”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人走过来说。这老人牵着一头牛，他把牛绳递给吴县长，接着说：“你把眼镜去掉，牵条牛化装成老百姓，说不定可以混出去。就是被鬼子抓住了，也有句话说，弄得巧了，也能把鬼子糊住。”

但吴大风同志谢绝了乡亲们的好意，仍和大家一起伏在道沟里。这时他的肩膀已经负了伤。

敌人再次疯狂地向道沟扑来。吴大风同志叫乡亲们在道沟里躺下，闭上眼睛装死，然后他将自己伤口上的鲜血，涂在大爷大娘的头上、臂上。接着，他便带领几个战士，一边抗击敌人，一边向道沟的另一头转移，以吸引敌人的火力。

不久，他身边的战士全都牺牲了，他自己也身中数弹。就在敌人快要接近道沟的时候，他趴在道沟里，将手枪压在自己的胸下，用最后一颗子弹壮烈地表现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而且他在临死前，还想着将武器藏在身体下面，不让日寇得去。

为了纪念为民族解放献身的吴大风同志，后来庆云人民将黄邱的一所学校改名为“大风公校”，并开了追悼大会。记得追悼会上有这样一副挽联：

生即正直举止非凡的系人中一大，
死亦壮烈刚毅不屈确系无产作风。

三军分区直属五小队的队长李清寿同志，也象李永安、吴大风同志那样壮烈牺牲，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李清寿同志当年只有二十五岁，是铁家营村附近的小徐家村人。他体魄强健，个头大，枪法很好。听说有一次，他为了打击庆云县赵榜杰据点敌人的嚣张气焰，单枪匹马走到这个据点的岗楼上，高声喊叫伪军大队长韩秀俊出来比试枪法。韩秀俊站在岗楼上，叫他先打三枪瞧瞧。李清寿便拔出手枪，对准百米外的一棵小树，先跑着打了一枪，再滚着打了一枪，最后仰面朝天躺着打了一枪，三颗子弹全从树干穿过。韩秀俊吓得急忙缩回岗楼不肯答话，更不敢下岗楼比试枪法。从此以后，赵榜杰据点的敌人好久没有出来骚扰。

在二月三日这场艰苦的反“扫荡”战斗中，李清寿同志率领的五小队，在同李永安、吴大风等同志失去联系之后，孤军奋战，击毙了上百个日寇。

他们从拂晓战斗到黄昏，将近十四个小时没吃过一粒米、没喝过一滴水，但谁也顾不上饥渴。同志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敌！

铁家营大洼是清寿同志的家乡，是人民养育他的地方。他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熟悉这里的人民和土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这块土地上参军、入党，在这里打过许多仗，消灭过许多敌人，使敌人闻名丧胆。他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凭借了如指掌的地形，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敌人疯狂地向他扑来，他沉着地让敌人逼近，然后用匣枪点射，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或者用手榴弹猛炸，使大批敌人应声倒下。但在天快黑的时候，他弹尽无援，身临绝境。大批敌人蜂拥上来，企图活捉他。李清寿同志宁死不当俘虏，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李永安、吴大风、李清寿等许多好同志，都牺牲在铁家营大洼反“扫荡”战斗中。人们将永远记住他们的英雄业绩，他

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敌人在铁家营大洼屠杀了一整天，直至天黑才撤兵。

铁家营大洼，这块洒遍鲜血和热泪的土地，这英雄辈出的地方，到处有我抗日军民的遗体，到处可以听到我军可歌可泣的事迹。烈士的鲜血同地上的白雪、泥土凝结在一起，它象火热的岩浆一样冲击着每个幸存者的心。它警告每个活着的人，不要忘记烈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人民，也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侵略者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大灾难啊！

战后，我们掩埋了牺牲的同志，抚慰了烈士的家属，重振旗鼓，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第二十三章 民族忠魂

铁家营战斗后，我和参谋主任陆成道，在无棣的小山一带活动。这几天，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王家楼战斗，二分区副司令员徐尚武牺牲了；铁家营大洼战斗，三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牺牲了……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损失了多少优秀指战员！这不能不使人感到万分悲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还没有从沉痛的哀思中摆脱出来，忽然又接到敌人长途奔袭，“扫荡”了乐陵大桑树村的消息。

大桑树村位于隔津河南岸，村外有一条东西长约几十里的宽阔林带。桑树、杨树、榆树、柳树、梨树、杏树……杂生的

树木长得十分稠密，宛如给鬲津河镶上了一条绿色的缎带。这里是边区境内最大的林区。

由于这一带党的建设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树林又密，小股敌人根本不敢来，所以在各地的环境日益恶化之后，这里就成了各级抗日政府和县区武装的主要活动区之一。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农历正月初十），也就是铁家营战斗后的第十一天，日寇又抽调了天津、沧州、德州等地的日伪军近万人，对大桑树一带进行“拉网扫荡”。当时在大桑树周围活动的我军部队，有靖远县独立营、吴桥县大队、东光县大队、沧县县大队、乐陵县大队和黄骅副旅长带领的十六团的两个营。

这天拂晓，黄骅等同志刚起床，便听到远处响起了枪声。他们在迷漫的晨雾中，看不清敌人，只听见子弹在树梢上“嗖嗖”地穿过去，打得树叶纷纷落下。

黄副旅长知道情况不妙，立即派通信员通知各部队分头转移，自己也带着十六团的“铁帽子五连”，撤离大桑树，冲往西北方向。

五连走了一程，连长杜万祥便命令战士们，装上“三八”大盖枪的刺刀，戴上钢盔，扮成鬼子模样，准备随时应付敌人。不久，雾气渐渐地散了，战士们隐隐约约看到前面来了一大批人马，黑压压地堵住了去路。

杜连长回头看看黄骅同志，意思是说：“副旅长，怎么办？”

黄副旅长眯起眼睛仔细听了听，发现对面的人群一边走，一边在乱七八糟地吆喝。吆喝声不象伪军的狂呼，也不象鬼子的嚎叫。黄副旅长笑着对杜连长说：“没关系，照直走。鬼子真不害臊，拉些老百姓来吓唬我们。”

杜连长将信将疑地点点头，带着部队加快速度朝“敌人”迎了上去。

不一会，逐渐看清了来人，其中果然有不少群众，此外只有大约一个中队的伪军。伪军端着刺刀，逼迫群众列成横队朝前走。这是日寇“拉网扫荡”的新花招：用抓来的群众在正面虚张声势，鬼子们则散在两旁的道沟中。如果我军被正面的“敌人”唬住，拐弯向两侧转移，那就会闯进鬼子们的“网”里，遭到他们的暗算。幸亏黄骅同志判断准确，一眼便看穿了敌人的诡计。

“铁帽子五连”笔直地朝前走着。伪军远远地见“太君”过来了，赶紧向两边闪开，让出一条路来。五连指战员大摇大摆地到了伪军跟前，突然掉转枪口，用刺刀逼住敌人：“缴枪不杀，我们是八路军！”

伪军吓懵了，不知所措地纷纷举手投降。有几个企图顽抗的，当即被我军击毙。

这下那些老百姓可乐坏了，大伙欣喜若狂地围上来问长问短。黄骅同志担心部队和群众被敌人发现，就高声喊道：“乡亲们，快回家去，敌人正在‘扫荡’，很快就要过来，快走吧！”群众听了，欢天喜地地一哄而散。

“铁帽子五连”押着俘虏，朝前走了十来里路，越过高津河，很快便进入了东光、南皮一带的安全地区。

敌人这次大“扫荡”，虽然出动了大批卡车、骑兵，但卡车根本开不进大桑树林区，骑兵在树林里也无法发挥作用。而且敌人撒的“网”大，兵力分散。所以在在大桑树一带的我军各部队，利用树林和晨雾的掩护，大都从敌人的“网”中穿了出去。

但是，乐陵县大队在离开大桑树不久，便和敌人粘上了。

他们被迫退到大桑树西边的五官庄，同包围过来的敌人展开激战。后来虽然大部分指战员突围而去，但乐陵抗日县长、县大队负责人余致远同志壮烈牺牲了。

原来余致远县长和他的通信员，被敌人紧紧包围在村中的一座小院里，无法脱身。后来敌人爬上房子，捣破房顶，举着手榴弹威逼他们投降。这个通信员动摇了，结结巴巴地说：“余、余县长，咱、咱们别干啦。”余县长大怒道：“别脏了你的口！你要当叛徒，人民不会饶你！可惜我只有一颗子弹了……”说着，用牙咬破中指，在墙壁上写道：“一支枪，一支笔，一颗子弹，最后一滴血！”又写道：“生前不能孝父母，死后鲜血为国流。嘱我抗日众同志，踏我血迹报国仇！”写罢，举起手枪对准胸口，朝那个蜷缩成一团的通信员说道：“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果敢地搂了扳机，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面对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举动，房顶上的敌人都吓呆了。这个通信员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趁敌人不备，钻进院外秫秸堆里躲藏起来，避过了敌人的搜查。后来，他逢人便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说：“……余县长就这样死了！我，我真该死呀！差一点当了可耻的叛徒。我真不是人！……下次不多杀几个敌人，我就是活着也要羞死呀……”

敌人离开五官庄之后，村里的群众涌到余致远同志牺牲的那间房子里，装殓了烈士的遗体。人们望着墙上那一排排血字和房顶上的破洞，想象着烈士就义前的一举一动，禁不住热泪涌流，胸中燃起一股为余县长报仇雪恨的怒火。房东李汉荣大叔，更是悲愤难抑，他泣不成声地对大家说：“余县长是个多好的人哟，就这样死了……这屋我打算不住了，就这样留着，我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告诉子子孙孙，余县长是怎么死

的！”在他的保护下，这间屋子直到今天还保持着余县长牺牲时的模样。墙上的血迹虽然黯淡了，但它依然强烈地激动着每个凭吊者的心。

日寇在大桑树一带未能围困住我军主力部队，就气急败坏地烧毁了许多村庄，杀害了大批群众，破坏了我们的几个地下交通站和抗日群众团体。日寇临走时，还砍倒了大桑树林区的许多树木。

陆成道同志听说这种情况后，为了抚慰那里的群众，恢复那里的抗日组织，便带着部队从无棣小山一带赶往大桑树。

他们到了大桑树村，只见村外大批的树木倒在地上，一个个树桩露着白白的断面；村内许多房屋被烧塌了，废墟墨黑一片，冒着一股十分难闻的焦味。村里的群众见到部队，连忙围上来，争先恐后地哭诉鬼子的罪行：这家的房屋被烧光了，那一家人全都被杀害了，一个还没满八个月的婴儿被鬼子用开水活活烫死；有些妇女被野兽们强奸了，某个姑娘宁死不从，投井自尽了……一件件，一桩桩，诉说不尽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同志们看着眼前的悲惨景象，听着乡亲们的控诉，心里感到发酸和内疚。这种心情，象一块沉重的铅堵在胸口，但很快又化成了一股怒火。陆成道同志对大家说：“乡亲们，咬咬牙，坚持下去，日本鬼子是在作临死前的挣扎，他们蹦跶不了几天啦！鬼子想把我们的人民斩尽杀绝，想把我们的根据地彻底毁掉，这简直是痴心妄想。鬼子欠下了我们无数血债，我们一定要向他们讨还……”

乡亲们默默地听着，眼泪渐渐地干了，眼睛里射出热辣辣的光。

许多青壮年捋起袖子说：“首长，给俺报个名吧，俺要当

八路，跟鬼子算账。”

很快，大桑树一带又掀起了抗日斗争的热潮。人们擦干了血迹，掩埋了尸体，纷纷拿起刀枪。各村交通站、自卫队、儿童团相继恢复……

但是就在这时候，三分区的通信员骑着快马从庆云赶到大桑树村，向军区领导报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日寇在撤离大桑树以后，掉头向北，又“扫荡”了津南的庆云县。边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启华、三地委书记李广文、三分区司令员杨承德和副政委李雪炎等同志被敌人包围。后来经过一阵激战，李启华、李广文、李雪炎等几位同志和大部分机关、部队都突围出来，但三分区司令员杨承德等同志，壮烈牺牲了。

杨司令员牺牲的消息，令人悲痛万分。同志们在心里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回忆起他的生平：杨承德同志是江西零都人。参加过江西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平型关战斗，后随曾国华支队来到边区。主力转移后，他留在边区，任一军分区司令员兼十六团团长。前不久，三分区司令员杨铮候去望子岛养病，他便改任三分区司令员。（一分区司令员由傅继泽同志接任；杨承德同志牺牲后，黄荣海同志升任三分区司令员。）承德同志一贯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而且性格豪放，胸无城府，深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

三分区的通信员告诉同志们，杨司令员牺牲得十分壮烈、感人：

杨司令员被日寇包围后，十分冷静地指挥部队向敌人开火，掩护机关从刘化风村顺着道沟向蔡王村撤退。不料，蔡王村预伏着一股敌人，用两挺机枪封锁了道沟。杨司令员只得带领部队和党政机关翻上道沟，向汾水王方向撤退。在穿过一片小坟地时，跑在他前边的一个老班长中弹倒了下去。他不顾危

险，扑过去扶起老班长，向旁边的一个坟包移去。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扫过来，打得地皮“扑扑”地响。杨司令员用自己的身体护着这位五十多岁的老班长，不幸也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他忍着伤痛，将老班长狠命地向坟后一推，自己就倒下了。

他的警卫员小周哭喊着冲上去，背起杨司令员就跑。可是没跑多远，就被敌人的一阵机枪子弹打中，两个人同时倒在血泊里，牺牲了。

这个通信员还沉痛地告诉军区领导：杨司令员牺牲后，三地委的一个干部和一个班战士，虽然冲出了坟地，但在汾水王村前的麦地里又遭到了敌人的伏击。这位干部的腿部负了伤，他几次试图从地上站起来，结果还是跌倒了。后来鬼子和伪军嗷嗷叫着冲了上来，那个班的班长一面指挥大家用手榴弹还击，一面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幕中，背起这位干部，边打边撤，退到了小田家。

他们刚冲进村，村里又冒出一股敌人。他们便闯进了一座院子里。

这院子里有位老大娘，在敌人进村以后，她就藏在秫秸堆里。这时她听见有人进了院子，开始以为是敌人，后来听他们说话的声音，才知是八路军。她刚爬出来，不料院外响起了鬼子的大皮靴响声和叽哩呱啦的说话声，就又躲进秫秸堆里，侧耳倾听着院子里的动静。

院里有人喊道：“两个人守一面，不许敌人爬上墙来。”又说：“同志，你进屋吧，别出来，这里有我们在！”接着，就响起一阵枪声，有人哀嚎着从院墙上滚了下去，大概是爬墙的鬼子被打中了。

不一会，四面邻房上都爬满了敌人，把手榴弹扔进院子里。

“快撤进屋里！”院子里有人喊了一声。大家冲进北屋，“呀”地关上了门，从窗口朝外打枪。敌人的机枪、步枪一齐朝着北屋门窗开火，不时响起框木被打断掉落在地上的声音。

过了一会，北屋窗户里一个声音紧张地叫起来：“班长！我没子弹啦！”“糟糕，我也只剩一发了，怎么办？”其他人也跟着叫起来。

“同志们！不要急，把大伙身上的子弹都数数！”一个温和而镇定的声音说道。

“一颗，两颗，五颗……十六颗，一共十六颗！”

“每人两颗！”那个镇定的声音说道。沉默了一会，只听那人又开腔了：“同志们！为抗战而流血，是无上光荣的！现在，每人分两颗，一颗消灭敌人，另一颗留给自己！”

这时候，四面房上的枪声停了，四周显得非常寂静。

伪军在喊话了：“投降吧，你们跑不了啦！”

北屋窗户里有人高声回骂道：“卖国贼！狗汉奸！你们谁敢进来！”

不一会，真的有人“扑通扑通”地跳进院里。窗户里那个镇定的声音说道：“瞄准了打！一人干掉一个！”接着一阵“砰砰”的枪声响了，跳进院里的几个敌人惨叫着跌倒在地上。

这时那个镇定的声音又问道：“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其他人齐声回答。

“让我们最后一次高声呼喊吧！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其他人一齐放声高喊起来：“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

这喊声压倒了其他一切声音，是那么响亮，那么震撼人心。高呼声长久地回响在院子里，回响在天空中，传到很远、

很远……

敌人撤走以后，那位大娘从秫秸堆爬出来，走进了弹痕满墙的北屋，只见这位干部和七名战士互相依偎着倒在炕下，每个人的太阳穴上，都有一个血洞，在汨汨地流着鲜红的热血……

那位大娘把乡亲们都叫来了。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感动得直掉眼泪的。大家说：“他们这样刚强地死了！我们要好好办个丧事，给烈士们体体面面地下葬，好对得起他们的在天之灵。”老人们自动献出了为自己预备的八具柏木棺材，把八位烈士的遗体沐浴后装殓了。全村人为之举行了古老而又隆重的葬仪，披麻戴孝地把烈士遗体掩埋了……

听到这些消息，同志们的双眼被泪水模糊了，心里默默地在说：多么好的战士，多么好的人民啊！烈士们视死如归，英勇自尽了，但是，他们在人民心里是永生的！人民不会忘记这些为民族流血牺牲的英雄，他们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

余致远、杨承德、小田家八烈士……都是我们民族的忠魂啊！他们在生命消失的一刹那间，迸射出闪电般的光芒，这光芒照亮了无数人的心，也必将照亮全边区乃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将所有的黑暗驱除干净。

“笼”中奋威

第二十四章 胡服指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酋冈村宁次在华北残酷地实施他的所谓“铁壁合围”、“拉网扫荡”、“对角清剿”等战术，使得我们冀鲁边区也到处是腥风血雨。记得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阵阵枪声寒，天天有惨案，村村都戴孝，家家有哭声。”这首民谣逼真地描绘了冀鲁平原在日寇浩劫下的悲惨情景。

但是边区抗日军民并未因此而屈服。反之，我们以格外坚强的意志，屡次击破日寇的“合围扫荡”，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并且采用分散游击的方法与敌周旋，缠住了日寇的数万重兵，拖得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冈村宁次在百般无奈之际，除了对我边区继续“扫荡”外，又想出了一招毒计，即所谓“囚笼政策”。他指令济南日酋细川忠康中将和天津日酋藤冈武雄少将，强征数十万民夫，在冀鲁平原上大兴土木；挖掘县境沟；修筑公路；安设岗楼、据点。日寇企图用一、二丈宽，二、三丈深的封锁沟，将冀鲁边二十四个县分别圈起来，隔断县与县之间的交通和联系。然后，在各县境内，修筑纵横交错的公路网，或成米字形，或成

品字形，用公路将辽阔的平原划成一枪可以打穿的许多小块块。再在公路网和县境沟上安起岗楼、据点。

他们妄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将我军分别锁在一县范围内的“囚笼”里。再用其快速的机械化部队，在“笼子”里“清剿”、搜索，企图使我军陷入无路可走，无援可待的绝境。

一九四二年冬，日寇的所谓“囚笼”，一个个相继建成。辽阔的冀鲁平原上，封锁沟、公路网纵横交错，岗楼、据点星罗棋布。其中宁津一县，只有三十二万人口，七百多个村庄，而敌伪的岗楼、据点竟有一百二十四个，公路四十八条，县境沟首尾衔接，长达三百华里。据不完全统计，这年下半年全边区的日伪封锁沟近二千八百华里，公路八千多里，岗楼、据点比一九四一年增加了五百零七个，共占耕地十二万亩。一军分区辖地平均七个村庄就有一个敌据点，二军分区辖地平均八个村庄就有一个敌据点，三军分区辖地平均十个村庄就有一个敌据点。

冀鲁边区的形势更加恶化了。我抗日军政人员，被分别围在各个县域里，常常遭到敌人袭击。在一九四二年冬的个把月当中，边区抗日军民就同敌人进行了二百六十九次战斗。因为我们被敌人封锁在一个个“囚笼”里，回旋余地太小，难以藏身，所以损失非常严重。而且由于敌人的分割、封锁，粮食、医药、甚至连睡觉都成了问题。

我们的伤病员无处安顿，无药医治。有的同志在战斗中腿部负了伤，伤口化脓，肿了起来。为了保住伤员的生命，医生只得用木工锯子，忍痛将伤腿锯掉。还有个同志，胸口负了贯通性枪伤，同志们为了替他消毒，又苦于无药，只好用纱布，沾点盐水，再用镊子钳着纱布条从前胸伤口伸到后胸伤口外，两手

捏住纱布头来回牵拉。他痛得都快昏过去了，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我们被封锁在敌人的“囚笼”里，粮食也没有来源，只好用树叶、树皮、草根、苜蓿等充饥。当时吃的最上等的食物，要算高粱窝窝头。这种窝窝头黑里透红，硬梆梆的，个头也挺大，中间有个坑，叫窝头眼。吃的时候将咸萝卜条装在窝头眼里，味道很香。同志们戏称这种窝窝头为“掷弹筒”。

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几个人住在乐陵县一个村子外的野地里。因为淋了一阵小雨，不久我就生病发烧。大伙见我病了，非常着急，但也没有办法。到了中午，警卫员小周送来两个“掷弹筒”，我拿起咬了一口，只觉得又苦又硬，还糙乎乎的，怎么也咽不下去。小周站在旁边看着，眼泪悄悄地淌下来了。他背过身去用衣袖揩了揩眼睛，轻声对通信员小侯说：“政委病得不轻，我们得想法改善伙食，给政委换换胃口。”

小侯想了一下说：“擀碗面条吧，面条吃起来软和，咽起来滑溜。”

于是两个小家伙便很快动起手来。他们把高粱面倒进钢盔里，兑上水，搓搓揉揉，很快便揉出一块面团。野地里没有面板，怎么擀面条呢？小周也真有办法，他卷起裤管，拿自己的大腿当面板。他从面团上扯下一小块，放在大腿上用手一来一回地搓，很快便搓成一根根圆筷子似的面条。小周的那条大腿，因为整日摸爬滚打，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污垢；面条搓好后，当面板的那一块腿面，比其他地方显然白多了，因为污垢都揉进了面条。但我觉得那顿面条真香，一口气吃了两小碗。

吃饭成了问题，睡觉则更成问题。当时环境恶劣，我们不能宿在老乡家里，因为许多村庄都有敌人的碉堡岗楼。即使是没有碉堡岗楼的村庄，我们住进去也容易被敌人发现，如果敌

人派兵围住村子或堵住胡同，那就糟了，就算我们能跑出来，也必定会连累乡亲们。所以我们常常露宿在野外的庄稼地里、坟堆里、河沟的茅草丛里。睡觉时，哨兵手里拿一根绳子，绳头拴在指挥员的脚上，一发现敌情便轻轻一拉，于是指挥员迅速将同志们推醒，带领部队转移。我们经常一个晚上要换好几个睡觉的地方。战士们开玩笑说：“我们白天开展游击战争，晚上开始游击睡觉。”因为一夜要转移几个地方，睡觉还往往衣不解怀，鞋不解带，有时索性背靠背坐着，低头打几个盹。

天气冷的时候，有的同志弄两块狗皮来，前后胸各贴一块，叫“狗皮宿营”。有的则两人合盖一条单薄的灰色军被，既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更没有枕头。有的没有被子，夜里常常冻得难以入睡，即使睡着了，也常常冻醒，冻醒了便两腿抽筋，疼得难熬。后来没有被子的同志想了个办法，叫“通腿睡”。这个办法是：两人搭成一对，都解开上身棉袄，互相把对方的腿搂在自己的怀里抱紧，再把棉袄扣子扣上，谁要想翻身，就得等对方醒来再一起翻，否则没有办法。搭不成对子的“单身汉”，便找两块砖头，放在火里烤一阵，等到烫了，再捡出来用破布包上，揣在怀里。

斗争环境虽然十分艰苦，但我们却感到温暖和欣慰。因为上级党对冀鲁边的斗争形势、对坚守在冀鲁边的抗日军民十分关怀。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教导六旅十六团政委陈德和副团长杜步舟同志，到一一五师师部去学习。当时一一五师师部（兼山东军区）驻在陇海路北面的莒南县朱范村，师部首长住在一家大地主的花园里，政治部机关住在花园中的一座连排五间的大厅房里。陈、杜二同志到了朱范村，刚想在招待所住下，一一五师和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便打来了电话，叫住到

他那里去。

陈德和杜步舟感到肖华主任仍旧象在冀鲁边区时一样关怀自己，而且马上又可以见到他了，心里非常激动。他俩挂上话筒，背起铺盖，飞快地朝政治部机关奔去。仅仅走了几分钟，老远便看见肖主任已站在门口迎接了。肖主任大步上前，硬是把他俩的铺盖抢过来背在自己身上，径直背进自己的屋里。肖主任把他俩按在自己的炕上坐下，然后泡了两杯热茶，又亲自端来一盆洗脸水。他亲切地看着两人洗过脸，笑呵呵地说：“今晚你俩就睡在我的炕上，怎么样？不怕挤吧！”

“这，怎么行呢！”陈德和杜步舟慌乱地站起来。

肖主任又把他俩按到炕上坐下，说：“怎么不行？挤一点暖和，睡在一起还可以多聊聊。”

他俩无话可说了。

肖主任等他俩喝足茶，便开始问长问短，仔细打听冀鲁边的斗争情况，非常专注地听取他俩的汇报。

这时候，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也来看望陈德和杜步舟同志。罗政委一进门便紧紧握住他俩的手说：“你们是从最艰苦的地方来的，辛苦了。”

陈德和杜步舟听到这话，心里非常激动。

罗荣桓同志详细询问了他俩沿途有没有碰到危险，冀鲁边的斗争情况怎么样，并再三要陈、杜二人好好休息。直到傍晚他才回去。罗政委刚出门，突然想起了件事情，又返回屋里笑着关照陈、杜二人：“你们准备准备，过两天将冀鲁边的斗争情况向胡服同志作一次全面汇报。”

胡服同志是谁？陈德和杜步舟心里都嘀咕起来。

肖华同志在一旁猜出了他俩的心思，便解释说：“胡服是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的化名。少奇同志刚刚从苏北来，他是整顿新四军后返回党中央时路经山东的。”

陈德和杜步舟听说马上就能够见到刘少奇同志，还要当面向他汇报，心里又高兴又紧张，结果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这天，师部组织小型座谈会，会议由罗荣桓政委主持，刘少奇同志、陈光代师长、肖华主任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肖华同志便站起来，指着陈德和杜步舟向刘少奇同志介绍说：“这两位就是从冀鲁边来的陈德团政委和杜步舟副团长。”

刘少奇同志连忙站起来，紧紧握着两人的手说：“你们辛苦了。”

陈德和杜步舟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通常我们都有这种体验，当自己的辛苦和劳累得到别人理解，别人安慰自己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和痛快。陈德和杜步舟在心情平静后，便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了冀鲁边的斗争形势，介绍了边区环境在日寇实行“囚笼政策”之后变得格外艰苦的情况，报告了边区我军连以上干部的伤亡率。

少奇同志听后，沉思了一会，说，冀鲁边南临济南，北迫天津，西胁津浦路，东据渤海岸，战略地位很重要，是我们将来大反攻的前进阵地。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也要坚持。如何坚持呢？依我看，第一，主力部队至少调出三分之一到清河区整训，其余的分散开来隐蔽活动，这样有利于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准备今后的战略反攻。第二，部队要换上便衣，划分为小分队，依靠群众，搞分散性的游击战、地道战，坚持斗争。第三，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和瓦解伪军，开展敌占村庄的群众工作。

少奇同志所指示的这些，是当时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的

战略措施。

很快，罗荣桓政委便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用电报拍发到冀鲁边。

我看到电文，很受鼓舞。心想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也不能放弃冀鲁边的一寸土地。我们要坚决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坚持在“囚笼”中战斗下去。

当天晚上，我们便在渤海岸边的一个渔村里，召开了军区党委和旅党委会议，向部队负责同志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重要指示，研究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

会议决定，立即转移主力。将十六团、十八团的主要兵力和一部分县大队，改编成军区独立团，连同区党委党校等单位，迁移到清河军区的八大组和垦区的老鹅嘴、义和庄一带去整训。十六团司、政机关与三军分区合并，十七团与二军分区合并，十八团司、政机关与一军分区合并，以精简机关；合并后仍留在边区。

几天以后，机关精简了，主力部队也在陆续转移。

主力部队撤离边区，是一件困难的事，沿途要穿过几个县，跨过好几道县境封锁沟。县境沟大都是五米多宽、六米来深，沟壁象墙一样成九十度直角陡立在两边，难以跨越。下沟时，先得有几个同志拉住绳子，其余同志再攀着绳子一个接一个地溜下沟去。上沟就更难了，先得有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志象叠罗汉似的搭成人梯，把三五个人送上对岸；上去的人再悬下根绳子，让沟下的同志一个个用手抓住绳子，脚踩沟壁往上爬。气力小的爬到一半就身子来回晃荡，弄不好就会跌下来摔个半死。除此以外，县境沟两旁的敌伪军的堡垒、岗楼星罗棋布。敌人在岗楼旁的县境沟上架了吊桥，盘查行人，严密把守封锁沟，一遇情况就鸣枪报警。县境沟旁边还筑有公路，鬼子

的装甲车和更夫不停地巡逻，夜间也用探照灯和火把将县境沟照得通明。我军区独立团和一些党政机关，在跨越县境沟时，曾多次被敌人发现，打了几场遭遇战，受到一些损失。尽管如此，我主力部队还是胜利地转移到了清河军区。

第二十五章 地道斗争

留在敌人“囚笼”里坚持斗争的我边区机关部队，有冀鲁边区党政机关、教导六旅旅部、三个军分区机关和十七团、地方游击支队、县大队等。它们化成无数小股，分散活动；其中大部分干部、战士，都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

这样“化整为零”，虽然目标大大缩小，但暴露目标的机会却多了起来，很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于是我们准备转入地下，在地下印刷报纸，在地下安装电台，在地下设置医院，在地下藏兵……

开展地下斗争，我们有充分的“地利”条件。冀鲁边地区属于黄河扇形冲积土平原，辽阔的大平原上，到处有油碱土、白膛土、莲花土，这类土壤颗粒粗，结构疏松，但又富有粘性，既易挖掘，也不大会倒塌。所以在这种土地下打洞、掘地道，大可一试。俗话说：“鸡不撒尿，自有出路。”山区根据地有山洞林壑藏身，平原根据地却有“土地娘娘”的肚皮。我们一旦成了“土行孙”，还怕他什么“申公豹”！

于是，冀鲁边平原上又一次出现了非常壮观的改造地形的运动。半个月之间，荒凉的平原上，无论河坎旁、草丛中，还

是坟地上、马厩里，都出现了秘密的洞口。同志们摇身一变，成了“土行孙”，钻进了地下。

一次，陆成道主任到了庆云县，想找区党委机关报——《烽火报》的编辑们聊聊。他知道编辑部在庆云，结果摸了两天，连编辑部的影子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交通站的一位同志告诉他，说《烽火报》编辑部在板打营村。板打营不是敌人的据点吗？他心中暗吃一惊。他们的胆子也够大的，居然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了。他想，得赶紧去看看。

当天晚上，交通站的同志领他到了板打营的村外。村外有棵大槐树。交通站的同志用手在树干上轻轻叩了三下，过了一会，树根下的一块草皮突然动了起来，草皮移到旁边，下面露出一个斗大的洞口，接着一个人头探了出来。

“哈哈，高光！”陆主任失声叫了起来。

“嗨，主任，是你！”《烽火报》的负责人高光同志看到陆成道，也很高兴，他双手抓住洞口用力一撑，身子便钻了出来。他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相视着，只是笑。在那种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即使是别后三天再见，也象久别重逢一样亲热。何况现在是分散隐蔽活动，大家见面的机会更少，见面时也就更亲。战争年代同志间的深厚友谊，真是非常感人。

“主任，外面危险，下洞吧？”高光同志先开了口。

陆主任点点头。

高光等他下了洞，也跟着下来了，然后双脚站在洞壁的壁上，将铺着茅草的洞盖移来盖上。

洞盖收走了泻入洞口的月光，但洞里点着几根蜡烛，通红的火光，将洞里的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地道相当宽敞，而且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洞口多达六、七个。地道的壁顶挖了通气

孔。地面则相隔十几米挖下一个小坑，渗出的地下水全流进了坑里，既排除了地道里的潮气，又储备了大量的饮用水。干松松的地面上，摆着电台、石印机、成捆的纸张、秫秸铺的地铺和简易办公桌。编辑部的同志正在紧张地工作，大伙见了陆主任，都站起来打招呼。陆主任赶忙摆摆手，让大家别动。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工作，他便和高光拐进了另一股岔道。

走不多远，岔道旁边又出现了岔道。嗨，这简直象一座地下城市，有大街，有小巷，还有十字路口。要不是有高光领着，陆主任肯定会迷路。他睁大了惊喜的眼睛，笑了。同志们的智慧和力量，任何愚蠢的敌人也别想战胜！让敌人在地面折腾去吧，我们在地下生活得十分自在！他们看不见，听不到，机枪、大炮、骑兵全都派不上用场。他们即使找到了洞口，也进得来出不去。

高光见陆主任看得入迷了，便故意笑着问：“主任，这地下建筑可行？”

“行，好极了！”陆主任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有办法，地道都掘到敌人据点的房基下面来了！”

“这叫‘灯下黑’，敌人的眼睛一般是不会看到他的鼻子下面的。”高光是知识分子，说话风趣，陆主任被逗得大笑起来，笑声在地道里发出嗡嗡的回音。

停了一会，陆主任想起了件事情，便问高光：“这里保险倒是保险，但报纸的发行工作怎么办呢？”

高光听了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眯眯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牛骨头，递了过去。陆主任接过牛骨头，放在手里掂掂。这是一根腿骨，很完整，但骨头中间有道细微的横纹，不留心就看不出来。他估计里面定有名堂，便用手抓住两头，用力一拔，骨头齐中间断开了，空心的骨头里面，露出十几份扎得很紧的

石印小报。他把骨头放在手里摇摇，笑了。是啊，把报纸放在骨头里，倒是个绝妙的办法，只要不被内奸出卖，敌人是难以识破这种伪装的。

高光见陆主任笑了，也格外来了精神。他捋了捋袖管说：“到了夜里，我们就把这些骨头悄悄送出洞去，放在同交通站商定的地点，再由交通站的同志分转到各县。”

“这办法行。”陆主任对高光说，“你们发行报纸的经验，尤其是把编辑部、印刷厂搬到地下的办法，可以推广到各分区的印刷科去。他们人少，摊子小，更适宜在地下工作。”

“是啊。”高光接着回答，“不过听说他们早已进了地道。比如三地委的印刷科，就在庆云县的西左耳村一带地下。大前天，鬼子汉奸到西左耳村‘清乡’，正在村里的地委印刷科负责人郑正和解希远等四位同志，发现敌情后，立即钻进了设在牲口槽下面的地道口。但地道狭小，预先又没有掘出透气孔，洞口的盖子一封上，地道里的空气就稀薄了。可他们也真有办法，四个人七手八脚在洞口插了根空心的向日葵杆作为透气孔，又在葵杆周围撒了些马粪，伪装得不露一丝痕迹。他们在地道里避过了敌人的搜查，坚持了正常工作。”

听到这些，陆主任心里涌起一股自豪的激流：同志们多么勇敢，多么有智慧！让鬼子折腾去吧。无论敌人用“囚笼”把边区封锁得多么严密，无论“囚笼”里的环境多么严酷，我们照样能生存下去，照样能坚持斗争。

陆主任离开板打营村以后，在交通站同志的掩护下，又到鲁北和津南的其他几个县转了转，还看到比地道更为巧妙的地下建筑。因为地道用多用久了，也容易被敌人发现，同志们便在荒野的地方制造假坟，用它来藏身。军区后勤部的一个流动医院，就是设在假坟里，治愈了不少伤病员。

那假坟的小门朝南，既不进水又透阳光。门口栽了些杂草，坟包上移植了两株柏树，并覆盖一层草皮。坟中的“墓穴”非常大，可容纳上百人和几十张地铺，地铺上铺着厚厚的麦秸、秫秸、玉米衣，非常舒适。因为假坟伪装得十分逼真，不但敌人丝毫没有发觉，就连两只猫头鹰都栖到坟头的柏树上来了，有些野兔也常常钻进“墓穴”。

制造假坟要用气力挖掘，花费心机伪装，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造假坟，同志们就钻到真坟里去隐藏。

冀鲁平原上，历代达官贵人、逸士名流的荒坟古墓很多。南皮县有清朝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墓；陵县有汉朝文学家东方朔的墓，还有战国名将廉颇的墓……这些古墓，坟堆虽然颓塌，但砖石砌成的墓穴完好如故，而且非常宽敞。墓穴里，棺木或早就被人窃去，或早就朽烂殆尽，即使剩些白骨，也早被野狗、老鹰啃碎嚼光。这是非常理想的藏龙卧虎之地。

一九四二年秋末，我二分区电台台长罗长波同志，带着电台和一个监护班在临邑、商河、陵县交界的一个三角地带活动。一天，他们来到陵县阎家楼，接到交通站同志转交的分区领导的一份电文，必须立即拍发给军区。

罗长波和监护班的同志，是化装成小商小贩到阎家楼同交通站的同志秘密接头的，他们不能在村里久呆，更不能在村里亮出电台，但也不能耽误发报时间。罗长波决定，迅速在村外找一处僻静的地方隐蔽起来，用最快的速度将电报发出去。他见阎家楼东南有一片松树林，便带着同志们出村向松树林奔去。

不料罗长波一行几人，刚进松树林，就被附近县境沟旁一座岗楼上的敌人发现了。敌人起了疑心，出动了三十多个伪军，咋咋呼呼地朝松树林扑来。

情况紧急，怎么办？机警的罗长波同志，耸起浓眉，眼光在树林里扫了一圈，发现林中有一片义冢地，百十座高高低低的荒坟挨在一起，坟丘上长满了荆棘茅草，草丛中隐隐露出无数被野狗、狐狸、野兔扒出的窟窿。

罗长波手一挥，带着同志们奔到坟堆跟前，挑了个最大的洞钻了进去。最后进洞的同志，将坟前的一块石碑移来，压在洞口上。同志们钻进墓穴一看，高兴极了，砖头砌成的墓道里足足可以容纳一个排，墓道顶上被田鼠掏出的七八个小洞，透下一缕缕新鲜空气和一道道细微的阳光。同志们都乐了，七嘴八舌地说：

“嗬，真是洞天福地！”

“依我看，死者生前准是个阔佬，不然他的阴府哪来这副排场！”

“富鬼的墓里，没有珍珠即有玛瑙，来，寻寻看。”

两个年纪小的，果真弯下腰，在墓道里东瞧西瞅。“咦，那里是啥？”一个战士突然惊叫起来。

大伙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墓道角落里，有一堆小小的颗粒，这些颗粒晶莹透剔，在从墓道顶小洞透下的阳光的映照下，闪着熠熠的光。大伙兴奋起来，忘记了外面的敌情，急忙拥过去看，原来是一堆饱满硕大的玉米粒，起码有四十斤。

意外的发现虽然仅仅是一堆普通的陈玉米，但多日来一直餐风露宿，现已饥肠咕噜的战士们，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失望，一个个欣喜得如获至宝，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解下干粮袋。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吱吱”的叫声，大伙仔细一看，原来玉米堆旁边躺着一窝小田鼠。几个调皮的战士，指着全身猩红，正一扭一扭蠕动的小田鼠说：

“委屈啦，小家伙，你们过冬的粮食，俺先借借。”

“将来啊，将来打完了鬼子，也给你爸爸妈妈记上一功！”

这话把大伙逗得都笑了。

“嘘！”突然罗长波台长听到什么，他一手掩着嘴示意大家别说话，一手指了指顶上。

大伙赶紧屏声敛息，竖起耳朵静听。坟堆顶上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和叫骂声：

“奶奶的，怎么一进林子就没啦？”

“那几个小子准是八路，不是八路，为啥要往这树林里钻？”

“弟兄们，留心点，搜出八路，每人十块大洋。”

“大洋倒是馋人，可俺没有这福份，八路军神出鬼没，我们整天奔东扑西，抓到几个？”

杂沓的脚步声离开坟堆，渐渐地远了。

罗长波同志从柳条筐里取出电台，按动电键，墓道里响起了清脆的“滴答、滴答”声。分区首长转来的电文，穿出墓道，驾着无形的电波，飞到了军区。

打这以后，罗长波和同志们在墓道里坚持了较长一段时间，多次沟通了分区与军区之间的联系，胜利完成了传达军区指示和分区报告的任务。

可是有一天，从墓道里传出的电波讯号，惊动了敌人，引起了陵县城里鬼子的警觉。鬼子判断电波讯号就在阎家楼东南松树林一带，于是派了重兵前来搜查，结果是一无所获，连八路军的影子都没有见着。但这伙敌军非常狡猾，他们在撤离松树林的时候，留下几个伪军，在坟堆旁边搭起一个茅棚，准备长期驻守在这里，严密监视松树林内的动静。

这天夜里，罗长波台长和监护班的几个战士，早已饥肠辘辘，喉咙眼也干得火燎似地难受。因为白天敌人在小树林里搜查，大伙躲在墓穴里，无法出去弄粮食和水，一整天滴水未进，粒米未沾。于是，罗台长叫一个战士出去看看，先设法弄点水来，给大伙填填肚子。

这个战士点点头，拿起几个水壶，走到墓道口，轻轻移开石碑。他刚把头探出洞外，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透过朦胧的月光，他发现石碑旁边晃动着一个幽灵似的黑影，这黑影是个伪军，手中端着枪；在离石碑不远的地方，还有座新搭起的茅棚，里面亮着微弱的灯光，不时响起一阵阵推牌九的“哗啦哗啦”声和粗鲁的吆喝声。

这个战士赶紧缩回头，悄悄将石碑移回原位，重新堵住洞口。然后匆匆走回墓穴，对罗长波同志轻声地说：

“台长，不好啦，外面有敌人。”

罗台长听到这话，立即走到墓道口，眼睛凑着石碑旁边的一条缝隙，仔细瞅了一阵，发现茅棚搭在一座坟头上。他退回墓穴，神情轻松地对监护班的战士说：“敌人还真有点小聪明，想来个‘守株待兔’。大伙琢磨琢磨，该怎么办？”

“这还有什么话好说？干！光躲着咋行！”监护班的班长回答。

“对对！”战士们齐声附和，“得弄掉那几个小子，否则，我们光躲着，不饿死、渴死也会憋死。”

“是啊！”罗台长皱了皱眉头，压低了声音说，“可是怎么个干法呢？敌人的哨兵就在石碑旁边，我们一出去就会被他发现，就会惊动茅棚里的敌人。如果双方交上火，引来附近的敌人，那我们的处境就糟了。所以得想个妙招儿，不露声响地把敌人干掉。”

听到这话，战士们都沉默起来。一个个抓抓头皮，扑闪着眼睛……

过了一会，罗台长想出了个办法。他对战士们如此这般地一说，战士们都乐了

于是大伙分头行动起来：班长到墓道口监视敌人的动静；其他人则操起小铁锨，朝着敌人的茅棚方向掘地道。

不一会，地道挖到了茅棚的底下。战士们拄着铁锨听了听，听到上面传下一阵阵微弱的嘈杂声。弄清了敌人的准确位置，战士们又用铁锨将地道顶上的土轻轻地往下铲。

敌人脚下的地皮越来越薄。战士们在地道里听到的敌人的嘈杂声也越来越响。

突然，地道顶裂开了一条缝隙。罗台长看到这种情况，立即低声喝道：“撤！”战士们赶紧后退了几步。

地道顶上的缝隙越来越宽了。忽听“轰”的一声，地道顶上薄薄的地皮塌了下来，几个伪军也一齐跌入地道。监护班的战士一拥而上，将吓得呆若木鸡的伪军一个个捆绑起来。

这时，那个正在站岗的伪军，听到茅棚里传来沉闷的响声，便慌忙跑去探看。他刚跑到茅棚边，冷不防我们的监护班长从背后猛扑上去，将他拦腰抱住，接着一把匕首扎进了他的咽喉。这家伙连哼一声都没有来得及，便死猪似地倒在地上。

当夜，监护班的同志将茅棚里塌陷的坑，用土填平，再铺上些干草，伪装成原来模样，不露一丝痕迹。

第二天，陵县城里的日寇，发现阎家楼松树林里的伪军失踪了，就再次派兵前来搜索八路军，结果仍然一无所获。这批笨蛋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八路军会在墓穴里藏着，只得悻悻地收兵回城。

第二十六章 鱼游水中

我们虽然被困在一个个“囚笼”里，但无论敌人动用多大的兵力在范围很小的“笼”中追逐搜捕，结果十有八九是扑空。这除了因为我们使用“土遁法”而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依靠了广大群众，得到了人民的掩护。

记得当年边区有一首流行歌曲，歌名叫《八路军好比一条鱼》，开头两句便是：

八路军呀好比一条鱼呀咳！
老百姓就是河中水呀咳……

当时的军民关系十分密切，“鱼”游“水”中，敌人就只能望洋兴叹了。

一九四二年冬，军区民运科长于志洪带着战士小周，到乐陵检查工作。这天，他们到了朱集附近的一座敌人关卡跟前。关卡的岗楼上，架着机枪，挂着一杆破烂的太阳旗，三个鬼子凶神恶煞似地在机枪旁边踱来踱去。岗楼下面有一根拦路的横木，架在十字路口。站在十字路口的两个伪军，正吆三喝四地盘查来往行人。这两个家伙最关注的是被搜查者的褡裢和口袋，而且趁机侮辱妇女，从腋下一直摸到大腿，好半天才打发一个。准备过卡的老百姓，都没精打采地拥挤在十字路口两边，等待伪军搜查、放行。

于科长和小周只好挨到人群后面站下。他俩估计这次过卡不会出什么岔子，心里很镇静，因为都化了装，口袋里还装着一迭“准备票”，伪军搜去“买路钱”，还不把人放过卡？

这时候，于科长前面的一个人，把手伸到背后，掩了掩于科长的衣襟，脸仍然朝着前面。于科长探身一看，原来是乐陵城里做小猪生意的王三大爷。他可能早已认出了于科长，只是不敢声张。于科长上前半步，靠紧了他。他的手又伸到背后，把拇指和食指伸得直直的，然后指指他的猪篓。于科长明白老人的意思，他是估计于科长身上带着手枪，恐怕敌人搜出来，要于科长把手枪藏到他的猪篓里。

于科长很感动，心里想，决不能让老乡为我们担这个风险。他悄悄握了握老人的手，又用眼神示意请他放心。王三大爷没有猜错，他和小周身上确实带着枪，都插在裤腰里，他带的是一支小擗子，小周带的是一支驳壳枪。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带手枪非常危险，带了手枪又容易招来麻烦，但他们早有准备，只要把肚皮一收，手枪就会“哧溜”一下滑进裤裆。可以放心，手枪决不会从裤管里溜出来，因为他们穿着两条裤子，里面一条，齐大腿根用绳子扎紧了，而且上身还穿着一件遮住了膝盖的破棉袄，不容易露出破绽。

又等了个把钟头，才轮到王三大爷过卡。两个伪军忍受不了王三大爷猪篓里的臊臭，只是在他身上胡乱摸了一气，就用枪托朝他的腰上狠狠地一捣，把他打发过卡。但是王三大爷惦记着于科长他们的安全，并不急于脱身；他走了两步便蹲下身子，装着整理猪篓。

这下轮到于科长和小周两个货真价实的八路军了。“妈的，举起手来！”伪军没有从王三大爷的身上捞到油水，似乎有点窝火，想在他俩身上出出气。

他俩装着服从的样子，举起了手。

搜查于科长的这个伪军，长着两颗老虎牙，撑在嘴唇外面。他龇牙裂嘴地朝于科长看了看，皱起了眉头，不用说，显然是因为于科长的一副穷相使他扫了兴，预感到又是一次晦气。他把手伸进了于科长的破棉袄的口袋，这下犹如触了电，飞快地抽回了手。

这家伙真有本事，眼睛不看，凭手感就能知道是钞票。他搜出了“准备票”，真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乌紫的嘴唇裂开了。

“老总，这钱你……”于科长急忙抓住“老虎牙”的手，装出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于科长越是小气，敌人也就巴不得他赶快走。“老虎牙”一手护住钱，一手把他朝卡外一拨：“去去去。”于科长过了卡子。

搜查小周的另一个伪军，见“老虎牙”开了利市，眼光直往他的手上溜，搜查也就马虎了。小周也过了卡。

同志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过了卡，脸上不能有丝毫欣喜的表情，脚步也不要走得太快，尽可能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以免引起敌人怀疑。所以于科长和小周走得很慢。谁知才走出十多米远，忽听背后那个“老虎牙”惊叫起来：

“啊！……是八路……来人哪，八路溜啦！”

糟了，“老虎牙”认出于科长他们来了。他们掉头一看，“老虎牙”和另一个伪军已经扑到了背后。这时候，只见王三大爷装着惊慌的样子，把猪篓朝跑在前面的“老虎牙”脚下一推，“老虎牙”“扑通”一声绊倒在地上，大枪也扔出十来步远。趁这机会，于科长和小周下了大路，进了庄稼地。

这时岗楼上的机枪响了，子弹在他们头上乱飞。岗楼里涌出六七个鬼子，跟着“老虎牙”和另一个伪军，在他们后面紧追。

“怎么办？科长！”小周从裤裆里掏出了手枪。

“沉住气，往道沟里跑，到前面村子避一避。”

前面的村子叫大常庄，不进这个村子显然非常危险。附近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倘若这些岗楼据点再出兵拦截，那就更麻烦了。

他俩从村东头闯进村子，进了一条胡同，不料这是死胡同。正想退出来，忽然胡同半腰里的一扇门开了，里面探出一个人头：瘦瘦的妇女，五十多岁年纪。她朝于科长和小周看了看，又往四周张望一下，随后飞快地一招手。他俩也来不及细问，便一步跨进门槛，反身闩上门，随她穿过庭院，走进北屋。

北屋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他见于、周二人进来，立刻掀起炕席，移开四五块砖头，炕上露出一个洞口。他指指洞口，嘴里呜呜啦啦，看样子他很着急，于科长这才知道他是哑巴。于科长遵从他的意思，和小周跳上炕去，钻进洞口。哑巴从篮子里摸出两个窝窝头，塞进洞里，然后把洞口封了，又摊上炕席。

“嗨，让鬼子折腾去吧，我们可进了保险箱啦！”小周嘻嘻笑着，一口咬下半个窝窝头。

“是啊，今天好险，多亏了乡亲们。我们要永远记着人民群众在危难中给我们的帮助，在抗日斗争中的功劳。”

小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过了一会，他说：“科长，我顺这地道走走，看有多长。”说罢就走了。

这时村子里响起了枪声、敲门声，到处是鸡飞狗跳，全村闹闹嚷嚷。

“咣当”、“咣当”……敌人的枪托砸到大娘的门上来了。薄薄的木板门被砸开了。

“他娘的，把八路军交出来。”这是“老虎牙”的声音。

“对，八路的，哪里？不说，死啦死啦！”鬼子也在一旁威吓。

大娘回答：“太君，啥个八路大大的？俺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还是头一遭听说。”

“他娘的，别想糊弄老子，八路准是在你屋里藏着，要不然，大白天关什么牢门？”又是“老虎牙”的声音。

“哎呀，大兄弟，这话怎么说呢？俺老实巴脚，胆小怕事，连掉下片树叶也吓得慌，听到外头枪响，能不关个门？俺妇道人家就是天生的没个出息！”

“你的，男人家的，说话说话。”鬼子又在追问哑巴。

“太君，他是俺丈夫，打落下娘胎就一直哑巴到现在，要是能说话，俺做梦都要笑醒。”

哑巴懂得老伴的意思，便呜呜啦啦起来。敌人傻了眼。

“搜！”鬼子吼了一声。大娘的屋里遭殃了，翻箱、倒柜、摔碗、砸锅……

过了好半天，只听大娘一声惨叫，敌人走了。估计鬼子和伪军一无所获，只得把气出在大娘身上。

于科长全神贯注地听着炕外的动静，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周又回到了身边。小周拉拉他的衣服：“敌人走啦！”

于科长默默地点点头。

“科长，这地道可大啦！”小周的语气里充满了惊讶，“地道有三条，连环的，洞口很多，一个在东屋的墙壁上，一个在羊圈里，一个在白菜窖里，一个在茅厕里，一个在牲口槽下面，最大的一条地道起码好蹲一百二十人。”

“这大娘和哑巴大爷，是我们党很可靠的基本群众。老夫妻俩要挖这许多地道，也真难为他们了。”

于科长和小周闲扯着，等待敌人出村。

不一会，炕上的洞口开了。大娘对着洞口说：“同志，没事啦，乌龟王八滚蛋啦！”

“谢谢你，大娘。”于科长边说边爬出了洞口。

“谢什么，一家人还兴说两家话？只要你们不惊着，俺就放心啦！”

“敌人伤了你哪里？”于科长不安地问。

大娘指了指腰说：“不要紧，这里都让狗娘养的打出茧子来啦！”她说得很轻松，显然是因为怕八路军同志难过。

这时哑巴大爷端着两杯水和一碗窝窝头进来了。他把碗、杯放在炕桌上，笑嘻嘻地望着于、周二人，用手比划了个“八”字，又竖起大拇指；接着打了个矮个子的手势，便很快地朝地下吐了口唾沫。

于科长紧紧握着哑巴大爷的手，把他扶到炕沿上坐下。

大娘告诉于科长，她丈夫叫常培仁，她叫刘香芹。

于科长问：“大爷大娘，你们挖这地道不容易吧？”

“可不是！”大娘回答，“俺这村有十来个国民党员，这帮家伙的鼻子比狗还灵，整天闻东嗅西。俺俩白天挖不成，就晚上挖，整整掏了七个通宵。泥巴运不出去，可犯了难，还是我这哑巴老头有心计，他把炕洞都塞上土，又用剩下的泥土，在东屋里堆了两个实心炕，好让同志们来时有睡觉的地方。”

当天晚上，于科长和小周便宿在常大娘家的两个实心炕上。他们知道这大常庄周围布满了敌人据点，北是大徐据点，南是乐陵县城，东是东兴店据点，西是李门杨据点，西北是三间堂据点，西南是苏家据点……离大常庄最近的不到三里路。但他们睡在大娘家的炕上，心里丝毫不感到危险，很踏实。这一夜睡得真香。

第二天一早，他们从炕上爬起来，常大娘正在收拾吃的，

她眼圈很红，面容露出明显的倦色。常大爷则爬在院子里的一棵枣树上，探头向外张望，头发全被露水打湿了。这一对老人为了能使他们睡个安稳觉，显然一夜没有合眼，在了望放哨。于、周两人的眼眶湿润了。

大娘见于科长起来了，忙从蒸笼里拿出一个窝窝头塞给他：“怎么不多睡一会？”

“睡足啦！”

“当真？俺看啊，你们这号人劳碌惯了，就是不知个倦！”

于科长笑了，说：“大娘，现在天刚亮，我们想早些走。”

大娘想了想：“行，俺知道你们忙，俺也不多留，可饭要吃饱。”说着又拿出几个窝窝头。

于科长和小周吃饱了肚皮，便向大爷大娘告辞。大娘把他们送到门口，压低声音说：“村东南有片乱坟，里面有座供桌，你们下趟来，先看看供桌底下。村里有情况，你哑巴大爷就塞一张白纸条在供桌下面，要是没有情况，就塞一张红纸条。”

他们感动地向两位老人点点头，出村去了。

后来，我碰到三地委书记李广文等同志，说起常大娘夫妇掩护于科长的事，他们都竖起了大拇指。原来他们也在常大娘家里藏过。他们还告诉我：在敌人“扫荡”频繁的时候，常大娘夫妇有一天连续接待了我军十多批伤员，擀了十多次面条。敌人曾发现常大娘有“通共”嫌疑，在一个月里派兵来搜查过二十几次，结果都一无所获；但常大娘却挨了好几次吊打。她的哑巴丈夫也同样了不起，他虽然不会说话不识字，但对革命十分尽心。有一次我们的同志在转移的时候，先后把几十份文件交给他保

存。后来同志们陆续回来了，他见到谁，便交出谁的文件，一份都没有弄错。

在边区被“囚笼”封锁的艰苦岁月里，象这种抗日群众豁出命来掩护我党我军的动人事迹，真是数不胜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两件事情。

一次，三专署妇教会主任石磊光和通信员赵玉兰，在葛津河畔小王村做群众工作，住在一户姓王的大娘家家里。这天正值鬼子出来“清乡”，石磊光和通信员准备转移出村。这大娘的家里有个大橱，橱下就是地道口，地道直通村外。大娘挪开大橱，正准备掀掉洞口的木板，突然从地道里钻出一个人来。这家伙是汉奸，原来他在村外发现了洞口，便暗暗钻了进来。接着又从大门口涌进来一批汉奸，将大娘家的人连同石磊光全堵在屋里。

“老太婆，把年轻的闺女媳妇都叫出来，给老子缝口袋。”汉奸们吆喝着，一面晃晃手中的鸡鸭，他们想弄几个口袋将抢来的东西装上。

“二丫头！”大娘对着石磊光说，“听老总的話，你和姐妹们上西屋的炕上绞布。”

“慢！”一个汉奸头目喝住了大娘，并贼眉鼠眼地盯住石磊光不放，叫石磊光先去烧饭。

大娘忙走过来对汉奸头目说：“老总，俺这闺女做出来的饭，底下焦，顶上稀，中间夹生，叫她做饭就是糟蹋米啊！”说完又冲着石磊光：“二丫头，还不快上西屋炕上去绞布。”

石磊光明白大娘的意思，便避开汉奸，到西屋去躲躲。可是她刚跨进西屋门，不料那汉奸头目也跟了进来，并反手掩上门，准备对她强行无礼。正在这危急的时候，大娘在外屋将孙子的屁股拧了一把，趁孙子哇哇大哭，她一步闯进西屋，高声

责骂石磊光不管孩子。

石磊光趁机跳下炕，想到外间去。不料汉奸从她下炕的动作看出了破绽，她下炕不象本地农村妇女那样溜下来，而是象跳交通沟那样，一手撑着炕沿蹦下的。

“妈的，你准是八路！”汉奸头目打了石磊光两个耳光。

石磊光同志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因为她不是本地人，怕露出口音，会更加引起敌人的怀疑。

“妈的，哑巴啦？看你这样子，准是八路的干部。”

“哎啊啊，老总！”大娘抢过话头说，“你看她这样子能当八路？俺这二闺女老实巴脚的，前几天才从天津婆家来，看你们这一吓唬，她连话都不敢说了。”大娘说完，从地上抱起小孙子塞给石磊光。

石磊光接过孩子，解开怀装着给孩子喂奶。

汉奸们狠狠瞪了石磊光一眼，然后翻出几条口袋，悻悻地走了。

另一件事，时间大概是在一九四三年初。我二分区领导决心在平原县打击一下敌人的威风，拔掉几个据点，于是派侦察员纪开礼、张义子等几个同志出去侦察水务、高家一带据点的敌情。

清晨，侦察员们出发了。他们在内线的帮助下，很快便掌握了敌人的兵力、工事等情况。在返回驻地的时候，他们途经华家村，想在这里吃了午饭再走。

几个人刚进村子西头，忽然听到村子东头传来鸡飞狗叫的嘈杂声，接着又是两声枪响。原来敌人刚从东头进村抢掠。侦察员们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抽身撤离，退到村口的道沟里，跨上自行车，猫着腰就跑。

但落在最后的张义子，还没有来得及跳下道沟就被敌人发

现了。鬼子嗷嗷叫着扑过来。张义子如果跳下道沟，就会引来敌人，连其他同志都会被发现。他当机立断，迎着敌人走去。在距敌二三十米的地方，他一个急转身，闪进一条胡同，走了几步，就飞身翻过一座墙头，跳进一个院子里。

敌人追进胡同，没想到丈把高的院墙人能跳进去，以为张义子逃到胡同尽头的一片芦苇塘里去了，便顺着胡同径直朝前追赶。

张义子跳进院子，使一个正在慌忙收拾东西的大娘吓了一跳。她抬头见是八路军同志，便赶紧把张义子拖进房间里，又把他推上炕按倒，给他盖上三床棉被，说：“同志，装病躺着别动，万一敌人进来，你就叫我娘，我女儿做你媳妇……”

大娘的话还没说完，她的女儿——还没有婆家的姑娘，就机灵地倒上一碗开水放在床头，又把茶壶里的陈茶水倒进碗里，用筷子搅搅，做成“药汤”。

这时候，十来个在胡同尽头的苇塘里扑了空的鬼子兵，闯进了院子。他们用生硬的中国话叫大娘交出八路军，说不交出就“死啦死啦的”，还做了个砍头的手势。

大娘装出不懂的样子，从勺子上取下半篮鸡蛋殷勤地递过去。

鬼子恶狠狠地接过鸡蛋，仍旧跨进房间搜查。他们掀掉张义子身上的棉被，见他满头热汗，而且还有个年轻的媳妇捧着“药汤”，焦急地守候在床头，似乎明白了三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只得怒气冲冲地离开院子，到别的人家继续搜查。就这样，张义子在大娘的冒死救护下，安然脱险了。

人民群众不但掩护我军及抗日工作人员，使我们在敌人的“囚笼”里生存下去，而且还配合我军，用种种办法来打破“囚笼”，如破坏公路、平毁封锁沟、割断电线等。有时群众

和民兵还协助我军主动出击敌人，破坏敌人修筑“囚笼”的计划。

一次，敌人强征了数百名群众，在盐山县望树镇一带挖掘县境封锁沟。监督挖沟的是日寇一个小队。

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后，便派军区手枪队的十几个人，去把这个日寇小队收拾掉，不能让敌人在这一带掘成封锁沟。因为这里是军常来常往的地方。

这天早晨，天空刮着西北风，一队民夫扛着镐、锹，被敌人押着，来到了望树附近工地。我们的手枪队员也混在民夫队伍中，他们头包白毛巾，腰间扎一条布带，打扮成民夫模样，身上藏着短枪。

劳动开始了。民夫们手中的铁镐高高地扬起，却轻轻地落下，镐尖只在冻土上凿出一个个白点。监工的鬼子端着枪，在工地上来回走动，恶声恶气地吆喝。我手枪队的同志一边“埋头苦干”，一边窥探着鬼子的动静，寻找下手的机会。

不一会，鬼子大概见工地秩序稳定了，便跑到附近的一片坟地里，生起火来，烤火取暖。他们将十几支“三八”大盖枪撂在地上，一挺歪把子机枪也架在火堆旁，但枪口对着工地。

手枪队长见到这种情况，心里暗暗着急，因为敌人离工地有三四十步远，我们一时难以接近，特别是那挺机枪，对工地的威胁更大。手枪队长的焦急心情，被手枪队一个年龄最小的队员觉察出来了。这小队员只有十五六岁，外表一副幼稚相，脑子却非常聪明，大伙都管他叫“机灵鬼”。

“机灵鬼”暗暗打定主意，一定要把鬼子身边那挺机枪夺过来。他向队长使了个眼色，队长估计“机灵鬼”想出了绝招，便点点头，示意他放手去干。

于是，“机灵鬼”将帽子歪戴在头上，朝鬼子们挤挤眼

睛，嘻嘻地笑着，装出傻乎乎的样子。鬼子们都好奇地看着他。然后，“机灵鬼”又学着鬼子的腔调，说起日本话来：“你的，米西米西，八路的，大大的，开路开路……”这牛头不对马嘴的日语，把鬼子们都给逗乐了。

日寇以为“机灵鬼”是个傻小子，便准备拿他寻开心。鬼子小队长朝他招招手：“你的，小孩的，过来。”“机灵鬼”见敌人上钩，心中暗暗高兴。他仍旧装着傻乎乎的样子，双手抱拳，用日军跑步的姿势，朝鬼子们歪歪斜斜地奔过去。

一部分民夫见到这情景，明白了“机灵鬼”的用意，但心中又为他捏着一把汗。有几个年轻力壮的民夫，在暗地里说：“准备好，万一‘机灵鬼’出了岔子，我们就冲上去，把鬼子干掉！”还有几个上了岁数的民夫，为了帮助“机灵鬼”麻痹敌人，故意高声地说：“他是哪个村的？这么不怕死。”“真他妈的二百五，这不是屁股眼拔火罐——找屎（死）么！”“你们去个人把他叫回来，把‘皇军’惹火了，咱们都跟着遭殃。”

“机灵鬼”到了敌人眼前，大大咧咧地伸出手来在火堆上烤烤，然后将鬼子小队长的钢盔摘下来戴在自己头上，又将自己的破帽子往鬼子小队长头上一罩。鬼子们顿时一阵哄笑。过了一会，“机灵鬼”同敌人混熟了，便将那挺歪把子机枪扛在肩上，嘴里喊着“一二一、一二一”，用操练的步伐向工地走来。他还佝偻着腰，装出扛不动机枪的滑稽姿态。敌人被他的傻样逗得哈哈大笑，笑得东倒西歪。

突然，“机灵鬼”猛地车转身子，将机枪架在地上，枪口朝着敌人，“哒哒哒”地扫射起来，打得鬼子们晕头转向。

趁这机会，手枪队员们掏出短枪，朝敌人猛扑过去。民夫

们也举着镐、锹，潮水般地涌上去将敌人包围起来。鬼子们还没有来得及取枪，便一个个被打死在坟地里。

战斗结束后，手枪队的同志和乡亲们，又将刚挖出的封锁沟全部填平，这才撤离工地。

从此以后，日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在望树镇一带掘沟、筑路。

第二十七章 瓦解伪军

为了打破“囚笼”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沟通县与县之间的联系，我们边区领导决定大力开展瓦解伪军的工作。因为县境封锁沟和交通要道上的岗楼、据点，大多数是由伪军把守，一旦争取和瓦解了伪军，就等于拿到了“囚笼”上的钥匙，就可以打开“囚笼”上的锁。

我们分析了一下，盘踞在冀鲁边的伪军，大致有下列几种：一是“和平救国军”，属于汪精卫伪中央的正牌军；二是“治安军”，属于省范围的正规军；三是“保安队”，有省保安队，也有县保安队，属于一定范围的地方部队；四是“皇协军”，是从伪“满洲国”调来的伪军；五是“自治联军”，既不属于汪精卫也不属于伪“满洲国”，是单独依附日寇的反动军队。其中“治安军”、“保安队”、“自治联军”的士兵，大都是本地人，我们易于了解他们的底细，也易于争取他们。因此，我们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这三种伪军上。

瓦解伪军，首先是选择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对象，对他们进

行说服教育，用唇枪舌剑使之改邪归正。

当时沾化县城东北有个很大的村庄，是由五十二个小自然村联在一起组成的，名叫五十二村，约有二万多居民。村中驻着伪军数百人，头目叫傅瑞五，外号傅老七，此人早年原是土匪，后被沧州的伪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刘佩臣收编为伪军。

据了解，傅瑞五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寇对他不太信任，国民党也对他不很放心；而他对日寇和国民党则同样怀有戒备心理。他们之间之所以存有隔阂，据说是因为傅瑞五早年干过这样两件事：

一件事是：抗战前有一天，傅瑞五和他的老婆化装成商人，身带两把匣子枪，从天津登上日本商船。船至深海时，他夫妻俩拔出手枪，劫持了商船，并迫使商船转舵开往郭家局子。到了郭家局子，他的喽罗们早已等在那里接应，于是一齐登上商船，将大量黄金和布匹等物搬上小船，驶入浅沟，又将商船和船上的人扣留在海滩上。这一抢，惹恼了日本政府，日本照会蒋介石，表示强烈抗议。蒋介石立即责令韩复榘索回被抢之货物人船，但韩复榘找不到傅瑞五。之后，日本派了数架飞机在郭家局子上空盘旋威胁，直到傅瑞五把商船和旅客放走为止。

第二件事是：早在一九二七年底，沾化县的士绅们同国民党沾化县党部闹了纠纷，继而扩大为仇隙。后来士绅们收买了傅瑞五。傅瑞五单枪匹马潜进沾化县城，一夜之间将国民党县党部的官员全部杀死。从此，国民党很久不敢在沾化县设置党部；后来虽设了党部，但党部驻在无棣城内，根本不敢过问沾化的政事。

鉴于傅瑞五的这些情况，我们将他列入可以争取的对象，并立即着手进行争取工作。我同王卓如、黄骅等同志商量了一

下，决定选派张荣亭、李逸民、贾乾瑞、吴英民、张立青、孙青野、翁默青、刘清林等几位精明能干的同志，打入五十二村，秘密接近傅瑞五，开展争取工作。

这几位同志到了五十二村，很快便渗进了傅瑞五部的基层组织和领导机关。他们在伪军士兵当中广泛地攀亲交友、结拜弟兄，利用拉家常的机会，宣传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有保护中国的责任，帮助日寇来糟蹋自己的国土等于卖国等道理。伪军士兵们听后，有垂头的，有叹气的，有沉默不语的，也有当场幡然醒悟、表示从今洗手不干的。

动摇了傅瑞五的基础之后，李逸民、贾乾瑞、张荣亭、翁默青等同志又大胆地开始了对傅瑞五本人的政治攻势。有一天晚上，他们潜到傅瑞五的住宅附近，利用夜幕的掩护，低声唱起了《流亡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凄惨悲哀的歌声在夜空中不停地回荡，拨动了傅瑞五的心弦。他从桌旁站了起来，又在屋内急速地踱了两圈，然后推开窗户，望着传来歌声的黑暗处默默出神。

藏在墙角旁的同志们，对站在光亮处的傅瑞五的一举一动看得非常清楚，知道他的心眼已经活动，便决定趁热打铁。第二天，他们在已被争取过来的伪军官的引荐下，会晤了傅瑞五，当面对他进行启发诱导。没谈多久，他便对天发誓，保证改邪归正，从今天起决不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为了使傅瑞五部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根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对于反正伪军，不一定要编入八路军，编制不一定要很快的八路军化，而可以作为八路军的外围军”的指示，与傅瑞五商定，今后傅部仍旧公开打着伪军的旗号，实际上则属于我党掌握的力量，暗中保护我党我军的抗日活动。

但事过不久，早已对傅瑞五心怀戒备的日寇，探出了傅部

和八路军有来往的苗头，可是又不甘心轻易将这支实力较强的武装撤消。于是派了沾化县城的三十多个鬼子和一个伪军保安大队，经常驻在五十二村这个据点，暗暗监视傅瑞五的行动。

这实在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但我们很快又了解到，由于日寇欺压伪军太甚，沾化县城的伪军保安大队同日寇也有矛盾，尤其是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张香山，更是对日寇怀着一肚子不满，常常不听鬼子的招呼。我们决定充分利用这一矛盾，连保安大队也争取过来。

保安大队的大队部，有个秘书叫杨天骥，是我们安插在敌人心脏的共产党员。他办事机灵，多谋善断，深得张香山的宠信。我们便指示杨天骥同志在张香山身旁大胆开展活动，务必将张抓到手。

杨天骥得到指示后，用大队秘书的合法身份，常以汇报工作、谈论时局为名，在张香山面前隐晦地数落日寇的罪行，灌输抗日救国的思想。

经过几次试探，杨天骥发现张香山在言谈之中常常流露出悔恨和失望之意：说自己走错了门路，失身为遗臭万代的汉奸，现在罪孽深重，知过已晚，不能重新做人了，等等。杨天骥见张香山确有爱国和悔罪之心，便向他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转达了我边区领导同志等待他弃暗投明的殷切期望。张香山大为感动，当即表示要投身革命，归向人民。

就这样，在杨天骥同志的耐心诱导下，张香山彻底转变了立场，并被我党吸收为党员。后来通过张香山的介绍，这个保安大队的一中队长尹子敬和几名小队长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我党基本上掌握了这个保安大队的领导权。

对于下层士兵，除了张香山和几个党员逐个地进行教育、争取外，沾化城里的抗日群众团体也积极配合，开展争取工

作。他们常去走访伪军士兵的父母、妻子儿女，晓以大义，请这些人劝告亲人改邪归正。伪军家属在伪军士兵回家访亲或自己进城探望的时候，不断向士兵诉说共产党的政策、八路军的好处，终于动员了大批士兵走上正路。

不久，这个伪军保安大队，从队部到基层都有我们党的组织，从长官到士兵都有我们安插的人员。它不但没有监视傅瑞五部的抗日行动，还同傅部秘密联合起来，为我军搜集情报，暗中配合我军的行动。而日寇还蒙在鼓里，以为傅瑞五部在他们派去的保安大队的监视下，变得老实了。

在边区根据地被日寇分割封锁，我军化整为零的这段时期，我们对伪军及汉奸尽量采取政治上的争取与瓦解，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但是，对那些顽固不化的伪军和铁杆汉奸，我们的方针则是使用武力予以狠狠打击，以震慑其他伪军、汉奸，使其转过来为我军服务。为此，我们曾发起“桃花月”活动，即一个月当中，每天都有铁杆汉奸、伪军的血流到地上。

在“桃花月”活动中，边区涌现出无数个神出鬼没，使敌人胆战心惊的英雄人物。他们说叫谁死就叫谁死，要张三半夜里丧命，张三绝对活不到第二天早晨；无论敌人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能寻找出来，给予应得的惩罚。

我庆云县手枪队队员刘心宽同志，一天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除掉铁杆汉奸董洪训。董洪训是东窑村人，他为了向日寇献媚邀宠，千方百计地残害抗日群众，民愤极大。

当天下午，刘心宽通过内线了解到董洪训这几天正在家里忙着替儿子娶媳妇。他顾不上吃晚饭，买了六个梨子装在口袋里，便上路直奔东窑村。到了村中，正巧迎面碰到董洪训，这家伙身穿白大褂，光着贼亮的脑袋。

“老董啊，贵人事多，找你可真难啊！”刘心宽嬉皮笑脸

地说。董洪训一愣，睁着老鼠眼将刘心宽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问：“你尊姓大名？找我有事吗？”

“有事有事，我是城里保安大队长吴赞训派来向你道喜的。另外，今日是吴大队长娶二房姨太太的喜期，他请你前去赴宴，不知你肯不肯赏这个面子。”说着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请帖。

“哪里的话，吴大队长看得起我，我董某还能不识个好歹。”董洪训一反刚才的那种凶相，满脸堆笑地说。

“那就请董先生上路吧。”

“啊啊，你看我这身衣服，还光着头，得回家找顶帽子遮遮丑。”

刘心宽装着亲昵的样子拉住他说：“闹什么客套，你和吴队长也不是一两天的交情了，随便些不是更显得亲热吗？”

就这样，董洪训被刘心宽连拖带拉地拖出了村口，踏上了进城的大路。走到袁家村的一条河湾旁边，刘心宽掏出手枪，结果了这个铁杆汉奸的狗命。

处决董洪训之后，刘心宽走到四区的一个村庄，心想伪县政府财政科科长魏登峰就住在这村里，这小子作恶多端，不如顺便把他也收拾掉。

刘心宽走进魏登峰家里，不料只有个老太太守在屋里。他便从怀里掏出六个梨子递过去，说是孝敬她老人家的，并向老太太打听她儿子的去向。

正在这时候，魏登峰回来了。刚走进前院，便骂骂咧咧地对后院的老太太说：“娘，不知哪个小子，把东窑村的董洪训给毙了，如果老子抓住那家伙，非扒他的皮、抽他的筋不可！”

魏登峰走进后院，猛地看到一个年轻力壮的陌生人站在屋

里，不禁一愣。没等他醒过神来，刘心宽左手揪住他的大褂衣领，右手掏出手枪顶住他的前心说：“不瞒你说，董洪训是我杀的，你敢怎么样？”

刘心宽的话还没有说完，那家伙便已瘫倒在地上，口中吐出白沫，双眼翻白。刘心宽用手在他的鼻孔前摸了摸，发觉这个饭桶已经断气了。

“哈哈，省了我一颗子弹。”刘心宽笑着出了魏家大门……

在吴桥县和东光县交界处，有个叫于集的据点，驻有伪军三、四十人。队长叫齐金折，专和共产党作对，罪恶累累。我们决定将这家伙除掉，便把任务交给了东吴县大队的石金玉同志。

石金玉领命后，立即召集几个同志商议出一条钻进于家集、除掉齐金折的计策。

第二天的下午，一个敌特队长模样的人，头戴礼帽，身穿呢料大褂，眼睛上架着副墨光眼镜，皮腰带上斜挎着一支短枪，骑着菊花牌自行车，非常神气地走在于集东北野外的大路上。他身后还有一溜十几辆自行车，车上的人有的光着分头，有的歪戴礼帽。走在队前的就是石金玉同志。他们冒充日本的特务队，向于集据点奔去。

为了更有效地迷惑敌人，他们还通过地下党组织，预先安排了一些农民在于集据点附近干活。他们这个“特务队”临近据点时，故意对农民高声斥骂，甚至装着要抓要打，将群众驱逐得四处奔逃。这些动作，全是演给于集据点炮楼上的伪军哨兵看的，哨兵当然也全部看在眼里。

这个“特务队”来到炮楼跟前时，见吊桥高悬，无法通过，战士们就冲着炮楼上的哨兵高声大骂起来：“你们这些混

蛋，干什么吃的？快叫齐金折出来，迎接我们队长。”

“请问长官，你们是哪一部份？”哨兵问道。

“你小伙子活够了，罗唆什么？我们是特务队，快叫齐金折跑步来接。”

哨兵不敢怠慢，赶紧进去向齐金折报告。齐金折正在炮楼里同姨太太及另外两个汉奸头目打牌，他一听来了特务队，吓慌了神，把麻将牌一推，整理了一下衣帽，便匆匆出来接客。他知道特务队在日本人面前说一不二，万一怠慢了他们，自己便大祸临头。为了表示对特务队的尊敬，他一路小跑，来到炮楼门口，命令哨兵赶快放下吊桥。他站在一边躬身相迎，满脸堆笑说：“队长请进，队长请进！弟兄们请进，请进！”

石金玉同志傲气十足地昂首走在前头，一个汉奸头目赶快把自行车接过去。战士们也都随后来到大院的大院里。

齐金折发现这位队长面带怒容，对他不理不睬，不由得慌了。他惴惴不安地走到石金玉面前，敬了个军礼说：“报告长官，兄弟齐金折事先不知道队长驾到，迎接来迟，请多多原谅。”说罢，又行了个军礼。

石金玉这才慢慢把视线从别处移到齐金折身上，将这坏蛋上下打量了一番，但也不说什么。这就更使齐金折摸不着头脑，他立正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过了一会，石金玉朝他冷冷地瞥了一眼，厉声喝道：“齐金折！”齐金折答道：“有！”“我们来到这里，你为什么迟迟不下令开门，安的什么心？”齐金折赶快回话：“兄弟实在不知队长驾到，兄弟有罪，有罪。”我们的一个战士插话说：

“听说这小子正在房间里同小老婆打牌。”齐金折听了，吓得哆哆嗦嗦地连声说：“兄弟消遣消遣，兄弟失职，失职，以后不敢。”石金玉又骂道：“你这个混蛋，如果我们是叫八路军

追来的，你不开门，你想到后果吗？”齐金折吓得没有话说了。“赶快命令全体官兵，徒手到这里集合，听我训话。”石金玉命令说。“是！”齐金折又行了一个军礼，回身下了徒手集合的命令。

几十个徒手伪军跑步来到院子里，排成整齐的队形，等待特务队长训话。石金玉同志昂然走到队前，环视了一下队伍说：“现在我县境内，八路非常活跃，他们破路、填沟、割电线，到处袭击‘皇军’。可是，队长齐金折竟玩忽职守，置敌情于不顾，整天躲在家里吃酒、打牌、玩女人。对此，‘皇军’早得到情报，今天特派我部前来惩处。”

齐金折听到这里，吓得魂不附体，跪倒在石金玉面前嚎叫起来：“请队长高抬贵手，饶恕小弟，小弟可是一贯效忠皇军……”他边说边哭，还趴在地上给石金玉磕头。

石金玉把手一挥：“拉出去，毙了。”

我县大队的两个战士应声上前，就地枪决了这个恶棍。

接着，县大队的同志们迅速收缴了据点里的枪支。并当众宣布了自己的身份，遣散了手无寸铁的伪军士兵，最后点火烧毁了据点。

此外，再如临邑县我“八大队”队长路虎子（路有水），击毙了辛集据点伪队长尹作文和盘河街日军翻译王子玉，活捉了辛集区伪区长刘行呼、孟康飞等；我盐山二区区长刘二愣，单枪匹马闯进苏基据点，活捉了伪联保主任“杨四老爷”；我宁津县大队的苏豁子，击毙了魏家庵的汉奸李华太……。据不完全统计，单是宁津一个县，在一年当中，就除掉一百四十四个铁杆汉奸、伪军。

我武工队、县大队的同志，捉拿伪军、汉奸，真象从羊栏里牵走一头羊那么容易，吓得伪军和在伪政府工作的汉奸惶惶

不可终日。伪军、汉奸们在赌咒发誓时常说：“我倘若如何如何，出门不遇上刘二愣，就碰到苏豁子。”伪军、汉奸们还常在暗地里互相嘀咕：“老兄，你的‘生死簿’上黑点多还是红点多？我名下的黑点可能已经不少了呢！”（“生死簿”是我们给伪军、汉奸立的档案。做一件好事的，给他点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的，则给他点一个黑点，黑点达到十个，就立即将其处死。）

从此，铁杆汉奸和伪军日渐减少，不死的也变得老实起来。有的主动向我军讨好，说他的小队或某某人某月某日讲了我军一句坏话；有的把鬼子的情报和药品偷出来，暗中送给我军；还有的悄悄找到我军，打听他的“生死簿”上有多少个黑点……。我们要他们干啥，他们就乖乖地干啥，大都不敢违拗。

一次敌人在庆云县大“扫荡”，我三分区的王世延同志带着一支部队向外县转移。到了县境封锁沟时，守在沟旁岗楼上的伪军见来了八路，慌忙放下吊桥，恭恭敬敬地让我军过去。王世延为了不使这些伪军在鬼子面前为难，便朝天放了几枪，还杀了一只鸡，洒下几滴血，为他们留下“战绩”，好让他们到鬼子面前报功。

还有一次，“八大队”队长路虎子同志，在临（邑）商（河）公路上碰到了伪军的一个巡逻小队。巡逻小队队长王荣庆，以为路虎子势孤力单好对付，便喝令部下捆绑路虎子。

路虎子站在公路上，一动也不动。他冷笑着对王荣庆说：“姓王的，你的名下已经有了九个黑点，你把我一绑，黑点就凑齐了十个。来啊，绑吧！”

王荣庆听到自己的“生死簿”上已经有了九个黑点，吓慌了，他知道八路军说到做到，自己如果再添一个黑点，不死在今

天就死在明天。他急忙挥手斥退部下，陪着笑脸对路虎子说：

“八路老爷，兄弟是闹着玩的，哪敢当真绑你。八路老爷，我把你放走，你能不能替我抹掉一个黑点？”

“黑点是抹不掉的，不过放我走可以给你添一个红点，红点多了就能宽待你。”

“这、这，那我放你走，再给你六百发大枪子弹，一百发匣枪子弹，那就求你给我多添几个红点吧，坏事反正我今后再也不做了。”

“这还差不多！”路虎子爽朗地大笑起来。就这样，路虎子不但安全地跨过了临商公路，还得到了七百发子弹。

再说一件事，那是一九四三年初，新海县委书记姜仁奇同志亲自闯进县城，找到伪军总队长李景文，向他讨两挺机枪。李景文说，自己的武器被鬼子登记在册，倘若缺少一件，日后鬼子追究起来就麻烦了。他想了个主意，要姜仁奇穿上他的衣服，拿着他的名片和伪军总队的介绍信，到天津的日军仓库去领。

姜仁奇料定李景文不敢耍什么花招，便按他的办法去干。第二天，姜仁奇化装成李景文，坐着李的汽车，跑到天津。果然从日寇驻屯军司令部，领回来两挺歪把子机枪。

事过没几天，姜仁奇染上了瘟疫，鼻子老是流血，便住到大郭庄休养。大郭庄距敌人的常戈据点很近，据点里的伪军透出消息说，鬼子最近将要出来“扫荡”。于是姜仁奇派人通知李景文，要他设法保护。

李景文接到通知后，便把他的亲信——驻常戈据点的大队长李九勺子找来，指定他负责姜仁奇的安全。

李九勺子不敢怠慢，亲自到大郭庄迎接姜仁奇，将姜仁奇安排到常戈据点附近的大赵村，派了专人保护。他自己也经常

到大赵村，给姜仁奇送西瓜、送葡萄，真是殷勤极了。

就这样，我们采用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配合的办法，争取和瓦解了不少岗楼、据点里的伪军，取得了打开“囚笼”的钥匙。

第二十八章 挫败诡计

日寇在“囚笼”里布置重兵“拉网”、“梳篦”，十有八九都是扑空，目标往往成了泡影。

失败和诡计往往成正比，敌人格外狡猾了。他们深知八路军游击战术的厉害，便异想天开，企图“以游制游”，即模仿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以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们也化整为零，穿上便衣。用伪装、偷袭、声东击西等手段，搜集我方情报，逮捕我工作人员，破坏我根据地，追扑我小股部队。

起初我们失之大意，没料到日寇会来这一手，吃了点亏。

有一天，盐山县抗日群众团体负责人左庆甲同志正在大左村向群众了解附近望树、马坊两据点的敌情。这时候，村口来了一群穿农民服装的人，有挎篮子的、挽包袱的、拿糖葫芦的。左庆甲以为他们是到村里一户人家去吃喜酒的老百姓，因而没有戒备。不料这伙“老百姓”一到他跟前，就将手中的东西一扔，掏出手枪对准他。左庆甲措手不及，被他们用麻绳五花大绑起来。敌人当即把他押到望树据点，关进一所有铁门的屋子里。

敌人拿来刑具，逼他供出我党地下组织。左庆甲闭目不

理。顿时上来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揪住他的头发，一个端着茶壶往他嘴里灌辣椒水。但左庆甲屏住气不往下咽。敌人便用力捏住他的鼻孔。左庆甲急了，牙齿一使劲，将茶壶嘴咬得粉碎，同时身上的麻绳也被挣断好几股。敌人大惊，赶紧找来一根铁丝，把他重新捆紧。后来又把他吊在屋梁上。敌人折腾累了，只得停止动刑，将左庆甲独自关在屋里，铁门上落了拳头大的锁。

到了夜里十点多钟，左庆甲估计敌人睡了，便慢慢缩紧身子，退下铁丝和绳索，在屋子里踱了两圈，舒展舒展手脚。过了一会，他把手从门缝里伸出去，抓住铁锁，再将功夫运到手上，猛力一拧，锁苗就无声地断了。

原来左庆甲自幼练过武功，精通祖传的劈挂拳，这拳种属于少林派系。据说古时候，少林寺的和尚聚众造反，与前来镇压的官兵展开激战，结果因寡不敌众，大多战死，只逃出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逃到盐山大左村的一个庙里，隐名埋姓，化缘为生。后来左庆甲的老祖宗左宝梅——八极拳拳师，看出这和尚的来历，便拜他为师，继承了少林寺源流的劈挂拳。从此世代传袭，传到左庆甲，已是第六代了。

左庆甲拧断铁锁之后，打开铁门，悄悄地走到院子里，见十多个如狼似虎的家伙守在大门口。恰在这时候，一个查哨模样的人提着灯笼，推开大门走进来。左庆甲闪身躲到院墙的墙根下，见那家伙穿过前院，径直朝后面的北屋走去。趁这机会，他一纵身窜上丈把高的院墙。他翻墙跳屋，直奔望树村外，等到踏上盐（山）庆（云）公路，才听到背后的村子里响起杂乱的枪声。

吃了亏，有了教训，我们开始警觉起来，加强了对日寇游击战术的戒备。我们通知所有打入敌人据点里的内线人员，严

密监视日寇和伪军的特务队，注意他们的动向，及时把情报送出来；并命令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提高警惕，防备和粉碎敌人的游击战术。此后，日寇的游击战术就不灵了，他们非但捞不到油水，反而处处挨打。

一次，南皮县的黄辛庄正逢大集。集市上敞棚高搭，商贩云集，人山人海。集外的各条大路上，来往的人群络绎不绝。

这时从敌人的长官据点方向来了一群人，挑着担子，推着小车，担子里装着萝卜，车子里堆的青菜。他们朝黄辛庄的集市上走来。

黄辛庄东头的一座屋子，是我高津县大队的队部住所。县大队负责人郑清霖同志的家也住在这个庄。这天郑清霖戴上帽子，正想出门到集上看看，突然闯进一个人来。

这人家住盐山霍庄，名叫谷扣子，是我军的情报员。谷扣子长相奇特，头顶中央有个凹塘，能放只鸡蛋，走上十里路也不会滚落。他没有牙齿，而且是独眼。就因他这副模样，鬼子特别喜欢逗他玩。他进出据点也就如同在自己家里那样自由，探听情报非常方便。

“啊！谷扣子，有事找我？”郑清霖问。

“有，老郑，鬼子想来袭击咱们的大队部。”

“什么时候来？”

“就现在，恐怕刚出长官据点，眼下还在路上呢！他们化了装，都扮成赶集卖菜的农民。”

“多少人？”

“不少呢！总在百十号左右，不过，甭担心，保险能把他们吃掉。”谷扣子说到这里，眨巴了一下独眼，“那批笨蛋早上化装时，把枪藏在车子上青菜底下，叫我去找根绳子扎紧，恐怕半路颠落，露出马脚。你猜我怎么样？我抱来一大捆

绳子，把机枪、步枪都他妈的绑在车档上，横七竖八缠了几十道，末了还打个死结。”

“好家伙！你倒先缴了他们的械。”郑清霖高兴地擂了谷扣子一拳。接着便集合队伍，布置伏击任务。

没多大一会，县大队的两个排出发了，他们也全是农民打扮。

在从黄辛庄通往长官的公路上，有个村庄叫小阮家。小阮家的房屋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公路两旁，恰似无数把钳子将公路拦腰夹住。县大队的战士们分散隐蔽在这些房屋的背后；侦察员则背着粪筐，戴着草帽，在公路上徘徊了望。

过了一袋烟工夫，敌人推车挑担地来了。他们忽而三三两两，忽而凑在一起，显然不象急着去赶集的菜农。等到这伙人进入小阮家村庄，郑清霖同志一声令下：“打！”埋伏在房前屋后的战士们，猛虎般地冲了出来，杀上公路。

日寇没想到会当头挨这一棒，顿时惊慌失措，撒腿就跑。能沉住气的，掀掉车上的青菜就去取枪，无奈枪支绑得很牢，匆忙中绳子一时无法解开。敌人傻了眼，赤手空拳在火网中乱窜，完全失去了还手的能力。转眼工夫，公路上便铺下几十具鬼子的尸体。只有那个领队的军曹，带伤突出包围，窜回据点。

这一仗，我军以少胜多，歼敌近一百人，缴获几挺歪把子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几十支步枪和几千发子弹，以及几十辆手推车和大批蔬菜。我军无一伤亡。

后来听说那个侥幸逃回的日军军曹，因损失太惨，被上司杀了头。

还有一次，驻盐山县城的日寇宪兵队长小林，伪装成中国老百姓，穿着农民衣服，在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溜达。他用

流利的中国话逗小孩玩，给小孩糖吃，向小孩打听周围村子里有没有八路军。这时恰巧从村口走过来两个人，一个叫董金科，是我党设在王木庄的侦通站的站长；一个叫郝秀亭，是侦通站的侦察员。小孩便告诉小林，说这两个叔叔是八路军的人。

过了一会，董金科出村了。小林便跟踪过去，并向附近的化装成小皮匠、小炉匠的特务打了个手势。这些特务立即朝董金科包抄过去，将他逮捕，送往宪兵队。

这董金科是软骨头，他害怕敌人的酷刑，当了可耻的叛徒。于是小林把他放了回来，让他仍旧担任侦通站长的角色，但要他侦察八路军的行动，通过“小炉匠”、“小皮匠”等人，随时将情报送给“皇军”。这样一来，我党设在王木庄的侦通站，就变成了日寇的情报站和联络点。

我们通过内线很快地掌握了董金科叛变的情况，但我们并不急于把他除掉，准备利用这个叛徒引诱敌人上钩。我盐山县政府的领导，经常派人同董金科取得联系，按通常方式指导他的工作，既蒙蔽了小林，也稳住了董金科。

此后不久，我盐山县政府机关驻到马庄，叫董金科前来汇报工作，告诉他县政府机关将在这里驻上两天，要他严密监视敌人动向。董金科装出认真负责的样子，表示了一番决心，说只要有他在，县政府机关就绝不会遭到破坏。县委领导夸奖了他几句，把他打发走了。

董金科回到王木庄，立即将我盐山县政府机关的驻地和人数，通过日寇的暗探，报告了小林。

当天夜里，盐山城里的日寇在小林的带领下，倾巢出动，前来偷营劫寨。与此同时，我盐山县政府机关和马庄的群众，全部转移出村子，村外则埋伏下一支主力部队。

下半夜，小林和他的人马摸进了马庄。敌人扑了空，知道不妙，赶紧往村外撤。这时候，遭到我埋伏部队的迎头痛击，当场死伤大半，只有小林带着十几个残兵逃回县城。

继马庄战斗后，小林又接连几次因听了董金科的情报，吃了大亏。他一怒之下，将董金科叫进城里，痛打了一顿，从此不再相信他的情报了。我们见董金科已经不能诱敌，完全成了废物，便将他逮捕枪决。

敌人连连吃亏，仍不服输，继续“东施效颦”，变本加厉地玩弄他们的“以游制游”战术。

一天，新海县境内的渤海边来了一批盐贩子，他们骑着一色的德州产二青驴，驴背上驮着麻袋。这些盐贩全是经过化装的鬼子兵。

原来日军早就知道我边区党政机关常在新海县渤海岸一带活动，他们想来“清剿”，但又不敢。因为这里荒无人烟，水土咸苦，东洋兵一喝上这里的水就会腹痛拉稀，东洋马一吃上这里的草同样会泻肚冒稀。他们如果想自带干粮和淡水，就要有非常庞大的供应队伍，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想速战速决，那根本不可能，这里是辽阔的苦海沿边，没有几天工夫别想走到头，没有几天工夫也别想退出去。因此，日军过去只依靠本地的伪军在新海县境内“清乡”，但伪军又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得挑选几十个身强力壮的鬼子，搜罗了一些能吃苦、能耐劳、能适应海边环境的二青驴，带上干粮和水，到渤海沿岸袭扰我边区党政军机关。

敌人的诡计很快就被我们知道了。我回民支队支队长刘振环的父亲，是个断了双腿的残废人。他平常骑头小毛驴代步。这毛驴非常乖。他坐在炕上想出门走走，只要喝一声，毛驴就会拱开门帘进来，靠着炕边，矮下身子，让主人坐上去。他想

回家，只要在驴背上轻轻拍几下，毛驴就会驮着主人走进家里，靠近炕边，轻轻一抖身子，将主人平稳地掀到炕上。大前天，这头毛驴被日寇蛮横地强征去了，他向村里人打听毛驴的下落，听说村内所有的驴子全被鬼子拉走了，而其他东西鬼子却没有要。他感到奇怪，便派人将这事报告了我们。

从此，我们就十分注意骑驴的人、尤其是成群的驴队，很快发觉了这批伪装的“盐贩”。我们将计就计，调集主力部队，装扮成去卖盐的“盐民”，推着盐车，挑着盐担，巧妙地接近了“盐贩”。“盐贩”们并不想接洽生意，一个劲地摆手叫“盐民”们闪开，但“盐民”们毫不理会，照旧蜂拥上前，很快将这批鬼子包围起来。等到鬼子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无数支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的脑袋……

日寇在连遭惨败之后，恼羞成怒。他们知道自己的“良计妙策”之所以老被识破，是因为共产党、八路军的“眼睛”、“耳朵”在起作用，所以派出无数的便衣侦探，恶狗似地到处嗅寻捕捉我军的地下情报人员，以期挖掉我军的“眼睛”，割掉我军的“耳朵”。

时过不久，敌探便盯上了我“八大队”的路虎子。他们侦知，此人早先当过“黑团”首领，同当地的大部分士绅都很熟识，在伪军中的关系很多，还在几个县城里安插了联络点，附近方圆几十里内一有风吹草动，他立即就能知晓。于是，日酋限令临邑县的鬼子中队长高冈，一月之内务必捉到路虎子。高冈接到指令，马上召集宪兵队长和特务队长开会，决定派出几个日、伪便衣，追捕路虎子。

路虎子是临邑城关路家庙人。他早年曾被韩复榘弄去受训，不久当了军事教官。后来丢官回乡，拉起一支被称为“黑团”的杂牌武装。抗战爆发后，他在我党的影响下，投身革

命，曾任临邑县县大队负责人。后来冀鲁边军区成立“八大队”（即可以在鲁北八个县域里活动的武工队，主要从事锄奸、搜集情报等工作），任命路虎子为队长。路虎子人挺机灵，又有很多老关系、旧相识，所以搜集到不少敌军情报。一九四一年左右，他又在临邑县城的柴禾市街开了个杂货铺，在顺城街开了爿酒店，叫城南张官庄的张文海、张文昌两兄弟，分别担任这两个店铺的掌柜，暗中侦察敌人的动静。从此，路虎子更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这天，搜捕路虎子的九个便衣，闯进了一个叫王庄的小村子。他们走到曾当过一段时间伪军的张自峰家里，向张打听路虎子的去向，说这次出来不抓住路虎子决不回城。

张自峰在当伪军期间，有一次随队出城抢粮，被路虎子亲手俘虏。路虎子对他交代了政策，指明了出路，便释放了他。他对路虎子十分感激。打这以后，张自峰便以养病为由，脱离伪军，回家种地了。

张自峰知道路虎子住在离这里只有八里路的一个叫张家庙的村里，但他不愿透露。他对这九个便衣说：“诸位老总先在这里耐心等等，待兄弟出去打听打听，顺便再到兴隆寺给各位买点白面来过瘾。”

张自峰说完便径自出村。他朝兴隆寺方向走了一程，然后拐弯直奔张家庙。他找到路虎子，劈头就说：“路老爷，不好啦，大祸临头啦！”

路虎子见他那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样子，便把他按到凳子上坐下，递过一杯水，让他慢慢从头说起。张自峰这才定下神，将九个便衣的来意颠三倒四地说了一遍。

“老张，你做得对！”路虎子拍拍张自峰的肩膀，“不过也别紧张，慢说来九个，就是来九十个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你

现在就回去，告诉那批家伙，就说路虎子一个人，在张家庙村住着，叫他们速速前来捉拿！”

“啊？路老爷，兄弟岂敢？兄弟对你上次刀下留情的大恩大德还没有报答，怎么能颠倒过来陷害你？”

路虎子大笑起来：“老张，你洗手不干伪军，已经是报了我的恩。这次赶来给我送信，那就是立了一大功；如果再把敌人引来，那就是立了两大功。”他说完拍了拍腰间的手枪。

张自峰明白了路虎子的意思，立即赶回村去。等张自峰走后，路虎子找来十八个战士，布置了一番，自己则端坐在屋内擦枪。

不到一小时，九个便衣侦探进来了。他们见路虎子独自坐在凳上，而且手枪零件都拆散了，以为笃定手到擒拿。那领头的对路虎子冷笑着说：“你的，路虎子？无路无路可走的！”

“哈哈，别替我担心，无路可走的恐怕倒是你们。”路虎子大笑起来。

敌人听到这话，掉头一看，只见身后都有一支冷冰冰的枪管顶着，顿时吓呆了。

路虎子从容地站起来，将他们的驳壳枪一支支缴下，笑着说：“你们这批笨蛋！实话告诉你们，游击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你们侵略中国领土，早已激起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愤恨，你们还妄想搞什么‘以游制游’，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们从侵入中国领土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了。”

敌人听着这一番话，脑袋越垂越低……

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三年春，日寇在边区疯狂地推行“囚笼”政策，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费尽了心机，企图将我边区抗日力量紧紧围困起来，加以消灭。但是，我们采取群众性、分散性、隐蔽性的斗争方式，并使军事斗争同政

治攻势相配合，不但没有被“囚笼”困住，反而给予“囚笼”以局部性的破坏，并且重创了敌军，使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逐渐归于破产。

反攻前夕

第二十九章 特殊斗争

抗日战争中最残酷、最艰苦的岁月，终于熬过来了。一九四三年春天，我们发动边区广大抗日军民，准备对敌人进行局部反攻。抗战形势的发展是喜人的，黎明的曙光已照耀着祖国的大地。

这年二月初的一天，我们军区机关驻在新海县的一个村子里，突然接到山东分局发来的电报，要我前往鲁南参加山东分局五年工作总结会议。去鲁南，要穿过敌人的许多封锁沟、封锁线，不是十天半月内可以到达的。所以，我匆忙交代工作，打点行装，准备带着爱人张玉桂同志和几个警卫员动身上路。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黄骅同志来看我。他显得忧心忡忡，一个劲地吸着旱烟，好半天没开腔，似乎有许多心事难以说出口。我感到很奇怪。前两年边区的形势那么恶劣，他都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性格；现在难关已经过去，形势正在好转，他为什么反倒很忧愁呢？

过了一些时候，黄骅同志轻轻地咳了两声，望着我缓缓地说：“我不知怎的，总担心我们的个别同志……唉！”

我明白了，原来他恐怕我们部队内部出问题，所以如此忧

愁。他所说的“个别同志”，是指军区司令员和教六旅旅长邢仁甫。邢仁甫从去年春天由鲁西回到边区后，在许多事情上，都表现出缺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比如，在艰苦的反“扫荡”斗争中，他长期躲在岛上；常用小恩小惠拉拢干部，培植个人势力；尤其是因为黄骅副司令在部队中的威信很高，他十分嫉妒，常在背后搞些小动作，给黄副司令制造了不少麻烦。黄骅同志曾几次跟我谈过这些情况。

当下，我问道：“怎么，邢仁甫最近又搞什么名堂了？”

黄骅同志摇了摇头说：“这倒没有听说。他再对我搞些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担心的是他总有一天要走上邪路，给我们部队造成损失。”

许久，我们两人都沉默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

我望了一眼窗外的夜空，见月牙儿已经爬到房顶上了，就对他说：“这样吧，你把这些情况向卓如同志谈一下，我到了师部也尽快向上面反映。”

黄骅同志说：“那好吧！”就起身告辞了。

第二天傍晚，我和张玉桂等人告别了王卓如、李启华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等同志，上路了。黄骅同志牵着我的马，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出很远。我望着他消瘦的脸庞和布满血丝的眼睛，知道他这几天没有好好休息，就关切地对他说：“你的身体不太好，要注意休息才行。”

他摇了摇头说：“没事，垮不了。”

暮色渐渐地暗下来，后面的村子显得模糊不清了。初春的晚风，冷嗖嗖的，从渤海湾吹过来，摇曳着路旁高大的榆柳树。我见离村子已经远了，就对他说：“老黄，你回去吧，风这么凉，要当心身体啊。”

他“嗯”了一声，说：“好吧，你也多加保重！”

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大步向前走去，走远了回头一看，只见他还伫立在暮色里，使劲地向我挥着手。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

我们一行人沿着渤海岸夜行晓宿，不几天，就来到了清河区。在清河区部队的护送下，我们穿过了敌人重兵封锁的胶济铁路，进入鲁中。不久，又跨过鲁中，进入了鲁南。在抱犊崮山区，找到了师部机关和分局机关，见到了罗荣桓、黎玉、陈光、朱瑞、肖华等老首长。

这时已是三月中旬，山东分局五年工作总结会议刚刚开始。这次会议，是在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即将对日寇展开局部反攻的形势下召开的。我和参加会议的其他根据地的领导同志，怀着喜悦、兴奋的心情，总结自己所在的根据地五年来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谈论对日反攻的光辉前景，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几个月。

七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一条山溪边洗衣服，忽听有人老远喊道：“周政委！肖主任要你马上去一趟。”

我急忙从水里捞起衣服，拧了几把，站起身来，匆匆赶到了肖华同志的宿舍。肖华同志紧锁双眉，剪着双手，正在屋内来回踱步。他见了我，当头就说：“边区有电报，你先看看。”

我一边抹着额上的汗水，一边就拿起电报看了起来。电报上写道：“六月三十日晚七时许，冯逆冠奎等匪徒乘我召开侦察会议之机，冲进会场，刺杀我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等五人，刺伤四人，现正在追捕中……”

我看着看着，脑子“轰”的一声，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只觉得屋内的一切都在旋转。我在心里痛苦地呼喊：这难道是真的？黄骅同志！陆成道同志！多么好的同志啊，难道真的遇难了？

不知过了多久，才听见肖华同志说：“这是空前的损失，损失太大了……血的教训啊。这么优秀的指挥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竟被几个匪徒杀害了……匪徒真可恨哪！”

我抬起泪水模糊的双眼，眼前顿时浮现出冯冠奎的凶相：朝天鼻孔，荒草似的胡子，一张血盆大口，两只眼睛射着凶光……。他原先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后来逃到新海县冯家堡投奔我们的海上特务团。当时许多同志都不同意收留他。但邢仁甫说：“抗战不分先后嘛！要允许别人进步。”不仅把他收留下来，不久还提拔他当了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长。就是这样一个家伙，残酷地杀害了黄骅、陆成道等同志！

肖华同志接着说：“新华分社发了这个不幸的消息，罗荣桓同志、黎玉同志和我也向总部作了报告。现在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可以想见，这不是个一般的暗杀事件。”他要我先回去休息，等边区的详细报告来了再说。

我回到宿舍里，心情沉重得象悬着块铅。黄骅同志那瘦削的身影；他在苍茫的暮色里伫立着，使劲地向我挥手送行的形象；他抱着腿坐在炕上，推心置腹地和我谈话的情景……这一切，是多么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几天来，我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饭吃不下，觉睡得更少，体重明显地下降。

不久，边区送来了详细的报告。报告上叙述了黄骅等九位同志罹难的经过和关于善后问题的处理：

六月三十日傍晚，细雨蒙蒙。军区司令部正在新海县离海边约六十里路的大赵村中举行侦察工作会议。会议由黄骅、陆成道同志主持，到会的有政治部除奸科长陈彪、司令部二股副股长崔光华和五股股长池田、一军分区作战参谋董兴根、侦通站站长齐耀庭、二军分区侦察参谋刘金财、三军分区侦察参谋迟麟兆等。黄骅同志首先讲话，主要是说高苗庄稼正在长成，

青纱帐快起来了，要求大家总结一下侦察工作经验，为部队出击敌人作好准备。接着由齐耀庭、迟麟兆同志发言。

就在这时候，叛徒冯冠奎带着手枪队的十一个贴身队员，穿着蓑衣，戴着斗笠，从冯家堡冒雨赶到了大赵村，摸到了会议室的门外。

黄骅同志忽见门外有几个黑影在晃动，正要喝问，不料叛徒的枪声响了。他的前额被打穿，鲜血喷涌出来，一头歪倒在地上。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陆成道同志也被打倒了。齐耀庭、池田等同志刚要举枪还击，但被叛徒们的四、五支短枪一阵乱打，都倒在血泊里。

在村东警戒的连队听到枪声，以为是羊二庄的敌人袭扰。后来发现一伙人奔出村子，向冯家堡方向潜逃，随即派了两个排紧紧追击。虽然没有追上，但子弹打伤了冯冠奎。

村中的部队赶紧派人向驻在苏基附近的区党委报告。同时救护伤员，把黄骅、陆成道、陈彪、崔光华、董兴根五位烈士的遗体装殓起来。

半夜时，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同志带部队赶来了。不久，王卓如、刘贤权、李启华等边区领导同志也赶到了大赵村。他们一面向师部报告，一面向全区发出了通令——

“各专员、县长、各级武装：

“冯逆冠奎于六月三十日晚七时许率十余人叛变，刺死我边区领导人黄骅、陆成道等同志，凶残万状……边区军民，无论男女老幼，皆应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案法办。”

当我再次到肖华同志那里，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心中不禁涌起了阵阵疑云：冯冠奎凶杀的动机是什么呢？他既然没有投敌，又逃到哪里去了呢？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是一个策划得很周密的阴谋，恐怕

不是冯冠奎能想得出来的。那么，这背后的人是谁呢？黄骅同志在我临行前的那个晚上说的一番话，又在我脑海里涌了出来，我觉得心里一沉：难道是他——邢仁甫？

我把这些忧虑告诉肖华同志时，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说：“你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本来师部叫邢仁甫到延安去受训，他说青纱帐没有起来，行动不便，一拖再拖，不肯动身。这是很有问题的！”

他告诉我，区党委另有一份报告，刚送到罗荣桓同志那里去了。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冯冠奎逃到海边后，到处骂娘，说：“邢司令叫我杀死黄骅，说事成之后给我银子，给我官做，老子挨了一枪，他也不管了……”闹得冯家堡一带人人皆知。区党委虽对邢仁甫很怀疑，但觉得在没有抓到证据之前，不便下结论，现在正组织人员进行调查。

肖华同志接着说：“联系到你上次给师部汇报的那些情况，看来大赵村事件就不是偶然的了。黄骅是个好同志啊！他很敏锐地看到了问题。”

我说：“现在师部有什么打算？”

肖华同志说：“师部的打算是，通知区党委和军区加紧缉拿凶手，以便查明事情真相。”

从这以后，我便日夜盼望着尽快查明事情真相，揪出刺杀黄骅同志的主谋，盼望着边区给分局和师部送来新的报告。

不久，我又来到肖华同志的住处，正巧这时边区党委给分局和师部送来了新的报告：

大赵村惨案的幕后策划者，果真是邢仁甫！

报告详细叙述了邢仁甫现在的活动和黄骅被刺的内幕，以及区党委最近对邢仁甫采取的斗争措施。

大赵村惨案发生后没过多长时间，躲在望子岛上的邢仁

甫，派人给住在垦区的军区独立团团团长冯鼎平送信，叫他到望子岛议事。

冯鼎平同志是个行伍出身，平时和邢仁甫比较谈得来。他一上岛，邢仁甫就把他请到自己的船上，邢的老婆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显得格外亲热。

冯鼎平问道：“邢司令叫我来，有什么要紧事吗？”

邢仁甫说：“咱们是多年的生死之交罗！有嘛事就直说了。”于是一五一十地把大赵村惨案的前后经过全说了出来：

由于黄骅同志对邢仁甫的所作所为看不惯，对他多次提出批评，所以邢仁甫把黄骅看成眼中钉。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以来，他先后组织了三次对黄骅同志的暗害，但都没有成功。

今年年初，邢仁甫在接到师部调他去延安受训的通知后，认为又是黄骅在背后捣鬼，想把他挤出边区，夺他的兵权，所以更加仇恨黄骅同志。他在大口河、望子岛，几次召集杨铮候、潘特、刘永生、陈二虎、邢朝兴等人计议杀害黄骅同志。

邢仁甫对这些同伙说：“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黄骅把我气死了，我把他杀了，边区没有军事干部，上面就不会叫我走了。”

杨铮候等人说：“就这样干，反正我们听你的！”

邢仁甫就把冯冠奎叫来，当面作了交代，许诺事成后给他一大笔钱。冯冠奎见钱眼开，一口答应下来。大赵村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阴谋得逞后，邢仁甫起初欣喜若狂，天天与几个同伙饮酒作乐。后来，听说冯冠奎嫌给的钱太少，四处骂娘，这才发了慌。他把冯冠奎接上岛来，用好言相劝，把冯稳住。同时严密封锁消息，隔断望子岛与陆地的联系。但他担心这样不够保险，害怕纸包不住火，总有一天要露出马脚。所以，他企图先

通过冯鼎平把独立团抓到手，然后作下一步打算。

冯鼎平听到邢仁甫要他把独立团拉到岛上去“自卫”时，就为难地说：“哎哟，你真不知道，独立团那么好拉？贾乾瑞、辛易之、潘大可、刘虎臣、王世延……哪个人我能招呼得动？现在要他们叛乱，那还不是自投罗网呀！”说罢一个劲地摇头。

邢仁甫给他出点子说：“咱们部队都是农民出身，地方观念很重，你去试试看，就说师部要调咱们南下集训，大家如果起哄，就趁机把部队拉过来。干部中有人顶牛，先崩了再说！”

冯鼎平无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回到了垦区。当时，独立团团部和一营驻在垦区新迁户村；二营由副团长贾乾瑞、政治处主任辛易之、党总支部书记潘大可等同志带领，在老爷庙搞整训；三营驻在老鹅嘴一带。冯鼎平趁团政委姚昌洲同志离开了新迁户的时候，派人给贾乾瑞等人送信，叫他们把二营带回新迁户。二营回到新迁户后，冯鼎平又支开贾乾瑞、辛易之、潘大可、王世延等同志，把一营长王之斌、一营政委刘仁桂、二营长刘虎臣等同志找去私下开会。

他把邢仁甫的话学说了一遍，然后，吞吞吐吐地说：“邢司令要把我们把部队拉到岛上去自卫，你们看……”

话没说完，刘虎臣呼地站了起来，手按着枪把说：“这不是要叛变吗？”

冯鼎平一听，脸刷地红了，两眼望着墙壁直发怔。

刘虎臣紧接着说：“冯团长！你太糊涂，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冯鼎平结结巴巴地说：“我也……可邢司令说……要我跟大家解释解释……那我怎么办呢？眼下，要么跟着他跑，要么开小差溜掉，否则只好去投案自首。你们看，我怎么办

好？”

刘仁桂说：“当然自首好。”

冯鼎平说：“那好吧，我去自首。”

这时候，贾乾瑞、辛易之、潘大可三同志进来了。他们听说刘虎臣等人被冯鼎平叫去开会，觉得事有蹊跷，便约定一起去找冯鼎平探探风声。

冯鼎平见他们来了，知道再瞒也没有用，就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全部说了出来，并问大家：“邢仁甫要我明天再去望子岛，商量拉队伍的事，你们看我去还是不去？”

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认为还是去好，暂时不要惊动邢仁甫，如能了解到更详细的情报，也可以向上面报告。因此，第二天早晨，冯鼎平就乘船到望子岛去了。

当天下午，冯鼎平从望子岛赶回垦区，一下船就对贾乾瑞等同志说：“邢仁甫已决定投敌，并准备去同日寇联系。我假说大伙都喜欢跟他走，他高兴得不得了，叫我们团到时候拉到无棣去。”

大家一听，便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区党委作了报告。

紧接着，驻在新海县邢家王文村的区党委，也收到了邢仁甫的信。邢仁甫要求与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等同志会合，对大赵村惨案后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安排，并建议最好能上岛去商议。这家伙以为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暴露，企图欺骗区党委，为他的叛逃投敌争取时间。

区党委的几个同志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利用会合的机会，把邢仁甫逮捕起来送师部法办。他们给邢仁甫回了一封信，同意在一起商量一下工作，但要求他下岛，到邢家王文与区党委的同志会合。

几天后，邢仁甫派通信员给王卓如同志送信，说 he 已到了

离邢家王文不远的毕家王文。王卓如从通信员口中了解到，邢仁甫只带了一个警卫班。于是，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同志和特务团副政委赵德修、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回民支队副政委刘济民等同志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由赵德修和刘济民带两个连，悄悄地将毕家王文包围起来；在逮捕邢仁甫时，尽可能避免动刀动枪。

两个连经过紧急动员，于黄昏时出发。逼近毕家王文时，天已经快拂晓了。部队在晨雾的遮掩下，向村子四周包抄过去。不料就在这时候，不知是谁“砰、砰、砰”打了三枪，破坏了预定的捕邢计划。部队赶快向村中心插去。可是，邢仁甫已经不见了。指战员们查遍了村中每个角落，还是不见他的影子。

事已至此，怎么办呢？赵德修等同志只得带着部队暂回邢家王文。

邢仁甫这条毒蛇哪里去了呢？原来，这家伙听见三声枪响，连衣服也顾不上穿，只穿着裤衩，光着脚就跑了。一出村口，就钻进了高粱地，没命似地朝海边跑。跑到一个三岔路口时，遇见一个侦察员骑驴回村，邢仁甫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快下来，快！有情况。”

这个侦察员见是邢仁甫，就信以为真，跳下毛驴说：“你骑吧，我来掩护。”

邢仁甫骗得了毛驴，急忙爬上去，一溜烟地跑了。

那个侦察员回村后，才知道邢仁甫叛变了，气得捶胸顿足，大骂自己。

斗争，已经公开了！区党委紧急商议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赶快把邢仁甫叛变的真相通告全区党组织和部队，防止邢仁甫混水摸鱼，拉走武装。因此，马上决定：一、在邢仁甫来不及

行动前，派后勤部副部长刘应扬赶到海边冯家堡一带，把那里的部队带回来。二、通知全区党组织和部队，没有王卓如签署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调动部队和财物。

刘应扬同志接受任务后，带着王卓如同志给几个连队干部的亲笔信，星夜出发。驻冯家堡的一个连和驻沙头的特务营两个排接到命令，毫不迟疑地跟着刘应扬回来了。

与此同时，区党委派专人向各个军分区送信，传达区党委的决定。并要一、三军分区注意邢的亲近人员，防止发生意外事情。

邢仁甫经呈子河逃回望子岛后，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岛上的机关、部队获知他叛变的真相。同时，派人到处散发《告边区群众书》，说：“托匪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等南蛮子杀害黄骅后，又要杀害我……”煽动部队和群众起来骚乱，并写了许多信，四处策反。

许多同志在接到邢仁甫的煽动信后，都立即把信交给了组织，揭发了邢仁甫的阴谋。在一军分区任副司令员的仇鸿印同志，接到邢仁甫的信时，立即把它交给司令员傅继泽、地委书记彭瑞林同志。他恳切地对傅继泽和彭瑞林同志说：“我过去同邢仁甫关系不错，今天他叛变了，我跟党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七月二十日，邢仁甫的一个亲信写了《向区党委的声明》，反戈一击，揭露邢仁甫从谋害黄骅同志到叛变投敌的全部经过情况，还把邢仁甫先后给他的几封亲笔信都交了出来。邢仁甫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事已如此，宜派人暗杀王卓如、李启华，就可挽回危局……想法把部队拉出来……”

区党委一边向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公布这些材料、证据，一边发出《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区同胞书》，向全区抗日军民揭露

邢仁甫的罪恶面貌。许多干部、战士和群众在得知邢仁甫叛变以后，都义愤填膺，纷纷谴责甚至大骂邢仁甫。这样，就使邢仁甫逐渐陷于孤立。

我看完区党委的最新报告，心情十分沉重：没想到在抗战形势已经好转的时候，边区会出这个乱子；没想到邢仁甫会很快堕落成为暗害抗日领导、叛国投敌的民族败类。我想，既然出了漏子，就得赶快补上，特别是不能让他拉走部队，削弱边区今后对敌反攻的力量……

没过多久，山东分局五年工作总结会议结束了。一天晚上，罗荣桓、肖华同志派人叫我到师部去。从我住的这个小村到师部所在的庄子，路虽不远，但隔着一道山梁。我披着夏夜的月色，顺着山路，急步赶到了师部。

走进师部的院子，我刚喊了声“报告”，就听见罗荣桓同志说：“是贯五同志吗？进来，进来！”

我进了屋子，屋内只有罗荣桓和肖华同志。罗荣桓同志亲热地说：“走热了吧，来，坐下，坐下！”

我坐下后，罗荣桓同志询问了我最近的工作、学习和身体情况，然后说道：“边区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全部知道了。在这场斗争中，事实证明，边区的部队和人民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现在边区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原来想让你在会议结束后就去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现在考虑到边区的局势，决定让你回去工作。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说：“服从师部的安排。这个把月来，听到边区出了这么多事，心里真急死了。在边区呆了这几年，真舍不得离开边区。”

肖华同志笑着说：“别说你，我也怪想念的，很想回去

看看。”

我接着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原在边区呆过的干部多带几个回去。”

罗荣桓同志摘下眼镜来擦着，笑着说：“好，都依你。不过，要争取早点动身，尽快赶回去！”

我站起来答道：“是！”

罗荣桓同志说：“坐下吧，我还有话说。”接着，他详细地分析了边区的战略地位和斗争形势，并对进一步处理好边区目前的问题作了指示。他认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对整个华北的抗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边区是深入敌人心脏、威胁敌人的主要作战区之一，也是将来大反攻的机动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坚持边区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边区抗日军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终于使这块根据地坚持下来了，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他指出，目前边区的这场斗争是特殊的斗争。要继续把这场斗争搞好，发动群众把邢仁甫完全孤立起来。

肖华同志接着说：“如有可能，要派人到岛上去，把邢仁甫叛变投敌的真相告诉部队。他们现在还蒙在鼓里，一旦知道事情真相，就会同邢仁甫一刀两断。”他还指示说，对这场特殊的斗争，我们要采取特殊的斗争方法，就是尽量文斗，避免刀戎相见，防止矛盾扩大，被敌人利用。

我把这些指示一一用心地记下来。等我告辞后走出院子时，夜，已经很深了。明晃晃的月光斜照在山道上，四周的一切都在沉睡。我踏着月色，急匆匆地山道上走着，想到又要回到边区了，又要见到熟悉的土地、村庄和同志们了，恨不得马上生翅膀飞回去。

两天后，我带着陈德、姚任远、马晓全、冯乐进等十多个

干部，在一支部队的掩护下，踏上了归途。

九月初，我们回到了冀鲁边的垦区，与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等同志会面了。我们决定，立即召开边区高干会议，传达贯彻上级的指示。

高干会议在垦区老鹅嘴召开，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团级以上干部。我在会上传达了师部和分局对处理邢仁甫事件的指示和分局五年工作总结会议精神。会议回顾了大赵村惨案以来的边区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各个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后，我和王卓如等同志商量，怎样才能把望子岛上的部队拉回来？经过反复考虑后，决定派海上特务团政委傅炳翰同志到岛上去做工作。因为傅炳翰是个出名的老实人，又和邢仁甫有点交情。

傅炳翰同志接受了任务，从海边一带上了望子岛。

望子岛只有二平方华里，一眼可以望穿。从望子岛到海岸的狼坨子之间，约有十多哩的水路，海水很浅，退潮时人可以涉水来往。

这时候，岛上除了邢仁甫的几个同伙外，还有司令部和后勤部的一些机关人员、特务团的零星人员、侦通站、电台、医院等，共约一百余人。

傅炳翰同志一上岛，邢仁甫的亲信杨铮候、陈二虎、潘特、冯冠奎等人立刻把他软禁起来，审问他来岛上干什么。傅炳翰说：“周政委回来了，他要我带个信给大家，请大家回去，既往可以不咎。”

陈二虎说：“这话是真的吗？”

傅炳翰说：“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扯过谎？”

杨铮候说：“这话信不得！”潘特也在一旁跟着附和。冯

寇奎深知自己的处境，更是拚命反对。

傅炳翰见这几个家伙的脑袋很顽固，就换了个话题说：“邢司令怎么不在？我有信给他。”

杨铮候抢着说：“邢司令有病，去海堡休养啦！”

傅炳翰见他老向其他人使眼色，觉得事有蹊跷。等杨、潘、冯等人散去后，傅炳翰就私下向陈二虎打听。陈二虎好讲江湖义气，把邢仁甫去天津投敌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原来，邢仁甫开始跟日寇联系时，谎称自己有四千人枪。后来他拉不动独立团，海堡一带的几个连又被我们拉了回来。但鬼子要派人到岛上接收四千人，按人数发给弹药、粮秣。邢仁甫一听慌了，觉得牛皮一破，鬼子不一定信得过他了，就急忙带着老婆和刘永生、邢朝兴上了天津。他老婆有个义母叫韩重仪，任天津救济院院长，与国民党特务系统有关系。邢仁甫想通过韩重仪投靠国民党。

陈二虎还气呼呼地说：“他去了个把月，也不回来。”

傅炳翰同志听说邢仁甫不在岛上，觉得这是个机会，正好把部队拉下岛。但是杨铮候等人一步不拉地监视着他，他有话也不能对部队说。一天，他装着解手，跟旁边的特务团文化教员李相轩说：“邢仁甫叛变了，快叫大家下岛。”

李相轩同志马上把这话传给了其他人。不到一天，岛上部队都知道了邢仁甫叛变的消息。许多人开始带着枪逃下岛去，几天工夫就散去了将近一半。

不料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邢仁甫突然回来了。他在天津等着跟国民党特务联系，等来等去不耐烦了，又怕岛上出事，就急急忙忙赶了回来。他听说部队逃散不少，气得破口大骂，马上吩咐杨铮候、陈二虎等人，派亲信人员把守岛子，不许一个人逃出。

李相轩同志在逃下岛时，不幸被杨铮候等人抓住。邢仁甫集合部队，当众拷打李相轩，问他下次还跑不跑？李相轩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出血，但宁死不屈。他忍痛喊道：“大家快跑，回部队去！别跟邢仁甫走，他是叛徒！”

邢仁甫气得暴跳如雷，忙叫手下亲信：“把他毙了，扔到海里喂鱼！”李相轩同志大骂不止，最后惨遭毒手。

这之后，岛上更加人心浮动，趁着黑夜逃跑的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怎么也止不住。邢仁甫大怒，发狠说要把傅炳翰干掉。傅炳翰同志看出了苗头，也趁着黑夜，从港湾里偷了一只小舢板，划到大口河，先躲进一个渔民家里，等到潮退时，才涉水回到垦区。

岛上逃出来的干部战士，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垦区。不久，我们从新逃出来的几个同志中了解到：韩重仪帮助邢仁甫打通了关系，邢仁甫派了亲信周保成跟着两个特务到洛阳去，向国民党第一战区参谋长挂钩。那个参谋长不大相信，说：“共产党这样大的干部叛变是极少见的，你叫他自己来。”邢仁甫接到周保成的电报后，已经赶往洛阳了。

我和王卓如等同志商量后，认为事情刻不容缓，应马上再派人到岛上去做工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大赵村惨案中的幸存者齐耀庭同志前去。

齐耀庭同志划着小舢板，刚刚靠近小岛，就被岛上的叛徒发现了。杨铮候、陈二虎、潘特、冯冠奎、刘永生等人如临大敌，人人握着枪把。等到齐耀庭登上小岛，这些家伙就围住他，一个个凶神恶煞似地问道：“干什么来的，是想钓鱼吧？”“到底是干什么的？说！……”

齐耀庭摸着满脸的大胡子，笑着说：“给兄弟来这一套，不太义气吧？”

这时岛上的部队也都围了上来。齐耀庭一眼瞥见了冯冠奎也在场，灵机一动，故意大声地说：“啊，冯大哥！你可是好枪法呀，打死了黄骅、陆成道不说，还给了兄弟这么一家伙，我可躺了个把月的炕啦！”说着扒开胸前的衣服，露出块很大的伤疤。

冯冠奎说：“这也怪我？是邢司令叫我干的！怎么着，你小子也是活该！”

岛上的许多干部战士这时才知道冯冠奎是杀害黄骅同志的凶手，而且是邢仁甫指使的，一齐轰动了！特务团二连指导员崔奎生同志带着八个人一拥而上，揪住冯冠奎就往外拖。杨铮候、陈二虎忙叫一些亲信把冯冠奎抢下来，并把崔奎生架了起来。

崔奎生大骂道：“狗杂种！杀人凶手！看我怎么收拾你！”

冯冠奎慌忙说：“快，快把他毙了！”

杨铮候老奸巨猾，知道杀了崔奎生部队就更不好收拾，便叫手下人把他放了，同时示意冯冠奎快走，免得大家起哄。

冯冠奎见周围的干部战士都对他怒目而视，知道凶多吉少，赶紧带着身边的几个人坐船逃跑。这家伙后来逃到唐山投奔日寇，日寇“赏”给他一杯毒酒，把他送上了西天。

当下，岛上已是一片混乱。干部战士三五成群的大声议论着，有的在骂邢仁甫骗了他们，有的在骂冯冠奎，说不该让他跑了。许多人在扳枪机、上刺刀、摸手榴弹，准备同叛徒干一场。

杨铮候见群情激愤，恐怕自己的性命难保，忙问陈二虎：“怎么办？”

陈二虎说：“操他娘的！邢仁甫不知在享什么清福呢，叫

老子在这里受气！妈的，愿意走的都走！”

杨铮候觉得硬把部队留在岛上，实在太危险，也就同意了。陈二虎忙喊道：“大家不要吵！愿意下岛的都可以下岛去，我派船送大家！”

部队一听这话，“哄”地走散了。许多人和齐耀庭同志一起乘船回垦区。

这样，岛上只剩下了杨铮候、陈二虎、潘特、刘永生、邢朝兴和陈二虎的几十个把兄弟。不久，眼见天气渐渐寒冷，海岸就要被冰冻封锁了，而且邢仁甫又杳无音信。这伙叛徒就偷偷地逃到无棣县城去投靠顽军张子良部。不料刚进城门，门后边突然飞出无数子弹。陈二虎和他的几十个把兄弟全被打死。这是因为陈二虎被我们收编前，曾把张子良派去游说的一个亲信杀了，张子良借机报了前仇。剩下的几个叛徒虽然逃出了县城，但后来也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杨铮候、邢朝兴先后被我们打死；刘永生解放后躲在广西，被查获后押回边区枪决；潘特化装成小贩，在北京前门卖香烟，正巧被肖华同志认出，也被逮捕归案。这些都是后话了。

等到邢仁甫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的委任状，兴冲冲地从洛阳赶回岛上时，望子岛上已经空无一人了！

后来邢仁甫投了日寇，当了“六县剿共司令”。日寇投降后，他摇身一变，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对人民欠下了更多的血债。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时，他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自大赵村惨案发生后，我们在分局和师部首长的领导下，经过一场尖锐、复杂的艰苦斗争，终于迅速粉碎了邢仁甫企图策动部队投敌的阴谋。同时，由于我们按照上级指示，对曾受邢仁甫蒙蔽的同志照常信任，并在党政军民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作，消除邢仁甫等叛徒的恶劣影响，所以我们队伍内部的团结并未受到削弱。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边区抗日军民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从而变得更加坚强。

第三十章 回民支队

邢仁甫等叛徒的破坏、捣乱，并没有能阻挡边区的抗日战争继续向着局部反攻阶段发展。

一九四三年九月下旬，我们一面向分局和师部报告了处理“邢逆事件”的全部过程；一面通知各军分区：迅速组织抗日军民，主动出击敌人，尽快拔除日伪的岗楼、据点，缩小敌占区，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为将来的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正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情报，得知驻沧州的日伪军将要进犯新海县（后来为纪念黄骅烈士而易名黄骅县），用重兵“扫荡”我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这事我们早就预料到了。因为在我军围捕毕家王文村的邢仁甫时，邢仁甫仓皇出逃，扔下许多文件，内中就有他写给沧州日酋谷川的一封信的底稿。他在信中无耻地向谷川详细介绍了新海县的战略地位，我军在该县的兵力，以及我边区领导机关在该县的常驻地点。

我和王卓如、刘贤权等同志，立刻开了个碰头会。大家认为：边区领导机关最近两年损失较大，这次应避免同敌人直接交锋；新海县有一批弹药、药品、被服等军需物资，是刚从天津运到的，还没有来得及分发到各军分区去，这批物资要设法保护，不可落入敌人手中；新海县是边区的主要根据地，也不能

容忍敌人在这里胡作非为，要给他们点厉害尝尝……。因此，我们决定：边区领导机关，分批转移到垦区和清河区去；军需物资连夜运送各军分区，剩下的迅速疏散隐藏；消灭来犯之敌的任务，则交给正在新海县境内活动的军区回民支队。

一天晚上，我将回民支队的支队长刘振环、政委王连芳、副政委刘济民、参谋长何仕兴等同志请到我的住处，向他们交代了战斗任务。

他们听说又有仗打，一个个都来了精神。刘支队长将衣袖使劲往上一捋，朝着我说：“政委，你放心，俺‘回回’（指回民）决不会给八路丢脸！”王政委也神采飞扬地对在座的人说：“俺回支，过去仗也打得不少，但鸡毛蒜皮的小仗居多，没啥油水，这回可要放开肚皮，饱餐一顿。”

屋子里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我也被大伙高昂的战斗情绪逗乐了。但我考虑到回民支队这次承担的战斗任务十分艰巨，恐怕他们轻敌，所以忍住笑，故意绷着面孔说：“据我估计，敌人来势可能比较凶猛。以往，敌人轻易不敢‘扫荡’新海县，这次既然不顾一切，冒险深入海边，可想而知，他们是下了很大赌注的。所以我们要充分做好战前准备，慎重迎敌，切不可失之大意。不过话得说回来，敌我力量虽然悬殊，但我们适应海边环境，而鬼子们不服海边的水土，这正是敌人一个致命的弱点……”

“对！”刘副政委接着我的话尾说，“新海县水土咸苦，是鬼子的天敌，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自然条件。”

这个问题一经提出，立即启发了大家。回民支队的几位领导同志，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很快便拟定出一个战斗方案：从支队里拨出几十个人，负责吸引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在海边兜圈子；支队主力则插到敌人背后去，暂时不同敌人交

锋，让东洋鬼子在海边折腾，等到他们不服水土，军心慌乱，匆匆回撤的时候，再以逸待劳，相机出击。

这个作战方案很好，我很满意。但我还是婆婆妈妈地叮嘱了几句，关照他们回去后，尽快侦察一下新海县城东面一带的地形，因为那里是鬼子和伪军退回沧州时的必经之路。刘振环等同志点点头，便告辞回去。

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钟了，凉爽的秋风吹到身上，使

计地扼杀这株嫩苗。沧州的伪自治联军副总司令刘佩臣，唆使回奸王铁匠暗杀刘振环、王连芳，妄图搞垮回民支队，结果没有成功。接着，刘佩臣又收买了土匪秃刘油子，命令他带领十几个武装匪徒混进回民支队，设法拉走部队，结果被刘振环等同志及时发觉，将其消灭，使刘佩臣赔了枪支又折兵。

回民支队成立以后，转战津南、鲁北，多次同敌人较量，消灭了大量敌人。三年来，在这支队伍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

一次，回民支队的中队长李思崇同志接到情报：盐山的十几个鬼子将要到黄崔抢粮。他立即带领一个班，埋伏在盐山城到黄崔之间的一段公路的两旁。这天中午，鬼子们大摇大摆地到了盐（山）黄（崔）公路，进入了回支健儿的伏击圈。

“打！”李中队长一声令下，公路两旁顿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鬼子们纷纷应声倒下，全部被歼。李中队长和十几个战士，带着缴获的枪支，迅速向东转移。但没有走出多远，便在一片庄稼地里，被鬼子的大批援兵追上了。李思崇等同志沉着应战，撂倒不少鬼子。后来终因寡不敌众，战士们全部牺牲；我方阵地上只剩下了李思崇一个人。他抱着一挺机枪，猛烈扫射敌人，但很快打光了子弹。他只得怀抱机枪，钻进土埂上的一个麦秸堆里。鬼子不敢掀开麦秸，生怕里面会窜出子弹，就惨无人道地放火点燃了麦秸堆。熊熊烈火吞噬着麦秸，煎熬着我们的回族抗日英雄李思崇。不一会，麦秸堆化成了灰烬，李思崇同志也被烧焦了。后来人们发现，他是趴着牺牲的，身体覆盖在机枪上面。他的肉体被烧焦了，但机枪完好无损，连木柄都没有烧坏。李思崇同志用自己的生命，把回民支队唯一的一挺机枪保存了下来。

回民支队还有一位中队长，名叫张风亭，也是宁死不屈的

回族抗日英雄。一天，他在家乡养病，被日伪军发现、追捕。他奋力拒捕，连连击毙敌人，后来弹尽被俘。敌人把他押到盐山城里。盐山日寇队长山田，亲自审讯张风亭，要他说出回民支队的驻地。他傲视日酋，闭口不语。山田发起兽性，割掉了他的耳朵和鼻子，他仍然咬紧牙关，一字不吐。后来山田狂怒起来，将他的四肢全部砍下。张风亭同志终于开口了，他大骂日寇，高呼“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直至停止呼吸。

多么了不起的回族儿女！由这样的战士组成的部队，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可以放心，回民支队这次受领的战斗任务虽然艰巨，但一定能够完成得十分出色。

我伫立在门口，呆呆地望着夜空，沉浸在长时间的回想和激动之中。等到思潮平静下来，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但我没有一丝倦意。

九月底，驻沧州的日军司令长官谷川和伪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刘佩臣，亲自率领一千多日军、四千多伪军，其中五百骑兵，从沧州出发，打算穿过新海县城韩村，拉开大网向海边推进。

谷川和刘佩臣已从邢仁甫的密信中得知，我边区领导机关常驻在新海县海边的大赵村、毕家王文、苏基一带。而且以为邢仁甫叛变不久，边区抗日军民惊悸未定，领导机关内部也肯定十分混乱。所以他们不顾海边水土咸苦，冒险进犯新海县，妄图一举捣毁我边区首脑机关。

十月初，谷川和刘佩臣带着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新海县的沿海地区。他们也知道这里环境险恶，原准备速战速回，没想到进入这一带地区，竟连我边区党政军机关的影子都没有

见着。

这时，回民支队派出的一支小部队开始行动了。他们东放一枪，西放一枪，吸引敌人追来扑去，弄得日伪军晕头转向。接着，他们又对敌人来了一次真正的袭击，尔后迅速向海边撤退，并在沿途故意丢下几双破鞋、几顶破帽，留下明显的踪迹，引诱敌人追赶。敌人象一头野牛，被回民支队的这支小部队牵着鼻子，在海边日夜奔跑。

几天后，敌人跑得精疲力竭，活象害了一场大病。特别是东洋兵和东洋马，喝了海边的苦水，大都上吐下泻，一个个元气顿丧，战斗力急速下降。

谷川和刘佩臣无可奈何，只得下令撤回沧州。撤退令一下，他们的部队可就乱了套。鬼子兵和伪军象一群群惊弓之鸟，争相奔逃，跑得快的到了前面，体弱的落在后头，队伍零零落落拉了十来里路长。真是不战自乱。

早在谷川和刘佩臣带着日伪军离开沧州，穿过韩村，进入海边的时候，我回民支队主力一千多人，已经跳到敌人背后，秘密集结到韩村东面。他们在这里磨刀擦枪，养精蓄锐，准备以逸待劳，伏击撤退的敌人。

这天上午，刘振环支队长和王连芳政委，估计谷川和刘佩臣在海边呆不住了，将要撤离海边，经韩村返回沧州。他们便带领部队，隐蔽在韩村东面的一段公路的两侧，构筑工事准备迎敌。这段公路是敌人返回沧州时的必经之地。

回民支队的设伏地点，离韩村据点很近。因为刘支队长和王政委考虑到，谷川、刘佩臣和他们的人马，撤退到韩村跟前的时候，势必认为进了保险区，会长长地松一口气，麻痹大意起来，这样就有利于我军的伏击。韩村虽然驻扎着不少伪军，但伪军总队长李景文，同我军的关系不错，他到时必定袖手旁

观，不会出援。刘振环和王连芳同志都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很会用兵。刘振环曾于一九三八年初，带领几个战士，埋伏在沧（州）盐（山）公路的仵龙堂附近，袭击日寇骑兵，击毙一名日军大佐和十几个鬼子。王连芳早在一九三三年，就和共产党员、回民刘格平等同志一起，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发动和带领群众长期坚持对敌斗争。

到了中午，回民支队在公路两旁眼巴巴地等了半天，还不见敌人的影子。有些战士急躁起来，叽叽咕咕地说：“妈的，怎么还不来？等得我们好苦！”“就是，鬼子难道在海边还没有折腾个够？”大伙说归说，但心里相信支队长和政委的判断不会错，所以还是捺下性子，憋足劲等待。

傍晚，敌人果然出现了，他们象一群逃兵，沿着公路向韩村方向奔来。

回民支队的战士们都兴奋起来。大伙紧盯着敌人，有的手指压在枪的扳机上，有的拧开了手榴弹盖子。

刘支队长压低声音对战士们说：“沉住气，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走在前面的谷川和刘佩臣，骑着东洋马，在几百个骑兵的簇拥下，进入了伏击圈。战士们心里痒痒的，恨不得立即冲上公路，杀他个人仰马翻，但刘支队长按兵不动。敌骑很快过去了，接着又来了一大批日、伪步兵，这批步兵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有的嘴里直吐白沫。刘支队长见敌人的骑兵还没有走远，所以仍然按兵不动。

不一会，敌人的大部分人马陆续过去了，而且先后穿过韩村，进入了沧州境内，已经看不见了。这时候，五、六百个掉队的鬼子和伪军，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圈。这批家伙没精打采，真象一伙老弱残兵，那副熊样，多半是被上吐下泻折腾出来

的。他们大概认为快到韩村，保险了，大都放松了戒备，有的竟倒拖着大枪在走路。

刘支队长见出击的时机已到，举起驳壳枪，朝着敌群“哒哒”打出一梭子弹。战士们听到号令，一齐开火，将密集的弹雨泼进敌群。敌人惊慌失措，纷纷中弹倒地，不一会就全部被歼。

已经穿过韩村进入沧州的谷川，听到背后响起了枪声，急忙令刘佩臣率领伪军掉头救援。

刘佩臣硬着头皮，带着伪军，磨磨蹭蹭，好不容易才又返回新海县。等他们到了韩村东面的那段公路的时候，我回民支队早已无影无踪，留给他们的只是几百具横七竖八躺着的日、伪军尸体。

刘佩臣不敢在新海县逗留，慌忙带着部队又回沧州。他们在穿过韩村时，又遭到新海县伪军总队长李景文的袭击。原来李景文和刘佩臣之间矛盾很深。现在李景文见刘佩臣部疲惫不堪，便趁机给他一个下马威。刘佩臣没有防备，吃了大亏，连自己的老命都差点贴出去。

谷川的“扫荡”失败了，但新海县的敌人据点还有很多。回民支队准备一鼓作气，乘胜出击，拔除几个重要据点，进一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刘支队长和王连芳、刘济民等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首先将躲在新海县城——韩村镇的日军宪兵队，引出来干掉。他们很快商定了战斗方案，并派人通知正活动在新海县的“铁帽子五连”，请他们到时助战。

这天，回民支队的许连芳同志，跑进新海县城，找到伪新民会次长——日本特务西川，向他报告说，八路军的回民支队正在齐庄开会演戏。西川听后十分高兴，将许连芳大大夸奖了几

句，便匆匆将这重要情报告诉了宪兵队长高桥。高桥很狡猾，他恐怕其中有诈，便命令伪军特务队长刘锡明亲自去齐庄侦察。刘锡明到了齐庄外一两里路的地方，果然隐隐约约地看见村子里戏棚高竖，还听到人声喧嚷。他不敢进村细看，便赶紧回城报告。

当天晚上，高桥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夜袭齐庄的行动计划。

下半夜，敌人出动了。刘锡明带着特务队的七十多人走在前面，日本宪兵队中队长松田，带着六十多个宪兵走在中间；伪新海县长焦定远和伪新民会次长西川，带领一千多伪军走在最后。到了羊二庄据点，松田又召集了驻在这个据点的李景文部的一个大队，约五百来人，一起前去偷袭齐庄。

敌人到了齐庄，见村子里空无一人。松田知道不妙，慌忙带领部队撤退。他们撤到村外一片荒野的开阔地里，看看四周没有什么动静，这才定下心来。

正在这时候，在黑暗的夜幕下，突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紧接着回支健儿猛虎般地冲了上来，将日寇和伪军截成两段，又分别包围起来。

伪军仗着地形熟悉，企图向北突围，占领大丰庄，但左冲右突就是出不去，不到一个钟头，大部被歼。日本特务西川的天灵盖被子弹打了三四个窟窿，也象死狗一样倒在血泊里。只有伪县长焦定远伤了左臂，带着几个伪军，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伪军都是脓包货，但日寇却比较凶顽。日寇装备好，火力猛，六、七挺机枪排成一圈，疯狂扫射，迫使回民支队难以接近。

渐渐地，东方开始破晓。两军阵容都已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突然从齐庄的东南方向来了一队“日军”，全部头戴钢盔，手持“三八”大盖枪。走在队前的“日酋”，穿着马靴，腰佩指挥刀，戴副墨镜，十分神气。

被网在包围圈中的日寇，见“援兵”到来，格外嚣张。我回民支队指战员，赶紧闪开一面，让“援兵”杀进包围圈内。这些“援兵”一靠近日军，突然枪口朝着他们开起火来。日军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倒地。回民支队趁机一拥而上，日寇全部被歼。原来“日军援兵”是“铁帽子五连”装扮的。

第二天上午，回民支队和“铁帽子五连”的同志，真的在齐庄演戏祝捷，可敌人却不敢出来了。

这以后，回民支队又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频频出击敌人，风卷残云般地拔除了新海、盐山县境内的吕桥、姚庄、辛店等主要敌据点。

吕桥村在新海县的西北角上，村北有座公路桥，桥头有一座古庙。日寇小队长稻村带着十几个鬼子和一个姓金的翻译，占据着这座古庙，将它作为据点。因为庙门正对公路桥，能够监视来往车辆行人，所以对我交通运输威胁很大。

这天晚上，天空乌漆巴黑，刘振环支队长带着一个大队，包围了古庙。但是庙门包着铁皮，院墙全由青砖砌成，有丈把高。刘支队长知道这个据点易守难攻，便命令战士们鼓噪呐喊，暂不进攻。

鬼子见我军不放枪，只是喊，一时愣住了。这庙的当院里有一棵老槐树，十几个鬼子便纷纷爬上树来窥看。我军趁机把枪口对准树叉突然开火，鬼子们象中弹的麻雀，“扑通、扑通”纷纷栽下树来，当场死伤七、八个。趁敌人惊魂未定，刘支队长带着战士们翻过院墙，冲进庙宇，很快便全歼守敌，拔除了这个据点。

拔除吕桥据点，我军没有伤亡一人，而吃掉姚庄和辛店的敌人，我军则连一颗子弹的代价都没有付出。

把守姚庄据点的是伪军一个连。这个连有个班长叫张增起，家住土楼村。一次他回家看望母亲，被回民支队的王光雨同志发现了。王光雨用耐心的教育，争取了张增起，并和他约定，回民支队两天后将要去攻打姚庄，到时请他做内应。第三天夜里，正值张增起站岗。回民支队的一支人马，悄悄逼近了姚庄的围墙，用预先约定的暗号同张增起取得了联系。张增起急忙打开寨门，放下吊桥。我军进了村子，由张增起带路，摸进了伪军宿舍，将伪军一个个拉下床，捆绑起来。伪军这个连自连长以下一百多人，全部被擒。

同样，辛店也有一个连的伪军。辛店有个牌号叫“保恒”的杂货铺，杂货铺的一个小伙计认识几个伪军。我们通过这个小伙计，摸进了敌人的岗楼，不费一枪一弹，活捉了这个连的全部官兵，缴获了小炮、机枪，以及一百多支步枪。

回民支队连战连胜，使新海、盐山一带据点的敌人整天提心吊胆，晚上都不敢出门。这一带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和巩固。

第三十一章 拔除“钉子”

近两年来，日寇为了用“囚笼”封锁冀鲁边根据地，在边区遍筑岗楼、据点。这些岗楼、据点，象密密麻麻的钉子钉在边区平原上，使我抗日军民的行动十分不便，给我根据地的巩

固和建设造成很大困难，所以非拔除不可。

最近，也就是我们向各军分区发出主动出击敌人的通知之前和之后这段时间，三军分区抗日军民在司令员黄荣海、政委李广文同志的领导下，广泛袭击敌人，频频拔除日、伪的岗楼和据点，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其中新海、盐山、庆云三县的成绩最为显著。庆云县连续拔除了尚家堂等许多重要据点，并活捉了伪军的一个团长。我因为从山东分局回到边区后大部分时间活动在三分区，所以对三分区的情况比较了解。但是，一、二两个分区的情况怎么样呢？我急于要亲自去看看。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份，我带着一个连和军区司令部作战股长周云，取道盐（山）庆（云）公路以南的地方，准备先到一分区。

这天，我们到了五桃木村，时间已是夜里十点多了，同志们都很疲惫。我打算让他们好好睡半夜，拂晓再走。

第二天拂晓前，侦察员突然跑来向我报告：“有二、三十个伪军好象要进村庄。”

听说发现敌情，我急忙起身跳下炕，一面命令侦察员继续侦察，一面命令部队在村西集合。

过了五分钟，部队集合完毕，静静地站在村西的场地上。

十一月的北方，天气冷得厉害，一阵阵的寒风迎面吹来，象针刺一样。我借着晓色，远望东边，只见地垅旁一排排黑影在移动，不用说，这是敌人。我转过头，南面远处又是一串串黑影，再向北看，黑影更多，而且还隐约听到“得得”的马蹄声。

“出发！”我下了命令。部队沿着道沟用最快速度向西行进，打算穿越旧（县）庆（云）公路，利用隔津河的有利地形脱险。我们多么希望天再多黑一会，最好再是一个黑夜。可

是，天终于亮了，现在一切都看清楚了，日伪军上千人，有步兵、骑兵、机枪、小炮。敌人的骑兵正在向右翼伸展，显然已经发现了我们，企图利用骑兵的快速，抢占坊子和旧庆公路，截断我们的去路。我军面临着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怎么办？”我自己问着自己。

“首长！”作战股长周云在叫我。这位平时爱说爱笑的同志，现在脸上显得很严肃，他用慢而重的语调说：“首长，看来这一仗少不了。硬拚要吃亏。全撤来不及。还是把我留下，带二排顶住敌人，你带同志们先走。”

“不！”我决断地说。谁都知道，要是留下一个排，他们将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处在极端的矛盾之中。

“首长，同意我的要求吧！”周云焦急地看着我，完全用了央求的口气。

情况越来越危急。每过一秒钟，敌人就靠近我们一步。时间已不容许我再迟疑不决，我知道此刻一百多人的生命，全靠我立即作出严肃、负责的决定。我再看看周云，他仍在用焦急、希望的眼光看着我。

“就这样！”我咬着牙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我回过头来，又看到副连长张树德似乎想和我说话。这个虎彪彪的小伙子，曾经在我身边当过几年警卫员，我知道他的脾气，他不多说话，自己想做的事情，先从目光里流露出来。我看出他也不想留下，就对作战股长说：“周云同志，张副连长留下来帮助你组织战斗。”

他们听到这一决定，高兴地互相握了握手。

二排的火力开始还击了。敌人愚蠢地认为我们要停下来和他们决斗，荷着枪的日伪军，弯着腰慢慢地向二排故意暴露出

的目标压缩，日寇的骑兵也转过头来向二排进攻。

“首长，请快走！”周云担心我的安全，催促我离开。枪声越来越近，子弹“嗖、嗖”地在头上掠过。在警卫员的再三催促下，我才拖着沉重的双腿离开了二排阵地。

我和同志们默默地走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我听着背后的枪声、炮声，真想带部队冲回去，但理智告诉我必须克制自己。

我们怀着沉闷痛苦的心情，穿过了公路，摆脱了敌人，到了鬲津河畔的安全地带。我们遥看东北方向，焦急地等待着二排的同志们。

正午十二点，远处的枪声由稀疏转为沉寂，这时从五桃木方向奔来两个满身血污的人。“啊，二排的同志！”我大步迎了过去。

“首长，他、他们……”这两个战士眼里含着泪花，嘴唇不停地抖动。我什么都明白了。我遥望着五桃木方向，发觉自己的视线有些模糊了……

第三天，我在宁津县附近见到一军分区的司令员傅继泽、政委陈德和地委书记彭瑞林同志，听到了一分区令人鼓舞的斗争形势，这才暂时从心里放下在五桃木殉难的二排的烈士们。

一分区的抗日军民在邢仁甫叛变后的这段时间里，以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坚持根据地，并主动出击敌人，拔除了一大批日、伪的岗楼、据点。

东光县多次破坏了津浦路，颠覆了日寇军车，使敌人的铁路交通经常陷于混乱和停顿状态。

吴桥县大队的三个小队和一个手枪队，化装成伪军，捣毁了蒋家庄岗楼，消灭伪军一个中队。

宁津县委在八月一日的晚上，发动全县抗日军民，一夜之

间将宁津县境内敌人的公路和封锁沟全部毁坏；将伪编乡和保甲制全部取消；将“户口册”、“良民证”统统收起来烧毁，使全县的敌岗楼、据点，陷入了孤立瘫痪状态。八月中旬，宁津县大队又用武力迫使詹庄岗楼伪军一个分队缴械投降；用强攻夺下了小店据点，消灭伪军一个中队和伪警察署，共俘敌一百五十余人，缴枪一百余支；用虚张声势，吓跑了柴胡店据点守敌；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攻下了大曹庄据点。至此，宁津县的敌岗楼、据点，有的被打掉，有的自动收缩合并。

一分区的抗日斗争，在傅继泽、彭瑞林、陈德等同志领导下，非常出色，其成绩远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急切希望尽快再到二分区看看。

几天之后，我告别了一分区的同志们，带着在一分区补足了兵员的一个连，离开宁津，往鲁北行进。临行前，傅继泽司令员给二分区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我的行动路线，并派了一个加强连护送。我们在行军途中，虽然碰到一些日伪军的拦阻，但敌军一触即溃。一路上，同志们横冲直撞，很快便到了鲁北。

一到鲁北，便碰上二军分区政委曾旭清派来的一个同志，他是奉曾政委的命令，带了一个营来迎接我们的。我带的部队同这个营合为一处。一分区的加强连自回宁津去了。

我在这个营的护送下，当天便在乐陵县城外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二军分区的司令员龙书金、政委曾旭清同志。

我们已经是几个月没见面了，久别重逢分外亲热。曾旭清同志拉着我的手说：“辛苦啦，政委！”

“辛苦什么，只要听到你们胜利的消息，就苦啊累的都没啦！”

龙司令员和曾政委都笑了。

“老龙、老曾，一、三分区的形势都很好，你们怎么样？”我素来就是直性子，而且和龙、曾都是多年的老战友了，所以也不来什么客套，劈头就问起工作。

曾旭清同志抓抓头皮，嘻嘻笑着，谦虚地说：“恐怕比不上老大哥分区。最近我们也有一些战绩，不算出色，请老龙给你汇报一下吧。”

龙书金同志清了清嗓子，向我详细介绍了二分区最近的对敌斗争情况。他着重向我讲述了分区主力营歼灭齐燮元伪军第九团，和“八月军民大破袭”。

一九四三年六、七月间，日寇觉察出济阳、齐河两县的伪军不可信任，便将齐燮元的第九团调到济阳、齐河，充实这两个县的岗楼、据点。齐部九团是伪军的王牌，有三个营，近两千兵力，每个连都有九挺“九九”式机枪。

齐部第九团一到济阳、齐河，这两县岗楼、据点里的敌人立刻嚣张起来。看来，要想拔除济阳、齐河两县的岗楼、据点，非歼灭齐部九团不可。

当时军分区有一个主力营，营长是赖金池同志，正在济阳、齐河一带活动。赖金池便和济阳、齐河县大队的负责人朱宝承、李聚五同志商量，决定联合行动，寻找战机歼灭齐部九团。

七月底的一天，济阳县伪军中的我内线人员送出情报，说齐部九团下午要到大小杨家、佛家庄一带“扫荡”。听到这消息，朱宝承、李聚五带着县大队，赖金池带着主力营，预先在大小杨、佛家庄一带设下包围圈。

果然，就在当天下午，齐部九团浩浩荡荡地到了大小杨家和佛家庄一带，进入了我军包围圈。我军指战员一拥而上，将密集的弹雨泻进敌群。伪军猝不及防，连机枪还没有来得及架

起来，便死伤大半，余下的乖乖举手投降。

这一仗，我军以少胜多，全歼了齐部九团，仅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

第二天，赖金池和李聚五、朱宝承又率领部队，一鼓作气，乘胜拔除了济阳、齐河境内的许多岗楼、据点。

“好！”我听到这里，高兴得忘情地叫了起来。

“好的还在后面呢！”曾旭清同志笑着告诉我：在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夜里，二分区的抗日军民一齐出动，对敌人发动了广泛的大破袭，连续攻克、焚毁二分区境内的岗楼、碉堡一百三十余座。其中，平禹县大队在几小时内，便拔掉二十多座岗楼；德县县大队的五名游击队员，化装成民夫，在群众的掩护下，混入德州市东门外的敌人罗庄军用机场，首先干掉了敌哨兵，然后放火烧着了机场塔台和几百方木材，整个机场成了一片火海。

“乖乖，那天晚上真带劲！”龙书金同志补充说，“我有生以来还是头一回见到那样的中秋夜，天上有皎洁的月光，地上有熊熊的大火，真比白天还亮！最近，陵县县大队，又在一天中，拔除了大单家、钟家寨、东蔡、王明雨、王环子、活佛庙、凤皇店等十余处岗楼、据点。”

另外，他们还向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年秋后，就在消灭齐部九团后不久，我乐陵县的区委书记刘子斌同志，在乐陵减毛王家附近，捉住日寇一个送信的，并从他身上搜出一封密信。这封信，是乐陵城日酋佐佐木写给官道刘、郑店两个伪军据点的。

当下，刘子斌将区中队的吕树林同志找来，要他立即将这封信送交三军分区首长。

密信很快送到了三军分区，又交到了副政委李雪炎的手里。

李副政委将信反复看了两遍，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模仿佐佐木的笔迹，给官道刘、郑店据点的伪军写一封假信，将伪军调出来歼灭。这样一来，官、郑两处据点也就垂手可得了。

想到这里，他将政治部敌工科干事潘云非同志找来，向他交代了造假信的任务。潘干事精通日语，而且会写一手流利的日文。他立刻找来两张从鬼子手里缴获的日本“美浓纸”，模仿佐佐木的笔迹，以佐佐木的名义，给官、郑两处的伪军写了封短信。

可是，鬼子原信落款处盖有佐佐木的私章，假信没有盖章咋行？印章到哪里去弄？李副政委早已考虑到这个问题，已经派人出去寻找政治处的统计干事郑正同志。郑干事会一手篆刻，当时正在乐陵郑家庙一带执行任务。

郑干事匆匆地赶回来了。他听了李副政委的意图，便跑到卫生队找来一根开药瓶子的钢锯条，磨呀磨，磨成了刻刀。又跑到司务处，向司务长要了一颗椭圆形的塑料手章，把它磨平。然后，他将鬼子那封信上的印章覆在章料上，再用烟袋的拐脖，在信纸的背面磨研。这办法真行！雪白的章料上，出现了三个浅红色的反字：“佐佐木”。

不一会，印章刻成了。摹刻的假章同鬼子原信上的那颗朱印，简直一模一样。

盖着假印的假信，很快送到了官道刘等伪军据点。

第二天一早，这些据点的几十个伪军，按照“佐佐木”的命令，开进了张家桥北边的一个场院里。这时场院里已经站着一个“日本军官”、一个“翻译官”，以及十几个“日本兵”。那个“军官”对伪军叽里咕噜地下了一通口令。“翻译官”马上翻译出来。

伪军立即按照口令行动：排成横队，向后转，向前五步

走，再向前五步走，向后转。等到他们转过身来一看，全都傻了眼，枪支已被“太君”搬走了。他们只得乖乖地举手投降。原来那十几个“日军”官兵都是我们的同志装扮的，扮“翻译官”的就是潘干事。

接着，我军趁机出兵，攻占了官道刘等几个据点。

我听了这些鼓舞人心的喜讯，十分兴奋，周身的血液直往上涌。我深情地遥望着辽阔的冀鲁边平原，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第三十二章 渤海怒涛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我们接到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山东军区的电令：冀鲁边和清河两个战略区合并为渤海军区。

将两区合并起来，是十分重要的战略部署。这样有利于加强领导、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有利于将来的战略反攻。

不久，分局和师部便确定了渤海军区的编制和领导班子组成人员。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龙书金任副司令员，刘其人任副政委，袁也烈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渤海军区下辖六个军分区：一分区司令员傅继泽，政委陈德；二分区司令员龙书金，政委曾旭清；三分区司令员黄荣海，政委李广文；四分区司令员王兆祥，政委徐斌洲；五分区司令员赵

济舟，政委岳拙元，六分区司令员许云轩，政委李曼村。主力部队整编成四个团：十六团团、政委由傅继泽、陈德分别兼任；十七团团、政委由龙书金、曾旭清分别兼任；垦利独立团，团长冯鼎平，政委姚昌洲；渤海军区直属团，团长郑大林，政委孙正。

新成立的渤海军区机关，驻在原清河区的广饶县，紧靠小清河一带。

一九四四年二月的一天，我和龙书金同志离开鲁北，前往渤海军区机关。我们顶着狂风，策马奔驰，一路上谁也顾不上说话，只顾赶路。我们都被抗战的光辉前景鼓舞着，心里象燃烧着一团炽热的火……

我望着眼前这熟悉的土地、村庄、河流、树木，想起挺进纵队东进以来的五年多的艰苦斗争，思潮真象千军万马在奔腾，在呐喊。多少往事，这时都被拉到了眼前：东进路上流水疾风般的队伍，乐陵南关拦住沈鸿烈汽车的黑压压的人群，韩家集公路上追击日寇的军民，大宗家血战中的刀光，打彭庄时攻坚的枪声，四柳林、王家楼、铁营洼、三汾水等地倒下的烈士，大赵村前长眠的战友……这一切，多么令人难忘！

我们终于在冀鲁边这块阵地上坚持下来了，为整个华北敌后的抗战，为全国的抗战，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在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首长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是在冀南区、鲁西区、冀中区、清河区等兄弟根据地的支持下取得的，是冀鲁边六百万军民浴血奋战争取来的，是成千上万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烈士们已经长眠地下，可是，我们能忘记他们吗？黄骅、杨忠、马振华、杨靖远、陆成道、杨承德、张秀石、杜子孚、

石景芳、邸玉栋、徐尚武、吴大风……这些县团级以上的烈士就有七十多人！而县团级以下的烈士呢？那就更是数不清了！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抗日的胜利，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浇铸了冀鲁边区这座抗日堡垒。

我对自己说，这些为国殉难的烈士，要是能看到今天的抗战形势，得知自己的鲜血没有白流时，也会在九泉之下含笑瞑目了。

两天后，我和龙书金同志在小清河岸边，与杨国夫、景晓村、刘其人等同志会合。

接着，我们便在广饶县的一个村子里，召开了两区合并动员大会。那天一早，军区机关和直属队的指战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会场。人们为迅速壮大的抗日力量和光辉的抗日前景所鼓舞，一个个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会场气氛十分热烈。

会上，我代表渤海军区，激动地向广大指战员解释了两区合并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意义；介绍了当前山东战场上令人振奋的抗日形势；要求两区部队合力齐心，将两个拳头攥在一起，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渤海军区成立之时，全国抗战局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态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九四三年一月，苏联卫国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德军防线全部瓦解。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便利了美、英军队，使他们可以抽调一部分兵力到太平洋方面来，对日本发动越岛进攻。中国解放区战场的连续的胜利出击，更增加了日军的困难。日寇为了摆脱困境，企图打通从北平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使中国大陆的日军和孤悬在南洋的日军联结起来。于是，在一九四四年初，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豫湘桂地区的新进攻，陆续从华北、华中等

地抽调军队南下。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渤海军区的领导研究决定，在青纱帐起来之后，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对渤海区境内的日伪军来一次全线出击，用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来拖住准备南下的日军，减轻国民党战场的压力，破坏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配合英、美军队在太平洋对日作战。

夏季攻势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对驻寿光、青城的伪军“灭共建国军”第八团发动政治攻势，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其反正；将广饶、寿光两县城之间的日伪据点拔除，破坏广寿公路，切断广寿两县敌人的联系，扩大我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根据地。第二阶段：主力部队攻占利津、滨县、临邑、乐陵四县城；地方部队破坏津浦路和胶济路。

即将发起的夏季攻势，是渤海军区成立后的第一个大的战役行动，是两区部队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作战。而且战役胜败，至关重要。所以，战前我们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充分的准备。我们一面加强对敌军的监视、对敌情的侦察，一面开展轰轰烈烈的战前大练兵。

北方的三四月份，正是春寒料峭的时候，天空还偶尔落下飘飘扬扬的雪花，但辽阔的冀鲁边平原和小清河两岸，却是一片热火朝天。我军的指战员们，披星星戴月亮，踩着晨露寒霜，在苦练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这五大军事技术。一个个虽然只穿着薄薄的单衣，但常常是汗流浹背。指战员们用汗水换来了过硬的军事本领。

七月下旬，庄稼地里的高粱快要扬花吐穗，早玉米也有了一人多高，青纱帐起来了。我们开始发起强大的夏季攻势。我军主力一部集结到小清河一带，向广（饶）、寿（光）两城之

间推进，以凌厉的攻势，在一天之内便拔除了几十个日伪军据点。接着，寿光、青城的伪军“灭共建国军”第八团二千多人，在司令王道的率领下，反正起义。夏季攻势的第一个阶段，宣告胜利结束。

随后，我便带着几个科长、干事，离开小清河一带，径直向西，奔赴冀鲁边地区。

八月初，夏季攻势第二阶段的作战开始了。十六团在团长傅继泽、政委陈德的指挥下，包围乐陵县城；十七团在团长龙书金、政委曾旭清的指挥下，进逼临邑县城；军区直属团、特务营，在军区首长亲自指挥下，分别攻打利津、滨县两县城；地方武装的部分兵力，则向津浦路和胶济路侧翼运动。

我军全线出击，首先攻占了临邑县城。那天，我和龙书金、曾旭清同志，集中了分散在鲁北的十七团的部队，悄悄地逼近了临邑县城。敌人见我军兵临城下，吓得慌忙缩进城里，紧紧闭上四门，据城防守。

十七团在离县城半里路左右的地方，展开兵力，向县城两翼迂回，很快便将县城包围起来。几百个伪军在十多个鬼子的督促下，惊慌地东打一枪，西放一炮。

我从敌人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隐约感觉到，敌人已经绝望，无心坚守城池，很可能在我军发起进攻之后，只是利用坚固的城墙稍稍抵挡一阵，一旦感到吃紧，就会弃城出逃。根据这种估计，我和曾、龙二同志命令十七团的全体指战员，要准备好在城外歼灭逃敌的准备。

过了一会，曾、龙二同志掏出怀表看了看说：“预定时间到了，开始出击吧？”我点点头表示同意。

霎时间，嘹亮的冲锋号声响了。随着号声，上千名八路军

健儿，高喊着“冲啊！缴枪不杀！”从四面涌向城门。城内守敌见我军来势凶猛，吓得丧魂落魄，有些胆小鬼竟连枪都打不响了。

我军冒着稀疏的弹雨，很快接近了城门。正当爆破组堆放好炸药包，准备轰炸城墙的时候，突然城门大开，敌人象一群受惊的鸭子，跌跌撞撞地夺路逃跑。

两军相遇，便是一场混战。敌人早已丧失了斗志，几乎没有抵抗能力，片刻工夫就死伤大半。命大活着的，大多举手投降，其余的则掉头转身，撒腿直往城里逃。我军一面收容俘虏，一面趁势杀进城去，很快便占领了临邑城。

十七团拿下临邑之后，我便飞马直奔乐陵。

到了乐陵，县城已被十六团攻下。我策马进城，只见市民们笑逐颜开，忙个不停。昔日在日伪统治下冷冷落落的大街小巷，现在又热闹起来。店铺全开张了，吆喝、叫卖的声音里充满了欢快；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一张张脸孔，消失了往日的紧张和愁容，全都舒展开来。乐陵城又恢复了生机。

“形势发展真快啊！”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三九年我们撤出乐陵县城，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回来了。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头，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要收复全部沦陷的国土，把日寇赶出中国。”

我在乐陵找到傅继泽和陈德同志，了解到一些情况，尔后便离开乐陵，回到了军区机关驻地。

这时军区指挥所设在滨县城东关。滨县城已经陷入了我军区直属团和特务营的重围之中。我在指挥所里向杨国夫司令员简单地叙述了收复临邑、乐陵两城的经过。他听后兴奋地说：

“好！我们攻打滨县的战斗也快开始了，你来看看。”说着便拉住我的手出了指挥所。

他指着孤零零地蹲在旷野里的滨县县城对我说：“城里的守敌不到一千，但城墙坚固。同志们正向伪军喊话，要他们献城投降，如果他们顽抗，我们就用炸药炸塌城墙。”

我侧耳细听，果然一阵阵喊声传了过来：“伪军弟兄们，快投降吧！”“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再不投降，就请你们坐飞机上天！”

我正听得出神，忽见一股夹带着断砖碎瓦的粗大的烟柱，拔地而起，紧接着听到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随后便是枪声大作，杀声连天。滨县城墙被炸塌了一角，总攻开始了。直属团和特务营的指战员，在团长郑大林、政委孙正同志的带领下，冒着硝烟尘土和从空中纷纷跌落的断砖碎瓦，跨过炸塌的城墙废墟，冲进城去，以迅猛的攻势压垮了敌人，夺取了城池。

几天以后，我们又挥师东指，攻克了利津县城，全歼伪“华北绥靖军第八集团军”第二十七团及日军一个小队，共一千七百余，活捉伪团长苏冀甫。

在主力部队连克四城的同时，我地方武装也收复了许多重要集镇。还严重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津浦线上，东光至沧州段的路轨一部分拆毁；胶济线上，潍县至济南之间的周村一带，连路基都给扒了。

夏季攻势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在这以后，渤海军区广大军民又多次对日寇进行局部反攻，同时厉兵秣马，掀起了大练兵、大参军、大生产等热潮，准备迎接抗日战争最后的战略反攻。

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号召一切抗日力量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接着，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军投

降。这时候，冀鲁边平原和小清河两岸的百万军民沸腾起来了！渤海军区对日大反攻的队伍，犹如咆哮的渤海怒涛，汹涌奔腾，席卷日伪，终于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附 录:

冀鲁边根据地县团级以上 抗日烈士名单

于文斌(冀鲁边区工委书记),刘子芳(津南特委军事委员),马振华(津南地委书记),邸玉栋(一地委组织部长),石景芳(一专署专员),杜子孚(一地委书记),黄骅(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教导六旅副旅长),陆成道(冀鲁边军区参谋主任),杨靖远(第六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王俊峰(盐山中心县委书记),赵新民(盐山县委书记),傅国光(冀鲁边区《烽火报》主编),杨柳新(教导六旅十八团团长),王家骥(南皮县县长),赵金生(新海县工委书记),汪士民(新海县县长),刘保田(无棣县县长),崔兰仙(一专署妇救会主任),李光前(东光县委书记),王哲(东光县副县长),杨忠(教导六旅政治部主任),吴匡五(陵县县长),曾庆洪(挺进纵队五支队五团政委),谢甲树(挺进纵队五支队五团特派员),张策平(挺进纵队五支队六团团长),朱挺先(挺进纵队五支队五团政治处主任),徐尚武(二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永安(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张秀石(张博,三地委副书记),杨承德(三军分区司令员),赵元明(商河县委书记),张维明(宁津县委书记),吴大风(阳信县县长),孙清野(阳信县委书记),张同仁(乐陵县委书记),阎登山(庆云县委书记),

张玉梅（盐山中心县委书记），张培芝（冀鲁边行政公署秘书长），张洁元（德平县委副书记），于慎德（庆云县委书记），张茂连（沾化县独立营教导员），王玉琢（无棣县县大队政委），马锡臣（军分区宣传科长），王世明（陵县县委书记），李景岳（三军分区参谋长），魏方林（宁津县县长），刘文同（冀鲁边军区组织部副部长），余致远（乐陵县县长），石廷同（阳信县委副书记），尹华平（南皮县县大队副大队长），陈立民（商惠县县大队副大队长），陈怀治（商河县县大队副大队长），韩文山（商河县战委会主任），吕器（一专署文救会主任），杨洪恩（二专署秘书主任），李恒泉（二军分区副政委），段培圣（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陈云彪（冀鲁边军区保卫科长），崔光华（冀鲁边军区侦察科长），姚思清（乐陵县委书记），于志洪（冀鲁边军区民运科长），杜杰（冀鲁边军区敌工科长），路牟班（教导六旅十六团参谋长），孙炳炎（鬲津县县大队政委），许景尧（冀鲁边军区宣传科长），于立平（三军分区民运科长）。

（说明：一、抗日时期牺牲在冀鲁边区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共计七十余人，而列入这份名单的只有六十六人，因为有些县团级抗日烈士的姓名和具体职务尚未完全查清。二、括号内所注，是烈士牺牲时的职务。）

后 记

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碰见许多曾经在冀鲁边平原和我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

老战友相逢，自然是一阵亲热，但又不禁感慨万分。时光过得真快啊，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当年个个英气勃勃，如今都已是两鬓苍苍。大家回首往事，谈起四十年前冀鲁边的战火硝烟，仿佛又回到了那艰苦的岁月，又投入了跃马挥戈，驱逐日寇的战斗。大家神采飞扬，情绪激奋，好象年轻了许多。就在这感情冲动之际，战友们立下了一个宏愿，写书，写一本回忆录，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记载下来。

稍稍冷静之后，大家又议定了这本书的内容和写作要求：着重反映冀鲁边根据地六年多的武装斗争，力求史料翔实，文笔生动。由于我在那里呆的时间长些，大家便要我将这事承担下来。我慨然应诺，但又惴惴不安，唯恐辜负重托。

从北京回到南京家里，我便闭门谢客，静下心来凝神沉思，将年代久远的往事一件件拉到眼前。但我毕竟年近八十，记忆力比以前差了许多。为了广泛搜集史料，核对史实，我先后在北京、济南、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邀请老战友座谈，共同回忆冀鲁边根据地斗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并且致函或电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请他们提供资料。

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开始向金仲如、杜文和同志讲述自己当年在冀鲁边区的斗争经历和所见所闻。不料到了五月间，我突然中风，全身濒于瘫痪。不久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仍然半身不遂，手脚麻木，说话不便。我苦恼极了，心想：回忆录写不成啦！可是我躺在病榻上，每当闭目静卧的时候，脑子里便映出了一幕幕图象：冀鲁边平原上的血火硝烟，烈士倒下时的怒容，幸存的战友们殷切期望的目光……这一切，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沉重的内疚之情一阵阵涌了上来。我躺不住了，又强打起精神，坚持每天断断续续地口述两三个小时。

这年秋后，我又委托郑正、杜文和、朱利民三位同志，专程到冀鲁边区和天津、北京等地，调查采访，核实史料。他们奔波了三个多月，满载而归。接着，我和辛国治、金仲如、郑正、杜文和、朱利民同志，在杭州又对史料进行了一次讨论。以后杜文和、朱利民两位同志便帮助我整理初稿（本书一部分章节的初稿系朱利民同志整理，后来他因事离去）。

前后历时两年之久，书稿终于草成。

书成之后，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为本书题签了书名。肖华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本书仔细地进行审阅，并为本书作序。在此，我谨向两位首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调查史料和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山东省委和德州、惠民、沧州三地区及所属各县党政军机关的支持；曾得到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大力帮助；特别是在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战斗过的许多老同志，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史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我已年逾八十，记忆、精力均不如以前，书中疏漏和差错在所难免，谨请读者赐教。另外，我在冀鲁边区工作时，主要担

负部队领导职务，对地方工作缺乏了解，所以本书涉及地方工作的笔墨较少；这一缺憾，有待于当年在边区从事地方工作的老同志，另撰专文予以补救。

周贯五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杭州

负部队领导职务，对地方工作缺乏了解，所以本书涉及地方工作的笔墨较少；这一缺憾，有待于当年在边区从事地方工作的老同志，另撰专文予以补救。

周贯五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杭州